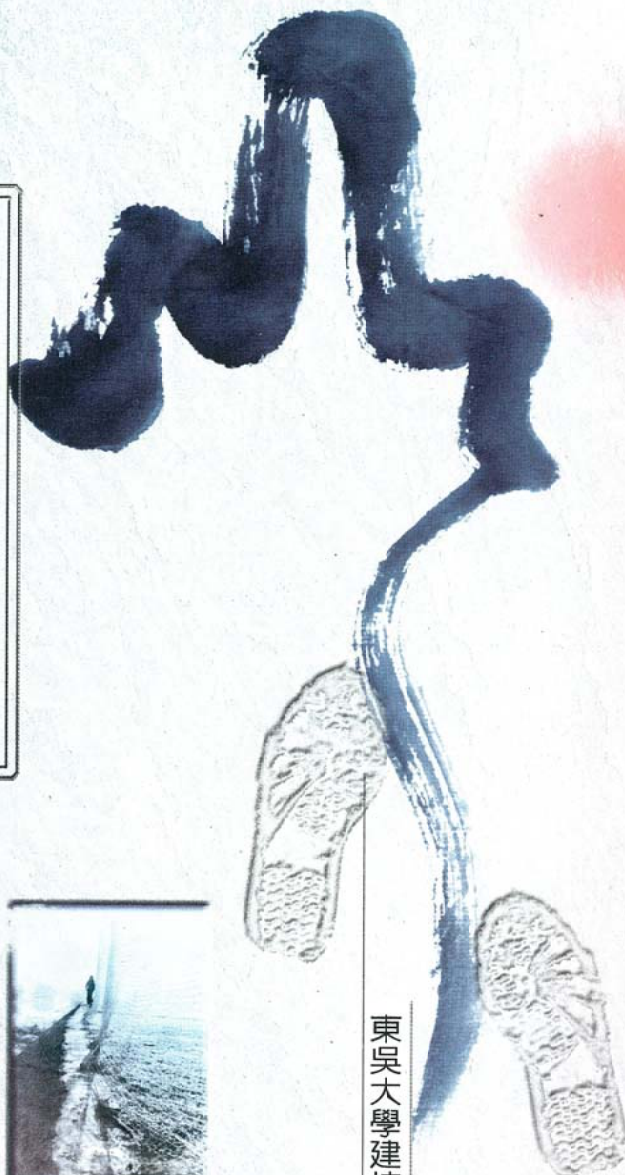


坎坷與榮耀



東吳大學建校百年紀念文集



王紹堉、唐松章、陸潤康
楊其銑、城仲樸、張曉風
郭俊惠、陳朝威、廖玉蕙
劉源俊等著

坎坷與榮耀

東吳大學建校百年紀念文集

F0041934

525.82
116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坎坷與榮耀：東吳大學建校百年紀念文集 / 張
曼娟主編。-- 一版。-- 臺北市：書林，
2000〔民89〕

面：公分

ISBN 957-586-855-2（精裝）

1. 東吳大學

525.8232

89001416

感謝高雄縣東吳大學校友會贊助出版

坎坷與榮耀

——東吳大學建校百年紀念文集

定價：370元

總策劃／劉源俊

主編／張曼娟·林伯謙

執行編輯／鄭秀涼·高岱君·陳慧霽

校對／吳家宜

採訪整理／劉琬茜·吳家宜·吳凡影·陳琬菁·
林育丞·杜佳紋·高岱君

照片翻拍／章宜珊

出版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二樓之五

電話：23687226 FAX:23653548

發行人／蘇正隆

郵撥／15743873·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印刷／永光彩色印刷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2000年2月一版

ISBN 957-586-855-2

目錄

序 坎坷的復校路程	楊其銑	007
壹 掌燈擺渡的師者		
大學生涯憶東吳	白培英	025
杏壇心·東吳情——記恩師楊懋春教授	蔡明哲	030
溪城與我	賴錦雀	036
白雲還守舊時山	黃永武	044
塵封往事，一世恩師	謝志偉	050
所得已多	王瓊玲	058
曾經，此水清清——溪城憶往	張曉風	063
李傑老師的故事	鄧東濱	069
與端木校長忘年之交	武憶舟	075
永懷恩師黃奉儀博士	孫清吉	083
結緣東吳三十年憶往二三事	成永裕	087

貳 璀璨的文學光澤

- 風雪般的名字——民國五〇年代的文學東吳……………林炯陽 097
- 時光左岸……………孫梓評 103
- 嚮往破繭而出的美麗……………廖玉蕙 110
- 消息：四年、百年或千年——記一個社團、一群人、一些夢……………吳繼文 117
- 我在《東吳半月刊》的日子……………李宜涯 125
- 掀起簾幕的秘密……………張曼娟 133

參 流轉的社團風景

- 社團擺渡者……………高建文 141
- 我愛幼幼！……………古美鳳 146
- 東吳社團逸事……………鄭汝璜 152
- 歌吟古調話停雲……………王偉勇 158
- 拓荒及守靜——羅浮童軍團憶往……………帥以宏 164
- 雙溪七載熔爐鑄 淬鍊頑鐵一世情——記一段有感覺的歲月……………李河泉 172
- 一箱箱檔案……………簡顯鐘 179

肆 宜晴宜雨來時路

我在東吳的回憶	李玉華	187
東吳的女兒	馬君梅	191
從魔笛手到伯恩斯坦之路	郭聯昌	197
會計人的創新與魄力	郭俊惠	203
銀河夜夜流	陳朝威	210
那個年代，那些人	陸潤康	217
燦如水晶	城仲模	223
留聲	邱稚亘	229
用生命寫笑話——我在東吳的那段日子	管仁健	234
微生物的蹤跡	吳慧琳	242
我們的故事	黃昇瓏	247
隨機工作，彈性生活	魏永篤	254
弦裡的春天	蘇顯達	260

伍 風物樣貌幾更迭

書香裡的生活點滴	潘懷宗	267
航向記憶的沙渚	唐松章	272
天人合一，止於至善	趙沛明	277
在愛和創新的歲月裡——在東吳大學任職的十六年	成嘉玲	284
看見一座碧綠的山城	曾惠中	290
二十年與東吳圖書館共成長	王中一	296
回首來時路	許玉珍	303
深深埋藏	張維中	307
小記「人民公社」	阿盛	314
驀然回首	王宣一	318
百年樹人話東吳	陳松雄	321
片片語絲憶東吳	謝政諭	326
偶然續前緣——話東吳理學院在台灣的生與長	劉源俊	332
東吳與我	王紹堉	338

坎珂的復校路程——代序

楊其銑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易幟，一切都有了變化。在教育方面的重大改變之一就是廢除了私校制度。一九五一年，正當江蘇省教育行政當局將東吳大學收歸公有並籌辦江蘇師範學院的時候，也正是東吳校友們在台北為恢復母校而到處奔走的時候。

當時台灣的人口將近一千萬，但有幸能接受高等教育者僅占極小的比例，因為四年制的大學院校只有四所，即國立台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及省立工學院，而且在設備及師資均感不足的情況下，每年錄取人數極其有限，因此被摒於大學門外的高中畢業生年有增加。東吳大學旅台同學會（後改稱東吳大學校友會）有鑒於此，乃決定在台復校。

決定復校後的第一步是先成立校董會。一九五一年八月正式成立，經與同學會數次會商，決定先恢復法學院，並在報呈教育部核准以前先設補習學校。蒙伍守恭校友協助，借得坐落台北市漢口街一段十五號三層樓房為臨時校舍，並請丘漢平先生出任校長。此一補習學校與其他以升學為目的補習班不同，名義上是補習學校，而實質上則按照大學制度開課。一

切籌備就緒，東吳補習學校即於同年十月招生，十一月正式上課，分法政、商業、會計、英文四科。另設比較法律一科，限大學肄業二年者報考。

一九五二年九月校董會改組，推選王寵惠先生為董事長。丘校長辭職，改聘施季言先生接任。兩年後（一九五四年）教育部以東吳補習學校辦理頗著成績，乃於七月二十九日核准東吳大學先行恢復法學院，准設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四系及附設外國語文學系共五系。同年八月校董會再改組，定名為東吳大學董事會，選舉董事十五人，並推王寵惠先生繼續擔任董事長，聘陳霆銳先生為法學院院長。

法學院恢復後，最迫切的工作是覓地建校。另一件刻不容緩的事就是與東吳的原創辦教會取得聯繫，希望教會儘快與學校恢復當年的關係，協助東吳在台復校。不料兩件事都不如人意。

購地建校因財力有限，困難重重。在台北近郊建校最為理想，但地價昂貴，買不起。遠處則因交通不便不能考慮。建校小組從一九五四年起幾乎每天都在找地，眼看一年過去了，毫無進展。此時，法學院各系因自然增班，原漢口街三層樓房已不敷用。不得已，乃將博愛路八十三號鶴鳴鞋店二、三樓承租下來，區隔為大小五間教室勉強應付。漢口街的臨時簡陋校舍被稱為「本院」，鶴鳴鞋店樓上為「二院」。體育課只能在星期天借用其他學校的操場舉行。因為地狹人眾，致使一般人提起東吳就會聯想到擁擠。

儘管如此，校內並無怨言。因為學校一切措施悉遵教育部規定辦理，所聘教師皆一時俊彥，對學生之課業、考核從嚴，故師生均能共體時艱、堅忍圖強，反而使東吳蔚成一種崇法務實，樂觀進取的校風。

但是外界的看法並不如此。特別是當時有些專科學校因想升格為四年制獨立學院而未獲准，便紛紛指責教育部何以獨厚東吳。有一所專科學校校長在該校周會上常向學生提到「台北市某術堂大學」，所指的就是東吳。教育部此時確實有些後悔，不該在東吳尚無任何硬體設備之前即准其復校。教育部承受不了來自各方的壓力，只得催促東吳趕快購置基地，興建校舍，並傳口信，若不能在年內完成即撤銷立案。所以東吳有一段時期可以說是在風雨飄搖中度過的。

東吳大學原係美國基督教南方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於一九〇〇年創辦於蘇州。該教派於一九三九年與其他兩支派合併後改稱衛理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東吳成立以後，美國基督教其他教派也陸續在中國創辦大學。到抗戰前為止已有十三所之多。當時有一個為謀求基督教大學共同發展而成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簡稱UBCCC），東吳於一九四六年入會。三年後大陸變色，基督教撤退，該會即改組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簡稱UBCHEA，中文簡稱聯董會），並

決定用原來十三所大學的經費在台灣成立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就是在台中的東海大學。

衛理公會拒絕了台北東吳大學法學院所提恢復固有關係的請求，理由是衛理公會已同意聯董會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並已將捐款撥與聯董會，因此無力再支持東吳，更何況東吳復校並未事先與衛理公會磋商。

衛理公會總部設在紐約。主管美國本土以外傳道事務的機構叫做「衛理公會世界差會海外傳道部（World Division of the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Church），台灣教友多簡稱爲「差會」，其執行秘書鍾士先生（Tracey K. Jones, Jr.）掌握大權。差會雖不願與東吳恢復固有關係，但是當時的港台區黃安素會督（Bishop Ralph A. Ward）因爲目睹東吳人爲恢復母校所作的奉獻及努力深受感動，乃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差會這才答應成立協商小組先行研究東吳與衛理公會應維持何種關係。

一九五五年是很不好過的一年。籌建校舍及爭取衛理公會支持均無法達成，加以原補習學校的舊生、畢業生及復學生之學籍問題無法解決，而陳霆銳院長又於六月辭職，董事會一時無適當人選接替，只得推聘江一平、富綱侯、施季言三位先生組成院務委員會，暫時維持院務。該委員會於同年九月結束。董事會延聘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曹文彥先生爲院長，前述學籍問題乃陸續獲得解決。

曹院長到任後不久董事會改選，王寵惠先生仍任董事長。副董事長二人，分別由黃安素

會督及黃仁霖先生擔任。一九五六年奉准增設中國文學系以作將來恢復文學院之準備。此時，覓地建校已不能再拖延。幸賴施季言先生（受聘東吳補校校長前曾任陽明山管理局局長）向士林鎮公所提出東吳建校計畫，鎮長及地方士紳當即表示歡迎。經鎮民大會通過，規畫土地十五甲為東吳建校基地。其中一部分由東吳購買，其餘則由鎮公所捐贈。東吳只須賠償地上農作物新台幣三十萬元。這對師生及校友而言，真是一個天大的喜訊。士林地處台北市郊，環境優美，交通方便，完全符合建校條件。

一九五七年曹院長奉派出任駐美文化參事，董事會聘石超庸先生接任院長。石院長接事後，積極推動建校事宜。

事實上，董事會及同學會早就展開了捐募運動。紐約差會經由黃會督的努力，允撥美金一萬五千元作為購買土地之用，不足之數由台灣本地之捐款補充。至於第一幢大樓的建築費，除了在台灣所募得之款項外，其餘捐助分別來自美國衛理公會東南轄區（The Southeastern Jurisdiction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曼格特基金會（The Manget Foundation）、艾里斯菲力浦基金會（The Ellis Phillips Foundation）及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等，共計美金九萬餘元。當時折合新台幣計二百六十餘萬元。

一九五八年秋，東吳大學在台復校後的第一幢教室兼行政大樓終於落成，巋然屹立于風景如畫的外雙溪畔，背面是蒼翠欲滴的青山。這是全校師生四年多來所夢寐以求的。大樓門

窗尙未裝設，土地尙未推平，各個班級便紛紛以外雙溪新校舍爲郊遊目的地。學生們搶著爬上窗台照相。有一位同學興奮過度，不慎跌落窗外，雖然疼痛難忍，卻仍笑著說：「值得！值得！」他爲什麼說值得？因爲以後別人若問起東吳大學在哪裡？他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在山明水秀的外雙溪。」這是全體師生和校友們的心聲。這件事也可以說明何以現在的新生初進東吳校園會大失所望，而畢業三十年以上的校友重回東吳，看到母校有今日的規模，竟感動的流淚！

一九五八年秋，各系學生除法律、會計兩系二、三、四年級外，都遷入新校園上課。博愛路「二院」隨即退租。

新校舍落成確爲喜事一樁，但同年也發生了兩件不幸的事，那就是王董事長寵惠及黃副董事長安素相繼去世。這是東吳無可彌補的損失。東吳大學能以在台復校實得力於王董事長，他同時也是東吳的精神支柱。黃會督則除了到處奔走爲東吳勸募外，對推動學校與衛理公會重建關係方面更是不遺餘力。逝世的前三天還在興高采烈地爲東吳籌款建校。據他的好友莫立魯（Miron A. Morrill）教授告知：黃會督自一九五五年起，三年內不斷奔波於香港與美國之間，到一九五八年秋爲止，他的朋友們認捐的數目已累積到數十萬美元。學校隨即繪製出一個完整的建校計畫圖，此圖至今仍存於本校圖書館校史室內。黃會督於此時離開人間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最「屬靈」的基督徒可能都無法自圓其說何以黃會督突於此時蒙主寵

召。這絕對不是上帝的意旨。

俗語謂：「人在人情在」，中外皆然。黃會督逝世後，原認捐人，尤其是口頭認捐者多不承認，或儘量拖延。東吳前景又開始令人擔心。

新建三層大樓已正式命名為寵惠堂，空間甚為寬敞，除教室、辦公室、會議室及教授休息室外，圖書室亦設在此大樓內。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座學生活動中心。經設計估算，約需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元。這一筆款項必須完全自行募集，對象為台港兩地的校友。

學生活動中心為一雙層大廈，其中部分於一九五九年先行完成。下層為餐廳，可供四百餘人同時用餐；上層為球場兼禮堂，其中三分之一隔為圖書室，其餘三分之二為集會及活動之用。如此便可騰出原先寵惠堂的圖書室以增加教學空間。同年，男、女生宿舍，院長、教授及員工住宅亦相繼竣工。

到一九六一年夏為止，學校遷入外雙溪已三年整，但社會一般人士仍認為東吳的校舍在嘈雜的漢口街。為了東吳的形象，石院長遂決定將仍留漢口街的各班級全部遷至新校園上課。這一來，新校舍就顯得擁擠了。

當時的校牧及教友們認為，既然黃會督生前所募之款項，認捐人多不願承認，現在何不在校園裡建築一幢禮拜堂並命名為安素堂以紀念黃會督。勸募對象就以原來的認捐人為主。這個建議很好，當即由莫立魯教授與差會及美國各地教會積極聯繫，希望此一構想能早日實

現。

東吳與衛理公會的關係仍未明確。黃會督雖已離開人世，但繼任的幾位兼任會督如俞斯（Richard Fred Raines）、柯森（Fred Pierce Corson）、史宓斯（W. Angie Smith）、穆爾（Arthur J. Moore）及華納（Hazen G. Werner）等因為常來校視察，比差會的職員更了解東吳。他們每視察一次就對東吳多一分同情，因此都各自在其教區為東吳捐募。雖然為數不多，但對彌補年度赤字方面確有很大的幫助。

差會既無法擺脫東吳，而原先打算將東吳合併於東海的提議又絕無實現之可能，鍾士先生乃致函石院長，建議東吳只辦法學院。如願合作，差會將從優補助云云。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東吳不答應，補助就沒有了。但是，恢復完整的東吳大學是董事會及同學會的既定政策，而且教育部核備的名稱是「東吳大學法學院」而不是「東吳法學院」。董事會在教育部備案的名稱是「東吳大學董事會」而不是「東吳法學院董事會」。鍾士的建議遭到了石院長的回絕，乃於一九六二年籌組一個三人小組來校考察並作成報告，差會就依據此一報告來決定應與東吳維持何種關係。考察小組的三位成員是：曾約農先生（前東海大學校長）、葛魯斯先生（John O. Gross，衛理公會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組組長）及朱育光先生（紐約 Skidmore 學院教授）。

三人小組除會見東吳行政主管及校友而外，並訪問若干學系與師生交談，而後撰寫報告

供差會參考。

報告中對學校頗多讚譽。三人一致肯定東吳在困境中所作之努力與奉獻。尤其在提高教學水準上是值得私立大學效法的，因為私立大學的學雜費高於公立大學，故得不到成績較優的新生。但在教學認真、淘汰嚴格的制度下，東吳的畢業生都是一流的。他們無論參加研究所考試、出國考試或就業考試等，其成績都不亞於公立大學。報告中所提應行改進事項也都是事實。茲將三人小組之建議概述如下：

一、美國衛理公會與在台復校之東吳大學（現為東吳大學法學院）恢復固有關係並正式訂立協議以確認此種關係。

二、東吳大學明定其辦學理念及宗旨。

三、將來如能恢復完全大學，宜分三院九系。

四、東吳應有自己的特色。

五、差會協助東吳選送優秀青年教師前往美國深造。

六、差會多派美籍傳教士來校擔任英語教師。

七、在恢復大學建制以前必先興建圖書館，增添圖書，增加教室，增聘專任教師。

到一九六二年為止，復校已八年，尚無圖書館，因此多年來都無法擴充圖書設備。這一

點全校師生都很清楚。學校既有苦衷，只好暫且忍耐。所幸三人小組完成考察任務後不久，安素堂及圖書館聯合大樓之建築費即宣告籌募完竣，共得美金九萬七千餘元。這真是令人興奮的消息，但問題又來了，山坡蓋屋，花費一向比平地大。安素堂的預定地是一片山丘，必須剷平並將土石運出校外。僅僅這兩項的開支就已占了建築費的四分之一，再加上既高且長的擋土牆，經費就只剩下一半了。正在發愁之際，陽明山管理局因需要大量泥土填平仰德大道及至善路交叉處之窪地，乃派遣官員來校商議，是否可以就近在東吳山坡地挖土。學校當局聞言大喜過望，立刻欣然同意，管理局隨即派一工程隊，用了數月的時間，將山丘一一移走，騰出了建堂用地。當時爲了方便運土車行駛校區，特開闢了一條環山道路，這剛好也是東吳極爲需要的。學校沒有花一文錢就把山移走了，而且還多了一條環山道路。這種好事只可能在夢中出現，現在居然成了事實，校內的基督徒大都感謝上帝，部分人認爲這可能是上帝因誤召黃會督而給予東吳的一個補償。非基督徒則說這是黃會督顯靈。

安素堂於一九六三年動工，翌年秋落成，左側爲禮拜堂，右側爲圖書館，是集「靈性」與「知識」爲一體的建築物，可稱爲東吳校園的中心；又因此樓正好面對校門，一進校園就可看到，故又可稱爲東吳的地標。本來整幢樓房都叫做安素堂，後爲紀念台灣最後一任美籍會督羅愛徒（Oro Nail），乃將右側圖書館命名爲「愛徒樓」。「愛徒」即 Oro 的音譯。

三人小組認爲當前東吳最需要的是圖書館，現在已經建成，只待寬列預算，購買圖書及

增訂期刊。其他應辦事項如培養師資、增加專任教授等均非一蹴可幾，學校定會盡力而為。

三人小組的報告對東吳頗有好感，否則不會在第一條就建議差會與東吳恢復固有關係，同時對恢復完全大學亦未表示異議。這當然不符合差會的意思，因此於一九六五年再度派遣葛魯斯及另一位差會主管教育的職員卜倫保（Thoburn T. Brunbaugh）來台北，對東吳的發展方向及應與差會維持何種關係作最後一次評估。此二人在臺停留十二天，除會見東吳石院長、董事及有關教職員外並訪問行政院嚴家淦院長、教育部閻振興部長，聯董會范維廉（William Fenn）總幹事，東海大學前任校長會約農先生及現任校長吳德耀先生等。二人回美後也作成一個報告，其主要建議事項如下：

- 一、鼓勵東吳向聯董會申請會員或準會員資格。
- 二、東吳與東海大學合組協調會。
- 三、協調會成立後應邀請差會派代表參加第一次會議，以便研商兩校合作事宜。
- 四、差會應繼續要求東吳提高學術水準。
- 五、在未與聯董會達成協議前暫緩討論恢復大學建制之計畫。
- 六、今後對東吳之經援如必須告一段落，最好分三年逐漸減少，不宜驟然停止。

從以上之建議事項及差會之反應，可以看出差會比較熱衷於兩校的合作事宜，對東吳恢

復大學建制的計畫不感興趣，因此只願給予有限的經援，而且隨時有停止的可能。差會建議東吳加入聯董會，但聯董會總幹事似乎對東吳也有成見，只允東吳以準會員名義參加。此案於一九六五年冬正式申請，翌年春獲准。這麼一所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高等學府居然僅能以準會員資格入會，真是委屈了！

一九六四年黃仁霖董事長奉派出國，董事會推舉端木愷先生代理。一九六七年春董事會改推孫科先生為董事長。孫先生接任後，學校再發動另一次較大規模的捐款運動以興建第二教室大樓，即哲生樓（孫科先生字哲生）。此樓之勸捐對象除校友外，多為工商界人士。

自從漢口街臨時校舍的各班級全部遷入外雙溪後，一直都感到擁擠。教務處排課時已將教室使用率發揮到最高點，其他可以利用的空間包括學生活動中心及安素堂都已充分利用。當一九六一年石校長撤銷漢口街校舍時，若干教職員認為還應該保留幾年再行撤銷，但石校長為了東吳的聲譽堅持全部遷入新校舍。如今教室不夠，怎不令他著急，但最使他憂心的是，哲生樓的建築費經捐募年餘仍然不夠，必須向銀行借貸。貸款必須用不動產做抵押（學校的不動產不可以），他家無恆產，無能為力。端木先生（時任代理董事長）就把他的私人住宅作抵押，還不夠，經濟系主任吳幹先生立刻將自己的房舍也拿出來抵押，這才解決了貸款的問題。

一九六八年六月，哲生樓及男生第二宿舍（現為女三舍）即將落成時，石校長在校務會

議上興奮而又含有幾分感嘆地對與會同仁說：「東吳即將脫困矣！」

同年秋，教育部核准增設商學及商用數學兩系，並同時成立文、商兩學院，恢復大學名義（正式奉准恢復完全大學建制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石院長被推為復校後第一任校長。

復校工作，從東吳旅台同學會倡議復校起到教育部正式核准大學建制止，歷經十八年的艱苦奮鬥，終於達成目標。當石校長正可喘一口氣的時候，卻突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因積勞成疾與世長辭。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在世上的工作告一段落後就「息了自己的勞苦」進入天國，但他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他的繼任人桂崇基先生雖僅在職一年，但因其曾任教務長三年，與石院長合作無間，對學校應興應革之事瞭如指掌，故能完成了多項改進。桂校長雖非東吳畢業，但對東吳之愛心及奉獻不亞於任何東吳畢業生。他於生前即將其財產包括公寓一所捐贈東吳。

端木先生於一九六九年出任校長至一九八三年退休，是為東吳復校後在職最久、建樹最多的校長。他到任後第一件事就是函請聯董會總幹事（已由 Paul Landy 接任）將東吳準會員之「準」字拿掉，否則即退出該會。聯董會反應迅速，立即承認東吳為正式會員並開始給予援助。

端木校長在其任內十四年間成立了十二個學系，七個研究所，三個博士班。在建築方面，除科學館、圖書館（原與安素堂併建的圖書館早已不敷使用），音樂館、教師研究大樓以及教

職員生宿舍多幢外，最重要的是開闢位於台北市延平南路的城中校區，並先後建成兩幢八層（舍地下一層）大樓。

東吳從漢口街時期開始，在人事及行政費方面每年都出現赤字，原因是一切遵照部令收費，從未在學生身上打主意，故每年都必須籌款以維持收支平衡。城中校區第一大樓落成後隨即開辦夜間部，而後又增設教育推廣部，學校財務狀況才逐漸改善，至少在人事及一般行政費方面不復再有支絀現象。

石校長和端木校長好像是上帝特別揀選前來東吳奉獻的。此兩位前輩校友在性格上、作風上以及長校先後順序和時間上，配合得天衣無縫。石校長耿介嚴謹，表裡如一；端木校長則是凝重果決，精幹寬和，他雖較為風趣圓融，但絕不犧牲原則。石校長在職十一年，未曾增加新學系，全心全意致力於教學水準之提高；要求教師考核嚴格，督促學生發憤用功，並採百分之二十的淘汰率，為復校不久的東吳打下了根基。端木校長接任後，正好在此堅實的基礎上發揮長才，繼續發展建設。一位善於奠基，一位長於開創，前後呼應合作，使東吳的校譽與日俱增。兩位長者當然也有其共同點，那就是堅強無比的意志力及信心。兩位也都是「完美」的追求者。最重要的是，兩位都對東吳做了鞠躬盡瘁式的努力。所謂「筆路藍縷」、「慘澹經營」……只有親身經歷者，方能體會個中滋味！端木校長在職期間從未領過薪金，逝世後又將私蓄及圖書捐贈學校。至於其私宅則早在生前即立據捐贈東吳。

東吳的復校路程是坎坷的，其間有被併入他校的顧慮，有僅能恢復一個學院的壓力，有長期局促於漢口街的可能，甚至有被迫停辦的威脅，但在東吳人及東吳之友的共同努力下，困難一一克服。原先大家都對教會期望甚殷，但最後還是應驗了一句最通俗的諺語——求人不如求己。

今後的路途並不見得多麼平坦，因為新的挑戰接踵而至，競爭更趨激烈，如欲出人頭地，仍得靠自己。

東吳的百歲生日即將到來，所有的東吳人對於當年創校、復校及建校的先賢們都應懷著感恩的心，爲了完成他們的未竟之志，共同努力邁向光明的二十一世紀。

楊其銑，現任東吳大學名譽校長。爲東吳在台復校後（第一屆）四十七級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語言學碩士。歷任東吳外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副校長、校長。曾任中華民國駐美文化參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文化組組長等職。



【壹】

掌燈擺渡的師者

大學生涯憶東吳

白培英

民國四十三年，我以插班的方式考進東吳夜間部的法律系。那是東吳成立法律系的第一年。當時的風景，還只是漢口街上一棟二層的樓房建築，沒有所謂的校園。而外雙溪的校區當時正在籌建中。

進東吳的第二年，學校搬到了重慶南路上，位置是現在中山堂的對面。重慶南路的校區是一棟六層樓的建築，我們法律系都在四樓上課。進東吳之前，我已經在大陸讀過一年的大學，來台後，我就讀於台灣省立行政專校，畢業後即分發到稅務機關服務，而因為體認到法律和知識對公務人員的重要，所以我選擇以插班的方式進入東吳法律系研讀。

當時的法律系分爲國外法律組和國內法律組，因爲配合工作上的需要，我選修的是國內法律。我們的系主任呂先生是當時國內相當有地位的英美法專家。他以清楚的法律觀念來引導我們進入法學園地，令我獲益良多。自東吳畢業後，雖然沒有從事法律的專業工作，但是所習得的法律觀念卻對我從事公職有頗多的助益。

在幾年的東吳生涯裡，有許多不同典範和風格的老師令我印象深刻，現在想來仍覺得十分有趣。

教我們「民法親屬篇」的陳顧遠老師，他上課的必備工具就是一把超大的放大鏡，非常有意思。我每次想起他拿著放大鏡在書本上搜尋講課的模樣，就覺得老師很像是調查蛛絲馬跡的私家偵探。

教我們「羅馬法」的金世鼎老師，嗓門非常大，他上課的特徵就是：腳步還未跨進教室門口，就已經開始講起課來了。我們只要一聽到他宏亮的聲音喊到：「上個禮拜我們講到……」雖然還沒見著老師，我們也得乖乖地把書本打開，開始上課。

現在的老師似乎都不大罵人了，而且現在學生也捱不得罵。但我始終覺得會罵人的老師常常是有責任心的老師。教我們「行政法」的林紀忠大法官就是一位非常嚴格而且會罵人的老師，因此，成績不好或是上課打盹，不專心聽講的同學，常被罵得心生畏懼。林老師是福建人，有很重的福建口音，他常說：「做人有鄉愿和狷介兩個極端，如果必須在兩者之中選擇，我寧可選狷介。」因此，他總是十分嚴格地教導我們，一板一眼地不容一絲懈怠與放縱。

另外教我們「債篇」的向英華老師，則是教課教得最賣力的老師了，賣力到什麼程度呢？無論夏天還是冬天，他講課講到一半一定滿頭大汗。可見他用心用力之深刻。

我現在回想起來，每位老師的形象與容貌都歷歷在目，而這些課堂上的受業與趣事也都令我印象深刻，讓我見識到老師們認真、負責的教學精神和充實的內涵。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師還有一位，他並不是法律系的主科老師，而是教我們共同科目——「理則學」的殷海光老師。理則學雖然不是法律系的主修課程，但是，對我來說，它對我智慧的啓發有很大的幫助。它提供一個新的思考領域和方法，使我們的心智更清明，讓我們從不同的說法中去尋找合乎邏輯的答案。換句話說，就是讓你的推理能力更強。

殷海光先生教理則學教得很生動，很引人入勝，總是以新鮮的事例來做說明和解釋，讓我獲益不少，也使我從此對理則學這門學科產生興趣。

我永遠記得殷海光先生上第一堂課的模樣：那天，上課鐘已響了一陣，課堂上卻遲遲不見老師的踪影，過了一會兒，來了一個擦黑板的工人，在黑板上寫了三個大字：殷海光，然後轉過身向我們打招呼說：「我就是殷海光。」我們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敢相信講台上站著的就是老師。他簡直就和擦黑板的工人沒兩樣，很簡樸，頭髮亂亂的，一副不修邊幅的模樣，完全看不出老師的樣子。但是，一上他的課，我們立刻被他風趣而有深度的言談給迷住了。

我以後在社會上服務，對很多事理的判斷看法，受他當年教理則學的影響很大。我個人對他極為推崇，欣賞他不修邊幅的灑脫，和不受形式拘束的率真自由，他那睿智的談吐，理

性的批判，和對民主自由的執著與捨身，也令我傾慕、感佩不已。殷海光先生五十歲不到，就頭髮全白，面容憔悴，我想正是因為他捨己爲人的緣故吧。

因爲殷海光先生的啓蒙影響，使我在法律的學科外，又培養了對理則學和哲學的興趣，得以豐富各層面的知識。

在東吳的求學成長經驗中，我獲益最大的訓勉就是習得一顆謙虛的心。因爲學法律的關係，知道了看事情要憑證據，要依法律規則來做事的道理，但是，也深切的明白：從證據層面所判定的事實未必就是眞事實，有些事實是無法從證據來判別的；同時，我們的法律規章也並非完善，因爲，任何法律都是以人有限的智慧去訂定的，並無法有至善至美至眞的境界。因此，我在學法律的過程中知道了人的有限，明白了法律人應具有謙虛心的體認。

那時，我們都還在上班，下午五點半從辦公室下班後，就得立刻趕到學校去。當時學校對面有家很有名的麵包店叫「美而廉」，我們總是在美而廉隨便買一塊麵包，再到教室倒一杯茶，等到三口兩口地把麵包塞完，茶喝完了，上課的鈴聲也就跟著響起了。到了晚上十點多回到家，再吃家裡的剩菜剩飯來填飽肚子。我們白天工作，晚上上課，只能利用週六週日的時間來溫習功課。這就是我當時在東吳的上課情形。

所以，我非常羨慕現在的同學有那麼好的學習環境，經濟狀況也比較寬裕，不必像我們那麼辛苦。因此，我不鼓勵同學打工，我認爲大學是人生塑造理念的最後一段時間，同學們

應該好好唸書，善加利用學校資源來充實自己，才不辜負寶貴的大學四年。

我自東吳畢業後，曾經回學校在會研所帶過「稅務專題講座」的課程。對學校的近期發展情況，是從校友會的報告中才有個概括的了解。在每次聽劉校長報告中，感受到他是個具有使命感，非常積極推動擴展校務的領導人，也明顯地感受到較自由、開放的東吳校風。

東吳即將歡度百歲生日，站在新舊世紀交替的時代，希望東吳大學能由學術性普通大學，提昇至對社會有所貢獻，具有公益服務理念的大學。而同學們則能達到專業與通識兼具，學術與人品並重的「全才」標準。這是我的期許也是深切的盼望。

（採訪整理／林育丞）

白培英，東吳大學法律系四十六級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國際租稅計劃研究。曾任：財政部常務次長、中國輸出入銀行理事主席、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中國國際商銀董事長、財政部長。現任私立中原大學董事長、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杏壇心·東吳情——記恩師楊懋春教授

蔡明哲

我與東吳的「姻緣」，應該是楊懋春老師牽的線。東吳社會學系就是老師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創立的。

當年我是老師在台大唸農業推廣學系、研究所的學生。現在這個研究所裡面分兩組，一個是鄉村社會學組，一個是農業推廣學組（但當時不分組），我是研究鄉村社會學的。一九七〇年代端木愷校長想在東吳成立一個社會學系，幾經商談，於是請楊老師來協助創系。我則是當年來幫忙的副手。想想，老師那時是七十歲了。他在東吳教學研究十五年，一直到他過世。

老師是一九〇三年出生在山東的一個平凡農家子弟。他在一九一三年開始接受新式學校教育，先在縣立模範小學就讀，後來進入膠縣的基督教浸信會瑞華中學繼續學業。一九二〇年他就開始擔任小學教員了，可說教育生涯早早就起步。後來再到美國南方基督教浸信會在黃縣辦的崇實高中進修；到濟南的齊魯大學歷史社會學系就讀奠定日後學術基礎。大學畢業

後，老師在學校留任助教大約一年的時間，隔年秋天老師就到北京燕京大學研究院讀鄉村社會學，兼修其他社會學的課程。老師後來擔任過中學校長、並輔導各級小學，後來又回到齊魯大學文學院擔任講師。一九三九年老師在美國宣教士的安排下獲得赴美留學的機會，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攻讀碩士、博士，雖然取得了學位，卻又因中日戰爭而回不了山東，繼續留在美國。這段時間老師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州、加拿大安塔略省（因為是加拿大東部的農業省分）做研究和講學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回到青島。

回國後老師不斷在國內外做農業推廣的各種考察和講學，雖然經過共產黨勢力的威逼，顛沛離散，但是老師仍然克服萬難，使在杭州、桂林、柳州、上海、以至香港等地的考察並無中斷，甚至老師後來攜眷赴美至史丹福大學講學一年，他的學術研究著作都一直持續著。

一九五八年春天老師接獲台大農學院院長的來函邀請他回國任教服務。在台大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教書，一九六〇年又創辦農業推廣學系，同時主持一個新的鄉村社會經濟研究所。他說：「……二十餘年來……我在台灣省的農業發展和鄉村建設上盡了一份力量，並以此為榮！」老師自一九五八年來台灣，一直到他一九八八年辭世，有三十年在台灣的大學內培養青年知識份子，誨人無數。他在台的教學生涯，正好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十五年在台大，後十五年在東吳；雖然地點不同，但是他的研究和教學實際上都是連貫一致的，他一方面延續他對社會史的不斷關心，另一方面也將過去所致力的新人文主義和文化生態學觀點，

予以形成體系。他自己看他這兩個時期的差別是：「……我由台大退休後，立即受到東吳大學聘，爲之創辦社會學系，在治學上也由鄉村社會學轉入社會學與社會學理論……」

他一直是秉持基督信仰待人處事，深刻地影響他的親朋和學生，表現出戰後台灣第一代學者的學術風格和治學爲人典範。他不會掛在嘴裡，但他是這麼做著。老師的中英文著作不計其數，學識淵博，文字深入淺出，頗多自己的創見。他是一位學者，真誠樸實，堅持學術上的自由。老師一直都自認爲很平凡，虛懷若谷，十分難得。很多事說起來容易，但真正要做到卻是很難。他律己嚴格，言談風趣。在台灣教學三十年，學生與他都十分親近。他的住處十分樸素，想來是爲他出生於華北的小農村，所以一向都十分節儉。他平生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就只一樣，好欣賞書畫。除了一些學界朋友贈送的字畫，如臺靜農先生所贈的真跡墨寶，也捨不得花大錢買。所謂收藏，也就是教授從雜誌封面、廣告單上面剪下來的圖片，只要他看了喜歡，就把他們留下來。對於這些身外之物，老師也總是抱著一種隨緣的態度，至於那些真跡書畫，老師過世以後，也捐給台北市立美術館了。

他用人唯才，並不會因爲人與他有特別的關係就輕易任用，只要確定這人對教育、對研究有相當熱誠與才華能力，就予以聘用。只要是愛學生、學問好、有熱誠的學者，楊老師都願意爲之擔保。至於我，也是經過了好幾年的觀察才受到老師肯定的，並不是因爲我是他的學生就理所當然的帶我到東吳來。

仍記得他在世的最後半年，當時他大概八十五歲了，曾經打電話給我。那時我還擔任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他說自己覺得體力日差，應該寫個遺囑，因此囑我來協助他撰寫。因此最後的半年，我常常到老師家裡去拜訪。在老師的遺囑裡面，有一項特別的，就是要用他在台灣的財產，來成立一個「楊懋春貞德紀念基金會」。很多人都誤會，以為楊老師的別名是「貞德先生」。「貞」其實是老師母親名字中的一個字，「德」是老師父親名字中的一個字。也就是要一同紀念他的父母身後之意。他在台灣的財產約有一千兩百萬，他將這些全都捐出來，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基金會，希望透過他這一份努力，使台灣的青年學子有更好的發展。

我擔任社研所所長時有一個暑假，他從美國寫了兩封信給我，說他這麼老了，還在教書，是不是對學生沒有幫助？或者學生會不喜歡他的教學方法？叫我不要因為是他學生的緣故而不好開口……他一直是替別人著想，怕麻煩了別人的。他自己當系主任的時候，也考慮每一個老師的需求。我那時就告訴他：沒有一個人是這樣想的，我們都是如此需要他……他後來就接受我們的邀請，回來擔任碩士班的老師。他一辈子就是這麼誠懇、為別人設想，為我們樹立了良師的典範。

老師的性格，也許是因為儒家的傳統、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再加上西方三十年代以來的人文社會思想，才有這麼寬闊深邃的學問和修養，我稱他為「新人文主義」的一代宗師。他一生淡泊名利，關懷社會，用心努力服務人群，這些事功，甚至是可以編成一本書來闡述

的。他自己就說：「感謝上帝，我多年在基督教義上的研究和體驗，在現代科學精神與方法上的瞭解和運用，在中國傳統宇宙與人生哲學上的修習與領悟，在我思想上與行動上，三者不但無矛盾衝突，更能互為闡揚，相得益彰。我自己常以此為精神上與學問上一大樂事。也常在適當機會與適當題目上，將此三者的相輔相成運用在大學的教學上與學術著作中。我確信這樣做沒有一點『傳教』或『念經』的意思。我覺得能把宗教、科學與哲學三者真正融會貫通，一點也不作假，不詭辯，是一種上乘的智慧。我是憑良心要把這種智慧與這裡的青年學子講論並共同研討的。」

我從老師身上體悟到，使我一輩子受用無窮的處事做人的態度。很多事情，不能總是想要等到有「好時機」再做；覺得是對的事情，就應該馬上實踐！隨時隨地想到的，就可以即知即行。我不能說我從老師身上學到了這一樣、那一樣，但是他對生活的認真態度和對人對事的體貼、關懷，正是我一輩子要去學習努力的。

老師辭世已經超過十年。

而東吳社會系創系二十五年，東吳也要過一百歲生日了。

在這樣的時刻，回想起楊懋春老師，對他有太多的懷念，因為他對他的學生、對我的深遠影響，永遠無法令人忘懷。

蔡明哲，台灣省嘉義縣人。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學士、碩士、博士。曾任東吳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現任東吳大學教務長。

（採訪整理／吳凡影）

溪城與我

賴錦雀

一、前言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拖著打工兩個半月而疲憊不堪的身軀，懷著千萬不甘的心情，踏著沉重的步伐，跟在媽媽的背後，輾轉搭乘火車、公車，抵達了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溪城。看到狹窄的校園，想到大部分高中同學都上了國立大學，自己卻不爭氣地考到這個從家裡單程就得花上兩個鐘頭的私立大學唸不知其為何物的東語系，當時，心裡想的是該如何準備十個月後的轉學考，以便進入公立大學減輕父母的經濟負擔。沒想到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我不但沒有離開東吳，反而以東吳為榮，以身為東吳人為傲。今適逢母校東吳大學建校百年，茲敘述個人這二十五年來在溪城的成長過程以為紀念。

二、求學生活點滴

進入東吳大學之後，我才知道自己註冊的東語系事實上所教所學的就是日語。在台日剛剛斷交、到處貼著「不用日貨，不說日語」標語的當時，學習日語似乎很難讓一般人接受。剛進大學的第一年，每當碰到往日的師長或親朋好友時，總會被問道：「明年要重考吧？」最令人難忘的是國中時代的國文老師朱老師在樹林街上對我大喊的那一句：「明年要轉英文系哦！」開學一星期之後的第一次日語假名小考，只考了四十分，連自己都懷疑是否要在這一個以第三十一志願進入的學系繼續唸下去。幸虧，當時的系主任蔡茂豐老師的「實力論」讓我興起了留下來的念頭。以現在的教學理念來說，蔡老師權威式的教導方式也許無法令每個同學心悅誠服；不過，當時卻使得懵懵懂懂的大一新生了解到不努力用功不行。

一九七五年也是東吳大學東語系由外文系東語組自立成系的一年。新鮮人的我們受到師長、學長的百般呵護。課堂裡，林錦川老師深入淺出的文法解說，快速地驅除了我對日語學習的恐懼感。尾久幸子老師溫柔的日語腔調令人感受到日本女性的婉約。原土洋老師的語音學教我認識了日語重音的規則。賴華光老師道地的日語讓我知道了日語學習的目標之一——講求速度。教室外，新生盃排球賽冠軍、康樂競賽第一名等成果，使得同學間的情誼更加滋長，並且激發出自己對學校、學系的認同感以及對日語學習的興趣。

其後，伊藤六夫老師的「會話」時間、陳先智老師的「日本文學賞析」、鍾肇政老師的「日語翻譯」指導、荒井孝老師的「日文習作」指導、小室敦彥老師的「日本世俗短評」和「日本文化介紹」、蔡華山老師的「古典文學」啓蒙、松野正志老師的「日本經濟名著導讀」、與日本拓殖大學等校學生的交流等，一步一步地引導著我進入日本文化的世界，使我度過了一個充實的大學時代。

一九八〇年九月我進入母校甫成立的日本文文化研究所就讀，成爲該所碩士班第一屆的研究生。在所長蔡茂豐老師的帶領下，跟隨蜂矢宣朗、戶田昌幸、蔡華山、黃國彥、黃得時等老師們，展開了日本語學、日本文學、日語教學研究的生涯。除了學期間的課程之外，每年暑假還在遠從日本渡海而來的奧村三雄、北原保雄、寺村秀夫、林四郎、小松英雄、相原林司、井手至、窪田富男、池內輝雄、日下部文夫等日本各大學的名教授、名學者們的指導下，鑽研日本語文學與日本文化。看到日本大師們犧牲假期、不畏台北炎夏高溫爲我們所做的付出時，感動之餘也更加深了自己向學的決心。而師長們的指導也使我了解到學習與研究的不同。學習也許有階段性、允許模仿，然而研究卻是久久長長、不允許模仿的事業。

碩士班的同學雖然不到十名，但是大家情同手足。在書寫碩論前的七百多個日子裡，並肩咀嚼初入研究領域的苦澀，一起享受求知解惑的歡樂。猶記得一九八一年日本電影剛剛限量上映時，大夥兒一大早到西門町排隊買票觀賞《歸鄉》，不亦樂乎。一九八二年春天當我

家老大小乖而在我肚子裡運動時，大家要求老師暫停上課好讓我稍做休息。這種關懷的友愛情誼，在事隔將近二十年的今天，想起來仍然叫人非常窩心。當時，每個同學都在本校推廣部日語班進行教育實習。這些實習的經驗以及在課室裡對日語教學的熱烈研討，使得我們每個人都儲備了成爲日語教師的基本實力。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又回到日本文化研究所就讀，成爲博士班第二屆的學生。在所長黃國彥老師的領導下，跟隨蔡茂豐、蜂矢宣朗、奧村三雄、小松英雄等老師進行研究。帶職進修的日子雖然辛苦，但是，能夠再當學生拓展個人的知識領域，令我有如獲重生的喜悅。每週和唯一的同班同學——艷紅姊輪流發表報告的日子，緊張、刺激、忙碌、充實，如今仍然記憶猶新。其中，最令人興奮的莫過於萬葉庭園裡濱木綿的欣欣向榮。茂盛碩大的葉片，細白成串的花朵，隨時呈現出活潑的朝氣，令人百看不厭。在無數的日子裡，於萬葉園旁邊的萬葉教室裡，追隨著蜂矢老師進入日本古典文學——《萬葉集》的世界，探訪古日本人的心靈故鄉，鑑賞日本古語的精華。跟蜂矢老師學習了多年，雖然尚無法完全領會《萬葉集》世界的意境，然而，每次進入萬葉教室就有一種得到收穫的、莫名的充實感覺。我想，那都是拜八十年前出生於花蓮、六十歲自日本天理大學退休後，旋即來本校任教的蜂矢老師對學問的熱忱與其所栽種的濱木綿所展現的生命力所賜的吧！衷心期盼以蜂矢老師爲中心的「濱木綿會」今後也能如濱木綿般茂盛、開花、結果。

此外，令人永生難忘的博士班老師，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已故的奧村三雄老師。逝世後榮獲日本天皇頒授正四位勳三等旭日中綬章的奧村老師原為日本九州大學教授，應蔡茂豐老師的邀請自一九八一年起來本校任教。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班成立後，每年利用日本大學的假期期間來台講學。即使罹病之後，奧村老師仍然不顧家人的反對，繼續到本校為我們授課。看到老師一次比一次地消瘦，心裡非常過意不去。然而，想到老師對學問、教學的熱心，又不忍心叫老師不要來台灣。一九九八年四月，當我們正翹首企盼時，卻由日本九州傳來奧村老師不幸仙逝的消息，從此天人兩隔。不過，奧村老師所教導的中日語言文化對比研究的理論、由中日兩語共同點切入的日語教學法以及他對台灣日語教學無私、不求回報的精神和提攜後進的寬大仁厚胸襟，將長存我心，成為我的典範。

三、服務與交流記實

一九七九年大學畢業後，在同學的選票推薦下，我獲甄選為母系的助教，開始了個人在東吳大學的服務生涯。一年助教兼秘書的生活，使我更加了解到學校的行政狀況以及自己對教學工作的熱愛。一九八〇年進入本校日研所碩士班就讀之後，同時也在本校推廣部教授日語，展開了我在本校的教師生涯。推廣部的學員來自各行各業，由他們的身上，使我更加體認到社會對日語的需求，以及日語教學的重要性。此外，白天上班、上學，晚上到本校學習

日語的學員們好學的精神，為我提供了鼓勵大學部學生的最佳教材。

一九八三年八月自碩士班畢業後，經由考試獲聘為講師，回母系擔任教學工作。由於是本校日研所碩士班畢業生第一個留校服務的土碩士，令我感受到無比的壓力和莫名的使命感。但是，也因此使我從中得到許多成長的機會。一九九六年九月我開始在本校碩士班授課，擔任日本語學研究暨日語教學法研究的課程，並且指導碩士論文寫作。當自己開始從事論文指導工作之後，我更加體驗到以往師長們為我們所付出的一切辛勞。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對日語不但不排斥，反而出現了很多所謂「哈日族」的年輕人。這種社會的變遷，使得我們不必像二十多年前的師長們那樣費心地力求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防學生流失。然而學生人數的增加，也使我們陷入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心理狀態。喜的是日語同好者增加了；憂的是受空間限制不得不採行的大班教學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一九九二至九四年間我奉命擔任日本拓殖大學委辦華語班的導師，負責留學生的業務。雖然心理負擔比本地生導師來的重，但是，在和日本的年輕人相處當中，也得到了很多生動的樂趣與經驗。

一九九八年八月承蒙外語學院謝志偉院長的提拔，被任命為本校語言中心主任，因此有緣結識了擔任英語聽講實習課程的教師及語言中心的行政同仁，頓時個人的生活領域似乎又更寬廣了些。不但進一步了解到本校外語教學軟硬體設備的優缺點，而且和同為外語教學奮

門的英語教師們有了更多交換教學心得的機會。

近年，在參與系、院、校級的各項會議、活動中，我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大學校園的民主化。學生、教師的自主性提高了，一切的行政工作、校園營運也透明化了。這種符合時代潮流的現象固然很值得嘉許，然而，校園成員民主素養的提昇似乎仍然有待加強。

於母校服務的這段時間裏，我有幸在長官的安排下赴外地講學或參觀訪問。一九八七年赴日本拓殖大學擔任客座日語講師期間，參觀了多所日本的大學，親眼目睹了自己所學、所教的語言使用者的國情，並親身體驗了日本文化，考察台日文化的異同。一九九一年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客座日語講師時，不但了解了些許新加坡的日語教學狀況，和當地的日語教師交換了教學心得，並且認識了新加坡式的民主，拓展了自己的視野。一九九八年到蘇州大學訪問，參觀了蘇大廣闊的校園，了解了該大學的概況。當然，也順便拜訪了姑蘇古城與寒山寺，並且復習了日本大文豪森鷗外的名作——《寒山拾得》裡的意境。此外，在蜂矢老師的引薦下加入了日本天理臺灣學會，結識了研究台灣的日本學者，接觸了日本學者的台灣研究成果。俗語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國際交流經驗，對於我在東吳的服務，都有莫大的幫助。

由於在母校服務，因此和畢業的系友們也比較有機會接觸。經由和系友的聯絡、溝通當中，可以了解到更多社會的動態，進而幫助自己調整教學的腳步，以更符合社會的需求。其

中，還可以分享到東吳人在社會上活躍的喜悅。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以唯一留校察看者的身分，迎接了大學同窗回校召開我們班——東語系六十八級畢業二十周年的同學會。雖然回想起往日大學時代的情景，令人有時光飛逝、歲不我予的感慨；但是看到同學們都能獨當一面，在社會各個角落努力以赴地過自己的生活，倒也叫人欣慰。昔日託同學、老師們的福才得以留校服務。而我能回報的，大概就是有所需要時盡我所能地讓同學們有回家的感覺吧！

四、結語

有緣修得同船渡。能在同一個地方連續待了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而且非常珍惜與溪城的這個緣份。當年如果沒有進溪城就讀的話，我就沒有機會接受東吳師長的教誨，踏入日語研究、日語教學研究的世界。當年如果沒有進溪城就讀的話，我就不會認識外子，也不會有一雙長得很像外子的可愛兒子。今後，我將秉著感恩、反哺、惜福的心情，就個人所能為母校盡棉薄之力。祈禱母校在第二個一百年裡校運昌隆，提供更好的環境讓莘莘學子遨遊學海，並且培養出更多社會所需的優秀人才。

賴錦雀，東吳大學東語系六十八級、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班七十二級、日本語文學系博士班八十五級畢業生。現任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兼日文系主任。

白雲還守舊時山

黃永武

記得我在臺中中興大學任職時，一天晚上夢見回到東吳大學，站在青翠的山腳下，面對著一泓碧水、八方山丘，四周藍綠的山頂上新建了許多白色的樓房，樓房高聳，透出天空，隨著嵐捲霞飛，景色極為旖旎，但並不是我舊時記憶中的青山印象。只有英英和盛的白雲，拱立於山崗之巔，氣象奇偉，仍與我當年所見的一般，我就在夢中脫口而成一句詩：「白雲還守舊時山。」這句夢裡吟哦的詩，後來有許多朋友為之唱和，但他們都未必知道是我夢到了外雙溪。

那時我開東吳的教職已十多年了，很久沒機緣再到溪城靜享一天嶺上白雲的日子。先是去高雄師大六年，又到中興四五年了，車聲馬蹄之間，蔣公過世了、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加上美麗島事件，壞消息紛至沓來，社會動盪不安，校園裡也騷擾惶惑，我和許多朋友創立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期望在學術研究裡尋找亂世中的心靈安頓所吧？處於那段惶恐的氣氛間，好懷念我在東吳時那段青春奮發而又平穩的歲月。

第一次回到母校任教，是在民國五十三年至六十年吧，新種的校樹還不過兩個人高，雜居的民房也少，很少開店的。那年代，今天稱之為「權威時代」，物質生活雖不充裕，精神世界卻很壯盛，在東吳教詩經、教史記、教國學概論，那時候大陸上開始大鬧紅衛兵，地下挖出的稀世珍寶「魯詩鏡」，居然由女工帶頭在研究。地下挖出唐代題詩的酒壺，居然連個「鷹」字也不認識，紅衛兵為隔海在破四舊，在批孔揚秦，所以在東吳教書時，肩頭很有使命感，「復興中華文化」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必須及時踐履的任務。那時代，心志集中，是非清楚，經濟起飛，社會安定，治學或教學也鬥志昂揚。彼時教學方法雖偏向「權威式」，可以規定得較為嚴格，學生學習認真，效果不錯。

再回想自己剛到東吳大學上學的民國四十七年，外雙溪的校舍初落成，只有一棟樓房，教室、圖書館與辦公大樓全擠在一起，設備雖簡陋，但學習志氣都像要吞牛的豹。當時外雙溪水碧山青，農田阡陌交錯，林巒間光凝氣聚，真是讀書的好地方。系內師資何需什麼博士碩士學位，但腹笥充實，學力深厚。

像申丙老師，他的《雙穗樓詩》，目前已無人能及其造詣，他教詩選課，上課時喜歡教學生當場做，他當場改，記得有一次每人僅須做一句五言詩，結果申老師將各人零星不相干的散句，一一當場拼攏來，組成成長篇有起承開闔的五言古詩，寫滿了一牆壁，全詩記不清了，只記得結尾兩句：「新詩張素壁，大海起雄風！」今日要找如此學力的師資，幾人能

夠？申老師自己的詩好，申師母的詩也妙，申老師換裝假牙後，師母做詩打趣他說：齒如貝列，微笑起來，要當心被美女喜歡上了。申老師的〈久雨晚晴詩〉寫得英氣颯爽，師母和一首，單是那句古詩「餘滴猶在屋」就境界清絕。他倆伉儷情深，至老彌篤，是中文系內才子佳人的好榜樣。師母大前年過世，快一百歲了。

還有徐子明老師，七十出頭年歲，頂著一頭白髮，瘦瞿而說話有力。聽說當年留歐歸來，黃季剛先生想請他做家庭教師，教兒子英文，約聘前先想考一考他的英文實力，正在想出一個什麼題目時，抓抓頭皮，計上心來，就問：「頭皮屑英文怎麼說？」“dandruff”；徐老師即口答出，黃季剛就去翻英文字典，果然不差，就聘為西席。

徐老師的英文根基深厚，據聞在臺大開拉丁文的課，常常罵別的教授所講是「下流英文」，更痛恨別人寫白話文，若有文章投稿見報，「報屁股上的文章」最好別讓他老人家知道，否則當堂不客氣。他說教白話文的老師，「師」字該改為「豕」才對。當年胡適將回臺灣任職，他寫了一本《胡禍叢談》，認為國事如此，都是搞白話文不讀書的禍害，惹得蔣公很不高興。彼時中文系裡提倡文言文者居大半，聲氣相投，至今東吳中文系內許多博士論文仍愛寫曲雅的文言，中文系作文仍注意文言，和這傳統大有關係。

徐老師上課札札實實，考試也嚴格，左傳要去他家裏背誦，有的同學弄到除夕夜還去老師家補背《左傳》。可是他對字義的詳究，毫不含糊。後來我研究文字訓詁學，才發現徐老

師所解析的字音字義，都有憑有據，非常精到。例如他說什麼叫「亡命之徒」？許多人誤解為「豁出去不要性命的人」，並不對，而其實是「隱姓藏名的人」。的確，《史記·游俠列傳》將「亡命」叫做「藏命」，命不是性命，而是名字，正義說：「命，名也，謂藏匿其名而作姦惡也。」而《資治通鑑》卷廿七張敞亡命，注文也說：「命，名也，謂脫其名稱而逃亡」，讀書愈多後，老師上課時講解的東西，往往得到愈多的證明，才發現徐老師肚子裡的學問如海，不可蠱測。今日教《史記》《左傳》者，在貫通字義訓詁上，想望徐老師的項背，那就太難了。

還有曹昇老師，他擅長《易經》，卻教我們《詩經》，他雖不教詩文，卻常常拿他的詩文給學生讀，有一次朗誦杜甫的《登高詩》，瘦小的曹老師，居然將這首七律吟得天風振響，沙渚迴盪，我才領悟吟詩絕不是用一個熟爛的調子去套所有的詩句，詩情不同吟法也有異，聲情協合，才是吟誦的勝境。

當時我在東吳創辦了《大學詩刊》，好幾期都有曹老師的詩，他的七言律詩骨格不凡，高華遒勁，有唐人風味。後來我寫《中國詩學》，不引今人作品的，曹老師例外，他的詠菊詩：「國士才情高士品，陶家美酒謝家詩。」又：「要使世人瞻晚節，出山故在九秋時！」實在太美，特別列入。晚年曹老師在屏東隱居，我會幫他收集散佚的詩篇，交還給老師，後來聞曹師母傳話來說：「老師與我都專心學道啦，詩文綺語，不想留傳，都付之一炬了！」

今天也許只剩《大學詩刊》上還保留著少許的鳳毛鴻爪吧。

師長很多，我只舉列三位，是因為我後來也常教這三門課，讓人知道淵源有自，不忘感恩罷了。當時還有令人敬佩的石超庸校長，愛護後生，珍惜人才，真誠辦學，不要狡猾，有這樣的校長，怎能不人才輩出？

外雙溪的流水潺潺，蜿蜒階前，白雲悠悠，蔚然嶺頭，草木毓秀，到處是人才發祥之瑞兆，但歲月遷流，更迅於逝水。我第一次回東吳任教時，申老師還兼任系主任，當我第二次再回母校任教時，連申老師當年臨流而築的小屋也渺無踪跡了。

外雙溪的變化不小，放眼望去，洋房大廈擁擠不堪，鄉野的景色已被繁華的車馬所取代。東吳也有了新的綜合大樓，樓上常見視線開闊的雲山，也有了像樣的圖書館，從館中俯瞰溪城的雨景，淒濛一如詩畫的催生所。中文系早有了碩士班博士班，配合所謂「民主時代」的風潮，當家作主的意識高漲，就多讓學生事先準備、自己報告。學生的可愛一如往昔，但大環境變了，有形的硬體建設進步不少，但也不清楚究竟失落了那些珍貴的東西，有人喜歡，有人厭倦，只有外雙溪四周山上靜臥著的白雲，仍萬古不改地守著山頭，我從清泉嘉樹中，早就感知山林煙波的召喚之樂，現在我又離開溪城，回想那句「白雲還守舊時山」的夢中詩句，大概是預言四十年中前後所見的這段滄桑因緣吧。

黃永武，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五十一級畢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國立東吳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等校教授、主任、院長，為國內古典文學研究之重鎮，曾獲國家文藝獎等各種榮譽。著有《愛廬小品》、《生活美學》、《中國詩學》、《詩與美》、《敦煌的唐詩》等。

塵封往事，一世恩師

謝志偉

很多人唸大學時住宿舍，我也是，只不過別人住的是學校宿舍，而我住的是一家西餐廳的宿舍，而且一住三年，這點與家父早逝有關。考上東吳的那一年夏天，終年勞累海上的家父已經因病下船休養了兩個月，這是他之前將近十五年來在陸地上待的最久的時間，可惜從此也沒再能回到海上。他僅僅來得及看到我成爲東吳大學的新鮮人，卻不但未能於四年後看到我考上輔仁大學德國文學研究所的榜首，甚至連我一年級上學期的成績單都還沒拿到，就與世長辭了，那一年他四十九歲，我十八。由於家父臥病期間，家中值錢物品都已典當一空，出殯時，連棺材錢都是幫人洗衣服的姨媽向人週轉借給我們的。母親爲一傳統台灣家庭主婦，未受漢文教育，又無謀生能力，而長我兩歲、高中畢業的姊姊剛開始當店員，月薪微薄，小我一歲的妹妹還在唸商職，加上剛上國中一年級的弟弟，一家人坐困愁城之際，有人幫我們出了個主意，於是母親就在家裡擺了個小麵攤，至少一天三頓都在裡面了。至於我呢，就接了兩份一個星期各三個晚上、每晚兩小時的國中英語家教，所得除了作爲生活費

外，剩下的加上高雄大舅已先應許的下學期部分註冊費，大一的日子熬到六月底學年結束就都有了著落。

那一年我仍住在一個高中同班龍姓好友的家中。高三時，我就已從基隆搬來台北他家住，以便縮短到板橋高中的通車時間，好準備大學聯考。放榜後，我同學上了成大，搬往台南，而把我當作自己孩子般看待的龍媽不但幫我找了家教，還堅持叫我繼續住在他們家。同學不在，我原本實在不好意思繼續叨擾，卻也覺得，若住基隆的話，白天上東吳，晚上跑家教（換了幾次，最遠到永和的秀朗路），再趕回基隆，體力實在也受不了，就很靦腆的接受了人家的好意。

六月下旬期末考一過，我就和幾位同學根據聽來的消息沿著中山北路二段尋找一家除了固定工時的外，也聘用兼職服務生的西餐廳。很幸運地，不到兩天的工夫，果真讓我在台泥大樓隔壁一家名為「榕榕園」的西餐廳找到一份每天工作四個半小時，一週六天，只要是上班時間就管飯吃、晚上還可睡員工宿舍、一個月一千二百元的跑堂工作（當時一學期的註冊費約為四千多元）。在試用一個星期後，我就開始上班，而由於是暑假，也可以幫別人代代班，多賺一點，等到開學時，還是連同大舅寄來的錢，也就把註冊費給湊了出來，從此我就在榕榕園待了下來，直到大學畢業。

由於是剛開始，一切還很新鮮，且又是暑假裡，即使三天兩頭加班、代班，也不致覺得

疲累，等到開學後，課業的壓力漸重，新鮮感頓失，白天上課，晚上上班，中午還要打籃球，蠟燭兩頭燒，體力漸感不支，只好選擇非德文的課打瞌睡，以免晚上端盤子時精神不濟而失手。課業、打工兩頭兼顧，漸有困難，但此時我已搬離高中同學家，每晚在餐廳宿舍裡過夜，實在也沒本錢辭掉工作，只好硬著頭皮撐下去。幸好當時在餐廳的同事裡交了幾個至今仍有來往的好朋友，給我帶來些許歡樂和勇氣，才能渡過幾次心理上的難關。

所謂員工宿舍，其實就是兩張上下鋪的床和中間一張行軍床，有縫隙的地方則塞滿了晚班同事換下來的便服，旅行袋，雜物等等，既無書桌也沒座椅，說是宿舍，不如說是睡鋪還較為貼切。偏偏我在此窘困的情況下，對學習德文的興趣反而更加濃厚起來，往往十二點下班後還躺在床上看書看到兩三點，宿舍裡燈不管制，倒是方便了我。一學期下來，原本就瘦小的我，又因日夜顛倒，吃睡不正常，沒事就拉肚子，體重減輕很多，反倒是德文成績提高了不少。

這一年，學校新聘來了一位年約五十來歲的德國太太當系主任，名叫齊馬蕙蘭，我們都稱她為 Frau Chi，（德文意為「齊太太」，但以此中文對老師如此稱呼並不妥）她先生齊熙是早期中國第一批派往德國學造船技術的青年學子之一，時任中船副總工程師，公公則是赫赫有名的戲劇大家齊如山先生。由於與先生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齊主任講的中文時常標準到令我們感到錯愕，但是又由於沒有正式學過中文，偶爾也會鬧一些笑話，例如有一次她說「早上去洗

頭」，我們卻聽成她「早上去溪頭」，都覺得，怎麼這麼趕，下午就回台北了。一臉和藹可親的齊主任，很快地就贏得我們的喜愛，在我們的眼中，她不僅是極有耐心的老師，同時也是充滿愛心的媽媽，或許也因為自己是幾個孩子的母親，她不但關心我們的課業，同時也關切我們的日常生活，很快的就能叫出我們的德文名字，也知道我們的習性。我常常手拿著夾了花生米的饅頭，睡眼惺忪地來上她的課，第一堂總會遲到個十分鐘，偏偏這個瘦小不起眼、邊上課邊吃早餐的學生卻能答出別人答不出的問題。有一次下課後，她就問我為何臉色蒼白，手上也沒拿饅頭，在知道我打工的原因及再看我睡眠不足又拉肚子的情況後，當天中午她就帶我搭她家司機的車跟著她回北投家中好好吃了一頓香噴噴的午飯，然後再讓司機送我回中山北路的餐廳。我記得，那一天我是紅著眼回到餐廳的，睡眠不足只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已。自此，我就常常去齊主任家吃飯，而由於她的關心——和適時且美好的中飯——打工的身心勞累不但沒有影響我的課業，成績反而從一年級的全班第十五名左右猛進到全班前五名，三年級時就開始拿第一名的獎學金了。有一回，因為寒假期間未能加足班，以致沒有足夠的錢註冊，齊主任還先幫我墊註冊費，後來第一名獎學金下來後才還給她，班上同學乾脆都笑說，齊主任是我的乾媽。

民國六十六年，我畢業的那一年，齊主任捐了五萬元給學校設了一個齊馬蕙蘭獎學金以鼓勵對德語文學有興趣的同學，另外還特地給我一萬元獎學金以獎勵我考上輔仁大學德國文

學研究所，就在那一年我告別了東吳，也告別了住了三年的榕榕園餐廳，恢復每天至少睡滿六小時的日子。五年後，我唸完碩士班、服完預官役，考上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的留德獎學金，期間我和齊主任及他那同樣令人敬愛且風趣的先生一直保持聯繫，三不五時也仍然到他們北投家吃吃飯，每次她都噓寒問暖，甚為掛念我的健康。出國前，齊主任又給我一萬元台幣當盤纏，說是我負笈德國的獎學金，我怎麼婉拒都不行，也只好收下。其實，當時的獎學金每個月生活費將近一千馬克，在大學不收學費的德國讀書，花用起來，足足有餘，甚至基於回饋之情，偶爾還可以接濟三餐不濟的德國同學呢。

一九八二年夏末，我單槍匹馬來到嚮往已久的德國，住進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y Bochum）外籍學生事務處事先為我找好的宿舍，一待五年，直到一九八七年八月取得德語文學博士才返台。到德國唸書超過五年的比比皆是，但是一去五年（前兩年除夕打國際長途電話給我媽時，都是眼淚隨著馬克不斷地往下滾，除了傷痛所費不貲以外，當然絕對也有思鄉念家之情在內）唸完博士才回來的，恐怕屈指可數。我之所以這麼做，一來是因為每年申請延長獎學金都必須拿出學期成果（德國大學沒有我們每學期所謂的成績單，僅有個人保留的成績簿，裡面夾著歷年來的所有各科成績證明，申請學位考試時須出示）和兩位教授的推薦信來，而這兩者都迫使我寒暑假必須準備功課或預寫報告，二來是因為第三年之前返台渡假得自付旅費，我又擔心，若平常不存點錢，則一旦獎學金延長無望，恐怕就會立刻斷炊，結果等到第四年我可獲補助台北

來回機票一張時，已因博士論文開工，不敢妄動了。而就在這前後五年未曾見到親人一面的情況下，卻與齊主任和她先生在德國見了五次面，蓋他們夫婦倆退休前後，每年都去瑞士渡假並回德國探望親友，而除了第一年我們是在法蘭克福與其本系其他留德同學碰面外，其餘都是他們特地挑選一班約略中午經過波鴻的火車，事先打電話與我約好，我到火車站與他們碰面後，他們就在附近的一家中國餐廳（在德國皆稱「酒家」）像當年一樣請我吃一頓好料，問了我的近況，知有挫折就打氣鼓勵一番，小有成就則為我歡欣不已，然後互道珍重再見，送她倆搭下班火車後，就等隔年再見面。雖然我在那兒交了很多好友，並不覺寂寞，但是每次送他們上火車時，我都覺得離情依依，幾天之內心情難以平靜，客從故鄉來，就足足叫人滿心溫暖，更何況是向來視我如己出的恩師。第五年碰面時，情況有點驚險，原本約好一切如常，結果齊先生心臟病發，不得不中途改變行程，先赴親友家休養。這回輪到我帶著當時交往中的德國女友坐火車去看他們夫婦，還好齊先生並無大礙，還能陪我們上館子吃飯，而特別是齊主任看到我旁邊多了個她的同胞，還笑得開心極了，我們傍晚回家時，還硬塞給我兩百馬克，說是給當車費和兩個人看電影及吃一頓中餐用，實在推辭不掉，我只好又收下了。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順利地完成學業，成為波鴻魯爾大學第一個取得德語文學博士學位的台灣人，但是我並無一絲驕傲之喜，除了緊繃幾個月的神經終於鬆緩下來之外，只覺得從此更是任重道遠，自知真正作學問才要開始，卻是將為人師，不由惶恐起來。八月中旬，口試

後七上八下的心情尙未完全恢復過來，就束裝返台任教本校至今。當初退休時，齊主任就一直叮嚀系上日後務必聘我回來，而執行任務的就是她十分信賴而日後於我亦師亦友的林愛華老師。當時也不知道我會是什麼樣的老師，說起來也實在是挺冒險的。如今轉眼一晃，又已十二個寒暑，期間我從單身而成家，從兩個人增為一家四口，而令人敬愛的齊先生卻已駕歸道山，年紀漸大的齊主任也已高齡八十有五，前年我們德文系慶祝創系二十五週年時，大夥兒特別請她來台灣，前幾屆的同學來了好多人，熱熱鬧鬧，一時衆人彷彿又回到當年十八、十九少年時的歡樂模樣，好不高興，而談起當年我手上抓著夾滿花生的饅頭邊吃邊上課的樣子時，我似乎看到齊主任眼中閃著淚光，我知道，她眼前浮起了當年帶著一個面黃肌瘦、稚氣未脫的我回家吃飯及日後那幾年與齊先生在德國與一個摯愛的學生共進午餐的情景——而今善良、幽默伴她一生的 Papi（意為孩子的爹，齊主任都這麼叫她先生）卻已長眠地下。她返美的前一天，我單獨去她下榻的圓山飯店看她，兩人坐在陽台上，早晨的涼風緩緩吹來，眼前基隆河蜿蜒而過，齊主任談起她每星期必定去公墓為齊先生整理墓前花草時，我不覺也眼眶溼潤起來。我們都長大了，而，他們都老了。隔年夏天我去加拿大時也特地從溫哥華搭灰狗巴士去西雅圖看望她，當然也和她一起去探視齊先生的墓地。微微細雨中，我在心中默默邀請齊先生與我們一同去海邊餐廳吃飯，這一次我請客。

後記：寫此文時，多少塵封往事再度歷歷心頭，太太、小孩，三個可愛女子都睡了，我一個人坐在電腦前稍歇片刻，窗外蟲鳴此起彼落，心中忽然一絲酸楚。剛剛給不滿兩歲半的小女兒佳佳蓋被子時，看她小嘴微張，細長又黑亮的睫毛貼順地蓋著下眼簾，如此熟睡的甜模樣，每次我都感動不已，總要偷親她兩下。這會兒忽想起齊主任這一年還沒看到小佳佳的照片，過兩天挑幾張寄給她吧，也該再給她寫個信了。

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六十六級畢業。一九八二—一九八七年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獎學金生留德。一九八七年獲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德文系博士，旋即回母校服務。一九九二年七月至一九九四年二月復以德國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研究學者身分赴波鴻大學一年半，後重返母校，現任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

所得已多

王瓊玲

步入所謂「壯年」，不得不面對「：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的人生階段。此時心情，雖難免有「江湖寥落爾安歸」的悲涼滄桑；卻也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體悟與自得。一路走來，所得已多，怎能不心存感恩？

感恩最多者，應是母校東吳。從大學新鮮人到取得博士學位，東吳如無怨無悔的慈母，哺育著我成長；而在外遍歷艱辛時，慈母的暖懷，又是遊子永遠的依靠。

回憶當年入學，猶是高中生清湯掛麵的髮型；重重的行囊，裝著深深的不安。然而，一下火車，遙見鐵、血精神的紅黑雙色校旗，正迎風幡飛，學生會已伸出體貼關懷的援手。

於是，從沒踏足繁華都會的南臺灣山區女孩，竟能瞻仰了前日本總督府的雄偉；挨擠了中華商場的人潮；流連了植物園的荷香之後；再被送上三〇四公車，一路打盹到外雙溪。

第一眼的溪城，山巒有照眼的蒼翠，雙溪有沁心的清涼。疲累了的步伐，忍不住越走越輕快。邊走邊跳，邊跳邊笑，繞過冤家路，爬上短命坡，女一舍已在望。負笈北上的志忑早

已煙消，遊子離家的孤獨也全然拋下。

笨重的行李早已被送達；床位上淌著口水的小瓷豬寶寶正鼾睡，那是學姊們歡迎新室友的誠意。窗前滿天的彩霞正璀璨，我們年輕的笑容也從靦腆陌生逐漸肆無忌憚起來。

中文系大一的課程已不算輕，老師們又要求得異常嚴格，一學期要寫六篇作文——且是文言文。於是，不少同學先寫成了白話文，再發揮大無畏的翻譯精神，將滿紙的「的、嗎、哪、呢、咧」，改爲「之、乎、也、者、哉」。

因此，老師自嘲「當國文老師的，前三輩子都是江洋大盜，殺人越貨；所以，這一輩子罰改作文。」並當衆宣讀「僅著泳褲一條，躍入圓山之畔、游泳之池」及「常至西門之町，遊之逛之」的「佳句」時，全班沒幾個笑得出來。

後來忝爲人師，身受「殺人越貨」果報之罰，每欲廢筆浩歎時，腦海中便浮出王國良、黃登山及閔孝吉三位師長，在我作文紙上密密麻麻的圈點及眉批；尤其是年踰七十的閔老師，對我們更是恨鐵不成鋼，數次金剛怒目的叱道：「孩子們！不好好學，怎對得起學校？對得起列祖列宗？」其言其情，凜若秋霜，小子敢不勉力乎？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美事，在東吳何嘗沒有？只是情境稍有不同而已！猶記得「戲劇」課上，曾永義老師一進教室，便雙手支住講桌垂頭沉思。全班則鴉雀無聲。曾師緩緩抬頭，眺望窗外燦爛的冬陽，再默默俯視不知所措的我們。突然，他掌擊桌面，大喝

一聲：「如此良辰！該不該在陰冷的教室裡上課？」全班歡呼：「不該！不該！」「走！隨我到故宮後山去」。於是參天的相思樹下，我們環繞著現代的西楚霸王，聽他高唱垓下之歌。歌聲中有道不盡的英雄憾恨；訴不完的兒女情長；但蒼涼悲淒中又有吾師令人動容的壯闊豪情。

張子良老師的詞選課，真令大夥如癡如醉。張志和〈漁歌子〉中的蓑衣、箬笠，何以是青、綠顏色？漁父爲何「斜風細雨不須歸」？李太白〈憶秦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何以得王國維贊美爲「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小晏詞何以是高華綺麗的外表，掩不住蒼涼奔放之情思？東坡詞何以能「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凡此大關鍵，在吾師吟誦講解中，一一解惑。無怪乎我雙十年華所許的生日願望，竟是盼能生生世世在臺下聽張師講詞。

考進研究所，是我的幸運；而能親炙臺師靜農、鄭師因百兩位大師，更是我無上的福份。溫州街日式房屋的紅色木扉，每次只要我伸手一按電鈴，臺老師便拎著一只舊公事包，笑容滿面的走來，拍拍我的肩：「娃兒，來接臺爺爺呀！」

溫州街到小南門的計程車程很短，但卻決定了我日後研究古典小說的漫漫長路。

「娃兒，妳可以寫的。要寫，寫一些有血有肉的東西呀！」

小說創作上，至今我仍繳白卷。每思及臺老師蒼松古柏的偉岸身軀，提攜小輩的慈謫話

語，便愧不能已！

鄭師因百年屆八十，猶精神矍鑠，上起課來，可謂出神入化。我們曾請教鄭師：「衆多詞家中，有無最喜愛、欽服者？」鄭師含笑答道：「衆名家皆有短長！知其所短、取其所長，始可談詞呀！」而禁不住我們一再懇求，鄭師方說：「年少時，最不喜清真詞；年長後，最喜愛的卻也是清真詞。這可要慢慢體悟的哦！」

後來，我讀了王觀堂早年在《人間詞話》中所云：「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對周邦彥可謂貶意忒深。但王觀堂晚年時卻特別撰寫了《清真先生遺事》，對周邦彥推崇備致：「以宋詞比唐詩……而詞中老杜，非先生不可……兩宋之間，一人而已。」

因百師和王觀堂先生皆是詞學湛深的學者兼作家，二人對清真詞的評騭何其相似！而清真詞精審音律、沉鬱頓挫，且頓挫中有姿態；沉鬱中極深厚。這種詞中三昧，大概須有豐富的學養，再配以生命的歷練，方能確切感受，正如鄭師所言：「這可要慢慢體悟的哦！」

博士班五年中，國良師教給了我們博採衆取的治學方法；文起師教給我們深閱精微的思辨能力；宏一師則縱橫有清一代，詩、詞、古文、小說，皆令我們酣然神醉。而年逾九十的潘師石禪，則讓我們一窺紅學之堂奧；並深深感悟前輩學者擇善固執的凜然風骨。

四月初，外雙溪繁花錦簇。我卻徘徊於木柵第二殯儀館前，悲慟到不敢走進靈堂。大二

背誦、繫聯「東、冬；鍾、江」的苦樂猶在眼前，我們敬之如父、愛之如兄的炯陽師，卻已撒手西去。

林聰明老師淒然肅穆地走出靈堂。我迎向前，忍不住痛哭，哽哽咽咽的說：「老師：兩個月前，炯陽師還約我長談許多事。他說您每週北上，一定親往探病；有時還一天探望兩次。他說您是他情義雙全的性命之交呀！」

五月，「停雲詩社」成果發表會。東吳嫁出去的女兒，帶領著五十位世新中文系的孩子們回外婆家觀摩。山巒依舊蒼翠照眼；雙溪依舊清涼沁心。冤家路上笑語喧嘩，我的孩子們正以清亮的眼眸，汲取溪城的靈氣；而蹦蹦跳跳的身影，依稀重映出當年南臺灣山區女孩初到東吳的驚喜。

啊！東吳！東吳！我安身立命的源頭。所得已多！能不感恩？能不感恩？

王瓊玲，東吳大學中文系七十一級畢業，東吳中文系研究所碩士、博士。現任世新大學首屆中文系系主任。專研中國古典小說，著有《野叟曝言研究》（學海書局出版），《清代四大才學小說》（臺灣商務書局出版）。

曾經，此水清清——溪城憶往

張曉風

那年，她十七歲，我也是。夏天放榜，她考取了東吳，我也是。她讀會計，我讀中文，我們都很快樂。

我們相約去看新校區，南部鄉下來的同班同學——真的很南部，比高雄還南，我們是屏東來的小孩。

同學叫她「獅子」，倒不是因為她凶惡，而是因為她名叫鄭師瑾，「師」「獅」同音，大家就叫她「獅子」。

「獅子」長得美，一雙大眼睛，慧黠靈動，瑩澈淵深，彷彿一串說不完的謎面，令人沉吟費猜。獅子且清瘦，腰肢一把，輕盈若無，穿起那時代流行的蓬裙，直如雲中仙子。

我們終於找到外雙溪，那時是一九五八年，住在台北的人一時還沒有學會污染的本領。我們站在溪邊，我驚異於碧澗瀨石之美——啊，教我怎麼說呢，我只能說，那時候的水，真是水。沒有雜質的水。

我當時忍不住跟獅子胡扯：

「我們去弄件游泳衣，下去游泳吧！」

其實，我只是說說，因為，第一，我根本不會游泳。第二，水也太淺，不可能施展身手。

但獅子這個人一向認真，她立刻很淑女的罵了我一句：

「妳神經啦！」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指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一個女孩子只穿一件游泳衣便去戲水，豈不有傷風化？

而我當時那麼說，無非想表達，此水清清，清到值得我們跳進去嬉戲！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每週去東吳上小說課，經過溪邊，總不免扼腕嘆息。溪水啊！你昔日的美麗呢？雖然也有膽大的釣者繼續釣魚，雖然也有一兩隻白鷺穿梭其間。但，那曾經澄澈如玉的溪水卻早已不見了。

獅子，繼續著她在人世間循規蹈矩的步伐，繼續流盼她的美目，但乳癌卻攫住她。她抗拒，她去開刀，她去復健，她認真的前往大陸尋求醫療，然而，三年前她終於走了。靈堂佈滿白色的姬百合，她連葬禮都規劃得一絲不苟。

我該向誰去討回我誤撞異域的朋友呢？

一九五八年，東吳在外雙溪的第一棟校舍落成，中文系一年級在「第一教室」上課，（那位置，現在是註冊組在使用。）班上同學只有十人，如果用成本會計的眼光來看，真是浪費。但小班上課實在是令人難忘的好經驗，認真的教授甚至可以記得我們作品中的某些句子，像張清徽（張敬）老師，三十年後她偶然還能當面背誦我大四「曲選習作」的句子：

「溝裡波瀾擁又推，亂成堆，一半兒春愁一半兒水。」
令我又喜又愧。

然而，清徽師也走了，祭弔時播放的不是哀樂而是她生前最喜歡的崑曲。啊！真是奇異的告別式啊！

「裊晴絲，吹來閒庭院……」

幽緩的〈水磨調〉，人生卻是如此匆匆啊！

老師是舊式才女，有才華，又用功，連她的字我也是極喜歡的，（雖然，不太有人知道她的書法。）她的古詩更寫得好，渾茂質樸，情深意切，當今之世，華文世界，能寫出這種水準的人，想來也不超過五個吧！

憶起清徽師，常忍不住惻惻而痛，因為同為女性，也因為疼惜，疼惜她這樣的才女，卻生不逢辰。她對自己的婚姻嘖有煩言。但據我看，師丈並不壞。我有次在老師家中看到一幀佩劍少年的舊照片，那美少年英姿爽颯，足以令任何女子砰然心動，我問師丈：

「這人是誰呀？」

師丈說：

「就是我呀！」

我當時大吃一驚！原來這不修邊幅，說起話來顛三倒四的師丈，曾是早期清華的高材生，他英俊俊俏，眼神如電，令人形慚。他且又因抗戰投身空軍，可謂是才子又是英雄。老師當年傾心此人，本來應該可成一段佳話，但才子往往不容易與人相處，至於逢迎阿諛，當然更爲不屑。在事業飽受挫折之餘，他變得成天談玄說命，不事生產。老師於是自怨自艾起來，詞曲於她不失爲一種及時的救贖。

啊！如果老師晚生五十年或者六十年，命運會不會好些？女性主義的大蠱是不是讓她可以活得更理直氣壯一點？但反過來說如果她晚生六十年，那些來自書香世家的良好舊學根柢也就沒了——唉，人生實難啊！

何況，多年後，老師告訴我，她原爲家計困窘，才在台大之外尋求兼課東吳的。那麼，倒是我撿到便宜了，讓我有了一年之久領略她風趣雋永的授課。世事的凶吉休咎原是如此難卜，她的不幸，不料反而成就了我的幸運。

當這世上你可以稱之爲老師的人越來越少，學生卻愈來愈多，真是件可悲的事。你眼看老成凋謝，卻阻止不了他們的消失。於是你漸漸了解，原來，學者也不是永恆的，如果你不

趁可請益的時候請益，將來，總有一天，你再也無法向他們請益了。

汪薇史（汪經昌）老師是我另一位恩師，不料在香港教書時發生車禍謝世。命運真是很奇怪的東西，汪老師和大多數外省老輩一樣，對台灣的政治定位沒什麼把握。剛好，香港有意延聘他教書，他是希望能終老香港的，卻不意為一輛不負責任的車子斷了命。那司機何曾知道這一撞，撞碎了多少寶貴的曲學傳承啊！

汪老師是曲學大師吳癩安（吳梅）先生的弟子，在台灣曲學界可算得一代宗師。但奇怪的是他當初受聘中文系，所授的課程竟是「社會學」。

有一次，我請教汪老師要學詞曲應該如何入手，他說該從花間讀起，我再問從花間讀起如何讀，他說，你來我家，我講給你聽。我從此每週兩次去老師家聽花間詞，他講給我一個人聽，免費，而且供應晚餐。甚至我後來結了婚，仍賴皮如故。有時在老師家談得興起，不覺已至午夜。忽聽得日式房子的矮牆外，有人用壓低的清亮男高音的嗓子在叫：

「曉風！」

我一驚而起，推開抑揚清激的工尺譜，完了完了，一定又過了十二點了。於是乖乖出門，跟來「捉」我的丈夫一起回家。從龍泉街到永康街，坐在腳踏車後座上，一路猶想著老師婉轉的笛聲。這種情節一路上演到我生了孩子，實在脫不了身，才算罷休。而那時候，老師也正打算赴香港上任去了。

我如今每次打開《花間詞集》都不敢久讀，因為一想起往事，就要流淚。

溪聲千迴，前塵如煙。連當年那可愛的會寫情詩的學弟林炯陽也走了。（至於他曾取得博士學位，當過中文系系主任，算來都屬「末節」，他的詩人履歷還是最可敬的。）我想，如今我只能珍惜活著的師友，並期待下一世紀的江山代出的人才。鍾靈毓秀的溪城當能回應我的祈願吧？

張曉風，民國三十年出生於浙江金華，原籍江蘇銅山。民國五十一年畢業於東吳大學中文系。現執教於陽明大學及東吳大學，著作有《地毯的那一端》、《步下紅毯之後》、《我在》、《玉想》、《從你美麗的流域》、《我知道你是誰》、《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曉風戲劇集》等三十餘種。

李傑老師的故事

鄧東濱

認識李傑（蘭甫）老師，是民國五十二年我在東吳母校擔任經濟學系助教的時候。由於當時系上專任老師很少，所以平常較有機會親炙他。他給我最深刻與最難忘的第一印象是：深受西方文化薰陶、卻維持傳統中國讀書人風格的那種特有氣質——有傲骨卻無傲氣，熱情但不失理智，開通但不放縱。我這一最初印象，持續到三十六年後的今天，仍然絲毫沒有改變。

民國五十六年，我從國外重回母校擔任經濟學系講師職務，有兩年的時間，曾與李老師及同系的侯家駒老師同住學校宿舍。這段期間，恭聆李老師教益的機會特別多，因此我對他較鮮為人知的往事也略有瞭解。茲將印象比較深刻的幾樣記載如下：

第一、李老師是抗戰期間在重慶沙坪壩就讀中央大學經濟學系。與李老師前後期的中大同學之中，先後在東吳任教過的計有楊必立老師、刑慕寰老師、魯傳鼎老師、金唯信老師等。李老師與他這群同學，在民國五十至七十年代曾經是台灣財經界極具份量與極具影響力

的學者。他們也全都是吳幹老師（抗戰期間中大經濟學系主任、東吳在台復校後第一任經濟學系主任及第一任商學院長）的門下。在這樣的傳承下，我能在東吳當學生，後來還能在東吳擔任教職，深覺與有榮焉。

第二、李老師是政府遷台後，第一屆公費留美考試經濟學門兩百名競爭者中唯一被錄取者。他因健康關係，耽擱了三年時間才赴美深造。可能因為有過這種痛苦經驗，李老師一直都非常留意自己的健康，並時時以自己的經驗提醒周遭的學生。此次公費留學，李老師取得了奧利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學經濟學碩士學位。

第三、民國五十三年，政治大學爲了創辦企業管理研究所，曾與美國密西根大學簽訂教授互訪計劃。李老師是該計劃下、前往密西根大學訪問的四位教授之一。他在爲期一年的參訪期間內，除了實際考察彼邦管理教育的實施狀況，同時也順利取得密西根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李老師回國後，即依合約規定在政大企管系所任教三年。民國五十七年，李老師再度應吳幹老師之邀，回東吳創辦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之前身），並兼學系主任之職。

第四、李老師的中、英文造詣極深。抗戰末期，美軍來華人數激增，亟須配合翻譯人員。當時的軍事委員會乃向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與西南聯大三校徵調四年級男生赴軍中充任譯員。李老師於民國三十二年底被徵調，並擔任譯員訓練班之助教。不久，他奉命前赴印度，加入中國駐印軍，並被派至雷多（Ledo）美軍供應處（Service of Supply）擔任翻譯工

作，直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復原爲止。大陸易手之後，李老師在台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中央日報國際新聞版的編譯。民國五十三年起，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開始大規模推動經濟學經典名著翻譯計劃，李老師是該計劃中第一種名著——凱恩斯（John M. Keynes）的就業、利息、與貨幣之一般理論——之譯者。據我所知，李老師自民國五十三年起，數年間翻譯的名著，肯定超過數百萬字。他譯筆之快，與譯品之通暢，相信當代少有人能出其右。

第五、李老師在執教鞭之前，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事有關臺灣土地改革及經濟發展研究的工作。記得他曾多次提及在蔣夢麟先生主持下的「農復會」、在尹仲容先生主持下的「經安會工業委員會」、以及在陳誠先生主持下的「美援會」從事研究工作的諸多往事。在三、四十幾年前，有經濟理論素養的人，未必都瞭解經濟實務；熟稔經濟實務的人，也未必都擁有足夠的經濟理論素養。像李老師那樣理論與實務兼具，在當年確屬少見。記得東吳商學系剛創辦時，李老師曾爲商學系引進一個研究計畫——請美國知名管理學者 Anant R. Negandhi 前來東吳，研究國際公司在台企業之管理方式，並就美資、日資、及中資企業管理方式之異同做實地調查——李老師除了擔任該計畫之研究顧問外，還甄選學生充當研究助理。該研究成果於一九七二年由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以專書出版，書名爲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he Case of Taiwan*。

民國五十八年，李老師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前赴該大學成立不久的嶺南商科研究所擔

任教席。民國六十年，我因李老師之推薦，得以赴香港浸會學院（後改為浸會大學）任教。三年後，我再度獲得李老師之協助，才有機會轉赴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任教。曾經有過五、六年的時間，李老師與我的研究室都位於同一棟大樓。李老師在嶺南商科研究所（後改為企管碩士課程部），除了指導研究生論文，主要開授的課程中包括「管理經濟學」與「國際企業」。他曾為這兩門課分別寫了《管理經濟學》（聯經出版社出版）與《國際企業論》（三民書局出版）兩本專書。這兩本書多年來是港、台兩地大學本科生及研究生經常使用的教科書或參考書。此外，在一九七四年時，李老師也曾與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國際企業教授 Lee C. Nehrt 合著「*Managerial Policy, Strategy and Planning for Southeast Asia*」（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後來成為中文大學 MBA 企業政策一課的基本教材，被稱為 the Green Book。李老師在中文大學任教二十年所表現的一貫認真的教學態度、卓越的教學品質、以及對人的誠摯關懷，一直贏得嶺南商科研究所同仁與學生的高度尊敬與懷念。而今天中文大學商學院被評為亞洲一流商學院，且為美國 AACSB 首次接納的亞洲兩名會員之一，李老師無疑有其當年一份心血貢獻。

民國七十六年，在楊其銑校長力邀下，李老師又回到東吳，執教於國際貿易學系，並兼學系主任職務。這一段期間，因為我也在東吳服務，曾目睹他為修訂課程結構及提升師資水準，做了長時間不遺餘力的付出。

一九九三年，李老師從東吳榮退。爲了感念他對東吳的貢獻，以及繼續借重他的專長，章孝慈校長在他榮退後，立即改聘他爲國際貿易學系的專任研究教授。目前他仍堅持每學期講授兩門課。

李老師並不是一位完美無瑕的人。三十幾年來，就我所見所聞，我可以舉出他的大、小「缺點」各一。他的一個「小缺點」是常常會「賴課」。每次當課講到起勁時，他居然聽不見下課鈴聲，甚至根本就忘記有下課這回事。在香港是如此，在台灣亦復如此。他的一個「大缺點」是善惡分明到超越常人想像的範圍。他最不屑的——不，應該說是他最鄙視的——就是官僚。一提及官僚，他在言辭與表情上立刻展現深惡痛絕的反應。他用以刻畫官僚的措辭，讓我耳熟能詳的至少包括「裝模作樣」、「歌功頌德」、「殺無血、刮無皮」、「頭削得尖尖往上鑽」、「一副感激涕零、皇恩浩蕩的嘴臉」等。以上兩種「缺點」，三十幾年來未見有多大的「改善」。事實上，出自他熱誠與耿直本性的這兩種「缺點」，我倒有一種奇怪的想法——那就是不希望看到他有任何「改善」！

鄧東濱教授，東吳大學經濟學系五十一級畢業，早年在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擔任講師，後受聘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執教多年，一九八六年受邀擔任東吳大學企管

系教授兼學系主任，並於一九八七年擔任商學院院長、城區部主任及推廣部主任。目前專職為企業培訓講師、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與端木校長忘年之交

武憶舟

一、端木校長生平簡述

(一) 文法兼精，學貫中西

故校長姓端木諱愷，字鑄秋，母校後輩咸尊稱「端木先生」，安徽當塗人，先生弱冠之年，同時就讀二所著名大學，在「復旦攻文」、在「東吳研法」。畢業後，遠涉重洋，在美國紐約大學深造，獲得法學博士後回國。知端木校長是不單法學造詣精湛，漢學根底也很深厚。至於口若懸河，辯才無礙，則有下列二事可供傳誦：

故校長在台北執行律師業務時，民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包括政府機關在內，須請律師時，如一方聘江一平律師（時任立法委員，可兼理律師業務，亦為東吳前輩校友），他造必請故校長對庭，蓋二人在律師界素享盛譽，聲聞各界也。

鑄公擔任母校校長後，不論是與同學聚餐共話家常，或在校內主持各種會議，威能掌握

分寸，恰到好處，片言而決，為參與者所敬佩。

(二) 參與國事，風雲際會

故校長於民國十八年學成歸國後，應程天放廳長之邀，初任安徽省教育廳秘書兼科長，自此踏入政界，曾一度擔任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與中央大學教授後，復轉入政府，參與樞要，先後在行政院歷任參事、組長、廳長、與會計長；後遷任司法，立法院之秘書長。政府遷台，被聘為國策顧問，兼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國民黨並聘其為中央評議委員，風雲際會。備極辛勞，誠為政府遷台後黨政各界一時之選。

(三) 執業律師，功在朝野

以報效政府言，鑄公會受政府之委託，辦理中國航運公司與中央航運公司飛機歸屬事件，每週往返台港二地，涉訟經年。終使我國數十架飛機完整來歸，功在國家，誰曰不宜。以服務工商言，鑄公在工商企業各界卓著聲望，前已言及。各界委辦之民刑事案件，鑄公皆與江一平律師對簿公庭之事亦傳遍台灣，法界中人多以瑜亮譽之。

以有車階級言，當年從事律師業務者，在台北地區，不到二百人。但擁有私人轎車者，鳳毛麟角，僅五、六人而已。故校長及江一平律師各有一輛。在當年私家轎車，咸認為奢侈品，不單稀少，抑且表彰擁車者在社會上之身分地位；不如現在，滿街盡車，今昔不能相比耳。

(四) 奉獻母校，功成身退

當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退守台灣後，青年學子隨政府、隨國軍來台者不少。然當年大專院校寥寥無幾，青年人失業，學生失學，非常嚴重。校友先輩們洞燭機先，倡東吳復校之議。經故校長等登高一呼，於民國四十年間創設東吳補習學校，奠定了以後恢復大學之契機。此在當時不能增設大學或恢復大學決策下慘淡經營，只好以補習學校補救，實質上教授學生者，皆大學課程。於是乃有刊物以標題：「掛狗頭賣羊肉」為文之讚揚。

故校長在執業期間，曾先後出任東吳大學同學會會長、董事會董事、代理董事長。至五十八年，母校正式恢復大學後，當選第三任校長，任職十四年，至七十二年秋季退休，由楊其銑接任校長，鑄公乃回任董事長，直至七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謝世止，先後獻身母校近四十年。

二、締交經過

(一) 初識蒙邀，未克入幕

憶在民國四十五年夏天，憶舟以四年總平均第一名畢業於母校法律系，且於畢業當年考取律師，即承故院長吳光博士推薦而拜識鑄公校長。承蒙不棄，邀余入幕幫辦律師業務。憶舟少不更事，婉謝故校長之雅意，自行開業，現今思之，令人感愧交集也。

(二) 再攬合作，追隨左右

憶舟執業數年後，因受鑄公委託，代辦在其認頗棘手之民事訴訟，標的金額逾新台幣十萬元，此在當時已屬較大案件，後以勝訴而蒙其賞識。鑄公再度相邀，約定消費合作。以斯時情況，誠難再拂長者栽培美意；遂決心追隨參與，成爲端正法律事務所之一員。按鑄公與予之年歲相差十有八年，不啻忘年之交也。

(三) 忘年之交，往事難再

鑄公與舟在相處消費合作律師業務歲月裡，辦公時間，分居二室辦公，但有一牆之隔，起居作息相聞，公餘也常被邀端木府上作客，享用豐盛晚餐，由是與楊前校長、王董事長學長等，共話家常，推心置腹，無所不言。主人好客，廚師藝精，豈止口腹不淺，抑且受教良多。惜乎如此聚會，往事難再。

三、任校長，不支薪給

(一) 百年樹人，以身作則

回憶端木先生甫接任校長，深感事艱責重，曾與憶舟談及其今後生涯。認從教育事業，乃百年樹人事，必須以身作則，爲人表率。事務所雖懸招牌，但即未接辦新案，舊案由憶舟爲之接辦至完爲止。在學校方面，負債新台幣七千萬元，認爲必須開源節流不爲功。

(二) 學校負債，放棄待遇

憶當年故校長與世界新聞管理學院成舍我院長交深，但世新則資產逾七千萬元以上，乃有二校合併，資產負債軌平之戲言。故校長由是決定，終其校長在內，放棄待遇。

(三) 聘舟專任，不領新津

鑄公同時對憶舟建議：「你做專任，有律師收入可予挹注，不在乎區區新給。」亦命憶舟不支新津。憶舟既追隨左右，自當應命。由此在校擔任副教授而教授，前後三十餘年，從未支薪給或研究費。直至章故校長主政時，母校財務狀況大好，母校現任教職員及專任老師八百人餘人中，只有憶舟一人未領新津，人言不平。章故院長於去北平前（此次章氏由北平返台時，已成植物人），憶舟從未啓口下，主動下條通知憶舟自即日起在學校服務，應照支研究費，以示公平。章院長所以有此一舉者，諒因前陳澤祥院實施甲戌改革方案，擬廢英美法之傳統教學特色，為憶舟所反對而被排擠、所受精神上委曲之回饋耳。

四、職業乞丐，募款建校

端木校長，以古稀之年，僕僕風塵，遠訪國外，自喻為職業乞丐。其分別向美國基督教衛理公會、亞洲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及海內外校友支持捐款，得以完成文、理、法、商及外語五個學院，二十個學系、六個研究所，與夜間部之正式設立更創設理學院、科學館、

與音樂系，東吳大學成爲一個完整體制之大學，母校有今日之規模，鑄公貢獻者多矣。

五、提拔後進，求賢若渴

(一) 事蹟之一

楊前校長其銑在母校服務多年，在出任教育部派駐美國大使館參事時，經故校長一再延攬，使擺脫公職回校服務，完成交棒接棒之世代交替。

(二) 事蹟之二

當時之母校，並無理學院之設；適現任劉校長源俊自海外學成歸國，有爲東吳服務意願。故校長乃以其過人魄力，創設物理、化學二系，原屬文學院之數學系亦併入之，而成立爲理學院；畀劉校長以創設重任。按劉校長與端木先生，原不相識，然由於故校長豐富閱歷，觀人才之透徹，賞識劉校長與楊前校長一樣，係同屬不可多得之青年才俊，故雖屬新人，仍予重用。劉校長得以一非東吳出身學者，而投入母校服務，始終如一，迄未他遷，匆匆近三十年。民國八十五年間，得脫穎而出，遴選首任之校長。由此可見故校長，知人識才，獨具慧眼也。

(三) 事蹟之三

故校長尙提拔章故校長孝慈進入法學院任職。初任法律系副主任；後晉升爲主任，法學

院院長。轉遷教務長。再繼任校長，迄其八十三年七月逝世，在東吳服務亦近二十年，其服務原始推薦人即為端木先生也。

(四) 事蹟之四

故校長執行律師間，因業務繁忙，乏人襄理，由憶舟轉介學生校友周惠銘出任助理，繼又介李文儀，再引廖修三，進入事務所。周君往後被推薦往香港董浩雲集團任職；鑄公又資助李文儀去美西雅圖深造，獲博士學位後仍回事務所襄助，同時兼在母校任教。廖修三亦因取得律師資格，現仍執業及兼本校教職。

六、捐巨款，獻華廈，贈珍書，作育英才，遺愛東吳

當故校長彌留之際，仍心繫東吳，遺言將其積蓄新台幣壹仟七百餘萬元遺贈母校，設立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金。並以自居之台北市敦化南路鑽石大樓九樓近百坪之華廈一所，及生平所藏珍品古籍，遺贈母校。故校長如此之慷慨解囊，全心全意為母校作育英才，遺愛長存，永留於東吳學子及校友之內心也。

欣值母校建校百年之慶，深感於鑄秋校長對母校之貢獻，無人能出其右。爰為文記述之，以告之各位校友，藉留永念焉。

八十八年六月

武憶舟，東吳大學法律系四十五年級畢業，律師考試及格。自一九五六年起迄今，執行律師業務及擔任母校教職，約四十年以上。現任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教授。著有《民法總則》、《公司法論》、《債務總論》等大學用書，並有《商事法總編》及《論關係企業》等近十種專著問世。

永懷恩師黃奉儀博士

孫清吉

前記：黃奉儀博士生於民國八年，民國五十八年東吳大學邀請她到校執教，訓練合唱團，創辦音樂週及籌辦音樂學系，因此造就了許多活躍於國內外樂界的優秀音樂人才。

民國七十二年返回美國定居。民國七十四年，以極優異成績剛完成美國德州醫學博士學位及新婚不久的廿八歲獨子洪大衛卻不幸罹患血癌過世。過了兩年多，一向身材魁梧，從事外交工作的先生洪聲華突然因心肌梗塞過世。接著在民國七十九年五月，黃博士也突然因腦溢血過世。短短的幾年，一家三口先後蒙主寵召，不禁讓人感嘆人生的無常。

民國六十二年，我因對音樂的熱愛，決定辭去七年多的小學音樂教師工作，考入東吳大學音樂系。新生訓練的第一天見到黃主任，給我的印象是位充滿活力、信心十足、慈祥帶嚴肅，令人敬畏的師長。在新生術科試聽會後，我被選為她的學生，可說是一種緣份，但開學後，我發現許多觀念和想法跟同學之間有一段距離，我開始焦慮重做學生的適應性，也不知

如何才好。上完聲樂課後，黃主任不只給我音樂，也給我極大的信心和毅力，使我能安心求學。

在未進入東吳之前就聽說東吳的英文要求很嚴，而我在國中畢業後，已十多年未接觸英文，黃主任知道我的情況，由於系務的忙碌，她特別請從小就接受英文教育的鋼琴老師周唐可博士幫助我，每星期利用一或二個晚上到她家研習英文，從字根、生字、造句到會話，而黃主任上個別課時，也會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問我，增加練習機會。他們兩位的無怨無悔教導，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在過去廿多年的歲月中，讓我活在熱愛布施及有教無類的喜樂中。

音樂系開辦之初，辦公室及琴房設在現今理學院大樓下方的光道廳旁，地方雖小，但同學與師生間情感如一個大家庭。最難忘的事是全體同學到黃主任家烤肉，那是一棟位於陽明山的豪華大別墅，有游泳池、籃球場、大庭院，依山傍水，每天有幾位工人負責打掃，大家都說：「黃主任是一位富貴中人。」

民國六十一年，經端木校長及黃主任的奔走募款，音樂系館的籌建有了著落，沒想到這一年，全球的經濟變動，台灣的物價上漲一倍，只好把音樂館縮減一半，音樂廳六百個座位變成三百個，這件是一直讓她耿耿於懷多年，系館完成後，還要募款購置樂器、圖書、唱片。特別是課程規劃與師資延聘，歷經許多艱苦，譬如她要求每一位學生除了西樂外，必須

選修一樣中國樂器，以免忘本，另外組織管絃樂團、混聲合唱團、國樂團、管樂團，舉辦全省巡迴演出，奠定東吳音樂系在國內的聲望。記得開創音樂系之前幾年，國內的銅管老師很缺乏，爲了提昇東吳的銅管水準，特地從美國聘請一位專任老師到東吳執教，並兼台北市交響樂團的銅管首席，開啓了國內樂團及大學引進外籍音樂家之風氣。

爲了讓東吳音樂系的發展延伸到國際間，特別與日本大阪大學音樂系結爲姊妹系。民國六十五年更帶領及指揮女聲合唱團到多所美國大學及教堂巡迴演出二十一場，也開啓了東吳畢業生到美國留學的風氣，進而把東吳音樂系的名聲遠播到國際間。

黃主任在辦學專業領域上有其嚴苛的一面，在鋼琴、弦樂、管樂、理論作曲都非常尊重各組的負責人。因她主修聲樂，對聲樂學生要求更嚴，她認爲聲樂的樂器是身體，沒有好的聲音不宜走專業的路，所以第一年八位聲樂學生剩下兩位，有的轉系或轉校，當時更氣走了一位聲樂老師。事隔多年，這些轉換跑道的學生，如今在社會上的地位及表現都很傑出，或許該慶幸吧。

民國六十六年畢業後，我留在系裏當助教，成爲她的部屬，才真正體會到她的處世待人風範，她教我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每一張節目單、海報不准有一個錯字，特別是外文部分，一個標點也不可忽略。在公文上，常常修改重寫十幾次，寫到手發軟；在爲人方面，她的細心真令人敬佩，不論朋友、部屬，過年或生日，她都會寄上一張卡片或小禮物，甚至朋

友的小孩都會收到。中午沒事時，她常約辦公室的助教搭十二點十分校車到士林福樂用餐，民國六十幾年經濟情況沒現在那麼好，有機會享受那麼豐盛的西餐，可說是一大福分，特別是從她臉上顯露出的慈母之情，令人難忘，然後再搭一點多的校車回校辦公。

民國七十二年黃主任返回美國定居，由張寬容老師接掌系務，還一直關心系裡的發展，而幾位老師先後離開東吳到國立學校任教，最令她難過。民國七十三年到七十五年，我在紐約曼哈頓音樂院求學期間，由於她與教會的良好關係，常利用假日，請我到多所教堂演唱打工，使我在生活上無後顧之憂，而每次見面，總會叮嚀要我多為東吳音樂系做些事，雖然在七十九年她蒙主寵召，但這些叮嚀無時無刻永遠在我腦海中迴響。

孫清吉，東吳大學音樂系六十六級畢業。先後畢業於國立屏東師院、東吳大學音樂系、紐約曼哈頓音樂院碩士班，歷任小學、中學音樂教師、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理事，現任東吳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新世紀合唱團指揮、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理事。著有《樂學原論》、《自然的歌唱法》等書。

結緣東吳三十年憶往二三事

成永裕

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年少輕狂歲月裡，問君欲投考何校何系，當時男生若未填理工，即屬意醫農；女生倘不學文史哲，即修商、家事；既處塵世，焉能不隨俗？雖內心老大不願，高二時仍隨大夥兒在吵嚷聲中升上「自然組」；諸多科目中，生物課最有趣味，而余對於醫藥尚感興趣，於是努力研習阿米巴、變形蟲，很用心觀看教學影片，一心想學醫藥，將來好懸壺濟世，治病救人。

孰料生物實驗時，分組操作，遇到解剖青蛙、白兔，看別組同學紛紛挽起衣袖，開膛破肚，已心有戚戚焉，實不忍心對小動物下手，本組同學二、三人交頭接耳一番，遂裝模作樣記錄解剖細節與過程，私下卻將可憐的青蛙、白兔藏匿於實驗室的櫥櫃裡，準備課後放生，以免因殺生而增加「罪孽」。

豈知此種小把戲，根本逃不過生物實驗老師的法眼，在「不動刀解剖、即休想及格」的威脅下，可憐的青蛙、白兔仍逃不過被宰殺之噩運；雖然依慣例禱告、施乙醚，希減輕其痛

楚、俾早早超生；然一刀切下，血流如注，不免膽戰心驚，但見屠體氣若游絲，心臟仍在跳動；而不爭氣的雙手似已不聽使喚，頓時噁心反胃，一場「天人交戰」下來，不僅汗流浹背，早已淚流滿面。雖然當年「生物」學期成績九十多分，頗為亮麗耀眼，但想到：如進醫學院必須上解剖學，面對人類同胞的屍體，屆時將更「情何以堪」……於是，心一橫，再見吧，醫學院！

高三時，不管他人的看法如何，余毅然決然地轉入「社會組」，成爲當年身爲男生，不唸理工醫農，卻與女生爭長短，讀文、法、商之「異類」。所幸，於國、英、數三科早有相當基礎，而對史、地與三民主義亦有濃厚興趣，因此對於被戲稱「半途出家」如我之高三轉組生而言，適應上，尙不是問題；只不過，爲拚聯考，短期內，硬要背一大堆文史資料，對此則有些不以爲然罷了！

三十多年前，聯考不待成績揭曉，即須報名時先填寫校系志願；一般作法，多爲參考上一年度聯考校系最低錄取標準。遂不能免俗，按「排行榜」依樣畫葫蘆一番，雖說志願，一填上百個，以免落空。原想唸商，在親友一致道賀聲中，卻誤打誤撞地進入赫赫有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

報到時，只見外雙溪操場一片荒涼，房舍三三兩兩，樸實無華，學生不多，學系更少；所幸校園不大，否則，多少會有被流放到「北大荒」的淒涼感覺；眼前所見與心目中的大學

校園相去甚遠，甚至還比不上台北的幾所著名高中校園。再看看第一學期的學雜費、制服費、宿舍費（當時有男女生宿舍各二，東吳規定：新生無論家居何方，一律住校，大一男生還「十分幸運」地分配到新落成啓用之男二舍，由於相較於當時校園內其他建築物，既新且「現代」，私下多稱之為「統一飯店」；該樓據悉業已改爲女生宿舍）及學生會會費，不得了，要新台幣（並非以「美金」計）五千七百多元，比公立大學學雜費總和還要多出約兩倍，而一般公務人員的月薪，在當時，也不過三、四千元！想著想著，東吳法律學系要唸五年，漫漫長夜，暗暗叫苦，心想乾脆次年重考，別讓父母負擔太重。

大一新生，實乃天之驕子，被學長、姊寵得很，哪科難過、某師如何，經已解說詳盡。令人敬畏的法律學系系主任呂光教授，雖未見其人，但早已聽聞其大名，尤其，呂光教授與新生初見所講的一席話，最令人難忘。

猶憶當時，呂光教授身著畢挺時髦西裝，漂亮的花領結，一步入講堂，即有國際知名法律學者的架勢，他以一口濃烈上海腔的國語，夾雜不少似懂非懂的流利英語，敘述了東吳大學辦學以來的滄桑史、法學院在「十里洋場」上海的光榮過去，並娓娓道盡了東吳師生、校友在台灣艱苦復校的奮鬥歷程，以及東吳大學法學院在國內、外所享盛譽，期盼吾等新生「無論想唸文、法或商，興趣是可以培養的」，大家別「三心二意」，應「既來之，則安之」，並勸勉新鮮人當步武前人奮鬥不懈之東吳精神，努力向學，以光大東吳法學爲己任，尤盼東

吳同學能薪火相傳、繼往開來，使東吳舊譽，於台灣繼續云云；呂老師語氣真摯懇切，好像老爺爺在對孫子、女親切話家常般，聞之令人動容。

不知是受呂光教授這番語重心長話語感召，亦或因東吳法律系向無可「混」之空間，在師長認真教學、諄諄教誨下，當時同學無不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般，努力向學。余生也愚驚，自不敢造次，只有跟隨學長、姊，腳踏實地、專心學習，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居然不錯，還得了第二名，非但有張獎狀，蒙系主任召見勗勉，尚可領學校「鉅額」的獎學金（依當時之物價計，東吳大學成績優良獎學金可謂十分豐厚），不久，又被通知去領取中山獎學金；沒想到，普通用功，竟然可享如此「豐厚」之酬答；暗想：讀書，不僅增廣知識、明辨是非，尚可變化氣質，並能享有如中獎般的實質「收益」，豈非一舉數得？真始料所未及也。

誠如呂老師所說，「興趣是可以培養的」，沒想到在大學會接觸一般人咸認為艱深奧妙的法律學，而在名師認真教學、悉心教誨下，非但不會排斥，對於原本「一無所悉」的法律學反而是愈來愈感興趣。回憶當年大學生涯，似乎除了唸書，還是唸書，沒有甚麼誘惑可以分神，頂多，週末與同學相約至西門町看場電影，已經感到十分滿足了。課業上，大夥兒始終都很拚命；老實說，我的用功程度比不上同班許多同學，但是，讀書有方法，重思考、勤學習、好發問的習慣，使我事半功倍，至今受益無窮。

無論是國、英文，抑或係法律專業科目，甚至於軍訓課，余均先行預習，知曉今日會上

些甚麼？有哪些重點？有哪些問題？上課從不遲到早退，必專心聽講，隨堂勤記筆記；遇疑惑之處，先翻閱相關資料，自行求解，如無法解惑，或對初解不甚有把握時，定盡一切可能，利用課間休息及課後的有限時段，向老師請益；記得最清楚的是：為求解惑，余曾經常常尾隨當時教授「英美法導論」的馬燮熙老師，下課後從哲生樓的教室，邊走邊請教馬老師英美法的各種「疑難雜症」，直到「望星橋」畔，送馬老師上計程車離去方歇；亦曾緊跟著當時教授英美代理、合夥及公司法的方文長老師，下課後，邊走邊請益，直至送老師坐上接送的轎車為止；教授們對於此種緊迫釘人的發問，非但沒有絲毫嫌棄，均不厭其煩的耐心作答，他們誨人不倦的精神讓我終生難忘，日後余追隨教授們亦為人師表，前輩師長的表現、風範，均成爲吾等後生學習的榜樣。

東吳法學院師資陣容向來令人稱羨，學驗均豐的飽學之士所在多有，曾教導我的恩師，如方文長教授、何孝元教授、周冶平教授、武憶舟教授、吳立榮教授、程家瑞教授、姚淇清教授、徐傑教授、鄭邦琨教授、司法院法官陳樸生教授、黃亮教授、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王建今教授、陳志川教授、余雪明教授、汪禕成教授、林永榮教授、溫哈熊教授、管歐教授等等諸位師長，他們治學嚴謹、教學認真，識見遠大、風度翩翩，且各擅勝場。誠如恩師呂光老師常言：東吳法學院有鑽石陣容般的師資，每人各學有專長，學子們倘能把握良機，潛心學習，五學年下來，不但可習得作學問的正確方法，尚可學到諸多名師的本事與特長；

來東吳這麼認真辦學的學校進德修業，倘不知道向飽學的教授們「挖寶」學習，用功唸書，不是天下間「愚蠢之人」，還會是啥？

由於受到大一上學期得獎學金的激勵，及師長們的諄諄教誨，對法律學各科愈來愈感興趣；平日最喜好逛重慶南路書店，嘗試去發覺有無法律書籍新版問世；三十多年前坊間法律專書（教科書、參考書等）頗為有限，多為大陸時期出版，而在台灣再印；當時只要是法律專書（教科書、參考書等）新版問世，常想先睹為快，因此，獎學金最佳之去處，即為書店。不知係班上同學謙讓，抑或是自己對唸法律漸漸摸索出一些心得，自大一下學期起直到大五下畢業，連續九學期余均忝列全班成績第一名，所得獎學金除了請請同學聚餐外，多用在買書、訂閱法律專業期刊之上，日子過得頗為充實。

值得一提的是，班上同學感情融洽，除分別自動組成讀書小組，定期共同研習外，還相互交換資料、資訊與讀書心得，彼此分享研討成果，不會藏私獨占；身處三十多年前法律學科升學及國家考試補習班尚不發達的時代，辛勤求取之資料、資訊與讀書心得能夠無私交換，全體受益，對於法律系學生而言，是相當難能可貴之事；不知當下年輕學子能否體會「捨」與「得」其中之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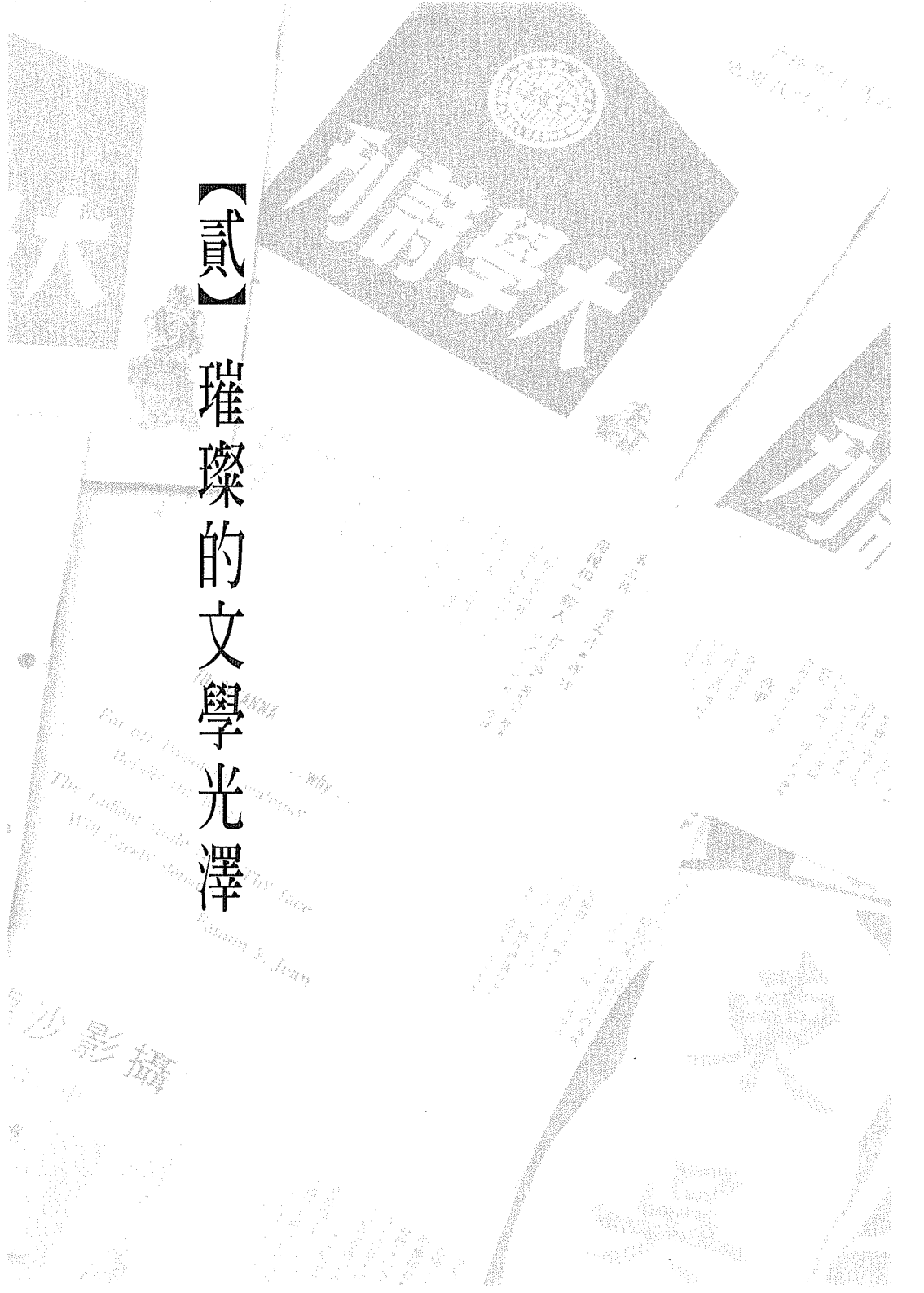
同學之中，人才濟濟，來自澎湖的黃陽壽同學最為用功，他一向選在舊的學生活動中心地下餐廳（按：該建築已然拆除，改建為現代化的綜合大樓）看書，別人喧鬧嬉戲，黃同學卻如老

僧入定般，絲毫不受影響，令人嘖嘖稱奇；黃陽壽同學既用功，領悟力又高，大二時整部《民法》（五大編，一千二百二十五個條文，分爲六門課）均已自行研習完畢，上「民法債編總論」課時，能與大師級法學者兼實務家——何孝元教授以「蘇格拉底」式一問一答，於課堂上討論民事財產法學理與實用之相關問題，甚爲精彩；無怪乎，當時年事已高、身體已甚虛弱，曾多次婉謝東吳聘任的何孝元老師，仍然願意大老遠地前來「偏遠」的外雙溪校園，教導我們這一班「關門弟子」，同學們迄今對此，仍津津樂道；亦難怪甫畢業，黃陽壽同學就榮登律師高等考試金榜（按：當年律師高等考試是出名「難過」，錄取率約爲千分之三左右，近年來已大幅提高至到考人數百分之十六，真不可同日而語），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誠哉斯言！

屈指一算，余與母校東吳大學結緣迄今已逾三十年（一九六七—一九九九），無論係求學階段，抑或是返校任教以來，均讓人感受到學校認真辦學、刻苦奮鬥的純樸精神，憑藉著學校在外的好名聲，余向來抬頭挺胸、充滿自信地告訴旁人：「我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法律教育工作者，東吳大學也是我的母校！」適值母校辦學百年，茲遵總編輯囑咐，撥冗憶往，草成小文，記述二三事，以爲東吳大學建校百年慶。不週之處，尙望方家不吝賜教爲感。

成永裕，字思賢，廣東省人，東吳大學法律系六十一級畢業。赴美進修，專攻英美契約法以及美國刑訴法，得法律學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八月應聘返母校任教

今。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三年七月兼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與法律學系主任，一九九一年夏，創辦「東吳大學法碩乙組」，禮聘名師，首創台灣優秀大學生學士後專業法律教育，成果斐然。



【貳】

璀璨的文學光澤

大學學刊

大

刊

For all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radiant smile
Will surely sleep
Fleming E. Jean

沙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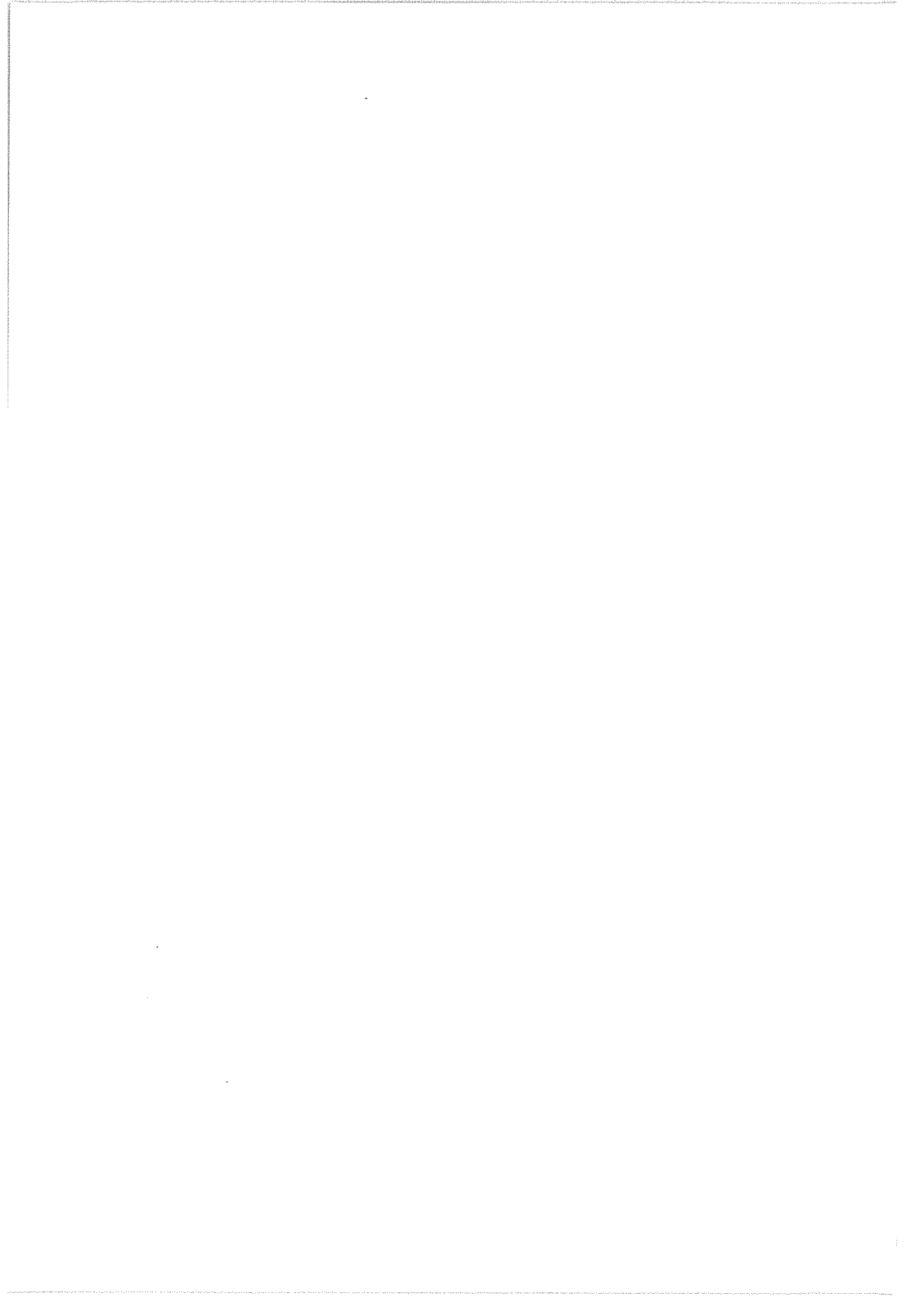
大學學刊
第100期
2010年10月

大學學刊
第100期
2010年10月

大學學刊
第100期
2010年10月

大學學刊

大學學刊



風雪般的名字——民國五〇年代的文學東吳

林炯陽

公園的早晨水樣的澄澈，我是一條散步的魚

一直到大二那一年，我才心甘情願的承認自己是東吳中文系的學生，雖然高中時候對文學很感興趣，甚至和同學將自己的作品集起來油印，裝訂成冊，作為紀念。可是，興趣是興趣，面對聯考填志願這樣慎重的事，還是要考慮到現實面的問題。因為當初中文系的出路並不好，教書一個月七、八百元的收入根本不能和那些薪資多四、五倍的私人公司相比，所以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討論下來，沒有人將中文系當作第一志願。

可是人生的事真的很難說，一九五九年九月，我成了東吳中文系的新鮮人，也許當初的東吳是法學院的緣故，所以學風非常謹嚴，上學時要穿大學服，上課時有點名制度，而且嚴格的淘汰規定，讓我那裡也不能去，只好乖乖的坐在教室裡聽課。漸漸的，師生之間的感情培養出來了，不安定的心也在良好的校風中慢慢沉浸，對於未來的出路，反而不會再有那樣

多的顧慮。

夢裡有一輪不落的太陽／滿月的輕吻下，復甦

在那樣的環境中，喜歡文學的心漸漸醒來，尤其是對現代詩的狂熱。我記得初中三年級的國文老師是紀弦，當初他還訓誡過同學不可以拿現代詩當課堂作業繳交，說現代詩不是那麼容易寫的，說年輕人不會走就想跑等等。那時我覺得很疑惑，他不是有名的詩人嗎？為什麼不贊同我們寫詩呢？於是我去圖書館找他的詩集來看，同時，爲了更深入的解讀作品裡一些現代派的寫法，所以又去翻了許多詩論的書籍作參考。也許在那樣的過程中，我對現代詩的興趣被開啓了，覺得有趣，也就會去注意，甚至開始創作。

大一下學期讀了很多的詩集，大二那年，我寄了兩首自己創作的現代詩給紀弦老師，期望老師可以給我一些批評指教。很幸運的，老師回了一張明信片給我，還挑了其中一首放在《現代詩》詩刊中，並在詩的後記裡表示，這首詩有幾句寫得非常好，與名家相比毫不遜色……我想，老師的明信片，詩的發表刊登，詩末的附記，這一切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種很大的鼓勵，讓我更有信心的去寫作現代詩，甚至找到更多對現代詩有興趣的人。

穿雲箭上炫亮的意志／靜靜流過去的萬頃琉璃

當時中文系的文風很盛，像張曉風、黃永武都已經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作品了，常常，我們這些愛好文學的人會湊在一起，坐在當時的活動中心外面聊天，談寫作。雖然有時候會爲了一些新詩創作的明朗或晦澀等主觀性的問題，激辯得面紅耳赤，可是那一種互相切磋鼓勵的力量，終究還是讓大夥兒不分系級的團結起來，創立了「大學詩社」，並且在學校的補助下發行了《大學詩刊》這樣的文學刊物。

詩刊內容分成了舊體詩、現代詩和西洋翻譯詩三個部分，舊體詩可以看見林尹、申丙、曹昇、章孝慈……現代詩出現了余光中、紀弦、寂寞紅……翻譯詩則有了章孝嚴、閻振瀛、芝行、張捷茂……我的筆名是無窮藍，除了創作現代詩，還負責詩刊的美編與封面構圖。像這樣一本在封面上注意到空間感，搭配著羅丹沉思者的設計，在風格上以舊文明種子入新時代園地爲宗旨的詩刊，曾經是東吳五十年到六十年間重要的文學風。雖然這本詩刊在傳統的中文系裡不被教授認同，甚至有些老教授調侃現代詩只是到印刷廠抓一把鉛字丟到桌上，然後隨意的排列組合而已，不過，同學們都很支持，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可以背誦出裡面的句子，這真的很讓人欣慰。

只可惜民國六十年以後的「大學詩社」已經後繼無力，不僅封面的設計趨於保守傳統，

連詩風的規模也不若往昔，於是，縱橫十年的「大學詩社」和《大學詩刊》逐漸湮沒，更可惜的是東吳圖書館裡已經找不到當年這些學生努力的痕跡了。

大學四年，除了是《大學詩刊》的編輯委員，也擔任過校刊的主編，在各式樣的文章中，印象最深的是章孝慈的〈寫給祖母的一封信〉，第一次閱讀的時候，差點就為著字裡行間濃郁的感情而掉眼淚，之後，再讀到他的〈情劫〉、〈昨夜〉、〈細說道理〉等作品，才真正感受到他那多樣化的創作才華與浪漫氣質。

不再有惑人的花卉，沉鬱的森林／只因濃濃的霧層，遮住你如春日的眼

大學歲月是我的創作力最旺盛，創作量最多的時候。當初畢業了，無意報考研究所，只想過著教書和寫詩的生活，可是，在薪水微薄的情況下，只好再去兼家教補貼，於是創作的動力慢慢的變成了遭現實俘虜，在生命的棋盤上被絆足的馬。

後來，考進了師大研究所的碩士班就讀，因為聽學長說大學時哪一科比較差，就在研究所把哪一科補回來，當時想想自己讀得最不好的就是「聲韻學」，而且又只認識聲韻學權威的林尹老師和陳新雄老師，於是就這樣一頭栽進了聲韻學的世界，每天都是看不完的聲韻書，讀不停的德紅切。碩士班畢業後透過老師的介紹回到東吳教「聲韻學」的課，只是在教學的過程中，發覺自己所學的並不够，所以又回頭再去唸博士班，從此，整個世界只有沉重

的、不動感情的聲韻學，創作與現代詩變得那樣遙遠。一直到民國七十二年，我才在路寒袖等人編的《漢廣》詩刊中發表了一首現代詩〈國際藝術節〉。這首詩的創作，距離我上次寫詩的時間已經有十幾年，之後又隔了十幾年，才在最近寫下了一組紀念「東吳百年」的詩組。

音樂般的名字哪，風雪般的名字哪／拂不掉的名字哪

民國七十二年，我擔任東吳中文系的系主任兼中研所的所長，那時候系上已舉辦了三屆「雙溪文學獎」。我發現很多有創作才華的學生，都可以從這個文學獎裡冒出頭來，像是張曼娟、彭樹君、路寒袖等等。獎金是不太多，可是經由名人的評審和講評，對學生的鼓勵是非常大的，可以增加學生的信心，讓作品越寫越好。我記得我們邀請過的評審，像新詩類有洛夫、羅門、痲弦等一些有名的詩人，而且當時擔任中國時報副刊主編的痲弦，有時候會將學生優秀的作品放到副刊上刊登，或者把得獎詩作轉介到其他詩刊上發表；甚至有一次司馬中原來當評審，除了全程參加頒獎典禮，典禮結束後還坐在行政大樓前，讓那些在閱讀與創作上有興趣的學生提問題，這種大師親炙的機會，對學生的創作是有幫助的，而且也很重要。

當時學生得獎的作品，都是附在校刊後面，我覺得沒有特意去保存這些作品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於是就向楊校長提出了每五年做一個得獎集刊的構想，如此持續下去，學生的作品

就不會散失，而且集刊所賣出的錢還可以當成下一本集刊的製作基金。只是，那樣的集刊只出過一本，第二本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下落。

關於現代文學的創作，我真的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有機會就要多寫，絕對不要放棄。當年的我花了太多時間去研究聲韻學，而且，我也沒有辦法左手寫現代詩，右手寫學術論文，在同一時間做好兩件事，所以，只好放開一手了。這一陣子因為休養身體，比較有時間去寫詩、寫書法，那樣愉快舒服的過程，我覺得才是人過的生活。記得大學時代有人問過我，如果可以選擇，願意成爲一個晚景淒涼身後蕭條，卻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還是當個很富有，卻是沒沒無名的創作者？我想，我的答案會一直是前者。

因爲我是一隻在浪花上翻騰的魚，而現代詩的世界就是我恣意穿梭的藍色海洋。

（註：分段詩句皆選自林炯陽先生詩作。採訪整理／高岱君）

林炯陽，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五十二級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教中興、淡江、輔仁、逢甲等大學，一九七八年受聘東吳大學中文系，歷任中文系主任、中文所所長。一九八八年中華民國聲韻學會成立，受邀擔任秘書長、理事長等職。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因大腸癌病逝，享年六十。

時光左岸

孫梓評

那麼，親愛的F，在深邃安靜的夜裡，倘若窗外突然飄落一場三月的雨，是否將引你想起，我們曾經一同走踏的年輕？雨聲幽幽，一彎溪水，三兩芒花。你短了又長的髮。多淚的季節。

而我們悄悄茁壯起孤獨，用不定量的悲傷餵養歲月。

你一定還記得，在許多初暗的街巷旁，我們陪L等公車回家的往事。總是，一行人笑鬧著走過，青山恆常依舊，溪水卻慌慌地奔流，青春老了，青春老了，一回頭，都是嘆息。

究竟，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呢？

應該是在社團的書展吧。見到賣書的像見到同鄉，我和L便一前一後交心繳械投靠投降。然後，你和其他的社員陸續入社，文研，慢慢如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記得麼？那時我們總愛說自己是不道德的，又說，相親相愛最堅強。

於是，我們矢志不移地辦起了社刊：《旋身集》、《風月書》、《花顏巧語》、《城裡的

雲》。像一場定時的祭儀，每半年上演一次。依著學長姊的經驗，憑著一股初生之犢的傻，從主題的擬定，邀稿、催稿、找印刷廠、編輯、送印。留言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跡，從文章的分類，主編的吶喊，到同盟戰友們的勉勵，宛如綿長不止的陣痛期，而後有著幸福的分娩。

那是渾沌的遠古時代，我義務性兼職校內另一個詩社的雜務，一整個禮拜，呆坐在電腦前，打完一整本詩集的字。G不小心被我拖下水，溫柔和善地幫我。就這樣，我和他合力完成了素簡的詩報與詩刊。同時，L也如火如荼，小心翼翼地展開初回編輯任務。好笑的是，不知哪來的壯志豪情，大家還辦了跨校的植物園詩社，不定期地開討論會議，我猶記得，一回我和L往印刷廠的路上，看見圓山飯店遠遠地起火了。蠻荒的城市顯得剝離而後現代。

那，就是屬於我們的歷史嗎？

除了社刊，社報亦然。有時，我借出筆記型電腦和印表機，到L家集體作業。一群人時鬧時玩，又想著鄰近的美味美食，往往夜半三更才鳥獸散。又或者是有的一次，我陪剛完稿的Y自社辦離開去搭公車，瘋狂的雷雨毫不留情地打向我們。雨勢夾著風勢，全身盡濕，深夜，只好去敲你的門，你像收留小貓一般地收留了Y，我又獨自撐傘走向男生宿舍。

親愛的F，一直都是同一條臨溪小路呵。

夜晚的時候，在樹與樹的背後，一盞強力的橙色亮光，點燃山城。雨後的地面，綻出一朵一朵的水窪。我們不覺中一前一後地走過了。

一屆一屆地辦著書展。去拿大雁書店的書來賣，排班、清點書、搬書、賣書、收書。設想出稀奇古怪的點子促銷，很有使命感地推薦好書名單，辛苦冗長的海報製作與傳單發放、辦演講、辦簽名會、辦特價，賣場上播放著社員偏愛的音樂，一整個禮拜，大家都踴躍翻閱了，只爲了到書展現場值班，像是擁有了一間臨時的，自己的書店，多麼豐厚的資產。

與文字爲伍相伴，竊想一點點愛情的芬芳，日子一溜煙地四散無踪。追不回來了，親愛的F，我們都慢慢靠近了成長。

但是如今，只剩下殘斷的記憶仍撫慰著一個黑夜裡的過路人嗎？

我不免擔心，或者說，根本毋須擔心。因爲我保留了自己的舊事版本，但對於你，對L，對C，對G，對Z，對每一個萍水相逢於文研的新舊房客而言，都是以自己所選擇的角度去進入同一段時空與事件吧。差異性的存在在於價值觀的擇取，然而我們真能說誰對誰錯嗎？

有誰能真正去定罪他人？就算此後分道揚鑣，各自天涯，也無法否認最初，我們都會以一顆熱騰騰的想望的心，如履薄冰，試圖靠近。只不過，接過對方遞來的問候，擱放著、光芒著、褪色著，近了，又遠了。

因此，當社團裡漸杳的人事糾葛如一個小型的社會，心思的幽微使彼此都落入一個流沙陷阱，還有什麼是可以奔赴的呢？在大階梯上看一場布袋戲？在咖啡坊裡喝一杯冰紅茶？或

者，往城市裡逃竄，像一隻疲憊的螢蟲，再也不願發光？

終究是書寫收留了我們。

最傷心的日子裡，你我只是不停地寫著。彷彿藉由這樣一種緩慢的爬行，就能找到出口。回想之中，不禁要問：哪來的這許多鑽牛角尖？像一場永無止盡的發酵，為難自己，也為難別人。不過老實說，書寫時的淋漓快意，的確是一次秘密的救贖，將私營的心事攤展，曝曬於日光之間。隔夜的雨轉眼便收了，當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社刊社報印好的那些個午後，我們和印刷廠老闆約在綜合大樓或是社辦，等他將大伙兒剛出爐的期待送來，已相熟的老闆總是憨厚地笑著，雖然封面的顏色有一些落差，雖然印刷的效果不如預期，大家還是望著一落落堆疊成山的社刊笑。終於，我們的文字變成可以被閱讀的書了，而不再只是一張張薄嫩的稿紙，那，不就是每一個書寫者最古老而原始的夢想嗎？

而親愛的F，春天，還會令你想起什麼？春假時你沒跟上隊的墾丁之旅？老是讓大家跌破眼鏡的奧斯卡金像獎？或者是，溪城的文字野宴：雙溪現代文學獎？我們常常很驕傲地說：北雙溪，南鳳凰。意味著東吳校內的文學獎在大專院校中有著優異的傳統歷史。與校外文學獎不同的是，因為怕投稿數量不夠，評委會規定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繳稿一篇。

於是，我們義不容辭地投身工作人員的行列，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參賽者。

整個文學獎的籌備過程與善後工作漫長而龐大。早在前一年的秋天便開始宣傳事宜，工作人員也進入準備階段。在校內，要擬定各組指導老師，對校外，要敲定複選與決選的十八位評審老師。反覆的連絡，客氣的解說，截稿日期的收稿動作，影印寄發交送稿件，直到複選之日翩然降臨。

春日遲遲的下午時光，寵惠堂的三樓悄悄上演一場廝殺。親愛的F，我們自臨溪路上的貞節牌坊迎來了評審老師，自他們手中接過稿件和評分單，一切就此開始。工作人員們有的招呼各組老師，有的快速地將分數填進牆上的另一張大海報，讓大家在討論時一目了然。

緊張的參賽同學坐在一旁只准聆聽，不准發問。而老師們通常會概略性地挑出入圍作品。有一回，我們都入圍了，卻因作品質地題材的相近，引來評審的非議。其實我知道，那時的你我，降落在等深的生命底層，沉澱著、飄遊著、迷惘著，等一道飛翔的光，指出方向。

書寫，即是無比真實的洩密者。當檯面上以文字技巧、結構、節奏、氛圍，分析解剖著我們的創作，只有你我我知道，每一頁字裡行間，隱遁的思緒和詭思，像安裝好的密碼地雷，終有一日，會在無意中被記憶的回溯手勢開啓。

有些事情卻是同步的。比如說，當文學獎入圍名單公布後，工作人員立即作業，將入選稿件傳寄決選評審老師。編輯小組馬上著手編輯複選集刊，好讓全校同學能閱讀入圍作品，

以便參與公開舉辦的決選頒獎典禮。

另一方面，我們的社團也蠢蠢欲動，進行「搶讀雙溪」的活動。企圖以在野的角度發聲。在社員不厭其煩的討論與辯駁之後，定出我們自己心目中的優秀作品，與評審老師的結果做一比較。我們趕製報刊，在典禮現場發放，像個游離的革命分子一樣。

想想，那真是一個繁華的年代。決選典禮如小型嘉年華會，一整日下來，大家都累了。名次已揭曉，一頂頂桂冠初戴，臨溪路上送走最後一批評審老師，許多人排排站，拍照，留念，輝煌過往。散會之後，編輯的同伴要一直忙到暑假，把決選集刊編出。而我們約好了，去看一部期待已久的晚場電影。

年少的身影姍姍走過。有些人仍寫著，有些人已在生活中擱筆。彼此甚至很少，或者，不會再聯絡。但是親愛的F，我偶爾在獨自的夜裡便會想起，T在樓梯上吐煙的側臉和她的小小煙灰瓶子。我想起，Y的巴黎風格在台北的飛塵中是如何保持優雅而不蒙灰呢？我想起，G後來總是很客氣地點頭微笑，擦身而過，文學，不再是他份內的事情。我想起，H一直堅持的理想和社會價值，最後，她掙到一個讓自己快樂的理由了嗎？我想起Z，他與我之間似友似敵的牽繫，似乎都遙遠而不真切了。

我想起你，親愛的F，還記得嗎？我們在天氣清朗的周末早晨，相偕走過溪畔小路，要換過幾班公車，進城裡去探險嬉戲。

而我終於明白，在春雨霏霏的窗前，那滔滔奔逝的，並不是外雙溪；青春老了，青春老了，時光已遠，但留下一片模糊又清晰的，左岸歲月。

孫梓評，東吳大學中文系八十七級畢業，曾獲得台北文學獎、華航旅行文學獎、長榮寰宇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雙溪現代文學獎。已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說集《星遊樂場》，長篇小說《男身》、《傷心童話》，旅行筆記書《逆光飛行》。

嚮往破繭而出的美麗

廖玉蕙

因為時日久遠，初進東吳的心情，幾乎已不復記憶。彷彿興奮中夾雜著微微的失望！矮窄的校門、狹小的腹地，學校看起來甚至比我剛踏出的高中校園還要寒碇！這對看多了言情小說、對大學生活充滿旖旎幻想的新鮮人而言，無疑是一個意外的驚詫！

然而，喜愛文學的我，進了中文系，倒也是如魚得水。系裡的老教授，並不特別鼓勵學生寫作，他們看多了蘇東坡、柳永、韓昌黎的作品，覺得現代文學像扮家家酒，任憑孩子們自個兒鬧鬧、玩玩兒無傷大雅，可沒理由大張旗鼓地拿到課堂上來瞎搞！大二時，上章斗航教授的文選課，老師大肆鼓吹「用手讀書」，規定全班同學一起合印六百字米色紅格稿紙，稿紙中間，有模有樣的印上「翰墨軒」「流金坊」「聽雨居」……等等，每星期定期繳交數張手抄工整的古文或古詩。老師說：

「有了題上別號的專用稿紙，心情便自不同，寫起字來，也應該會更加慎重！更加用心！只有心、口、手合一，古書念起來才能真正進到心裡去！」

只記得當時一些由南部負笈北上的同學，因環境清苦，爲了這一筆額外的開支，叨叨念了許久！而我已經忘了是否真的因此多念了幾篇古文，但是，那一絡厚顏印上「詠絮樓」的稿紙，倒真的在我的寫作生涯裡，起了那麼點兒作用！

大二結束的那年夏天，突然接獲校方通知，指派我和另一位外文系的女同學爲訪問成功嶺暑期集訓的學生代表，由總教官率領直奔烏日成功嶺。從成功嶺回來後，時任校長室主任秘書之職的章教授，便交代我將此行經過，寫成一篇文章。雖然平日喜歡塗塗抹抹，作文藝術少女狀，但對寫類似的八股文字，實在興趣不大。但是，師命難爲，我只好翻出那絡紅格稿紙，勉爲其難。開學後，我繳出了作品。章老師很熱心，覺得可以投稿到報紙副刊去發表。他一再的在字句釘鉅的小節上講究，有些地方，憑良心說，我頗不以爲然。然而，當時的風氣十分保守，尊師重道的觀念也頗根深蒂固，我只好忍耐著一次次的修改！最後，章老師將我原訂的題目改爲〈女生看成功嶺〉時，我的憤恨已積累到無法再隱藏！老師也許也察覺到了，苦口婆心告訴我：

「不是我愛囉唆！寫出來的東西，代表學校，一定得做到最好才行！」
年輕的我，哪裡理會這些！爲了題目的俗氣，忍不住下情緒，恨聲的回道：

「老師愛怎麼改，就怎麼改！不要再問我啦！隨便你啦！」
當文章終於在十月的中副刊出時，同學們興奮地向我恭喜，我甚至嘔氣地不肯多看一

眼！

也許是因為這篇文章的發表及在校刊上經常撰文，我在學校因而薄有文名，因之被推舉為學校校刊《東吳季刊》的主編。對編務一無了解的我，為之寢食難安了許久。幸而幾位外系男同學見義勇為、鼎力相助，答應為我兩肋插刀，我這才戰戰兢兢接下主編職位。我們費心草擬徵文廣告，四處張貼。每到黃昏，便充滿希望的去打開設在活動中心的徵文信箱，幾乎沒有例外的，每一回都空空如也！隨著截稿日期腳步的接近，我的失望越深！除了緊急動員親朋好友支援之外，我不得不親自披掛上陣！每失望一次，便漏夜用那批紅格稿紙趕稿一篇！這時，才恍然大悟，何以社內同志如此謙讓再三，原來，我真是誤上賊船了！那一期的校刊，幾乎成了我個人的作品展，只是，是分別用各色各樣的筆名發表的。套句孟子的話：予豈好「寫」哉！予不得已也！

水深火熱地編了一期校刊之後，六十年二月，我獲學校推薦，參加全國青年期刊編輯人研習會。在木柵舉行的這場盛會，參加者都是各大專院校的校刊主編，可謂冠蓋雲集！短短一星期的研習，除了一些基本編輯常識的獲得外，其實，比較大的收穫是：和一群校園菁英的相互切磋，讓我見識了外雙溪之外的天空。當時的我像鄉巴佬般，害羞、天真，動不動便臉紅，看到所謂名校學生的侃侃而談、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自信，簡直相形見绌，自卑得不得了！我躲藏在人群之中，恨自己帶去的鮮紅外套太過顯眼。

研習會結束後，營主任盧弦先生在其中挑選了幾位同學，爲他所主編的《幼獅文藝》，義務性的潤飾翻譯稿件，斷斷續續約半年之久。一日，我接獲他的來信，說要請我吃周胖子的餃子，請我到漢中街的編輯部，另有要事商量。我應邀前往，因爲去得早，沒吃到餃子，倒是對著一碗黑呼呼的芝麻糊踟躕良久。聽他說：

「經過很久的觀察，並比較了很多人，我發現你很細心、很優秀。」

我心裡又驕傲、又憂心。驕傲的是，彷彿華山論劍後，居然打敗群雄；憂心的是，一向糊塗的我，竟然贏得細心的美名，這事兒遲早要穿梆的呀！情急之下，我回說：

「我要回去問我媽！」

幾天之後，我開始了我平生第一份的兼差工作——到幼獅文藝打工，當編輯。「我要回去問我媽！」變成日後同事們取笑的笑柄！

當年，打工風氣不像現在一般興盛，最多只是去擔任家教。然而，私立學校的招牌不夠響亮，找家教也不是容易的事，東吳學生占了地利之便，比別的學校多了一項機會，就是到對面的中影文化城去當臨時演員。我的一位同學，曾經在大熱天，穿上厚重的古裝，拿道具刀，在中影的城牆外不斷地向內衝鋒陷陣。一早上的汗流浹背，換得了五十元，而我平白無故得了這麼個非常有「文化」的工作機會，在同儕間，似乎得到一些另眼相看。於是，學校的音樂周，由我主持；運動會，由我擔任司儀；書法比賽，找廖玉蕙；徵文比賽，找廖玉

蕙，演講還是廖玉蕙……：既然在雜誌社做事，自然從此和編務更脫不了干係。校刊之外，當時學校還有一份國民黨支助的刊物，名叫：《研究與實踐》，也找上我，我推辭不果；接下來，學校又辦了一份報紙型刊物，名曰：《東吳半月刊》，我又匆匆接手。在大三那年，我的操作成績，因為不斷的記功、記嘉獎，而堂堂突破一百分大關。

六十一年五月，仗著幾期編輯工作的經驗，我在即將踏出校門之際，有感而發，在《東吳半月刊》的〈望星橋〉專欄裡，寫了篇〈也算臨別贈言〉一文，老氣橫秋地為東吳校刊把脈。說：

我老覺得東吳的學生不夠熱情、不夠主動。臥虎藏龍的時代過去了，三顧茅廬的時代也已過去了。這是個一切講究自動自發、速戰速決的時代。相信東吳的人才不在少數，可是大學四年，我還沒見到一個自告奮勇出來編輯刊物的人。園地既是公開，投稿的人就不該踟躕不前，儘量把你的感受寫出來……刊物既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每個人就都有出來負責的義務，中國人常把權利和義務弄混，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個錯誤……沒有批評的雜誌，固然不會進步；缺少鼓勵的雜誌，同樣的，進步也很有限。老里老氣的口吻中，固然有著可厭的、自視高人一等的驕傲，但字裡行間所透露的焦慮，也隱然可見當時東吳文風的薄弱所帶給編輯的嚴重困擾。

那段時間，每個星期，我抽出五個半天到幼獅上班。雜誌社裡的同事，體貼我仍在學，

每每不忍給我過多的工作負荷。當年的《幼獅文藝》，網羅了最壯盛的作者群，夏志清、劉紹銘、俞大綱、柳無忌、琦君、朱西寧、司馬中原、余光中、黃永武、曾永義、唐文標、楊牧、施叔青，甚至是少壯派的張大春、李昂……等，我負責和他們聯繫及校對文章，並寫些訪問稿和雜誌的編輯小語。瘧弦先生事情多，責任心又重，往往付印在即，他卻堅持親自作最後的校對。爲了爭取時間，往往由我念原稿，他負責校對，我因此結結實實念了許多好文章，這對我其後的寫作生涯，或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亦未可知。而我嘴裡念著文學菁英們的佳作，眼中看著前輩們溫柔敦厚的風範，心中想著屬於自己的如詩如幻的未來，和他們或通電話、或寫著信件，覺得自己像一隻蛹般，嚮往著破繭而出的美麗。

雖然經歷了無數不足爲外人道的糊塗及尷尬事！終究，慢慢地，我也從一個拿起電話都會臉紅的傻女孩，變成了能獨立作業的編輯人，其後，更因緣際會地走上了文學創作的不歸路。人生的際遇真是奇妙！因爲一次偶然的成功嶺的造訪，我的人生行道，蜿蜒崎嶇，從一絡紅格稿紙，一直寫到如今十幾本書！撫今追昔，不禁要深深懷念起那逼迫我再三修改文章的章斗航教授！若是沒了他，我的人生也許就走了不同的路吧！而如今長眠於地下的老師，不知是否知曉學生對他永遠的懷念？

廖玉蕙，東吳大學中文系六十一級畢業，中文系博士。中正理工學院文史系專任副教授，東吳、文化中文系兼任副教授，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專欄作者。曾獲中山文藝創作獎及五四文藝獎章。著有《不信溫柔喚不回》、《沒大沒小》等散文十餘冊，《細說桃花扇》、《唐人傳奇探原》等學術論著五本，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消息：四年、百年或千年——

吳繼文

記一個社團、一群人、一些夢

民國六〇年代中期，東吳校園中曾經出現一個叫「海棠社」的小小文學組織，一群孩子（誰不是時間的孩子？）試圖透過文字、精確點說是「詩」來預演自己存在的姿勢，或者向嘖一口煙而煙味所能及的範圍內的「世界」證明自己顛巍巍的靈魂也能站出某種高度。辦過一些有點成功但不太轟動的朗誦會，和校內、外的社團有過一些不冷不熱的交流，並出版了三期《海棠詩刊》。

社團成立於東吳創校七十五周年也就是民國六十四年，詩刊的創刊號也在當年九月發行；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陳年舊事了，既沒有激越，也沒有傳奇，沒有人記得多半也沒有人覺得遺憾。由於手頭一直有那幾期詩刊，偶爾翻讀，看到那些遙遠的名字、稚嫩的習作，內心仍舊有些奇異的騷動。所以作此文章，但無意立傳，也無此必要；就當做是一段翰墨因緣的雜憶吧，可以不經查證、理直氣壯地沒有條理。

對詩刊裡面多數的名字而言，當時正是初識人間憂患的開始，許多的謎團待解，許多無

來由的微熱如浪潮般襲來。外頭的世界呢，台灣的經濟活力正在急速增強中，但剛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的震撼教育；席捲全球的反戰熱潮被無限上綱的戒嚴體制硬是擋在島外，但保釣運動被選擇性地放生，於是大中國民族主義和本土認同一起生根發芽，而台灣失去聯合國席位帶來的危機感則引發改革圖強的呼聲，成爲反對運動漸漸蔚成氣候的端倪。然而表面上看來整個社會是平靜的，校園更加如是；其實「平靜」是好聽的說法，貼切點應該以帶著貶意的「保守」來形容。

現在的學生恐怕難以想像，當時的「社團」被當局拿來和「學運」比擬，而「學運」可是那年頭的洪水猛獸；所以創辦社團要經過嚴格審批，活動被嚴格管制，出版刊物必須事先嚴格檢查；而所有社團都不准進行校際串聯。

對當時校內的文藝青年而言，最「主流」而且有「勢力」的筆桿子首先是校園新聞性質的《溪城雙週刊》成員，其次是校刊《東吳青年》的編輯團隊，但是在「純」文學青年或反叛性較強的理想主義者看來，那兩個陣地較政治，較嚴肅，較敏感，消毒水氣味較濃，因此也比較遙遠。「海棠社」的成員大概就是那些「純」文學青年，帶著鬆散而頹廢的名士派頭，而反叛者們則組了一個地下神祕社團「科哲社」，非常好學深思，總帶著挑釁的調調，而且比較像是玩真的（哦，不知道這次的專輯裡有沒有人會讓「科哲社」現身，當年的危險分子裡有一位叫做寧應斌，外表文質彬彬，寫的東西可帶著霸氣，所以後來成爲犀利的評論家卡維波並不令人意外）。

社團的成立其實是與我同一級（六十二年）就讀歷史系的宋熹一人之力，他寡言、多情而且總是一臉憂鬱，但與許多當時活躍（而且神聖——是的，台灣曾經有過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因此也造就了帶著神一般光環）的詩人往來；登記、申請社團的人是他，詩刊的編輯、印務甚至籌款也是他。

宋熹原名宋德喜，台東成功人，宋熹是羊令野幫他取的筆名。宋熹詩作並不多（至少發表的不多），但簡約而富感性。大三的時候因為家庭變故他中途輟學先行服役，也就離開了我們，等創社成員都畢業後，他才又回到歷史系完成學業。離開東吳他繼續在台大歷史所攻讀，卻比在東吳還曲折，但終於以無比的毅力取得博士學位，成爲一個專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學者，在中興大學歷史系任教。不知道微微發福的他是否仍記得「我的病色的馬呵，猶被秋風飼養得／瘦瘦的」這樣的詩句。我們一直都保持聯繫，至於當初他是如何找上我的已經無復記憶，但社團成員多係中文系，第一任社長陳桂珠就是我的同班同學。

陳桂珠是鹿港人，寫詩的筆名叫墨荷，有一個就讀輔大中文系的姊姊陳桂芬，兩人極爲親密，所以認識其中一個必定認識另外一個。兩人都頗具文采，對文學更有一種不尋常的執著，畢業後姊姊在中視工作，妹妹也創立了一家傳播公司，兩人都編、製了不少文學性的電視系列節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公視頻道播放將近三十集的〈現代詩情〉，等於是一次現代詩史的完整呈現，其魄力恐怕也是電視史所僅見。陳桂珠寫詩的歷程還有一個有趣的延

續，那就是從事歌詞的創作，寫過「這湖給染綠了，深深地／被霧催眠著／我亦是個小小的湖／悠閒地夢去」（斷想）詩句的她，也寫了〈相思雨〉、〈跟往事乾杯〉、〈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我和我自己的影子〉等許多膾炙人口的歌詞。

詩刊創刊號的封面是外文系高年級的陳玲玲設計的，由於前面幾頁先刊載了林煥彰等對外特約的詩作，創刊號第一個出現的校內詩人洪祖玲也就是陳玲玲，而她紀念亡友的作品〈邀請〉令我印象深刻：「伊再度邀請我到她的世界／那是在火葬場的黃昏：」這是詩的起首兩句，到現在讀來仍低迴不已。陳玲玲畢業前在學校編導演了一齣舞台劇《人煙》，更是教我對她另眼相看，而她也因此迷上戲劇。後來她就讀文化戲劇研究所專攻導演，並到哈佛大學、紐約大學進修，是八十年代活躍的「方圓劇團」創辦人，寫了《周蠟梅成親》、《八仙作場》等劇本，執導過姚一葦的《紅鼻子》、史特林堡的《夢幻劇》等經典作品，現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我個人是在知道她的名字之後十五年才認識她，結果卻成爲她那個複雜得可以寫成百萬字大河小說的家族的友人。一九九八年我們更合作了一齣叫《公園一九九九的一天》的戲，那是我第一個舞台劇本，由經驗豐富的她執導。

在創刊號發表〈柴薪〉的林邊、第二期發表〈打柴婦〉等三首的李刀，其實都是就讀中文系夜間部的謝元寶。謝元寶出身東部，文如其人，純真而樸實，而〈柴薪〉這樣的句子「我亦懂得／懂得柴薪的哀傷／一大早／在光中泣／泣中灰／沾你的血你的汗／入他的門他

的灶」又是如此強烈，而且成熟。他畢業後曾在花蓮富里的富北國中任教多年，以一己之力傳播文學與詩的種籽，調教了許多寫詩少年，印行《大草原詩刊》、並且讓全校參與的創作活動成爲獨步全台灣中校園的特色。現在他轉到宜蘭復興國中任教，利用高中聯考即將廢除的契機，再度結合本校與地方上他校的教師，全力推動文學的理想教育，希望學生們在年輕時代即接觸文學之美，冀以養成閱讀文學作品的終生習慣，據聞有一個很好的起步。

當創社同仁陸續畢業後，經過兩位接棒人的手「海棠社」才停止活動。第一個接棒人是中文系低年級的王宣一，筆名「行行」（一九七九），是從醒吾商專轉來的世家子弟，但個性耿直、平實，詩作不多，卻自有風格，文字簡潔、意象淡遠。她在醒吾時主持「笑吟詩社」，頗爲活躍，就是在當時認識了宋熹，並受宋熹慫恿到東吳考轉學考，才有接手「海棠」的機緣；《海棠詩刊》第三期也就是最後一期的編務是在她手上完成的。王宣一畢業後在報紙和雜誌任職，文字、攝影都來，當了母親以後開始寫起小說，並成爲旅行作家，小說作品有長篇《少年之城》、《懺情錄》、《旅行》和短篇集《蜘蛛之夜》。爲《海棠詩刊》第三期繪製、設計封面的人當時是她的好友，就讀台大經濟系，後來就是她的丈夫。這個人能寫、擅畫、會編，近十餘年倒成爲文化、出版界的風雲人物：起草《台灣新電影宣言》，監製過侯孝賢《悲情城市》、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電影，主持過遠流出版公司，如今是城邦出版集團董事長、《Pc home 電腦家庭》等多種雜誌發行人的詹宏志。

第二個接棒人、也就是末代社長爲中文系夜間部高年級的黃智謀，他是非常豪爽的苗栗客家人，當時一邊讀書一邊在故宮博物院器物修復單位打工。他似乎沒有創作的跡象，和詩的唯一關係是「陪詩人喝酒」。他頭腦極好，是少見的奇才，讀中國文學卻精通化學、生物，畢業後回到故鄉，在三灣山區經營農場十餘年，除了養過山羊、土鷄、尼羅河紅魚，種過木瓜、金棗、佛手外，還自己研發靈芝、珍珠和非洲菫的育種或養殖。

以上諸位，都是一直保持著聯繫的當年同行者。

創刊號上還有一個熟悉的名字應該提一提：王明輝，「那人打開門／讓許多天空斜著腰走進去」（退休中的鄰居）。他是先服完兵役才進大學的，詩、散文都寫得很出色。畢業後他主持電台節目，並從事音樂工作，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應該記得他就是解嚴前後最強悍有力的音樂團體「黑名單工作室」核心成員。

除此之外，其實也有一些不忍提起的名字。印象裡面他們一直都是我輩中最優秀的人，不管風度、文采、才華都不是我可望其項背的，也因為他們的存在，才教我不得不加緊學習的腳步，以免成爲脫落者。在當時的想像裡，他們這些一時俊彥離開學校之後也必將繼續製造風潮、引領風騷，而且以文學和理想樹立典型。然而不知道爲什麼，這幾位當時的佼佼者卻反而是最先放棄文學創作的初心——也許是對人性隱微處的好奇、對他者的關懷、對主流的質疑、對普世價值的超越、對美善更加嚴苛的要求——並忘記淑世理想、終至面目模糊的

人，對他們而言詩或者文學似乎只是年少輕狂時發過即算的麻疹熱病。這也是我始終不明白或者說難以釋懷的地方，爲什麼曾經站在同一個起點上同行者，最後會有這麼大的腳步之差？思之令人惘然。

東吳母校在千禧年走完她的第一個一百年，並仍步履穩健地走向第二個百年。我曾在同樣也有百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任職，我了解一百年的意義和份量：一種無以倫比的風範和無以言宣的精神，一個教育文化機構沒有風範的建立和精神的堅持將不足以延續百年。就東吳大學而言，她創立於人文薈萃的江南首善之區蘇州，又復校於外雙溪山水明媚之間，一個學子在綠意盎然、遠離塵囂的空間度過至少四年的時光，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人生中難得（甚至無可取代）的一段浪漫但又無比靜好的歲月。我總覺得，在這樣的地方待個四年，和以同樣時間混居市塵的人相比，在許多人身上應該會看到明顯的人格位移吧？粗糙點說，會多點理想和夢想，少些功利與現實。

雖然，對無盡的時間而言，千年算什麼？千年放眼，百年又意味著什麼？遑論百年之中的四年，或是一個短暫存在的社團。但對一顆心，四年已經足夠涵容一切可能的契機、孕育許多萌芽的消息：啓蒙、發現自我與他者、知識之門、理想、承諾、愛與責任、冒險和背叛……

有如目睹奇蹟。

吳繼文，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六十六級畢業；日本國立廣島大學哲學碩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編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文學主編、叢書部總編輯，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現為自由作家。著有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天河撩亂》，劇本《公園一九九九的一天》，譯有吉本·芭娜娜中篇小說《哀愁的預感》、短篇小說集《蜥蜴》以及河口慧海《西藏求法行記》等。

我在《東吳半月刊》的日子

李宜涯

一

青春如煙一樣，飄著飄著就散了！

二

爲了東吳百年校慶紀念，我打開塵封已久的兩本日記，從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一日，在註冊爲東吳中文系新鮮人的前兩天開始，直至六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離開學校，走入社會，成爲一名正式的新聞記者止。這兩本日記，整整的記載了我大學四年每一天的心情與事情。翻讀著，彷彿走回時光隧道，有歡笑，有淚水，親情、友情、愛情，一切人生成長的要素，都濃縮在這四年之中。而在這四年中，真正陪我一路行來，並牽引我日後走向新聞採訪、編輯與寫作的路上，是我在《東吳半月刊》的那兩年。

三

少年時期，我就嚮往記者生涯。十八歲考大學，數學不爭氣，只拿到九分，落入東吳中文系。我曾傷心的以為，這輩子大概與新聞工作絕緣了。

中文系的老教授，集一時之彥。年輕的我，並不知道珍惜。爲了怕我們轉系，老教授不斷在課堂上耳提面命：「中文系是宰相系，只要讀通了，就可以領袖群倫。」而我只想當個無冕王。如何達成願望，身處在沒有傳播科系的東吳，我是毫無頭緒。

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六。一個值得在我生命中紀念的日子。那時，我才大一，快要結束十分苦悶的新鮮人第一學期的生活。第三堂才剛下課，同學忽然叫道：「李宜涯，黃老師找你。」我走出一看，是國文老師黃登山副教授，那時，他也是校刊《東吳半月刊》的指導老師。

黃老師說：「你的文筆不錯。上回你寫一篇〈我看武陵人〉，半月刊已決定採用。」我開心的笑了起來，還來不及說謝謝，黃老師又問：「你對新聞採訪與編輯有無興趣？」正中心下懷，我連忙點頭。他說：「那好！現在半月刊正缺少一位對此有興趣，文筆也不錯的人。你既然願意，我現在就帶去認識幾位大四、大五的學長。」

走進半月刊室，也從此走進我生命中最多采多姿、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時光。

四

大一下學期，我全心全力的投入半月刊的採訪與編輯工作，並逐步了解，東吳早先的校園刊物，只有《東吳季刊》（後更名《東吳青年》），是屬於學生會出錢，由學生主辦的文藝性刊物，至於傳達校方與學生之間訊息的新聞性刊物，只有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一日才創刊的「東吳半月刊」，由校方出錢，師長指導、學生編採，一期發行五千份。

半月刊是小型四開的報紙，一版為學校重要新聞，二版為論壇，三版是文藝副刊，四版則為學生社團活動。在第三期時，法律系的劉志華同學寫了一篇有關「髮禁」的問題，由於措辭強烈，且批評校方，於是教官就把沒發完的報紙，拿到外雙溪畔，一把火燒了。校方隨後指派黃登山老師擔任社長，負責指導半月刊。

首任總編輯是法五的劉敏豪，對我照顧最多。他身材不高，但成熟穩重，不多話，話必中的。他同時還在 *China Post*（中國郵報）擔任攝影記者，是東吳當時的印第安人（紅人）。教導我新聞採訪與寫作的是採訪主任中四B的李音，至於各版編輯，如胡德生、曹華青、李宗文、陸永強等人，都對我十分親切，細心的教導我，各種新聞都讓我跑，從校慶大典、運動會，乃至各類社團活動、學生會、圖書館，我都有接觸。大一下的生活頓時忙碌而充實。

由於是半月刊，每月總有兩天我們會聚在位於延平北路小巷子中的永茂印刷廠，在轟隆

的印刷機聲中，我們滿手油墨的在昏暗燈光下拼版、校對、看大樣，然後大夥再一塊到附近的小吃店旁吃晚飯。我是唯一的女生，卻從未覺得有什麼不便，而大夥對我的訓練，日益加強。有一天，劉敏豪嚴肅的說：「你的新聞稿已寫得不錯，現在開始練習寫社論。」面對大五學長的威嚴，大一的我只有點頭稱是的份。後來，我才明瞭，他們就要畢業了，並決定培養我將來接掌《東吳半月刊》。

暑假，在劉敏豪安排下，由校方送我至救國團參加「新聞研習會」，成為幼獅社採訪自強活動的學生記者，並再至中華日報擔任實習編輯。整個暑假，我終於飲嘗了新聞工作的刺激、挑戰與甘美。

五

大二下學期，我正式接任半月刊第三任總編輯。在之前是法律系的陸永強學長，他後來考上政大新聞研究所。

擔任總編輯，首先要有自己的班底。於是，我找了法二A的帥以宏擔任採訪主任，各版編輯則有李若純、張新方、姚志毅、徐文哲。以宏是正言社的社員，他引進了一批法律系的生力軍：李念祖、劉瑞霖、周士恆、張季言，頓時，半月刊熱鬧非凡，火力旺盛，戰鬥力與批判力在當時的東吳首屈一指。而半月刊室，更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各系好友，只要有空，

大家就會聚一堂，校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接任總編輯的第一篇社論：〈論今後我們的方針與責任〉，我意氣風發，開宗明義的指出，一份具有新聞性質的校刊，她的責任與價值，絕不只是在於成爲學校的宣傳工具及單方面的校令傳播網，其真正的精神實質應爲能與學生引起共鳴的心靈溝通，使學生因爲此份刊物的存在，而肯定自己爲學校的一份子，並由此刊物的引介，進而產生「校我合一」的眞正愛護學校的情感。因此，半月刊應負起「聯絡感情，鼓動思潮」的責任。

半月刊果然在接下的幾期中，內容紮實的探討許多問題，在五月四日並出「五四專刊」，社論則引用胡適先生的話：「我輩不做腐儒生」。接下一期，則以「批評和行動」鼓勵東吳人要有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當時，校方爲避免旁聽生過多，擾亂上課秩序，規定旁聽生要收費，這引起學生反彈，半月刊自然也善盡職責，忠實報導各種聲音。同時，我還開關「半月筆談」、「冷眼集」等方塊文章，內容多與學校與學生之間較具爭議性的話題爲主。至今來看，其實都屬於較溫和的批評，但是，年輕的我們，顯然太過天真與理想，總是忘記出資的校方才是半月刊眞正的老闆，也誤認爲老闆心胸寬宏，會接納批評的意見。就在三十六期出刊後，校方決定停辦半月刊。

六

停刊的消息是在我大三的開學日傳來，半月刊室的成員大多驚愕難解，幸好，有一半的成員已轉戰學生會，紛紛當選學生會中各個重要委員會的主席，於是，大家決議從已嫌短絀的學藝預算中撥出一筆專款，自己創辦《溪城月刊》，讓東吳的文藝、評論風氣，煙火不絕的繼續下去。

《溪城月刊》繼《東吳半月刊》後，風雲再起。但我已感疲累心灰，堅辭總編輯，最後，由歷史二的劉家國接任，我則出任總主筆。第一期出刊後，校方堅持要預先審稿。第二期的社論，我就以「意見的自由市場」為題，要求校方給予我們充分的「新聞自由」，記得，我是如此寫著：

所謂新聞自由，我們認為應是「意見的自由市場」，即學生可以以它來自由表示他們的願望、意見及觀念，他們也應有知道「真相」與自由選擇新聞的權利。然而我們絕不盲目地要求「自由」，我們強調的是責任下的自由，即我們對所發表出來的觀念與文字富有道德上的責任。我們承認我們終究是太年青、沒有足夠成熟的智慧來表達出精闢鋒利的思想，然而，我們卻不承認我們的觀念不值得被重視與被評價的。我們希望，每個學生均可自由發表意見（在不違背國家與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即使

其中有些是錯誤的、有偏異的，但它可促成我們求得真理，因為真理必須隨時接受反對的挑戰。若無發表自由，則所謂真理也就缺乏考驗了。我們不明瞭，一個毫無是非觀念與不追求真理，凡事唯諾的學生對社會、對國家會有什麼貢獻？而大學教育更失去其真義。在今日，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然諤諤之士甫表其意，則立被抹煞，我們不明瞭，如此學校會培育出什麼樣的學生來。（六十三·十一·五）

《溪城月刊》在學生熱烈的反應與支持下，四期過後，改爲《溪城雙週刊》。而我，也因即將邁入大四，爲了考研究所，完全的離開了她。至於校方則另行開辦《東吳校訊》，八開，單張，由助教編寫，定位清楚，真正是一份「校訊」。

七

畢業前夕，爲了紀念在外雙溪畔曾導引出的文藝風氣與批判思潮，蘇孟志、孟麗亞、甯應斌、張新方、尹士英、羅正心、姚志毅，以及我，合資編選及出版了《隧道外的大學生》一書，作爲獻給東吳大學六十五年畢業同學的小禮物，也做爲我們四年來熱愛東吳、參與東吳的美好見證。

在封底，我們用一首小詩，表明心跡：

一個夜晚，一間小屋，一盞燈，一群人

一個心願

亮起一把火種

燃亮夜空

燃過……

八

俱往矣！我年輕執著而狂放的歲月！至今我仍深深懷念那段夜雨瀟瀟，殘燈點滴光如豆的編輯日子；曾經在東吳淋漓潑墨黏襟袖、酒酣說劍、耳熱談天、爭無作有的時光！那是我人生中最純真美好的一段。如果時光能倒流，我還是願做《東吳半月刊》的一名小兵，為我的新聞志業奉獻永遠不悔的熱情！

李宜涯，江西省蓮花縣人。東吳大學中文系六十五級畢業。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美國亞歷桑那大學東方研究所碩士，現為文大中研所博士班候選人。曾任青年日報記者、採訪組副主任、專欄組主任，現為青年日報副總編輯兼副刊組主任，並任教於中原大學。著有《書海探微》、《一天一個夢想》、《當代人文翦影》等書。

掀起簾幕的秘密

張曼娟

小時候擠在酬神戲台前，看著那些臉面上塗滿顏彩的男男女女，哭著笑著怒罵著，將觀眾的情緒鼓動起來，然後，他們一閃身進了後台，我看見他們掀起一幕簾子，隱身進去，就在那二分之一秒的瞬間，我見到與前台完全不同的景致，便是那演員的臉上也忽而有了另一種完全不一樣的表情，在現實與虛構的世界，穿梭而過的神情。那神情蠱惑了我，從那時我便希望能成爲一個演員——可不是明星，確實是演員——有一天，我能掀起那一幕簾子。

這願望在我五專畢業插班考進東吳，成爲中文系二年級新鮮人時，似乎可以實現了。我很努力的克服了害羞和自閉，報名參加國劇社。民國七十年左右，大約是國劇社的輝煌時期，每個學年都有一次盛大的公演，我一直暗中期盼著，如果不能飾青衣或花旦，就算是小丫鬢也可以，只要能將珠翠頭飾扮起來，揚個水袖，走幾個小碎步也好。但，我知道社裡開始練習，卻始終沒通知我去，是不是連上台的機會也沒有呢？和我一起報名等待通知的同學，打探消息說我們都是跑龍套的，「大概是扮演宮女之類的吧」，她說。宮女嗎？也好也

好，起碼也能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上台了。整排那天，我和同學都被指導老師從「宮女」一列中剔除，發配到「太監」和「小卒」那一邊。因為太高了，「不適合當女生」，老師是這麼說的。我的古典戲劇之夢，就在繞著舞台跑幾圈後，悄然甦醒。

大三那年遇見一位大二插班女生，她矢志要將已經名存實亡的「話劇社」振興起來，於是招兵買馬，我在人情與好奇心雙重驅使下，轉投話劇社，展開了舞台劇生涯。第一次登台演出《鴛鴦配》，因為是西方戲劇改編，口白常顯得生硬不自然，所幸我只有幾句話。劇情是我愛上一個窮畫家，決意與他私奔，卻受到嫌貧愛富的叔父阻撓，因此覺得痛苦。由於飾演的富家女，所以，被導演要求要穿上飄逸美麗的衣服，我的母親日夜趕工，為我裁製了雲彩一般的戲服。終於，這一次，我可以漂漂亮亮的上台了。

我們參加了大專戲劇比賽在校外演出，演出那天，我們在後台忙著化妝拍照，工作人員興奮的衝進來說：「評審，評審已經來囉！」大家都覺得奇怪，誰也不認識評審的，他怎麼知道？那人說他看見一個穿中山裝戴眼鏡，很像教育官員的男人走了進來，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我隱隱覺得了什麼，請他帶我去看一看，觀眾席上沒幾個人，我走過去對那人喚著：「爸爸！你來了。」我的爸爸說：「我一下班就來了，好像來早啦。」身邊的工作人員更興奮：「哇！妳老爸是評審啊！」我的爸爸，一向很像公務人員，但，他可不是評審委員。

舞台上燈光耀眼，輪到我上台了，我的叔父正為他永不滿足的金錢欲望而苦惱，我卻要

拿最不重要的兒女私情來煩他。

「叔叔。我知道，如果不嫁給彼得，我一定會死的。」我說。

「妳怎麼會死呢？」叔父斜倚在椅上，不耐煩的瞄我一眼。

「我會心碎而死。」我說。

一句如此悲傷的台詞，台下卻在此時轟然爆笑起來。他們大概覺得這樣的對白是愚昧的吧，或者他們已經不相信沒有愛情會死。後來，我有了一點小小的名氣，中午吃自助餐時會有男生指指點點的說：「那個心碎而死的女生」。

參加話劇社有一個頗為珍貴的收穫，就是遇見了當時的指導老師陳玲玲老師，她是英文系學姐，碩士研究做的是戲劇。每個星期義務到社團來，為我們介紹北管、南戲、子弟戲、布袋戲和傀儡戲，也做肢體訓練，讀西方與現代劇本。我讀著那些劇本，也讀著玲玲老師，看見她背著個沉重的大包包，裡面裝著幻燈機、幻燈片，準時的來，逾時也不忙著走。我看見一個纖巧瘦小的女人，竟有這樣旺盛的生命力。有時，黃昏之際，我站在教室外的長廊上，看見她迅疾走來，忽然被震動了，我相信她的背包裡有魔法，我一直在尋找的，掀開一幕簾的機關，不只是戲台上的，也是人生裡的。

大三暑假我們社團應陳玲玲老師之邀，幫忙她參加第三屆實驗劇場，老師組了「方圓劇場」，推出由老師自編自導的實驗劇《八仙做場》，在南海路藝術館演出。所有的演員都是很

有經驗的，我們則負責幕後的工作，終於明瞭幕後工作的辛勞與瑣碎。那麼多環結緊緊相扣，成全了一場成功的演出，掌聲與喝采卻是台上的演員的。有了親身體會，我學會尊重與感激，每一場演出幕後的工作者。

那個暑假有很多機會跟隨在陳玲玲老師身邊，我發現她的行為舉動並不是那麼典雅女性化，比方導戲的時候，她不站也不坐，而是穿著長褲兩腿分開蹲在地上，這與我的一向良好的家庭閨閣教養有很大的衝突，我驚訝的看著，直到有一天，她拉著我在她身邊蹲下。我蹲下來了，和她一模一樣，接著發現除了蹲下，還可以有更多方式令自己放鬆，我學會掌握自己的肢體，用一種「人」的姿態而非「女人」的姿態，我感覺到自由。

離演出還剩一個月，飾演何仙姑的女演員忽然得到一個電視演出的機會，決定退出。這變化令人猝不及防，一陣慌亂中，老師明燦的眼眸看住總是安靜躲在角落的我，指定由我接演何仙姑。我真的嚇壞了，反覆陳情說自己只適合當場記，將來演出可以當檢場，但我不能上台，又要演又要唱還要分飾好幾個不同的角色，搞砸了怎麼辦？玲玲老師很酷的說：「沒辦法，這些女生只有妳最像吃素的。」上一次，因為高，只能扮小卒；這一次，因為瘦，成了女主角。人生的際遇多麼奇妙。

扮演何仙姑確實激發了我的潛能，使我的生命裡有了一些新的東西，最明顯的就是「衝動」。否則，怎麼會有空前絕後的舞台劇《紅樓夢》的演出呢？

考上東吳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班上十位同學感情很好，一起吃飯旅行看電影，還想找點不一樣的東西來玩玩。擔任康樂股長的我，在同學們暗無天日的經典古籍圈點生活中，突發奇想：「我們來演一齣舞台劇吧？」從來沒發生過的事，大家隨意應著，好吧，好啊。我認真起來：「我們演紅樓夢吧！」大家的精神都來了，《紅樓夢》啊，哪個中文人不受誘惑呢？當時，憑藉的全是一股衝動，沒錢沒人，連劇本都沒有，怎麼演呢？當時的所長林炯陽老師竟然同意我們的想法，在所裡任課的曾永義老師與高采烈為我們籌謀打氣，我連著幾個夜晚趕寫劇本，〈寶玉的夢魘〉脫稿時，也沉沉的病了。

然而一切才剛開始，我們四處籌措經費，尋找導演及演員。幾番折騰，我因為配合度最高所以飾演林黛玉，那位意欲振興話劇社的學妹陳稼莉演寶玉。碩士班同學鹿憶鹿飾王夫人，陳菁瑩飾熙鳳，姚儀敏飾演寶釵，其他同學全數投入幕後工作。我們向全校廣徵演員，又邀請「停雲詩社」參與演出，負責詩詞吟唱與舞蹈的部分。直到演出那天訂便當的時候，才知道前台幕後總共有將近一百人參與。在藝術館演出三天，場場爆滿，報紙廣播都有專題報導，連電視台也出動攝影機來拍攝新聞，卻因為現場人潮洶湧，花費許多時間才取得畫面。

這是東吳的一次熱烈的文學藝術活動，我參與了台前幕後的所有流程，經歷許多不可思議的歡喜憂傷，憑藉的當然不只是一股衝動而已，我認識到自己的意志力。當觀眾散去，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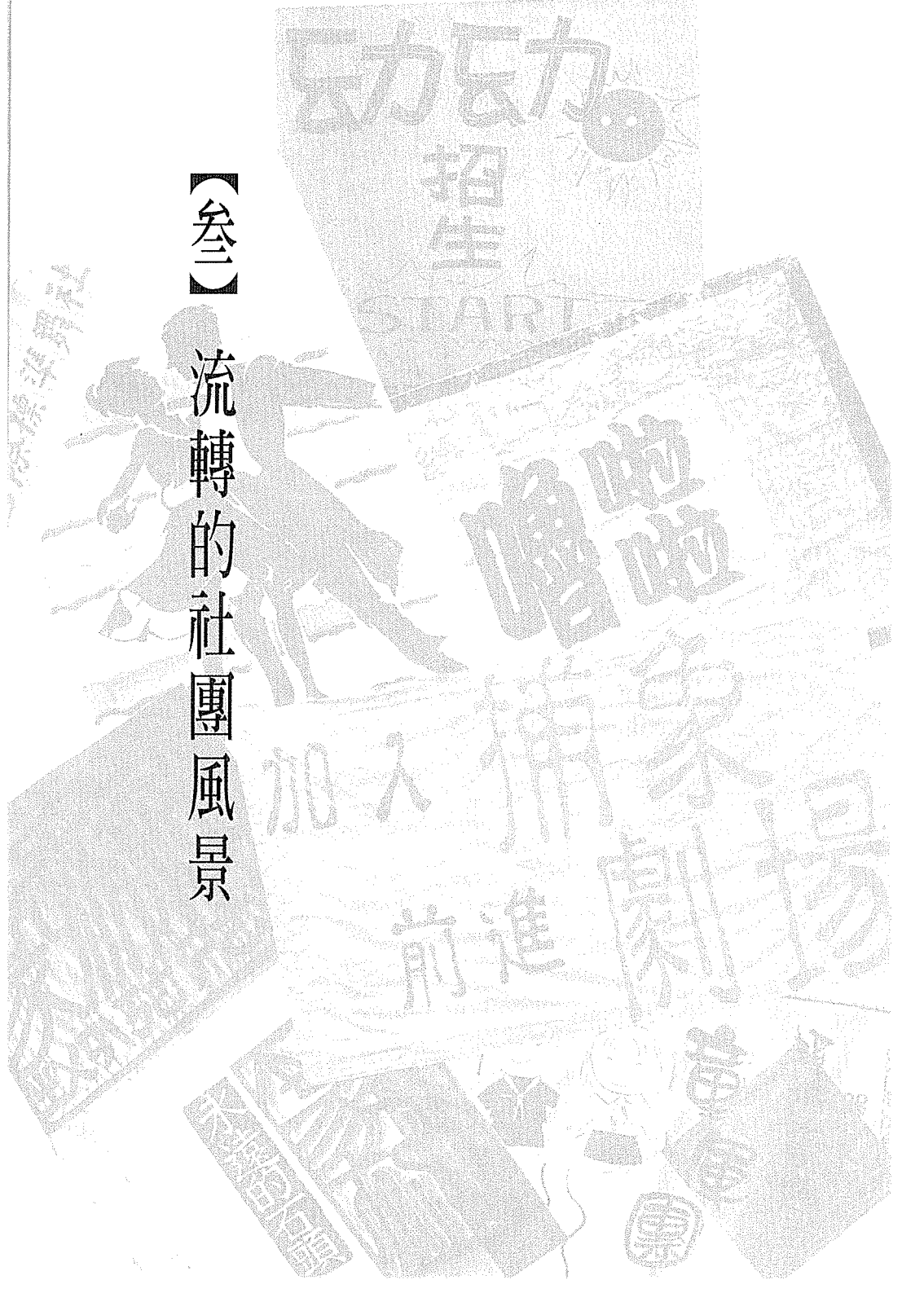
台燈光暗下來，我掀開垂掛的簾子，站在明暗的交界處，忽然明白了那個秘密。那個一直以來以為會有人告訴我的秘密，原來要靠自己去發掘——每一次掀幕下台，為的是下一次的演出，不管自己是主角配角還是幕後人員，人生如戲，戲總要永不止息的演下去。

張曼娟，東吳大學中文系七十二級畢業，東吳中文碩士、博士。曾應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現任東吳大學專任副教授。

已出版《古典小說的長河》、小說集《海水正藍》、《我的男人是爬蟲類》、《火宅之貓》等，散文集《緣起不滅》、《百年相思》、《夏天赤著腳走來》、《女人的幸福造句》等。

【叁】

流轉的社團風景



社團擺渡者

高建文

我的爸爸——高天福先生，現在還在世。我是家中的長子，上有四個姊姊。父母盼望著要生一個男孩，連香灰也吃。後來好不容易生到我，不過，並不是就此溺愛。我父親受的是日本教育，認為要給予嚴格的斯巴達式教育，才能夠成鋼、成器。所以，我從小就接受這樣的教育，如果做錯了事，往往一巴掌就打了過來，其實我父親是愛子心切，但是那時年紀小的我並不瞭解。

在日據時代，社會上各行業，只有醫生這個職業最具社會地位和高所得。我在台南一中求學時，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以醫學院為第一志願。我父親從我小時候就要求我在功課方面要拿到第一名，一直到小學畢業，我勉強強順了爸爸的意，在德、智、體、群、美育，都拿了第一名。但是在初一時，就退到第六名，根本進不了前五名。在我們那個時候，還有保送制度，保送的資格和名額都被「豪權貴族」掌握或買通。中學時代，也正好是叛逆、轉型的時期，我們抱怨老師不公，我父親是不肯相信的。許多不公平的情況，我心知肚明，但又

無可奈何。

以前我們是白色恐怖主義，威權當道。老師要記你過，隨便都有理由，要讓你退學，更是簡單。要是頂撞了他，是可以任意扣上一個罪名的。在學校受到不公平待遇，回去告訴爸爸，他卻說：「豈有此理！天地君親師，是不容污蔑的。」我父親是個老道統，認為一定我在學校調皮搗蛋，或者是不用功，才找出這些藉口。在學校得不到公平待遇，家裡得不到公平教育的情況下，我在初一下學期就離家出走，自力更生了。但是，我還是天天按時到校上課，也向父親承諾會完成學業，行爲上也會不辱家聲。

在父母親的眼中，記過就算是有辱家聲了。我提早在社會上歷練，和學校社會抗爭，學校記了我二、三十個過，我總是先記了五、六十個功嚴陣以待。唸完高中之後，本來是不想參加聯考的，覺得社會這麼混亂，公道又不存在，就想帶著「徒衆」們當兵去了。那時已保送上了陸軍官校（以前只要第一志願學校的學生肯來念，就可以保送），但是，我的母親以死相脅，所以後來才倉促成軍地去參加聯考。

考入東吳大學外文系時，英文成績只有十八分。我還沒註冊時，系主任王之先生（他是念美國西點軍校出身的，從前是孫立人手下的將軍），看過了新生入學成績之後，注意到我，要助教在註冊前來找我，他告訴我，你以這麼差的成績念外文系，一定畢不了業，乾脆重考算了，才不會浪費學費。但是我並沒有照他的話做。後來，他又告訴我，如果一定堅持要念東吳大

學的話，看新生報到之後，哪一個系有缺額，你就去念那個系好了。但是，我還是不願意，所以，就這樣念了外文系。

那時候學校淘汰率很高。我們那一屆，一起入學，一起畢業的人數，不到百分之五十。我在念書時也是非常擔心的，尤其我從大一，才開始背單字，念文法，本來第一年只是「拚氣魄」，第二年就有轉系的打算了。在那個時候，系主任又找我去了，他覺得我念得很努力，很辛苦，卻還是敬陪末座，到了大二，路會更難走，要我還是趕快轉走，否則念了一半才被二一退學很可惜。可是，也許是王主任深諳兵法，反而激起我不服輸的心理，我也就一年念過一年，順利的畢業了。當初我承諾父親要完成學業，不辱家聲，我是做到了。由中學六年到大學四年，我也都是很順利的升級、求學，並沒有留級過。

在大二時，自知英文不能成爲未來謀生的工具。一方面應付課業，一方面也開始在外學做建築，大學畢業要入伍時，已經是一家集團的副總裁了。我覺得一個人要念什麼、學什麼，是憑自己的意志力，並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學有專精、學以致用的。

之所以選擇建築，是因爲我從小就喜歡各種不同的藝術。但如果要走出藝術的路，是很艱苦的。藝術家大多是吃不飽、餓不死的。而距今十年前，哪一個國家能夠名列世界富豪排行榜前十名，大部分都和建築有關，後來才漸漸被電腦、科技取代，以前的台灣也是這樣。我在想，學什麼就要像什麼，就回去研究。

在企業界有些成就，我體會到像我這麼差的材料，還能在社會上博得立足之地，也該回饋社會。在二十多歲時，就參加青商會、獅子會、扶輪社等服務性社團，給了我很多磨鍊。再回頭看學校的社團：現在的大學生其實還有很多多餘的時間，如果拿來做有意義的事情，是一種訓練，也可以提早對國家社會有貢獻，更是一種自我教育的課程。我希望能把這些理念傳達給學弟妹，讓他們有正確的認知，不要虛度光陰，因此，爲了感念我的父親，並且鼓勵服務精神，就創立了高天福社團服務獎學金。

一個社團是一個團隊，但須有目標、理想、作法。我一直告訴社團裡的同學：今天我們成立一個社團，要知道它的宗旨，朝著這個宗旨去推進。但這其中的差距是什麼？依佛家的話說：「起心動念」，心裡動了念成立社團，是個理想；動念要達成怎麼樣的成果是個目標，坦白說這兩者都是空的，你要訂多大的目標都可以，聊勝於無。而起心動念，有了善心，沒有善行，是結不了果的。但最重要的還是善心。我們在學校、社會，要學著如何去「行」，結果是可以預期的。

社團是要每年檢討的。每年在看，總覺得成長得太慢、太有限。如果一個社團要求精進，得講究方法。在校的學生，衝擊力不夠，過去的經驗也不足，所以，至少要找一個在校且有經驗的老師來認養，再者，找社會上的賢達或相關團體來作指導，會成長得比較快，計畫的品質也會提高。學生只要肯虛心求教，大家都樂意提供幫助的。而且，一個好的計畫是

生生不息的，你們可以自謀發展和財源的，如果品質好，就可以對外申請經費，不必自掏腰包，可惜社團還沒達到提昇的角度。

人生的競爭不只在學業上。以前的同學說我學業上落於人後，現在卻有成就，十分不公平。我反而覺得：這沒有公平與否的問題，他們傾全力在功課，我著重別的方面，而且在工作時投入全部心力，他們一天工作六小時，我是十八小時，原來他們有我一倍優勢，一年我就追趕上了，十年就遠遠勝過了。人的聰明才智相差並不遠，只是看你肯不肯去做。

高天福獎學金一是鼓勵參加團隊，認清一個 team work，二是認清目標。做事情要有方法，照著方法，年年推動，就可以不斷成長，這是個很好的學習過程。同時在做人的方面，已對社會付出，來申請獎學金，是很榮譽的一件事。得到這個獎學金，不僅是愛心熱忱的證明，也有助於留學獎學金的申請，學會尊重自己和別人。

（採訪整理／劉琬茜）

高建文，東吳大學外文系五十八級畢業。曾任鴻霖企業集團副總裁、東帝士集團副總裁、亞太設計中心董事長。現任東星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河東堂獅子博物館董事長、東吳大學校友會榮譽理事、英文系友會會長、東吳大學社團人聯誼會理事長、東吳大學高天福社團服務獎學金創辦人。

我愛幼幼！

古美鳳

幼幼社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我的大學生活，都與幼幼社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度過！

大一的某一天，一群熱情活潑的學長姐走進我的教室，背著吉他，又高興、又熱切的唱著歌曲，「歡迎加入幼幼社」！於是，當下就被他們吸引，走進幼幼社社團辦公室的一隅，開始參與小朋友大朋友的喜怒哀樂。

幼幼社的歷史悠久。民國六十年，趙中人學長和他的一群同學，因為愛小朋友，想盡自己的力量，為他們做一點事，因而創立「幼幼社」。這樣的「幼幼」雖然只是小社團，但是這一小群人的努力，從來沒有間斷，那樣的精神和關懷，持續至今。幼幼社今年二十八歲了，第五十六屆幼幼人仍然在關懷孩子們的這條路上奔跑著呢！

二十八歲的幼幼，已經是小具規模的社團。從學期一開始的迎新，接著捐血活動、義賣籌募兒童基金、疾風營（幹部訓練）、兒童夏令營（原來的海鷗營），加上持續性逢周末假日的

「攜幼」，一整個學期的活動、企畫都是很完整的。社團的方向越來越清楚，社裡也開設各種課程：同理心訓練、各種輔導課程、POP課程和康輔訓練等等，讓我們更知道怎麼做，讓育幼院、啟智學校的國中生、小朋友都能得到實際的關懷和幫助。

我是真的喜歡小朋友。驚喜於他們的天真可愛，又心疼他們的生活遭遇。剛開始接觸他們，有些小朋友充滿敵意，或者滿嘴「待會要去打群架，要不要去觀戰？」的話題，甚至有些孩子從頭到尾都是悶葫蘆……他們很少像一般孩子，輕易就存著感激、存著歡喜心，加上我們的目標和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功課上協助輔導他，如何做到「亦師亦友」，真是一個大挑戰哪！

我自己覺得，在幼幼社，是一個被愛包圍的溫馨所在。因為我們常常要付出愛和關懷給那些常不是輕易就接受我們的孩子們，因此我們必須常常用友情、愛和溫暖彼此安慰。幼幼社的每一個人都像家人一樣，有需要的時候大家一起幫忙，有好笑的事情大家一起笑、有好吃的東西大家一起吃，誰有難大家一起救援……（我還記得有一次自己電腦作業作不完，還請電算系的學弟幫忙，徹夜未眠趕作業……）

就是這樣的一份情感，讓大家緊緊的連在一起，即使畢業了以後，大家都一直保持聯繫。八十六年幼幼社的姊妹社——「愛幼會」正式成立，聯絡所有曾經是幼幼社一分子的人們「回家」！像這一次的集會，還有上百人的參與……連第一屆的學長姐都回到這裡，真是

難得一見的「百人大家族」！

幼幼社的點點滴滴，每一件都記憶深刻。當年迎新擺台招生，一早到法學院門口搶位子；義賣的時候大家卯足了勁大聲叫賣，真像菜市場裡的大聲公大聲婆！還有大家在疾風營裡接受的各種課程訓練，有些東西即使是已經在工作了，在人際關係或者情緒的處理上都還是很有幫助的。

最棒的是夏令營。雖然夏令營到現在也才十二屆，但是我一直記得我們是如何精縮節省的，在使用分配義賣時所得的兒童基金辦活動，如何帶小朋友……夏令營都是分梯次的，每一批小朋友來到營上，大家擁抱在一團的景象，到現在都還忘不了……。由於夏令營的服務員需要經過甄選，並非只要是幼幼社的社員就可參加，所以我也經過服務員甄選的考驗。當時真的是好緊張哦，跟在學長姐身後進入甄選地點，戰戰兢兢，深怕出錯。看著坐在甄選委員席上的學長姐，那天就對自己許下諾言，有一天我也要神氣威風的坐在那個甄選委員的位置上！

後來我做到了。參加了幾次的夏令營，每一次都收穫豐富。當然，每一次都吃到西瓜——來探望夏令營狀況的學長姐們必備的「等路」！也是因為甄選的過程並不容易，因此我更看重每一次能參與夏令營的機會，能夠和大家在假期裡面多聚聚、多玩玩也是好的。還記得有一年夏令營地點在桃園的「大自然花園」，是戲水活動。沒想到場地游泳池的水不是很

乾淨，結果幾乎所有服務員眼睛都感染細菌，臨時到桃園的長庚醫院掛急診——這也是夏令營經驗的另一章！

幼幼社的「攜幼」也是重要的事情之一。在週末假日出遊（有時只是一起吃頓麥當勞、放放風箏）的過程裡，我們建立彼此的友誼和關心，分享心事和秘密，那樣的過程，其實就像是自己養育著一個「大小孩」一般。幾個像朋友的大小孩。

當年我的「大小孩」現在有些都在當兵了，偶爾也會寫信給我。雖然聯絡不是那麼頻繁，但是我知道以前一同出遊的記憶是不會消褪的，他們知道他們可以找我吐吐苦水，找我聊聊天聲。

在幼幼社辦的話題，常常都是「喂，我帶的那個小朋友今天跟我說……」「你們知道嗎，上周我和他們一起去……」啓智中心的小朋友最惹人憐愛，雖然他們可能是最不會說「謝謝」或「哈囉」的小朋友。但是只要他們有一點點進步，陪同他們做感覺統合運動的我們就會雀躍好久！家扶中心的小朋友最善體人意，他們常常帶給我們意外的驚喜……育幼院的小朋友則像小大人一樣，他們總有自己的意思，一旦我們成爲他們的朋友，他們是可以互相保護、互相關心的好哥兒們哦。

每一次大家一起搭上公車，往約定好的育幼院或者啓智中心去，總是溫馨，總是欣喜。因爲知道我們一起做著令大家快樂的事。令自己快樂，也令孩子們快樂。我想這也是幼幼

社一直往前的動力吧！雖然每一個社團都難免有他的包袱和問題，在處理社務的時候也難免有爭執，有意見不和的地方，但是大家總是都能顧全大局，讓事情圓滿處理，這也是身為幼人的驕傲！

自己已經開始工作，也算成爲一個社會人了。竟然發現自己的社團經驗對自己成爲社會人是很有幫助的。曾經一度抱怨的小小社辦，竟然也成爲我往外面發展的跳板。正因爲社團辦公室的擁擠，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如果幼幼人不努力，所待的位置就會越來越小，被其他形形色色的社團淹沒；如果幼幼人不相親相愛，很快就會被挫折和傷害擊敗！這樣的想法，讓我在工作的時候更懂得珍惜與人相處的機會，同時也努力爭取前景。至於和其他不同社團相鄰近的位置，也讓我交到各樣不同的朋友，爲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樂趣和幫助。在東吳讀書的這段日子，在幼幼社的這段日子，真的是值得紀念的美好時光！

幾次校慶的時候回到學校，都會與教官、課外活動組老師、以及幼幼社的學弟妹們聚在一起。日子一天天過去，一年年過去，哇！東吳要一百歲了。自己也沒想到這些年與幼幼社的情感有一天會在這樣的時刻，用這樣的方式與人分享；更沒想到當年抱怨的種種，今天會變成感謝詞的開場。回想起來，在法學院地下室幼幼社辦的時光，真是難以忘懷的好日子。學校雖然並沒有提供一個寬大舒適的空間給我們，但是我們想辦法靠自己闖出一片天；學校雖然沒有給我們大筆的金額補助，但是在其中的同學們都是最真誠可愛的好「員工」，使我們

能夠在其中學習如何合作、如何使用預算，達到最好的結果。這些意外的收穫，正是每一個在其中的東吳人、幼幼人的驚喜生日禮物。我也相信，那份不管環境如何，一直保持樂觀、努力不懈的精神，東吳人、幼幼人會一直持守下去，再一起邁入下一世紀！

（採訪整理／吳芃影）

古美鳳，東吳大學商數系八十三級畢業，在學期間曾任幼幼社副社長、八十學年度人人獎評審。畢業後曾任教於中山國中、顧問公司講師，現從事補教業相關工作。

東吳社團逸事

鄭汝璜

大學的社團活動，與學業以及感情生活三項，形成大學生社團生活的主要部分。有人稱大學的社團活動是一門不列學分的必修課程。對學生成長有極具正面的影響，值此百年校慶，特提供本校社團逸事數則，以饗師生。

舍我其誰

學生話劇社，每年例行參加由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大專院校話劇比賽。是項活動是話劇社年度經費重要來源之一，參賽獲獎優勝，可得獎金三萬元，三萬元對學生社團來說，極為重要。雖然受整個娛樂節目多元發展影響，參與話劇社人口，日趨下降，但該社仍能年年參加，且均能有良好之表現。

是年，大專話劇比賽，在南海路國立藝術館舉辦，學生邀請前校長楊其銑教授參加盛會，校長欣然赴會，開演後，時至中場休息時，因冷氣太強，校長稍感不適，擬先行離開，

惟起身後，發現偌大劇場，後排竟空空蕩蕩，無人觀賞，僅前排評審師長與觀眾十二人而已。

校長隨即不動聲色，繼續欣賞學生演出，結束時，除趨前向評審師長致謝外，並上台鼓勵參與演出同學，社團同學爭相與校長合影後，始離場返校，時已十時三十分。

事後，校長表示，學生社團代表學校一年一度校外演出，不僅是社團的大事，也就是學校的事，應該鼓勵支持，如我中場退出，台下的支持者，就又少了一個肯定他們的人。因而我決定留下來到結束再離開，至少，表達師長學校對社團的肯定與關心。

校長對學生社團的關愛，所表現的氣慨大有「舍我其誰」的精神。這正就是東吳學生社團在大專院校中享有盛譽的原因。

嘹亮校歌

本校國樂社在國內大專院校內頗具名氣，經常獲得全國性比賽首獎。樂器種類，吹彈撥打無不具備，且種類複雜。因此整體演出前，必先作各種樂器的個別訓練嫻熟後，才能整團配合演出，樂器不同，所聘請的指導老師就要很多位。因而每年新手訓練的師資費用，就是一筆沈重的負擔，爲了減輕師資費用，乃設計與他校同性質社團，利用暑假，合併辦理集訓，這樣不僅可以節省師資經費，而且可收攻錯之效，一舉數得。

合作對象為基隆某校國樂社，本校國樂社移師易地集訓，爲了著重對方地主學校，理由對方校長主持開訓儀式，行禮如儀，本應就此結束始業儀式，不料主持人提議兩校社員以唱歌作爲始業式最後程序，以示慎重，並指定由該校學生先行演唱。司儀發音後，台下歌聲七零八落，於是重新起音，仍然是此起彼落，不成腔調，司儀叫停。再輪本校同學起唱，歌聲整齊悅耳，那天，聽起來覺得特別有力。主持人要求該校學生爾後要多多練校歌。

這件事可以說明凡事豫則立的道理。此外，領導人的身教也有一定的作用。因爲無論是前校長楊其銑教授抑或章故校長孝慈教授，應邀參加社團活動，對唱歌這一項程序，從不馬虎，不僅領導學生齊唱，而且聲音鏗鏘有力，發現唱得不順，一定要求重新唱過，到正確爲止，因此，唱校歌在平時就做了最佳的準備。

這種重視事前準備工作的特質，正是社團活動培養成員從事任何活動的必修課程正與大學教育的宗旨相契合。

寵愛一身

學校社團每到暑假，大都會利用這段空檔，來辦理社團幹部或是新血的訓練，作爲下學年活動的先期準備。因此，社團對暑期訓練均特別重視，往往不惜成本，向外租借較好場地，延聘專業素養師資，期望經過暑期整訓後，在新學年能大顯身手。

某社團經過一番準備後，洽借位在士林之市政府之職訓中心，師資亦為一時之選。到了開訓當日，邀請前訓導長林錦川教授參加其開訓典禮。訓導長準時前往集訓地點，發現報到學員僅有一人，其他原先報名學員均未能如期報到，承辦社長萬分焦急無奈。

林訓導長一如往常，主持開訓，而且特別勉勵唯一學員，精神可嘉，並鼓勵主辦社團幹部，要能勇於面對困難，作應變措施，何嘗不是對社團成員的一種考驗。

三天訓練，一切照預訂計畫進行，祇不過所有社團幹部與服務員，輔導員均為「唯一學員」服務，真是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來形容，一點也不誇張，創前所未有之紀錄。結訓時，亦如終如一，圓滿結束，經過這次磨練，社團的成員之間顯得更具有自信與成熟。

這次的單兵訓練，說明絕處逢生，危機何嘗不是轉機的道理。若是因人少而停辦，不僅打擊社團成員的士氣，團隊的下年度運作，可能也因此大打折扣。迎向困難，反而能重建信心。這也正是人生過程必然的歷程，提早養成接受作戰的能力，也是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的目的之一。

末代社長

通常在學年結束前這段時間，校內社團大致改選完畢，新舊任幹部忙著交接。此時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社團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現象。因為經過前一年的活動以後，有的社團生氣蓬

勃，發展快速，社員日漸增加，新舊交替，自有一番新氣象。但也有些社團，可能因為領導者個人風格的關係，或是經營策略不當，形成社團氣氛離心離德，聚不攏人氣，活動沒有號召力，以致到了期末改選，會員大會出席情形甚差，有時祇有社長以及少數死忠幹部出席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社團勢必停止運作，社團生命就此終止，這時的社長，就成爲名實相符的「末代社長」，這個社團就此走入歷史，逐漸消失。故而「末代社長」是社團經營者極不願意遇到的夢魘。

某社團準「末代社長」，改選大會流會後，實心有不甘，坐實該社團末代社長之名，愧對社團歷史。乃向課外組師長商討，如何能中興再造，扭轉社團「末代」噩運，重創社團生機。經一番檢討與自省，決定旗鼓重整，利用暑假進行社團內部溝通，調整領導風格，改善經營方向，整合以後，配合新學年新生入學之際，重新招募社員，終於浴火重生，展現社團新生命，末代陰影也隨之消失。

社團活動的過程，順利固然可喜，但經過失敗挫折之後，能在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的歷練，則更爲可貴，更能發人省思，因爲，世上沒有永遠一帆風順的人生。

當此百年校慶之時，欣聞學校已決定將「社團活動」列入正規課程，供學生修讀。此舉不僅創我國大學教育之先例，東吳學子亦將因此獲益匪淺。

鄭汝璜，曾任東吳大學生活輔導組主任。五十二歲進入研究所，畢業後應揚其銑校長之聘，返校服務。除擔任政治系講師外，歷任夜間部訓導組主任、課外組主任、兼僑外生輔導室主任、出版組主任，於課務組主任任內屆齡退休。

歌吟古調話停雲

王偉勇

民國六十八年，東吳大學學生會舉辦詩歌吟唱比賽，中國文學系（以下簡稱「中文系」）同學以吟唱天籟詩社所歌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一詩，榮獲冠軍；旋應校友會、聯合報邀請，至校外演出，深受好評。同學得此鼓勵，於是決定成立永久性組織，並推陳慧玲同學為第一屆「社長」。

取名為「停雲」，出自陶淵明〈停雲詩〉。該詩序說：「停雲，思親友也。」其中詩句有云：「靄靄停雲，八表同昏……良朋幽邈，搔首延佇。」又云：「靄靄停雲，時雨濛濛……願言懷人，舟車靡從。」可見當時同學或有感於「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所以想廣招同好，以發揚古典詩詞的吟唱，於是藉陶淵明的「思親友」之意，而命名「停雲」。

「停雲」雖有社團之實，但成立至今，一直附屬在中文系系學會之下，並未向學校正式登記為獨立的社團。但這有其實而無其名的窘境，絲毫不影響同學的參與及表現。民國七十、七十一兩年，停雲分別在本校城中校區及外雙溪校區，以「溫柔在頌」（語見劉錕《文心

雕龍·宗經篇》爲名，舉辦第一、二屆詩歌吟唱發表會，並印行《停雲詩譜》，使吟唱的同學有譜可據。七十一年，中文系、所假國立藝術館演出舞臺劇《寶玉的夢魘》，停雲擔任歌唱與舞蹈兩部分，倍受肯定，於是正式命名爲「停雲詩社」。

七十三年，在當時系主任兼所長林炯陽先生大力支持下，與日文系合作，再假國立藝術館擴大舉辦第三屆詩歌吟唱發表會。此次演出，同學勇於突破以往形式，配合幻燈片、短劇及歌唱、舞蹈，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日本及民間詩人，也參與盛會，讓聽衆聆賞了唐詩吟唱的別樣異彩。

七十五年，企圖心甚強的「停雲詩社」決定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青年聯吟比賽，試試自己在大專院校吟唱的水準。該比賽是由財團法人陳逢源先生文教基金會主辦，高雄市古典詩學研究會、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協辦，當時已舉辦了三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南廬吟社」，表現一直很搶眼；停雲詩社還曾邀請他們蒞校指導過。但比賽結果，出乎意外，竟然由停雲詩社榮獲冠軍，真教人刮目相看。七十六、七十七兩年，第五、六屆全國大專聯吟比賽，停雲詩社連續蟬聯冠軍，終奠定在大專吟唱的地位。而這種聲望也讓其他學校倍感壓力，於是自第七屆起，該項比賽的方式，經各校學生代表會議議決，有了重大改變。也就是聯吟表演已不再只是純粹以「吟」、「唱」爲主，動、靜態的舞臺、服裝設計也列入評分；對停雲而言，這無疑是另一番考驗，畢竟停雲一直是自食其力的！

也自七十五年起，當時社長朱盈俊同學有鑒於社員畢業後，薪傳的不確定性；以及吟唱時，詩詞意境的掌握及平仄聲調的分辨，若無老師指導，恐不易持久，亦難以有功，於是商請筆者義務予以協助。筆者當時僅為系上兼任教師，基於個人喜好，及回饋母系的心願，熱情地答應了。轉眼十三個年頭已過，此期間，與詩社同學一起學習切磋，總有無限喜悅與心得；當然，每年也總免不了要我這個指導老師出錢、出力、出時間。尤其在七十五年至七十八年間，我每周幾乎要花四小時的時間，來回外雙溪與城中校區，穿梭於日、夜間部詩社之間，兼授吟唱與創作，真是甜蜜的負擔。後來，行政工作的負荷實在太重，才在同學的體諒下，做不定時的輔導，到今天，一直是這種方式。

在我指導詩社之前，前幾屆社長，如陳慧玲、郭鳳娟、鄭永祿、張月娟、何佩玲……等，已就他校及地方上翻寫的樂譜，如南宋姜夔的〈自度曲〉、明代魏皓〈魏氏樂譜〉、清莊親王允祿編纂之〈九宮大成譜〉、謝元淮〈碎金詞譜〉，以及由成大教授李勉訂譜的宋詞古唱、師大南廬吟社編印的〈南廬詩譜〉等，加以蒐集。同時，也逕自去採訪魏子雲、王更生等教授，以及基隆天籟詩社林安邦、周植夫、凌淨（真珠姑）；彰化鹿港詩社許志呈、施文炳、施人豪、黃金如、吳錫昌、施瑞樓等民間詩人，真可謂用心良苦。由於了解到利用中古音才能吟唱出詩詞的味道，而中古音尤其大量保存在方言裡。因此，我擔任指導老師以後，除了希望歷任社長廣蒐各種詩譜以外（當然也包含現今大陸及臺灣地區發行的古典詩詞新譜），更積

極要求他們去採錄民間詩人的吟唱。到目前爲止，七十八年擔任夜間部社長的林純鈺同學，仍然在做這個工作，並不時地將資料提供給筆者及停雲詩社的學弟學妹，堪稱個中「癡人」！而當今極被推崇的民間吟唱者，如許志呈、施文炳、陳祖舜、李伯臻（天印）、李春榮、施勝隆、莫月娥、施瑞樓、嚴連素月……等，他們所傳吟的調子，都保存在停雲裏，成了無盡的寶藏。而我還不時叮嚀同學：不論各校如何使出新招，不論聯吟比賽的辦法如何改變，停雲一定要維持合乎規矩的「吟唱」方式；且演出時一定要有「吟」有「唱」，絕不可隨波逐流，走偏了方向。也因此，在大專院校中，東吳停雲詩社的吟唱格調，總是倍受青睞。

總計大專院校聯吟比賽，已舉辦過十六屆，參與學校已達十六、七所；而東吳大學停雲詩社共參加十三屆，計獲冠軍四次、亞軍兩次、第三名三次、第五名及第六名各兩次。在創作方面，歷經王次澄、許清雲、歐陽炯等多位教授的指導，八十六、八十七兩年，團體成績也都擠進了前五名。可見在吟唱、創作兩方面，東吳停雲及中文系同學的表現，的確可圈可點。列子湯問篇有這麼一段記載：「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求反，終身不敢言歸。」這是「響遏行雲」一典的出處，用來形容歌聲響亮動聽，使行雲也停止不前。歷經二十年歲月的停雲詩社，或許也有了使行雲「停」止的吟唱工夫，端賴大家好好聆賞，也是我這指導老師

深切地期許。

當然，停雲也有分享成果的胸襟。所以，二十年來，我們會應淡江、海洋、世新、國北師等大學之邀請，前往表演或指導他們的社團；也曾支援各縣市鄉土文化的活動，負責古典詩詞的吟唱；甚至應邀赴中國廣播公司、臺北廣播電臺、公共電視，錄製詩詞節目，並應王友梅「漢霖說唱」的邀請，拍攝詩詞吟唱第一集「天地悠悠」，提供各電視臺播出，以推廣詩教、淨化人心。至於校內傳統週的表演活動，以及應本校各慶典的需要，停雲也都及時支援，讓全校師生有一種另類的感受。

八十四學年度，中文系夜間部遷回外雙溪，有鑒於領導統馭的一致性，日、夜間部詩社決定自八十六學年度起，合併為一，這是一個好的構想；陳翔羚同學正擔任社長，統籌一切。而中文系自八十五學年度起，透過向系友募款，以及前主任王國良教授與全體專任老師的支持，也為停雲詩社做了一套專屬的衣服，停雲的境遇是越來越好了，期待今後能積極配合學校敦親睦鄰的政策，回饋這個社區，貢獻我們棉薄的心力。

其實，停雲也這樣做了。八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在本校傳賢堂舉辦立社二十周年的吟唱，就是一個開始。只可惜，當天鄰近受邀的中、小學校，都未能參與，顯然在宣傳上，停雲應該更積極一些，才能收到「面」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表演當天，劉源俊校長竟然撥冗蒞臨現場，自始至終，聆賞我們的演出；也上臺即興吟唱，詩歌之感人，由此可證。而一

個學校的領導者能如此重視詩歌，誠屬不易；停雲詩社的同學理應好好把握這個契機，在學校行政資源充分支持下，再繳出另一張耀眼的成績單。我們且拭目以待！

王偉勇，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六十五級畢業，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東吳大學總務長、主任秘書；現任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兼台北市東吳大學校友會總幹事。著有《南宋遺民詞初探》、《南宋詞研究》，以及學術論文十餘篇。

拓荒及守靜——羅浮童軍團憶往

帥以宏

我是從有兩個大操場的師大附中畢業的學生。在民國六十一年夏天第一次參觀東吳大學校園的時候，只感覺非常地失望。從校門進來右側有一大片竹林山坡地，但不屬於學校的。沿著外雙溪的操場加上旁邊的網球場，還比不上附中的前操場大。沿著山坡一疊疊往上已經蓋滿了大樓。所有的建築都如此的平淡無奇。既無如台大或中興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築，也無輔仁新穎美觀的大樓。只有安素堂及與其相連的圖書館略有一些建築設計上的特色。但比起東海的尖頂位於一大片綠草地上的教堂，卻又顯得非常寒慘。但東吳大學法律系畢竟是我的第三志願。在選系不選校的原則下，再加上男兒志在四方，陋室鄙巷於我何有哉的豪氣，也就坦然接受了這外表毫不起眼的東吳。

入學之後，我逐漸瞭解東吳的歷史，以及學校行政單位與董事會對東吳軟硬體的發展不遺餘力的努力。而不再對東吳軟硬體設備不如人感覺遺憾，並更進而願意在東吳的發展中貢獻我的棉薄。

我是非常喜愛大自然的。那時的東吳外雙溪校本部可說是位於台北市的郊區。從台北市最熱鬧的西門町來東吳校本部，經過中山北路，車水馬龍到處一片繁華。過了圓山飯店到了銘傳商專下的士林區，就好像進了一個小有規模的市鎮。但再過了雙溪公園走上雙溪路之後，就像是進入了鄉下。不但是在鄉下，東吳前有外雙溪流經，後有五指山爲屏，還緊鄰故宮博物院、內雙溪、芝山岩、陽明山、大屯山、淡水關渡等風景區。所以，東吳可說是位於山明水秀及鎮國文物之鄉。對我來說更是如魚得水。

東吳雖小，在校園內及週邊卻有許多值得觀賞的自然景緻。譬如，在男生第二宿舍旁邊的石校長墓園，大樹成蔭。不但是夏日乘涼的好地方，也是賞鳥、聽鳥及摘採野花的好地方。有一次，我特別仔細地計算。在一個小時之內，看到了六、七種野鳥，並在四周採到十幾種野花。雖然不像人工花園裡所栽種的艷麗花卉，但也小巧玲瓏值得賞玩。操場旁邊的外雙溪則常有鷺鷥及魚鳥的出現。

若走後門，穿過橋下往故宮的方向去，會經過一片樹林。有幾間平房錯落期間。都是租給東吳同學住的。順著小徑繼續前進，則是一片花田。種植玫瑰花及應時的花，如水仙花。花田的盡頭，就到了故宮前面的公車總站。心情鬱悶的時候，這也是一個散心的好去處。順便也能摘幾支花，帶回去向要好的女生獻殷勤。

另外，有一鮮有人知的山中小徑。這山中小徑沿著山腰而築，大概是始於故宮與內雙溪

之間，而止於芝山岩附近。我則都是從故宮後面的石階路走上去，走到學校大門對面再抄小路下山。沿途是林蔭處處，鳥語花香。不知這山中小徑如今安在哉？

大三的時候曾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東吳校刊上。該文敘述東吳外雙溪校區的自然美及附近值得賞玩的地方。我自題為〈石級！石級！石級！〉意指東吳人每天在校園裡走動，只看到上上下下的石階，卻忽略了其周遭微小但美麗的景緻。可是當時校刊的主編李宜涯建議將題目改為〈嗨！溪城〉。她的用意是強調文章裡所講述東吳的自然美。校刊發行後有一天，宜涯告訴我，校刊組收到了一些讀者投書。其中有一封投書對這期刊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有負面的批評，唯有對〈嗨！溪城〉一文有甚好的評語。

民國六十年代初東吳的學生都非常保守。每個人上學時，都是將書及筆記夾在一隻手臂之下，一副大學生的模樣。不管是男生或女生，穿著都是整整齊齊。盛夏時穿牛仔褲加T恤的男生，已算是相當前衛了。只是南部來的通常比較樸素；北部的比較花俏。差異不過如此。我則講究實用及舒適。所以，上學時仍背著高中的書包；夏天的時候，經常是短褲、T恤、涼鞋。走在校園裡，與眾不同，非常顯眼，被認為是東吳嬉皮。

大概是在我二年級那一年，學校的總教官終於忍不住，把我叫到教官室去教訓。他說我是奇裝異服，招搖過市。以後不准再穿這樣的服裝。我在教官室裡面與他辯論。我說穿衣服講求的是舒適。短褲、T恤、涼鞋是人人都有的穿著物。為什麼我把這三樣一起穿，就變成

了奇裝異服。有另外兩個教官坐在教官室裡，看著我與總教官一來一往，只是張著嘴笑，也不幫腔。最後，總教官無可奈何，揮揮手叫我走路。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找我這種事情的碴子。

記得在大二時，我擔任《東吳半月刊》的記者兼編輯。《東吳半月刊》是由學校行政單位出經費辦的報紙型刊物。只是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由學生來擔任。那時候，有許多學生反映東吳學費比公立學校貴許多，但設備和師資卻遠不如公立學校。以至有人主張要審核學校的經費，看是否有挪用公款的情事。《東吳半月刊》也登過一篇這種想法的學生投書，我認為學校行政單位應該就此爭議有所答覆。遂到校長室要求見端木校長，就學校經費的運用有個專訪。首先，端木校長透過秘書表示，這是校方的事，學生無權過問。而且，學校是以極少的經費來做別人所辦不到的事。我則請秘書轉告說，就算學生無權過問學校的行政；但現在確實有許多學生對這件事情有疑慮。若校方不出面說明，這些學生不但將永遠不知道校方辦學的艱辛，反而還認為校方擁款自肥。大概這說詞生效，端木校長終於同意接受我的訪問。

在寬敞但樸實的校長室內，端木校長花了半個多小時，告訴我東吳在台復校及建校的歷史。有關大陸東吳來台校友們在台復校的經過，不需我在這裡多述。至於建校的部分我覺得值得我在此一提。他說東吳的雙溪校區先是得到士林鎮公所贈送一塊土地，用來建第一棟大

樓。他還提到操場的地是如何得到的，我現在記不清楚。好像是向台北市政府租來的或是借來的。然後，再向旁邊的地主購買土地來擴充校地。雖然這些地在都市計畫裡劃歸學校用地，可以說除了賣給東吳之外別無買主。但地主們還是漫天要價。所以，學校只有一小塊一小塊地購買。其間的艱辛，難以言喻。

端木校長還囑總務處給我一份雙溪校區的地籍圖。地籍圖上所展示的，果然是十幾、也許二十幾塊大大小小的地拼湊起來的校園。端木校長又提到，買了地之後，還要蓋校舍。但錢那裡來？就是拿土地及舊大樓向銀行抵押貸款。雖然價值不足，但一則靠關係，而且是爲建校舍之用，還是能貸到所需的建築款項。有了貸款就要連本帶息的還。還得差不多時又要建新校舍，便再拿舊大樓向銀行抵押貸款。政府補貼私立學校的經費又非常少；在政府遷台之前支助東吳的南美以美教會，又將經費全部集中給了東海大學；所以，學校的經費就捉襟見肘了。訪問端木校長之後，我寫了一篇訪問稿登在《東吳半月刊》上。從此以後，未再聽到有人懷疑學校行政單位挪用公款。而我對端木校長、在台復校的學長們及當時學校的主事者更增了一份欽佩。

在我大二下學期的時候，與三年級的董保城學長競選法律系學會的會長。董學長不但長我一年，而且口才便給。所以，我的競選註定失敗。既然無法在系學會發揮，班上支持我的幾員大將因此轉而競選學生會的各委員會主席。李念祖當選文藝委員會主席。武茂楨當選服

務委員會主席。好友政治系的王愛榮則當選婦女聯誼委員會主席。

還在考慮何去何從的時候，武茂楨來找我參加東吳羅浮童軍團成立大會。他說羅浮童軍團是他與我們班上一些同學發起成立的。但缺乏具有童軍及戶外活動經驗的人。所以，希望我能參加並競選群長。來到會場，發現有興趣的人還真不少。至少有四十個人來參加開會。會議中最主要的議題是選群長。只有我與另一人被提名。而我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東吳羅浮群第一屆群長。

由於童子軍團是服務性社團，我們請到端木校長來擔任我們的團長。加上武茂楨是服務委員會主席，居然向校方申請到活動中心裡的一個房間作為辦公室。在那時候，是唯一有辦公室的純學生社團。在那同一時期，資深女童軍團也新成立。陳若玲被選為第一屆團長。因這兩個社團性質一樣，所以兩個童軍團合用一個辦公室。我那時也是《東吳半月刊》的記者兼編輯。所以有兩個辦公室。在中午及無課時有兩個辦公室可以辦事、歇腳及與朋友談天說地。可算是那時候的一個特權學生。

我被選出任群長之後，要知道羅浮童軍除了童子軍時代的活動外，還做些什麼事情。所以打電話到全國童軍運動的領導單位——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去詢問。我所得到的回答是：去問自己的團長。而我們的團長是從未參加過童子軍的端木校長。令我大失所望。只好到各大書店及圖書館去尋找答案。但也只找到兩三本講童軍活動的書，略為說明羅浮童軍的

組織型態及活動方向。那年的暑假，參加在墾丁公園舉行的全國童子軍大露營。在活動期間，也向一些老前輩請教，才大致明瞭羅浮童軍的活動方向。雖然知道了羅浮童軍的活動方向。但三十幾個羅浮童軍裡，只有三個人在初中時參加過童子軍。所以，東吳羅浮群的初期，很多的精力都花在童軍基本技能的訓練上。

那一年辦了兩次男女童軍聯合露營。第一次到坪林，遇到颱風，溪水暴漲，將位於溪邊的營地夷為平地。幸好我在溪水暴漲之前，決定撤營而未遭受損失。第二次到內雙溪，遇強風大雨。架好的營帳多被吹垮。此後，童軍們給我一個「雨神」的綽號。其間，我也帶領伙伴們做一些比較冒險的活動，例如拓荒旅行及守靜。

在東吳羅浮童軍及資深女童軍成立大會的典禮上，我們請到了端木校長來致詞。他說他這一生的一件憾事就是沒有作過童子軍。但他對童子軍的宗旨非常贊同。簡而言之，就是要增加自己的被利用價值。一個人在一個社會裡的被利用價值越高，越被人尊重。他這個說法是對童子軍的銘言：「準備；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最佳的闡釋。在東吳五年，聽了許多端木校長的訓詞。但只有這一次的訓話，我到今日都還記得，並且成為我的座右銘。

帥以宏，東吳大學法律系比較法學組六十六級畢業，美國加州州立大學三藩市分

校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法律博士 (J.D.)。曾任美國加州洛杉磯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美國加州洛杉磯華商協會理事長。現任台灣商務仲裁會仲裁人、美國加州執業律師。

雙溪七載熔爐鑄 淬鍊頑鐵一世情——

李河泉

記一段有感覺的歲月

一直到現在，身旁總少不了母校相關的小紀念品，辦公桌上放的是印有「東吳大學」字樣的變色水杯，身上別的是紅黑相間的校徽領帶夾，手中拿的是「東吳大學第四屆社團博覽會」的原子筆，就連所刷的信用卡都是母校的認同卡，隨時可將刷卡金額的千分之二點五回饋母校。

「爲什麼對學校那麼有感情？」有人問我。

其實，如果你在了一所學校待了七年，由青衿學子蛻變爲處世漸趨練達的社會人，你也會和我一樣感恩吧？

就這樣，在東吳，五年的法律系生活，二年的課外活動組生活。由貴陽街至外雙溪，我度過了七載璀璨不留白的歲月。

一段有感覺的歲月。

沒有古樸的鐘聲，沒有深邃的長廊。法學院大樓，在衆人的口中是個平實無華，像個補

習班似的建築。然而它卻承襲昔日大陸的風華，一代一代的孕育出司法界的人才，細細擦拭著「東吳法律」這塊金字招牌，不容蛀蝕。

民國七十五年，頂著一頭「成功嶺」短髮，身材適中（少有的情形）的我，進入了法律系司法實務組就讀。

當時，正是法律系崛起為各校原始總分霸主的年代，本班的好漢來自三山五嶽，以國立大學分數選擇本系的大有人在。在貴陽街上，你隨時可見拿著一本厚厚的六法全書，故作有氣質狀，假扮端莊的本班同學，想闖紅燈時，會因為自己法律人的身分而踟躕不前。

隨著矜持的消除，情感的增加，除了大台北地區遍佈本班的足跡及車輪痕跡外，凡寒暑假，同學們必定至外縣市狂歡。大一寒假的阿里山，大一暑假的墾丁，大二寒假的溪頭，大二暑假的中橫、大三寒假的北橫，大四的環島畢業旅行，在在牽絆了同學「控固力」般的情誼。

到了大五，因為幾乎都投入準備考試的行列，同學們的身影也鮮少在校園中出現。當時身兼班代和畢聯會理事的我，可真是傷透了腦筋。

首先出現的難題是全班六十餘人，僅有四位於註冊時繳交畢業年刊費用八百五十元（法律系比別系多唸一年，其他系認識的早就畢業了，花同樣的錢卻只看到一群不認識的人，自然興趣缺缺）。這下畢聯會可慌了，急忙求救於我。在逐一電話聯絡拜訪大夥賣個面子的情況下（大多數的人都

是衝著這通電話），繳錢的同學增加到近六十人。

接踵而來的難題是如同畢業公演般的模擬法庭，過程除了要聯繫指導老師編撰劇本外，還要檢視法律流程，以及最困難的找演員並抽時間排練，多虧了弘仁、淑萍、俊彥、德馨、乃彥、尙昆、英豪、志聖、宏文、士瑩、棋馨、怡箴、怡萍等好哥兒們的兩肋插刀，迄今仍銘感在心（好人有好報，以上的同學現在都有不錯成就）。

時至今日，誰也沒料想到，當年弱不禁風、內向害羞的秋萍，搖身一變擔任起某上市公司辯護律師，在電視上侃侃而談；最愛說笑話，口無遮攔的宏文竟能律師、法官官雙雙告捷，年紀最小的他還超越大家，成了二個孩子的爸（都是合法的）；早期好發議論，言必稱齊克果的尙昆，也自立門戶，成爲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每次在課堂上大談 NBA，下了課馳騁在球場的怡箴，不但出國拿了個碩士學位，還成了外商銀行的法務部門主管……凡此種種，誰說法律人一定得每天死讀書才能有成就。

法律系學會，則是我的另一個舞台。

從大一起，就希望能進入系學會作些事情，甚至跑腿也好。可惜當時學會都是由高年級的學長姐在「把持」。噢！應該說是「熱誠關切」才對。

其實，當年的法律系學會迥異於其他系學會的是，主力幹部多是大四、大五的學長姐，而非一般的大二生。主要的原因在於它是日夜間部學生共同的系學會，爲了照料夜間部「化

石」級的大六學長姐，僅憑大二、大三的小毛頭是「凍抹條」的。

一直到了大二，才進入學會擔任康樂組長，負責全系的「法律之夜」「新生迎新」「卡拉OK晚會」等大型活動。想到以小小年紀要「侍奉」許多年長的「爹娘姑嫂」，簡直有如汪洋中的一條船，鎮日尋找我生命中的燈塔。

第一個燈塔自然是當時任法學院院長的章孝慈院長。

對章院長最深的印象是氣質十分高雅。溫文的外貌，親切的談吐，一雙相當細緻而溫暖的手（和章院長握了非常多次的手，很喜歡那種感覺），是經師，亦為人師。當時他召見了學會新任的幹部鼓勵大家，尤其對我這個小毛頭慰勉有加，還親筆題送「積極進取」的墨寶給我，真是又驚又喜。如今回想，自當年迄今人生觀的不斷調整和超越自我，該是源起於當年章院長的鼓舞吧！直至章院長高升為副校長乃至校長，因為個人所參與的校內社團或活動，始終仍有機會面見這位尊長。畢業後進入課外組工作，凡學生社團舉行的大型活動，均能望見這位謙謙長者的身影。你也許無法想像，能夠在大型場合，眾人注視之下，偷偷與章校長講上一句笑話，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親切感，超越了師生之情，淡化了尊卑之分，像朋友，更像親人。

第二個燈塔是前任的康樂組長，大三學姐范琪斐（現任TVBS駐紐約特派記者）。琪斐學姐是個言語流利，表達力極強的人。由她的傳授，對整體的工作瞭解了不少概念，最大的收穫

卻是——要善於「利用」，不！是「敦請」學長出面代勞。

我沒有美色，但是我有一顆謙虛而卑微的心，爲了進一步補強如何把活動辦好，我決定尋訪第三個燈塔。一群深居簡出，廢寢忘食，名爲唸書，實爲發揚「國粹」的法老們（法律系的老人們）。

打聽到了學長們在永和的落腳處，決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登門拜訪。

按了門鈴，心中惴惴不安，進了門後嚇了一大跳，屋內的學長姐比想像中多得多，原來有個學長今天生日。

沾了光叨擾了頓便飯，正不知如何表達來意，壽星卻開了口。

「學弟，會不會打麻將，我們開三桌還欠一ㄅㄚˊ」。

也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能留下來，機會自然是有的。

「學長，辦迎新要注意什麼事項？」上桌後我打了第一張牌，立刻問道。

「這還不簡單，要先選擇場地。」坐在下家的學長回答，順便吃了我打出的牌。

「對！場地至少在半年前先定，其次再來考慮活動內容設計。」另一個學長接話，手中的牌也隨之打出。

「碰一個。」第三個學長連忙喊出，繼而補充「迎新要有一個中心主題，活動才有特色。」……

就這樣，三位學長你一言我一語，偶爾間雜了隔壁桌學長姐穿插提供的意見，八圈牌下來，各項應辦活動的內容我已了然於胸，彷彿十一位高手同時灌注絕頂內力在我體內，輔以何首烏，千年靈芝，增加了三甲子功力還不止。

沒想到，我對舉辦各項大型活動精緻化的概念竟啓蒙於牌桌上。

除了浸淫最深的法律系學會外，在大二、大三這兩年，同時參與許多校內外活動，舉凡校內營隊方面的康研營，編研營、社研營（其後才有議研營）；社團方面還周遊了基服，吉他社、童軍團、時事研究社。

營隊方面所學幫助最大的，在於效率的極度重視。亦即必須在有限時間內，以有限的資源創造無限的效能。任何的意見，任何的糾紛也得在第一時間內解決，不僅是 *do things right*，更要 *do right things*。

參與各類不同的社團的益處在於多認識了不少朋友。尤其在東吳不甚廣闊的環境中最有利的一點是，你可以（甚至被迫）每天看到同一個人好幾次，久而久之想要不熟悉也難。參加不同社團的人在基本個性上也略有差異，三、四年的鍛鍊下來，比看一百遍《EQ》還有效得多（何況當時還沒這本書）。

畢業之後，除了待在課外活動組奉獻東吳社團二年之外，任何可返校回饋之機會盡量不放過，原因無他，只因我在東吳獲得太多，無以回報。

如同當年一位學長告訴我的「你不用擔心從我這獲益太多，無法回報，你只要以同樣的心繼續回饋學弟妹就好。」

我認真的執行學長所說的話。

回首種種，只覺得有幸進入東吳，獲得太多磨鍊的機會。即使太上老君鍊丹的熔爐，七四十九天都可造就孫行者的火眼金睛。何況是七載的淬鍊，平凡的頑鐵終究也有鑄成精鋼的一天。

往後，我仍然會拿起東吳的杯子，使用東吳的原子筆，穿戴東吳的領帶及領帶來，永遠的看著紅黑相間的校徽以及「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訓勉。

或許我永遠無法作古今完人，我只希望作一個永遠感恩的東吳人。
謹以本文感謝所有曾栽培我的師長及學長姐們。

李河泉，東吳大學法律系司法實務組八十級畢業，曾當選七十九年大專優秀青年。曾任法律系學會會長、七十七級畢聯會幹部、第九屆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服務員、第五屆康樂輔導人員研習會服務員、第七屆編輯人員研習會服務員、救國團歲寒三友服務員、學代大會輔導老師、畢聯會輔導老師、正言社輔導老師、議研社輔導老師、板友會輔導老師、南友會社團輔導老師。現任寶島銀行信託部襄理。

一箱箱檔案

簡顯鏜

筆者一直都有製作個人檔案的習慣，不例外地，在學校參與社團的各種活動紀錄也歸檔到一箱箱的檔案內。在從這許多社團與活動中，筆者覺得最有意義與價值的活動，便是參與畢聯會的畢業年刊製作。

每一屆畢聯會最主要、慎重的一件事就是製作畢業年刊了。畢業年刊就是畢業紀念冊，而至於爲什麼叫畢業年刊就不可考了。製作畢業年刊不僅是畢聯會最重要的活動，亦佔了畢聯會整年度預算的百分之七十。以當年筆者服務的七十九級畢聯會來說，整年度預算近兩百一十五萬，光光製作畢業年刊就花費了約一百五十萬呢！

除了支出費用之龐大，超越筆者以往所舉辦過的各社團活動外，畢業年刊對於一位畢業生重要程度之高，亦是讓筆者對於製作畢業年刊印象深刻的主因。對於畢聯會來說，製作畢業年刊可能只是件每年例行的工作，但對於即將畢業的同學而言，這本書刊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大學時光的回憶錄，稍有製作上的瑕疵，即完全無彌補錯誤之機會，其重要性自然不言可

喻。

因此在製作畢業年刊時，不論是在企劃階段、決定印刷廠階段、或是編輯階段，畢聯會幹部無不戰戰兢兢，莫不盡全力完成這一年一次的大事。

七十九級所製作的畢業年刊，則是將東吳畢業年刊帶入另一階段的重要里程碑。以大環境來說，七十九級的畢業生有幸經歷了七十五年到七十九年間，國家、社會、與學校的各種重大變革：街頭抗議興起（所以您會在七十九級的畢業年刊中，看到鎮暴部隊駐守城區校園的畫面）、六四天安門事件、野百合學運、雙溪校區學生活動中心拆除重建、廢除點名制度、大幅修改學生會組織章程、東吳學生會由間接選舉改為全校普選等等，凡此種種，均成為年刊的最佳素材，並使年刊成為了這段歷史的重要見證，也為七十九級畢業生留下不可抹滅的深刻回憶。

而在年刊的編輯製作上也做了大幅度的改變：由傳統單本的大開數規格，改成盒裝四本（依彩色共同頁、雙溪校區畢業班、城中校區畢業班、通訊錄）菊八開的做法。在當時，這項突破性的做法除了在理事會中引起一番討論外，請廠商估價時也因無前例可循而花費了許多功夫進行訪價與估價。當年刊送到畢業生手中時，從大家激動愉悅的表情，與讚賞不已的言詞中，可以透露出大家對這次年刊的滿意度是相當地高。

藉由這段在畢聯會參予畢業年刊的改版過程中，讓筆者了解到「尊重創意」的重要：當創意被提出時，不要以違反慣例而否決掉，試著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創意是否有價值，

進而依主客觀條件分析其可行性，若為可行，主管要與以充分的支持，並提供必要之有形與無形的資源，讓創意得以實現。這些經驗隨著自己進入出版界工作後，在與美術設計人員的合作上，都能給予專業上的尊重，以求整體產品的完美，這些經驗都是從學校課業中所無法學習而得。

談到社團活動的改革與創意，筆者在就學時，做了一項影響至今的大變革——調整社團負責人研習會的組織架構與研習方式。

筆者於七十八年夏主事了第十屆社團負責人研習會。當時由於前一屆在財務結算上出了些狀況，又加上學生會組織章程有了相當大的變動，因此接下此工作時，除了不能辜負歷屆學長姐所打下的營隊基礎外，對學生社團灌輸學生民主自治的觀念亦是社研活動的重點。在此前提下，第一個遇到的難題便是服務員的甄選。由於會來參加服務員甄選的多是活動性較活躍的社團幹部，因此服務員的普及性便無法擴大，就此筆者想到了遴選的主意，就是由營本部根據社團生態，討論推舉出一些資深社團領導幹部，稱之為「輔導員」，然後總幹事再聘請這些夥伴擔任服務員。這些輔導員將擔任各組的導師一職，隨時在小組活動、小組討論、或是聯誼時間中，給予其經驗的分享與傳承。這個想法立意雖好，但如此一來服務員組織就過於龐大，因此第二個改革動作就是將原來各組的執幹一職取消，以容納更多優秀夥伴的加入。

接下來在籌備活動時又遇到了另一個問題，由於所甄、遴選的服務員多有參加暑期服務活動，時間長達三、四周，因此以往每周全體集訓的做法便有窒礙難行的情況。在會本部討論之後，毅然決然做出七月份停止集訓的決議，這個決議在當時營隊界是無法理解的一件事，也讓課外組林老師緊張到打電話到我打工的 IBM 詢問社研是不是要停辦了。不過這個決議是有但書的，會本部每周要開會一次，各組則要持續執行會本部所指定的籌備工作。

在所有服務員下鄉服務之際，筆者也至 IBM 擔任 summer student，並趁機學習到 IBM 「尊重個人」的信條，這個信條也成為社研的管理圭臬，亦是活動的另一項改革——學員自治。這項學員自治就是由學員擔任值星官，帶領學員進行各項研習活動，以及秩序的管理與流程的控制。

在活動內容上也做了相當大的調整，會本部在活動內容的設計上，考量了每位服務員的原屬社團，讓服務員展現其最擅長的一面，因此您會在晚會上看到北大康的活動，也會在早晨會看到社服團、基服團土風舞與帶動唱，課程設計則有歲寒三友會的影子，讓社研會成爲真正由東吳社團人所舉辦的社研會，而不是學生會的制式活動。

經由這些裡裡外外的調整，社研其實已經與以往的社研相差相當地大，可說是大幅度翻修，而活動結束後，無論是學員、學長、或是師長，都相當滿意這樣的做法，也讓日後的學弟妹繼續沿用類似的做法。不過這裡要特別提出來的是，當初這樣的運作除了徐正揚、王俊

雯、李思恩、李鏗激、李威霆等優秀的會本部幹部外，服務員有一致的理念、實力相當的活動企劃力、良好的默契都是活動成功的關鍵，若無法有這些主客觀要素存在的話，如法炮製並無法達到預期的活動成效，而是要根據舉辦活動的實際情況，調整甚至修改整個活動的舉辦方式，才是活動成功的關鍵。

簡顯鐘，東吳大學電算系七十九級畢業。曾擔任東吳電算系學會總幹事、學生會康樂委員會主席、畢聯會副理事長、第六屆康研營總幹事、第十屆社研營總幹事。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媒體碩士。曾任旗標出版公司產品一部主任、華彩軟體教育訓練中心產品經理。現任學貫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經理、東吳大學社團人聯誼會監事。

【肆】

宜晴宜雨來時路

我在東吳的回憶

李玉華

當初進入東吳大學，是考入中文系。由中文系轉入英文系，是我一生中滿具影響的決定。國文是需要花工夫去念的，英文才是我所感興趣的。在那時候，轉系是以一年級上學期成績為主，感覺上不如現在競爭激烈，大部分向學校提出申請的人，幾乎都能如願，我們那時候也沒有雙主修、輔系的選擇。我還記得，在我轉出中文系的那一年，就有很多人從中文系轉入英文系的。

雖然我是從英文系畢業的，但是，跟中文系的同學感情比較好，轉系後還是跟他們去登山，參加中文系的活動。英文系的班上，如果要開同學會的話，我大概叫不出五個同學的名字，比較熟的，反而是轉學、轉系生或是學弟妹，可能是因為修課的關係，也是個認同吧！

大一時，中文系的課程有「文字學」、「四書」、「文學概論」、「大一國文」……影響我轉系較深的，是「文字學」這堂課。那時的老師是耿慶梅老師，她很嚴肅，總在上課時寫了滿滿一黑板，我們就在底下抄個不停，而且，還得畫甲骨文、六書，圈點「說文解

字」，課排在禮拜二的七八堂，上完課要回家，冬天時候，天色都黑了，上這堂課壓力很大，讓我想轉系，而英文是我的興趣，就選擇轉到英文系。教「四書」的老師是張志韓先生，上課帶有濃厚的鄉音，因為這層語言上的隔閡，並不太能體會到他的學問。「大一國文」是王國良老師教的，他挺有趣的，上他的課時就覺得，他怎麼可以把每個字都唸成捲舌，上「文學概論」的是林聰明老師，他的中英文都挺好的，不過，這堂課排在禮拜六的三四堂，所以，上課效率也不太好。

中文系的課程，因為我沒有興趣，所以花了再多的時間去念，總覺得事倍功半，常有著挫折，懷疑自己學了中文以後要做什麼，到了英文系，我非常用功。那時候，我們上體育課時規定穿著白上衣、黑長褲，很多女同學愛漂亮，都是帶著衣服來學校換的，我卻直接穿來上課，又因為比較黝黑的皮膚，看起來土土的，同學們都以爲我是從中南部來的。

現在的風氣比較自由。當時的體育課沒有這麼多的項目可以選擇，男女生也分開上課。因爲我中學念的都是女校，到了大學，就覺得男女生之間的距離挺大的，不若現在的學生，比較能夠打成一片，人際關係發達多了。

不過，我看到比較不好的一點是：現在的學生對於功課的專注度較低。以前的學生除了功課，常要花時間去上家教，現在的學生則是在忙碌之餘，還有各種兼差，但不純粹是爲了經濟問題，加上社團，看到學生比以前更忙了，而應該放在功課上的心思少了，老師比較無

法預期學生對功課投入多少。

以前是有點名先生的，他們在老師上課時，就站在教室後面點名，從背影就可以看出誰到了，沒來上課的人就得請假。現在就比較自由了，依各老師而定，但是，學生被賦予的自由，他們本身並沒有充分利用，有時候反而濫用了自由，不上課而忙其他事，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結果。

英文系裡，我的恩師應該算是以前的系主任吳子平老師。民國七十年畢業時，在吳老師的鼓勵下回校考助教。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時我並不很明確知道未來要做什麼，也順利考上，就在語言中心當了兩年的助教，當時的助教是負責英聽教學的。第三年，校長室秘書出缺，我在吳老師的推薦下，就到校長室任職，那時的校長是楊其銑先生，他是英文系的教授，教「語言學」這個科目，我到他的課堂去旁聽，這是造成我以後出國唸書專攻語言學的一大因素。校長室裡面，還有一位精擅詩詞的韋仲公老師，他也在中文、哲學系任教。在校長室裡，韋老師擔任主任秘書，專門負責書信公文的擬定。另外，還有擔任英文秘書的鄧臨爾（Dr. Paul Deninger）老師，負責英文書信的書寫。到校長室工作，由原本單純的教學，轉入行政工作，它的社會性比較高，但我對行政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才會決定出國唸書。

在我輔導學生時，常覺得很多事情只是靠當事者看法、決心的改變，我比較傾向於站在

一個聆聽者的立場，把自己開放出來，讓學生主動來接觸。我常常感覺到，自己的人生走來很平順，沒經歷過什麼挫折，人生歷練不多。所以，有時候輔導學生時，覺得滿心虛的。我覺得一個更好的輔導者，對被輔導人的路，他也許都自己走過一圈，就像一個好的牧師，或許他曾經是個「歹子」、「浪子」，他回頭了，再去輔導需要輔導的人，他比較能夠了解對方的想法和困難。

我上大學時的上課方式比較是純講授的。我們在上「英文會話」課的時候，一班五十人分爲兩組，大部分都是外籍老師在講話，我也不曉得老師怎麼給出成績的。現在的學生則幸運得多，課程設計有演說、會話、辯論等，評量也是多元的，老師有時會要學生帶些東西，在課堂上一起分享、討論，或戲劇表演，提供了很多的學習機會，也較具挑戰性。

對於學校，希望它能繼續保有樸實的面貌，但能更有自己的特色，獲得更多的肯定。

(採訪整理／劉琬茜)

李玉華，東吳大學英文系七十級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語言學碩士。曾任語言中心助教、校長室秘書。現任英文系專任講師。

東吳的女兒

馬君梅

我在民國四十九年就與東吳結緣了，當時，家住羅斯福路，每天得轉三班公車才能到東吳，先從羅斯福路坐車到台北車站，再從台北車站坐到士林火車站，也就是現在小北街的地方，然後再搭二十九路公車到外雙溪，每天如此，非常辛苦，不像現在交通那麼方便，還有往返外雙溪和城區的交通車可以搭乘。

那年代的女生都很有 lady 的樣子，不像現在的女同學，都是牛仔褲、T 恤的，我們都是穿著窄裙，很少穿長褲。有一陣子流行穿一種細根、釘有釘子的高跟鞋，走起來叩叩作響，很有意思。大一時，我還曾經穿著窄裙、高跟鞋爬後山到實踐管理學院呢！當時我們連上體育課，都是帶著長褲和布鞋到學校換裝。現在的同學，大概不會像我們這麼堅持 lady 形象了吧！

大學聯考，我之所以選填東吳就讀，是我父親的意思。我父親是大陸復旦大學畢業的，他非常希望我唸東吳，所以即使當時我的聯考成績達到就讀公立大學的標準，但我還是選擇

東吳爲我的第一志願。至於爲什麼會選擇會計系，這就得談到我對數字的一種天生的迷戀與興趣。我從小最喜歡的科目就是數學，很喜歡演算題目、掌握數字的那種感覺，這點大概是女生裡的異數吧！所以當時的大學聯考，我本來想報考甲組或丙組的，但是因爲我的好朋友們全都報考乙組，我也就跟著她們一起報乙組，選填志願時，聽說會計是和數學相關的學科，於是，糊裡糊塗地就填了會計系，沒想到，卻因此奠定了我與東吳會計系近四十年的不解之緣。

我們會計系的功課壓力非常重。記得上會計學的第一堂課時，陳振銑教授就告訴我們，要我們注意看看前、後、左、右的同學，看看他們下學期還在不在？當時大學聯考進入東吳會計系有一百二十人，但能順利四年畢業的大概只有三、四十人，其餘的唸五年、六年、七年的大有人在，所以我們常常開玩笑說：東吳的會計系是醫學院的會計系。

會計系向來秉持之傳統，就是「勤教嚴管嚴淘汰」。當時每學期各科不及格的同學名字會被公布出來，通常只有少數幾個人能 all pass。我是普通中學畢業的，班上部分同學是商校畢業，和他們一比，壓力就很大，而且課本全是原文書，沒有中譯本和解答，連中文之會計書都很少；所以我們必須勤做筆記，並經常漏夜演練題目，再和同學核對答案。我從小就對數學有興趣，也很喜歡作題目，這點對我來說並不是很困難，所以我在班上的成績很好，老師和助教也都滿喜歡我的，大二開始，就經常被同學選出來當班代，爲同學服務。

東吳一向非常重視文史的教育，「國文」、「英文」都要修二年，那時大二擔任我們國文課程的教師，是當時很有名的一位監察委員：錢用和女士，因為她年紀大了，每次上課，我都會到行政大樓前去接她，放學後，再安排同學送她回去。那時，作文作業都必須繳交至中文系辦公室，現在的黃登山教授，是當時中文系的助教，所以我常常將本班之作文送到中文系時和黃教授有接觸，黃教授是高我幾屆的學長，那時我們同學都說他很帥，很像當時一位叫安東尼·柏金斯的外國當紅影星。

當時的東吳，只有法律、政治、經濟、會計、中文、英文六個系，學校的規模比較小，學生人數少，相對的感情也比較好，六系的同學彼此都認得。我記得當時有一個胡教官，我們都叫他矮教官，每個人都喊得出名字來；另外，因為當時實行點名制度，所以負責點名的先生小姐都非常厲害，只要看後腦勺就認得出來你是誰了，也因此當時點名的職員和同學的關係也比較密切。

點名制度已經取消十多年了，我一直覺得滿可惜的。讀書有時候還是需要老師督促鞭策的，不能說崇尚民主，就不點名。所以當校方取消該制度時，本系系務會議一致決議通過，所有會計主科，學生一律採固定座位上課，並規定：「如學生缺課總時數達該科目上課總時數四分之一者，學業成績一律不及格」，這是本系教師對學生課業的一種要求，也是一種堅持。

以前的學生本分就是唸書，活動比較少，社會的價值觀也比較單純；但是，現在外面的誘惑多，社會多元化的趨勢也容易讓同學分心，所以東吳的整個學風跟以前比起來，的確有些不同。不過，在這方面，會計系倒是始終如一，堅持我們「嚴勤篤學」的傳統。一直以來，外界給予會計系的評價極高，我亦常常提醒同學：「會計系贏得各界的口碑與好評並非平白得來的，靠的是師長和學長多年的經營和努力。維持此一光榮之傳統極為不易，但要破壞它卻很簡單，就像一支球隊，說解散只需要一分鐘，因此大家均有責任維繫此一優良傳統，絕不可作歷史的罪人。」我一開始就說明了我的堅持，同學們亦能明白和接受，很快地就被會計系嚴謹篤學的環境所感染，同學們也都將傳統和使命承接下來。再者，系裡的老師，不論是外校或是系裡畢業的，也都曾受到環境的感染，大家都同心齊力地為系付出。因此，會計系的學風和以前比起來，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這跟一個系的傳統、系風、文化有關，我畢業於會計系，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以會計系的傳統為榮。所以我在十幾年的系主任任期內，不斷地警惕自己：我一定要維持傳統，繼續堅持下去，盡心盡力的在這方面做下去。

民國五十三年畢業後，即留任母系助教，而後升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我記得在任職助教及講師期間，因想往企業界發展，曾兩度提出辭呈，但當宋作楠老師和陳振銑老師知道我並非出國深造時，均不同意我的離職，我一直非常尊敬我的師長，對師長們之教誨也一直

銘記於心，師長們交代的事，我總是循規蹈矩的做好。後來，因為結婚，有了孩子，老師這份工作，可以讓我兼顧家庭，而我亦喜歡和學生相處的感覺，加上自己的企圖心不強，很多原因促使我留在東吳。至於我走的路到底對不對？自己也不清楚，但現在許多已擔任企業高階主管的同學總是以羨慕的口吻對我說：「還是妳最好。」我覺得人生的際遇和選擇是難衡量好壞的，但最重要的是，不論在任何工作崗位上，均應全力以赴。

在學校擔任行政主管是有責任與壓力的，不像只擔任教職那樣單純。女性當主管，要比男性相對付出更多，所遭受的風風雨雨也比較多，身為女性也有一些先天上的優勢，待人誠懇寬厚，處事細心周到，這些是我做事的基本原則，所以我們系上的同事及同學們都稱我為主任媽媽。

民國七十三年接任會計系系主任，這十餘年來，雖然非常辛苦，也遭遇一些惡意打擊，現在回想起來，上帝還是對我很好的，很多事情碰到困難，也都能順利地解決。在我之前的系主任都是男性，而且年紀都較我年長二十歲以上，在這過程當中，所經歷的辛苦，是一言難盡的。但同仁都跟我說：看不出妳內心之辛苦，每天看妳都精神充沛的。其實我只是不想讓別人看見哭喪的臉，遇到挫折應面對它、並盡力解決它，怨天尤地是沒有用，不是哭鬧就能解決的。我先生經常開玩笑說：「妳呀！看到我就累了，一跑到學校就生龍活虎。」數十年來，我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私事而耽誤到上課和系上的事務，或要求在排課或服務方面給

予特別通融，我總是將學校的事情列為優先考量。

先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這是很大的原動力，使我遭遇挫折，亦有勇氣與信心去面對。同事們經常開玩笑說，要頒發一座榮譽獎盃給我先生，以獎勵他對工作及會計系的支持和付出。

自學生時代至今，東吳陪伴我走過漫漫四十年，亦伴我度過人生最精華之歲月年華，不論收穫是付出，是喜悅或是挫折，其中的酸甜苦辣，都將化做對東吳綿綿細長的感情和祝福！

（採訪整理／林育丞）

馬君梅，東吳大學會計學系五十三級畢業，美國北羅普大學會計碩士。曾任台灣證券交易所所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行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諮詢委員會」委員、經濟部「會計制度審查委員會」委員、考選部「會計師檢覆委員會」委員、全國會計師考試、高普考試、特種考試典試委員等。現任東吳大學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從魔笛手到伯恩斯坦之路

郭聯昌

沒有音樂的生命無法想像，沒有生命的音樂流於學究氣。

所以說，我與音樂的接觸是一種全面的擁抱。—— Leonard Bernstein

我是東吳第六十七級的畢業生。記得剛進東吳的時候，新的音樂系館才剛剛興建完成。我們的系館在二十幾年前算是非常摩登的；舊的系館我都沒有見過，因為民國六十三年時剛好系館「搬家」，位置應該是在超庸館的下面，跟現在都不一樣了。我是音樂系第三屆的學生；那時的課程，因為是早期，所以課程比較沒有上軌道。不過也是因為這樣，我們就有很多的時間去作我們想做的事，無形中也有了更多的發展空間。我主修的是長笛，副修鋼琴。但是由於課程安排的都滿輕鬆，所以我就利用時間也自學了低音提琴。就靠著這些，我獲得了一些機會與學校外面的樂團接觸。

那個時候課程安排規定每一位大二的同學必須選修一項中國樂器。而我選了與長笛較接

近的中國笛。當時教我們「國樂概論」的老師是李震東先生，他是中廣國樂團負責訓練的首席胡琴；由於我自學的低音提琴基礎還不錯，國樂團裡正需要類似這個聲音的倍革胡，老師就推薦我和現在復興劇校的鄭榮興校長一起加入中廣國樂團。當時我們的導師是曾任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系主任的徐頌仁教授，在幾乎同一時期內他也介紹我到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那時還是兼任團員。在國樂團前後待了一年多，後來發現國樂和西樂畢竟有差異，而且我還是學生，學校的方向還是以西樂為主，所以就暫時離開了國樂團，專心留在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了。後來十年後又再度回到國樂團，而且是我自法國回國的第一份工作，這卻又是後話。

二十幾年前主修管樂的人比較少，多半的人都是主修聲樂和鋼琴的。我們音樂系一直到我們這一屆才有比較多的人修管樂、還有少部分的弦樂。當年我們班上三把小提琴，只有一把是主修，其中之一後來成爲我太太——她是我的同班同學。當時班上修弦樂的人數雖然可以勉強組一個小樂團，但是卻還沒有合奏課程，也許是因爲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的緣故。所以我就自己發起號召組了一個小小的弦樂團，找幾首曲子練一練；這團大概有十幾個人，我一面指揮一面吹長笛，演奏給當時的老師聽，然後就像現在的「請願」一樣，申請開合奏課。大二時課開成了，老師是當時一位美國宣教士，當時教會勢力還深深影響著學校，用的教材也是美國的一些民謠，滿粗糙的。不過由於常在喊東喊西的，自己就當上了這個團總幹事。除了這個以外，在高中時參加台中一中的管樂團有一些經驗，因此我也鼓吹在東吳用社

團名義組織了一個管樂團，那是以音樂系爲主的。後來也被改爲音樂系的正課了。當時也沒有老師，我就自己上台指揮，校慶等慶典活動也都擔任負責工作。其實管樂團的好處就是沒有時空的限制，婚喪喜慶都用的上。還因爲這個，大四畢業那一年還得到學校頒發的「服務熱心」獎呢！

想想當時大三、大四的時候真的一個人身兼好多團。除了中廣國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還有大四那年有一個「幼獅管樂團」也徵召我去，還有兩團合奏課。我的東吳印象幾乎就在這些團裡面轉來轉去……但仔細算一算，國樂團、管樂團、管弦樂團我通通都接觸了，所以可以說東吳的環境再加上我對音樂的酷愛，過去經驗的累積，都一點一滴的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

至於畢業以後在國防示範樂隊服役，因爲地點就在台北，常常被徵召去救國團的「幼獅管樂團」幫忙，跟音樂也脫不了干係。當時這個幼獅管樂團就像國家代表樂隊一樣，我是第一屆的團員。六十六年成立的時候，指揮是張大勝老師。六十九年一月的時候，指揮已經換成我高中時代的恩師陳澄雄老師。他當時就徵召我到幼獅去當他的助理指揮，那時我都還沒退伍呢。也因爲和陳老師的接觸，六十九年四月的時候，陳老師推薦我參加法國文化科技中心一項公費留學獎學金的考試，考的專業科目是指揮。我想是因爲自己在學校的那段日子裡有許多指揮方面的磨練，加上陳老師也鼓勵我朝這個方向發展，大學時代的徐頌仁老師也都

來幫忙……經過重重關卡，雖然我八月才正式退伍，但是四月就考上了公費赴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深造，雙主修指揮和長笛。

要去法國，但是當年我一句法文都不會，於是只得趕緊補習。四月到八月我還在服役期間，只得一放假時就找家教來為我補習，十月的時候我就出國了。

想想在東吳四年到當兵退伍的這一段時間，真的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這短短的幾個月裡面我畢業、退伍、結婚、出國。從大一下追求我太太，一直到出國前結婚，我們愛情長跑了五年半；我赴法國留學一年以後她才跟著到法國去的。這中間的過程真的相當漫長，不過我們倆可以一同走來，現在想想也是不容易，看看現代男女的愛情，能夠走的長久的有幾多？

當時法國人，對台灣所知甚少（可能是因為台灣太小了吧）。爲了讓他們有清楚一點的認識，因此到了法國四、五年，我就組織當地的華人、留學生共同組成一個「國際管弦樂團」。我擔任總監兼指揮，在當地有無數場的演出，並把當時台灣作曲界前輩郭芝苑先生的中國輕歌劇《牛郎織女》搬上法國舞台。啊，那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把中國文化在當地推廣，也算是一項創舉了！

我在法國待了六年三個月又十五天，雖然只有頭一年領著法國文化科技中心的獎學金，但是接下來的每一年學費方面申請不同的獎學金支持，都還過得去。靠著演出、交流和教

學，我太太和我一同努力，在法國也算是小有成績了。不過異鄉總是異鄉，想回國的念頭是一直有的。我從巴黎師範音樂學院畢業以後，留在法國吸取「實務經驗」二年，後來因為獲得「台北市立國樂團」的聘書，就高高興興的回來了。

陳澄雄老師一九八四年三月接掌「台北市立國樂團」的團長，他寫信給我，希望我回國服務。其實十二年前要回國找工作就已經滿困難的，留學生的增加，造成所謂「留學生症候群」就是說出國後回國找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缺額有限。但是因為老師當時是用人之際，他也知道我能做一些事，能夠帶動，所以還是毅然決然的邀請我回來。老實說那時回來有很多壓力。一方面自己是在國外學指揮的，學的又是西樂，離開國內也有六年多。現在突然回來，而且又是帶「國樂團」！不知道會不會有不好的意見或者批評。加上這個團裡有一些團員是我的舊識。那時候心裡滿志忑的：有舊識，可以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因為如果和他們的關係不好，現在可就糟了！人際關係處理的好的話，現在就可以是我的「介紹人」。還好自己在社團經驗或者做人處事上沒有什麼遭人非議之處，自己在回國服務的第一個工作，算是平安過關了。

「台北市立國樂團」當時是一個公家行政單位。公家單位對於人員對外演出有諸多限制，還有就是除了本團演出以外必須堅守「公務人員不得兼差超過四小時」的規定，因此當長輩或者學生時代的舊識找我帶團或在學校兼課時都很不方便。就這樣，後來我就結束了在

市立國樂團的指揮工作，投身國內的教育及音樂文化推廣工作一直至今。

在法國待過一段時間，一直到回國教學，老覺得其實在音樂方面是可以「中樂爲體，西樂爲用」的，先傳統再創新。所以說，能夠在自己的這塊土地爲中國人做一些事是好的，能夠爲國內的音樂教育出一份力是好的，能夠爲國內與國際做音樂交流是好的。也希望我們的努力有一天有收穫！

（採訪整理／吳堯影）

郭聯昌，東吳大學音樂系六十七級畢業、巴黎師範音樂學院高級指揮科，曾任巴黎市國際管弦樂團總監兼指揮、臺北市立國樂團、幼獅管樂團指揮，也多次獲得教育部所頒特優演奏、教育、社會貢獻獎項。現任輔仁大學音樂系所專任教授兼主任，並指揮該系交響樂團及管樂團。

會計人的創新與魄力

郭俊惠

寒窗苦讀立根基

唸商是我年少時的最大期許，因為身為農家子弟，深刻體認家裡務農的辛苦，所以我想從商或許是另一條出路。就這樣，我進入了東吳當年唯一的商學科系——會計系。

記得第一天到校是住在舊的學生活動中心，後來才有男生宿舍可以住。在東吳讀書比考大學時的高中生活還辛苦，由於沒有商科基礎，每天都得勤作習題，我記得會計學有習作 Group A 及 Group B，別的學校可能 Group A 都做不到一半，而我們 A、B 都得做完。另外還有很多科目要唸，例如英文、會計、經濟等，每天唸書都唸到將近子夜。

嚴格說起來，會計是一門艱難的學問，記得當時光是「會計」一門課便有七本書，但在大學裡我已喜歡上會計了。還記得到大四我們都不用聽課，利用課堂來討論，上台發表意見。當時對幾個老師印象頗深，例如陳振銑、鮑爾一、王量教授等，還有系主任宋作楠先

生。尤其是陳振銑教授，他的教法很西式，開了一串書單，加上指定幾章回去自己看，下禮拜看完後提出問題討論，所以沒有預習的人是不大敢去上課。

雖然課業的壓力很重，但大學時代的我是很活潑的，除了參加足球系隊、象棋隊，也加入團契唱詩班，充分利用時間。另外也工讀賺學費和生活費，大一是打掃教室，二、三年級則至會計室當助理。因為當時我父親在衛生局當工友，母親務農，家裡經濟原本就不甚寬裕，所以靠著工讀與獎學金或多或少可減輕家計的負擔。除此之外，寒、暑假得回家幫忙農事，每次再回台北都曬黑了，所以我也常笑說，來台電有什麼辛苦的都不比下田的農稼辛苦。記得大學時每年夏天頂著三十幾度高溫的大熱天，在燙足的水田中，穿著短褲打赤膊除稻草，從清晨工作到晚上七、八點，比較起來現在的學生似乎幸福得多了。

投身台電展長才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我參加特考進入台電，從那時開始便一直服務到今天。剛開始為求離家鄉較近，所以被派在嘉義區營業處，當了三年的記帳員，民國五十七年被調到台電總公司，我的工作內容改變，從記帳員變成企劃人，此時必須從會計的角度來做企業預測、電源開發及財務配套。

唸會計其實是學習如何當一個「企業醫生」，以會計為基礎來看企業的問題；使企業能

成長，會計最大的功能便在此，所以我一直認為會計能做的事遠比提供財務資料的範圍更廣。事實上過去和現在的會計工作內容也產生了變動，其主要的任務有二，一是發現公司的問題，使公司能永續發展。二為保護公司的財產，讓企業、股東與員工權益不受損。所以如何提供正確有效的資料，保護公司的權利，也是我在東吳四年所學的應用。

財務預測成效大

受學校教育的薰陶，我們的眼光與立足點是寬廣的，不是只會記帳。課程安排從管理、經濟、法律、證券、市場、保險學都包括進去，而會計是底子，在專才的技能基礎上，更訓練我們要有企畫能力的全方位通才眼光。

因著有這樣的體認，所以我進台電後的信念與認知，便是加速能源開發，也就是蓋電廠。民國五十七年，當時台灣經濟很不好，要向民間借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國家也多靠美援。借一百萬都很困難，遑論一個電廠投資須幾百億。因此資金缺乏的台電，當務之急便是尋求外幣援助。事實上一個企業要永續發展，最大的問題就是錢，但是要借什麼錢呢？美金、日幣，還是馬克？如果借錯了錢公司就得關門。蓋一個電廠少說要花三至五年，核能電廠更需歷時十年，所以沒有好的財務規劃，便無法達到目標，因此我才有所謂的「財務預測」。

電源開發規畫投入台灣經濟之後，便帶動整個社會經濟供需的市場，形成資金的滾動循環，產品賣出後又再投入資金。因此於民國五十七年，台電向世界銀行貸入第一筆五千萬美金，合約台幣二十億，是當時台灣有史以來第一筆國外貸款，當時我是以幕僚身分從中參與，推動公司蓋電廠。從電價訂多少，市場在哪裡？供需求多少？收入多少？電場蓋多少？賺多少？加上市場預測等，皆是有我的從中協助運作。

台電當初只有兩億資本額，如今已滾到三千三百億資本額，之間完全沒有政府資助，而是由企業本身的經營擴充成長。以百分之七十外資，百分之三十自己的錢的合理比率貸款，運用貸款策略的經營方式，給政府股票，慢慢滾出資金。一切都從兩億資本額開始，從那時候開始，我便是以全方位理念來發現公司的需要。

至民國七十四年，最後一筆貸款是五十億日幣，只有二千多萬美金。當時台灣經濟開始轉好，社會經濟繁榮後，貨幣也豐沛起來。民國七十一年、七十二年台灣開始外銷，台電也開始還本。七十一年台灣美金外匯只有一億，至七十八年度已有九百多億美金。七十四年整個貨幣供給量達到四千億。台幣愈多，便可以開始還錢，所以這時候整體的財務結構也跟著改變了，改採還美金借台幣的策略，直到民國七十八年台幣二十八塊兌換一美金，光是匯率就賺進了幾千億差額。

回顧當初我選擇借用美金的策略，一是並無台幣可借，欠外幣不影響國內的通貨膨脹。

二是社會發展繁榮後，台幣走勢增強，所以需要還的錢也就少了。這便是「財務預測」所發揮的功能。因此，我們每年都要做十到十五年的財務預測，曾經，台電資產只有數十幾億，如今已有一兆一千億。我感謝學校訓練學生不只有專才的技術，更具有通才的本領。固然專才的訓練使我們能成為會計專業人才，但擁有開放的眼光，才能成為一個企業家或領導者。今日我能成為台電的總經理，除了原本對人生的規劃和其他人不同外，重要的是，在現有的會計基礎上，我相信自己還有更大的創造空間。

企業經營重管理

大學時代在接觸所有相關學科中，我已經知道「管理會計」是一門十分重要的科目。管理最重要的三項原則即是：企畫、執行、回饋。而公司領導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再來是設備、資金、技術，這是企業中不可或缺的四元素，發揮到最高的效率，則公司必然就能經營成功。

然而人才要如何發揮呢？當企業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員工，能認同公司理念便十分的不容易了，台電有八個副總、二十四個處長，所以這又牽涉到所謂的人事制度、技術、設備管理。要讓員工有參與感是很重要的，實在、誠懇的溝通便是關鍵，要人替企業賣命，便須讓員工知道企業的發展方向。而領導者和下屬分享想法是必要的，如果管理人將構想，政策放

在腦中誰能了解呢？所以溝通與獎賞的管道必須暢通而有制度。再者，一個公司經營不善，絕大多數都是出在資金的問題，所以財物管理是一個公司的命脈，若再透過人事的推動，有人才有技術設備資金，這企業動力便可源源不絕。

在學校的企業管理學科的學習中，我對管理企業有了自己的構想，所以出了社會即使是台電這樣大的企業，我仍尚有餘刃操作。我一直堅信工作最重要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過去的資料固然可當做參考的指標，但是包括未來五年、十年，企業可能面臨至什麼樣的環境。而你又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走到那條正確的路上去，這才是你更需要關心的問題。

期盼校友常連繫 共同努力創校譽

不斷的、多方面的學習，是我一直自我要求的目標。我的那些大學同學在國內外都發展的很不錯，可惜現在因為工作太忙碌一時也走不開，否則我也想到國外再進修。之前我曾到賓州阿靈頓短期進修電腦，回來後台電的 MIS 資訊系統，便是在我任內領導起來的。

因此，我希望學校能嚴格要求學生，除了合理的管理，也要有學習的目標。就像每個科系，固然應該充實系上所開的課程，但各系之間的交流更有必要。社會實務經驗和學校所學是有許多不同的，這也正是同學們日後可以發揮的空間所在。社會發展是多元化的，如果同學只局限於自己所唸的專業科目，是無法開拓人際關係與發展未來的空間。所以對自己的能

力要有信心，相信自己的潛力是無窮的，如何打開心扉，有胸襟的去採納不同的人與不同的想法，是必須學習的重要課程。所謂民主便是如此，不須矮化自己而以誠懇待人，尊重別人而有自己的原則。

回歸至學校的發展亦是如此，各系間的良性競爭固然可喜，但重要的是如何使各系溝通交流，促使整個東吳大學整體進步。套用經濟學的觀點，如果總體利益成長，個體利益必然相對提升，所以，我建議學校，需觀察社會各種新需要與發展，跟著時代脈動甚至領導社會的課程都可以開設，而不要一成不變，必須要有創新力與魄力。如此才能培育出一個真正擁有專才的技能，及通才的理念與國際觀的東吳人。

（採訪整理／杜佳紋）

郭俊惠，東吳大學會計系五十一級畢，歷任中油公司董事、台金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特別助理、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及監察人，現任台電公司總經理、董事。曾獲六十四年行政院優秀主計人員獎、東吳大學會計系傑出校友獎，中華民國財務主持人協會第二屆傑出主持人、八十八年全國優秀公務人員。

銀河夜夜流

陳朝威

人世間許多事往往變幻無常，少有人願意去承受，但無奈總有些事情並非完全能按照自己所想的去進行。

人生可把握的事實是在是太有限，就以進入東吳大學這件事來說，並非如我當初所預期的。嚴格說起來，從我唸東吳經濟系、文化經研所到後來做了二十五年公務員，及在學校當了六年助教、兼任講師，這一路走來並不盡然照著自己的人生規畫。

記得在高雄中學時，我並不是十分用功的學生，但是很會開夜車讀書，尤其在大專聯考前很用功，當時學校模擬考試我幾乎都在四百多分以上，在那時可說相當不錯，有考上國立大學的實力，因此我第一志願便是法律系。

興起唸法律系的念頭，是因當時有一部名為《紐倫堡大審》談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犯的電影，在這部電影中有一段律師替戰俘辯論的場景，其辯況之精采，深深地沖擊我年輕的心，那時我便深深的以為，當一位律師便要有那種大無畏的精神。

既然對自己有信心，大學聯考時便將前五個志願都填了法律系，本來就要這樣交上去。但是填完之後突然覺得似乎少了一點，於是想想又多填了一個志願，那第六志願便是「東吳經濟系」。

這突然一閃而過的念頭應該是來自兩個隱約的印象，一是當時有部非常風靡的小說叫《藍與黑》，其中的男主角張醒亞便是唸經濟的。此外，我當時有位表哥，原本是唸台大法律系，後來轉至經濟系，就依這兩個印象我把東吳經濟系填為第六志願。

到了大學聯考時，考場在台南，因天氣炎熱夜間睡眠不太好，因此前往藥局要求老板給我開一些鎮靜劑，那位老板特別提醒我說，如果精神不好的話可以吃一粒，買回來的那天晚上，覺得精神沒有甚麼不好，所以並沒有吃它，但第二天考試的時候卻覺得精神非常不好，因此就照著藥局老板的吩咐吃了一粒，沒想到吃下去之後，眼皮重的抬不起來，原本最為看好的國文及歷史，卻考的不知所云，結果我以幾分之差和東吳法律系擦身而過，考上了東吳經濟系。

一方面因為那時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境不好，考上私立大學無異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我想唸法律卻掉至經濟，原本想放棄來年再重考的，但時任教職的父親體不太好，那一年病情更加惡化，恐怕隨時都會不測。記得在飯桌上，父親告訴我，希望能親眼見到他最小的兒子進大學，因此我只有背起了行囊北上求學，不幸的事緊接著發生，敬愛的父親就在我大一

下學期與世長辭了。

以一個南部學生來說，也許因為校方沒有特意作宣傳，進入東吳之前對學校是沒什麼印象的，只知道校風保守而純樸，所以對東吳的感覺相當模糊，但是沒想到日後竟成爲東吳的一份子，人生預料外的事自此處又有一些體認。許多往事，猶似昨日歷歷在目，還記得背著軍用帆布包，隻身北上的我，剛踏進學校時已是黃昏時刻，位於溪畔的校園被山中早臨的暮靄所籠照，迎面所見只有校門口孤零零的兩條柱子寫著：「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一時只覺得好大的口氣！除此之外對整個校園的景象也沒辦法看的很清楚，只覺得校園很小，和從前所唸的高雄中學實在不能相比，心底不由然地升起了些許戚然與落寞。等到我帶著行囊至舊男宿舍報到時，站在寢室門口迎接我的是大我一屆的法律系學長黃義生，此外同寢室尚有同是二年級法律系的李秋福、經濟系一年級A班的王玉章、加上隔壁寢室會計系的張潏。當天晚上在黃學長作東下，一行人便在東吳門口的小麵店吃了碗麵。這簡單卻誠摯的款待，讓我這青澀不安的新生有了親切的感受，對東吳的印象也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隔日起來，朝陽揭去了東吳校園神祕的面紗，在明媚的山勢與清澈溪水的襯托下，顯出了令人驚艷的靈秀面貌，聽著潺潺的溪水聲與林間細碎忙碌的鳥叫，深吸一口清晨沁心的新鮮空氣，就這樣對東吳的印象又更加深了些，也啓開了我往後數十年台北居的新生活。

有幾位師長讓我的記憶猶新，記得當時國文課是由中文系丁介民教授擔任，他二話不說

便要我們背書，背書時二個人對站著背，其間你來我往背誦，不可稍有閃失。而我背書的速度可說是全班的第一名。這是有原因的，記得初高中時，每年放暑假父親都會嚴格要求家中子女——對著他默書，因此我們對《古文觀止》等國學書籍的了解，就在那段時間紮下的根基。父親過世後我由於心神不寧，再也無法專心背書，即便如此，這段過程對我日後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

另一印象深刻的是經濟系主任吳幹先生，他教學素以嚴格聞名，當時我們所用多是原文書，他又很喜歡考填充題，大家沒辦法只有苦讀苦背，硬將完整的原文內容記憶下來。此外，侯家駒教授讓人永遠懷念，最令人感動的是他的長者風範及對學生的關懷與愛護，我亦曾經擔任過他的助教。另外鄧東濱教授認真有條理的教法，以及將整本總體經濟學都記在腦中，上課侃侃而談，隻字不差的歐陽助教授，這些老師都令人感懷不已。

有兩個地方是我在東吳校園中最愛流連的角落，一是在有潺潺溪水聲的雙溪畔可以吟背文章。一是安素堂，我總喜歡在禮拜六跑到那裡，在潔靜的建築內，聽著安詳的風琴聖歌，心中感到格外的平安寧靜。此外經營學生福利餐廳，長的圓胖和氣的老板，讓我們這些經濟困頓的學生以每月三百元包飯。記得在成功嶺時，我一餐可吃下六碗米飯，黃義生更可吃下八碗，可見胖老板做我們這些蝗蟲般學生的生意肯定沒什麼利潤。

校門口那家由一對周姓老夫婦經營的小麵店，亦是我和同學常去的地方。記得在經濟拮

據的狀況下，幾個窮學生在幾近攝氏零度的冷冬，在小吃店吃著麻醬麵，邊喝著五加皮驅寒意，這是東吳令人懷念的另一鏡頭。

東吳四年亦有不少輕狂的往事，記得有一年冬天東吳淹水了，黃義生和另一學長曾文雄打賭看誰敢跳下已深過腰部的溪水，我很不服氣便逞強撲通一聲陪著跳下去，結果上岸後，打賭的曾學長一上來便病倒，而我硬撐二個星期也終於不支生病，這下子一病便躺了一整個月；第二年冬天曾又找我去跳溪水，我就是不幹。大三時也是和曾文雄到金瓜石爬山，黃昏回程時迷失在大磺水嶺一帶，山中起霧伸手不見五指，我們被困在一處廢棄的牛寮裡，帶著志忑的心情直等到霧稍退才慢慢摸索下山，那次登山歷險歸來讓我心存餘悸，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冒險爬山了。

大學時代我沒參加社團，但是喜歡打籃球，在系上及成功嶺都是代表隊的一員，我和班上的廖世新、丁祖卓被稱為經濟系三劍客，打遍東吳無敵手，每次籃球比賽我們班都拿冠軍，當時常打著赤腳下場打球，彼此間豪爽的交往，同學們也見怪不怪。

在東吳的日子裡，還有一件事讓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大家喜歡開夜車念書。由於教授都是出了名的嚴格，所以經濟系流行當全班三分之一以上，我記得巫永森教授教「會計學」，我們的考題和會計系的一模一樣，一考便是四個小時，等成績出來時全系一百多人才十一個及格，我就是以六十分名列第十一名。正由於考試很難，大夥也不敢隨便鬆懈，所以幾乎每

隔一陣子就得開夜車，一次便開個二、三天，儼然成爲系上的風氣。而這種嚴陣以待的應考態度，使我在回東吳當「個體經濟學」的助教時，也曾經讓考不理想的班上同學三分之一不及格，但是我指定五十題較重要的題目，讓不及格的學生回去用功後再來補考，我當時考慮到，與其把學生當掉，不如至少讓他們就這五十題死背還能強迫記點東西。我認爲這樣對用功的同學才比較公平一點，所以即使日後擔任講師我還是有讓學生不及格的習慣，但我採活當不死當的方式。

閱讀是大學時便養成的習慣，卡謬的《異鄉人》讓我對人性有了最真實的共鳴。當父親的惡耗傳來時，我忍著悲傷從「人民公社」狂奔而出，霎那間的痛苦反讓我一滴淚都流不出來，突然感悟到《異鄉人》中的男主角莫魯梭爲何對母親之死如此冷漠，且做出異於社會世俗眼光的行爲，這種心理受到衝擊後的轉折是無法以道德批判來論斷的。可以這麼說，我在大學時期便早已對人生的真實面有了深刻的體認。

「白雪歲歲有，銀河夜夜流，明月早應允，還我少年頭。」這是我書房中的一幅字，購於北京的榮寶齋，也是我自己心境的寫照。回憶在東吳的輕狂年少，猶尚昨日之事，不覺竟也在社會上埋首工作了數十年。讓我深深的感覺到，做人做事必須步步爲營，不投機、不取巧的紮穩根基，離開學校後才正是我真正開始用功讀書、用功做事的時候。正由於出校門後更發覺自己的不足，才懊惱在學校時不夠用功，所以我殷切的期盼學弟妹能珍惜這寶貴的有

限時光，勤勉發奮向學。「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如同我初見時被其氣勢所震驚的校訓，這不但是已邁入百年樹人的東吳母校的歷史傳承，亦正是我們東吳人世代代應謹記在心的訓誓。

（採訪整理／杜佳紋）

陳朝威，東吳大學經濟系五十九級，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現任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任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副執行秘書、台鹽公司副總經理、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執行長、中華工程公司董事長、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那個年代，那些人

陸潤康

捻熄案頭燈，任月光入窗，安靜的午夜，微風吹得沁涼。人生像一本相簿，我在月光中重新溫習往事，翻閱著一幅幅人生風景。時光隨頁掀落，我再一次回過頭去看看，盛美的大學生活，回過頭去看看，東吳初復校的那個時段。

回過頭去看看，那個年代，那些人。

當年我進東吳大學，並不是採聯考分發，而是依照自身的意願報考。那個時候，多半的同學都是已經在社會上有工作，再到學校唸書，所以同學們常自稱是「職業學生」，像我自己當時就已經在政府擔任公職了。我當初選擇法律系，完全是依照自己的需要，因為在社會上工作的經驗，讓我知道擁有一些法律基礎是很重要的，有了這樣的學問之後，擔任任何的工作都會更有把握，更容易掌握原則，正確地作出判斷。

我是民國四十一年進入東吳的，因為我已高等考試及格在先，所以學校給我免試的優遇。當時學校的位置是在漢口街與博愛路兩處。博愛路的教室，是因為漢口街的教室不敷使

用才增加的，現在回想起來，真像是一間補習班，一樓是一間「鶴鳴鞋店」，二、三樓才是教室。而漢口街的教室原本是一間商業大樓，由一位學長免費借給學校使用，裡頭的設備相當簡單，那時候，教室與教室之間，僅僅隔著一片木板，談不上任何的隔音效果，兩邊的教室稱得上是聲息相聞。因此，有一次我們班上授課的老師遲到了，同學們便在教室裡聊起天來，愈聊愈大聲，引來隔壁班老師的糾正，但是，也許是因為班上的同學多數都已經在就業了，所以並不像年輕的學生那麼受教，大家還是依然故我，結果那位老師便跑去報告了校長，那時候的校長是施季言先生，一見到校長上來了，我們心想：糟糕了，一定會被好好的訓一頓。結果，施校長一上講台，卻是一種長者勸導晚輩的溫和語氣，他說：「今天老師沒有來，是學校的責任，是學校沒有連絡好。而你們在教室裡講話，影響到隔壁班上課，也是學校的不對，是學校的設備太簡陋……」

而後，施校長便把學校辦學的過程與難處告訴了我們，跟我們聊了一節課，我們都非常地尊敬施校長，他長者的風範與氣度，令我們深深地感動，對於大聲「聊天」，也深感慚愧。

在那個年代裡，其實老師與學生都是在一種不夠齊備的環境中教學及聽課。我還記得那時候班上同學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六、七歲，而老師全部都是兼任老師，並沒有專任老師。因為當時公務員的待遇並不好，所以擔任公職而學有專長的人，紛紛兼任大學老師。那時候，

交通條件也很差，最好的交通工具便是三輪車，所以，兼課太多的老師，常常來不及從上一個學校趕到下一間學校，於是，遲到、早退的情況成了家常便飯。當時，還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情形，就是老師一開始便和學生講明了他一定每堂都會遲到，因為，兩堂課的學校距離實在太遠。

我們班上有一位汪禕成老師，他當時在司法部擔任參事，為人非常幽默風趣，法學淵博，經驗豐富，贏得學生的尊敬。有一次，他匆匆忙忙地趕到之後，便向同學們道歉，他說：「我從上一個學校下課之後，一分鐘都不耽擱，坐了三個輪車趕來，還是會遲到，所以向同學們道歉，不過，既然道了歉，那我就再多道一個歉，因為我待會兒還要早退。」讓大家都笑得闔不攏嘴。汪老師上課雖然並不是很準時，但是他講課非常地精彩，深入淺出，學生無不敬佩。汪老師是江蘇無錫人，講課時家鄉口音十分地重，有一回上課時，班上的張祖光同學，來不及抄筆記，便舉手請老師講慢一點，汪老師便幽默地回答他：「你來不及抄筆記，自己要改進呀，不然將來當了律師，法官在宣判的時候，你總不能請他唸慢一點吧。」

當時師資十分地缺乏，因此兼任教師是非常普遍的情形，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若沒有這麼多的兼任教師，學校根本辦不起來，因為付不起專任教師的薪資，老師也不夠。而那時候，東吳雖然不是正規的大學，而是補習班的名義，不過，畢業學生的素質卻都是很高的，也是拜兼任教師所賜。因為當時都是兼任教師，所以學校能夠請到一些在台大、政大上課的

老師，到東吳來授課，如果是專任制的話，學校根本無法請到這些老師，而這些老師也非常歡迎學校找他們兼課。當時政府也鼓勵學有專長的公職人員到學校兼課，所以那時在外兼課是沒有時數限制的，後來因為大家實在兼課的太多，才設下限制，但是仍沒有禁止，就表示兼任老師的確是有他的存在價值。我想，兼任老師一方面擁有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又擁有在外工作的實際經驗，學驗相長，是相當豐富的教材資源。

談到兼任老師，又令我想起一件趣事。我畢業之後也曾在東吳兼課，當時我都是搭校車到外雙溪校區上課，有一次在車上遇見一位法學界相當有名的先進管歐先生，他也在學校兼課，由於我在行政院工作時，他正擔任法規委員會的主委，因此我們是同事，便聊起天來。他說：「東吳真是個好學校。」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覺得，他回答我：「從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在很多學校都有兼課，每個學校每個月發鐘點費都不相同，有的學校永遠都不準時，總是一再催問之後才發，有的學校根本一學期都沒發過，只有東吳是準時發，而且是在老師進休息室的時候送來，非常難得。」由管歐先生的話裡，我們感受到東吳真是一間講制度、重誠信的學校，東吳能擁有今天這樣的發展，也就是因為歷屆的校長秉持著這樣的原則在辦學。

那時候的老師，有的年長、有的年輕，而年紀大一點的老師，鄉音都是非常重的，所以很多同學上課，其實都聽不懂老師說的話，只好看老師發的講義，但是有些老師上課是沒有

講義的。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一位鮑華國老師，教我們「勞工法」，也是立法委員。在當時台灣還不注重勞工法，所以沒有這方面的教科書，於是，鮑老師便想採用由他講課，同學來抄筆記的方式，然後選同學們作的較好的筆記，加上他自身的補充，編成教材。可是，鮑老師是四川人，所以講課時有的同學也聽不太懂，於是筆記作的並不是很好，鮑老師看過之後，覺得這樣也不是辦法，便向我們提出一個建議：由老師去聘請一位速記，幫我們大家作上課筆記，速記的費用由同學分攤。我們大家聽了都很高興，因為當時同學們都有工作，分攤一位速記的費用並不是多大的負擔，便都欣然同意，也算是趣聞一樁。

也許有人會懷疑，既然有速記幫我們作上課筆記，那同學們不就可以蹺課了嗎？但是，那時候班上卻沒有任何一位同學因此蹺課。我想，一方面是因為那時候同學們都是自己真正爲了求學問而去上課，所以，沒有人會無故不到，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學校的管理制度。那時候東吳雖然不是正式的大學，但是在學生的管理上仍是十分地嚴格，學校從一開始便有點名制度，會有專人來點名，不過，這樣嚴格的制度，對我們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因爲那時候同學們都在工作，下了班之後也沒有什麼應酬或娛樂，所以便理所當然地上課。那時候，我每天下班之後，上課之前，經過學校附近的懷寧街，總會在那人行道上的小吃攤，點一籠蒸餃作爲晚餐，因此，有人笑說，那小吃攤的老闆該發個獎牌給我，因爲我從不蹺課，也就是說我吃了整整四年的蒸餃。

闔上相簿，闔上舊日時光，我靜靜地看月色一寸一寸探進屋裡，在地上泛著銀白色的薄光。人們說，往昔的記憶會在歲月中漸漸暈黃，可是，大學時代的那些往事，都還歷歷在目，於是，我知道在我心中，總有一處地方，恆常保持著鮮艷的色彩。

關於那個年代，那些人。

(採訪整理／吳家宜)

陸潤康，東吳大學法律系四十五級畢業，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學院比較法碩士。

曾任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常務理事。現任大安商業銀行董事長、中華金融業務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

燦如水晶

城仲模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我從東吳大學法學院比較法律學系畢業，七月就通過了教育部的留學考試，迄至服完預官役後，民國五十三年一月才開始八年的留學生涯。我先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拿到法學碩士，然後轉去歐洲維也納大學攻讀行政法學博士，最後才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法學院作博士後研究。當時，除了在威斯康辛的 Carroll College 擔任客座講座外，威斯康辛的圖書館也因著我會五國語言而願意以年薪一千兩百美元來聘請我，可是同年，行政院邀我回國至法規會工作，所以，民國六十年五月，我不顧一切的回到台灣，即使薪水只有國外的十二分之一，我還是回來了，只為著對自己生長地方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同時，我也成了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兼任副教授，睽違九年，又回到同一個地方，而身分卻從一個坐在臺下聽課的法律系學生，轉變成站在臺上授業解惑的法學教師。

其實唸大學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台北有那些學校，也許是眉清目秀的模樣吧，因此那時候有好多人都鼓勵我去唸外交系，希望我將來能成爲一個外交官，可以爲台灣做一些事

情，所以，唯一的一個政大外交系便是填志願時的第一選擇，然後是台大政治系、東吳政治系。可是放榜之後，我和外交系擦肩而過，來到了東吳政治系，記得當年考進來的成績，不僅是政治系的榜首，亦是全校的最高分。

進入政治系後，也許是還未忘情於外交官替國家衝鋒陷陣的理想，於是除了教科書外，每天早上七點左右，就會去當時的台灣省立博物館裡的閱覽室報到，求知欲算是非常旺盛的了。大一歲月，我已經讀完四大冊的《胡適文存》和一整套的《胡適留學日記》。而我也買了一套《胡適留學日記》給自己，每每讀完一頁，就會寫上批注、感想、反省等等，只可惜後來這套書借給了學生，就借到不見了。當初，胡適的這兩部作品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一是讓我感受到西洋近代史的深度和廣度，因而對西洋這三百年來的社會科學、文哲發展，有了一個相當清晰的輪廓——即實際實用，不講風涼話。二是胡適對中國的文學哲學、儒家思想、傳統文化，有著明確的論述和最後評斷，那就是要國人對儒家思想做深切的反省。

胡適的懷疑態度讓我開始反覆的思考為什麼中國會是一個苦難的「民族」？原來，這些災難都是因為中國的華而不實和講大話，如《大學》八條目裡說的「齊家」、「治國」，我發現西方這兩、三百年來一切的努力，都是在研究一個人在齊家與治國之間，該如何紮實的填補下去，所有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社會、心理……等學科，無一不是研究怎麼去培養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在這方面能有紮實的基礎；相反的，

在中國人哲學的眼睛裡，只要能齊家就能治國，如此的阿Q、糊里糊塗的簡單化說法，竟然可以綿延兩千多年而沒有提出懷疑，這一點很讓我匪夷所思。

此外，大一時我也唸了很多中外最好的小說、傳記，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書中主角的身上，所以，當我讀了五十本書以後，就等於是經過了五十個不同的家庭、五十個不同的年代、五十個不同的生活環境。記得那時讀完《刺鳥》裡面的人與自然間的感情發展後，我整個人都昇華起來了；記得闖上《京華煙雲》以前，我在書末寫上了「一定要娶莫愁當太太」……我幾乎是把整個感情都投入到閱讀情緒裡，因此，每每讀完一本書，要將書歸檔的時候，眼淚都快要掉下來了，因為要跟這個家庭說再見，因為又要像孤兒一樣的去別的地方重新學習新的意境、新的人生。我想我這一輩子的學問如果有一點點什麼樣的皮毛的話，都是從這些小說開始的，也許別人認為我是那種很安靜、不愛講話的人，可是我知道，那時候我心中的宇宙比起任何同年齡的人都還要大。

大一下學期，學長的畢業感言讓我決定轉讀法律系，當時政治系的杜光主任不願意我走，還要法律系的呂主任設門檻，不過，我仍然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了轉系考，成了東吳比較法律學系五年制第一期的學生，一直到畢業，我總共修了兩百一十七個學分，平均一學期將近三十多個學分，因為我不怕苦，不怕被當，認為該學的東西就要認真去學，所以，即使修了那麼多的課，我還是以很好的成績畢業。

大二的時候，校園遷回外雙溪，因此也有了一個大操場。從小我就很喜歡運動，很傾心那種一瞬間爆發的感覺，國小五、六年級，我可以是一壘手、游擊手、投手；中學時的四百接力成績還打破了長榮中學維持了七十年的記錄；大學時代則與黃登山、鄭世津等人打過棒球，也參加過足球隊，不過我最喜歡穿上釘鞋沿著河堤邊那段一百公尺做衝刺，雖然當時的場地不是很好，可是，我真的很享受那種在運動場上跑跑跳跳的的痛快。

現在想想，其實讓我一輩子更受用無窮，並且樹立人生規範的則是長榮中學。它是一所基督教長老教會學校，所以作禮拜、唱聖詩是晨昏固定的功課，而每次三十分鐘的晨昏是我最盼望的時刻，因為學校會請一些會計師、律師、工程師、傳教士等各方面的學界人士來講道理或是人生故事，談論的東西不僅是台灣的，更多的是全世界的事，這些內容建立了我們的宏觀和世界觀，也讓我的生命開始真正的進入倫理道德的領域。記得剛留學到日本的時候，雖然主攻法律，可是最先讀完的書卻是《臺灣歷史》和《國民黨史》，因為當時有人問我：「你來自臺灣，台灣的歷史、文化、地理、民俗、風情，你知道多少？」我聽著，竟然發現自己一無所知，這對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人是一件非常羞恥而殘酷的事，所以，在我讀完這兩本書以後，那些與我同年齡的人對自己生長故鄉的過去是怎麼樣？現在是怎麼樣？將來的何去何從？我想會比我清楚的人並不多，而這個刺激更堅定了我為這個生長的地方服務的志業。

民國六十年回台到今天，我在東吳法律系教書將近三十年了，也許是社會變遷的緣故，每個階段所遇到的學生都不太一樣。六十年代的學生有自己的聰明才智，而且非常的遵守規矩和聽話，是傳統標準中的好學生，勉勵他們的話，每一句都聽進去，所以那時候輔導學生考上法官的，現在都出人頭地了。七十年代的學生，感覺已經在變化，會蹺課，偶爾聽課的秩序也不太好，不過情形不算嚴重。八十年代的學生，讀書的樣子真的變了，或許是和社會的繁榮有關，他們剛好成長在舊倫理式微、新倫理尚未建立的時代，常常是上課時苦口婆心的跟他們說，只是學生好像還不能體會到你的用心。即使如此，我仍然覺得愛護學生是我的天職，當初回國的願望，就是想將自己的熱情、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擴大成十個、一百個、一千個城仲模，因此，我會一直不遺餘力的拔擢那些聰明、能幹、誠實並且有鄉土感情的學生。

我深深以為學法律的人，與其教他們條文與條文之間的關係，還不如教他們怎麼去了解人世間的現象，因為當一個法官，了解適用法律簡單，但在適用法律之前的事實真相是如何，這才困難，我認為清楚明白事實的真相遠比條文的使用來的重要。教書那麼多年了，我一直堅持著對任何學生和晚輩都是不能捨棄的，只有更多的愛心和用心才能使他們更好。就像以前遇過一個規矩不太好的學生，當時爲了公平而給他不及格的分數，可是當他成了國大代表後卻跑來告訴我，說他很感激，說如果當初沒有給他這個警告，他根本就不知道錯在哪

裡。

所以，我經常會深入到不可爲而爲之的境界，並且去試驗，因爲我希望除了扮演一個可以帶領學弟妹的好學長以外，也期許自己的內心和處世態度可以有著像水晶一樣明亮、剔透，閃著璀璨光芒的特質。

（採訪整理／高岱君）

城仲模，東吳大學比較法律學系五十一級畢業，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碩士，東京大學研究，維也納大學行政法學博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美國威斯康辛州 Carroll College 客座講座，曾任中興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法研所所長、維也納大學客座教授、台灣省政府省府委員、考試院考試委員、司法院大法官、法務部部長；一九九七年膺選爲東吳大學特別設置之「嚴家淦先生法學講座」教授。現任司法院副院長。

留聲

邱稚亘

頭髮又長了。

不聽話的髮絲墜落在耳邊，無法忽略，難以梳理，像記憶的扒手，一撥一撥，彷彿想探聽什麼。

前陣子把及腰的長髮一口氣剪掉，只是覺得時候到了，也沒告訴什麼人。之後，我每每遊走在朋友間的驚嘆、評價和重複的解釋、自嘲裡，不免有些疲倦。

原來，我是這樣被記憶的。

曾幾何時，時光的大手已把我拆散成一片片零碎而發亮的拼圖，鑲嵌在諸多他人的印象、經歷、悲傷和問候裡，生活都定型了。如今，在離開學校的前夕，我卻必須將它們再度拆散、重組，融塑成我最初的雛形，恍若新生。

我還記得，八十三年夏天，台北炎熱的陽光和那個短髮笨拙的男孩子。

那年夏天，整個台北像是溶化的巧克力城市，走在人行道上，整身的黏膩和廢氣，像要

把人焊黏成這城市的一部分似的。而我從更炎熱的地方來，更爲乾燥、多風，只是沒有擁擠的車流和大廈。

也許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在想念台東，或者更久。新鮮人的興奮、好奇並沒有持續太久，生活裡花費最多時間的地方還是宿舍，我總是一個人宿舍裡研讀著煩瑣而艱深的功課，看自己的書，或者和學長們在樓梯間聊天，一同吃宵夜、唱歌，討一點人情的溫暖。雖然也參加了迎新舞會、宿營、夜遊之類的應景活動，然而和樂在其中的友人們比起來，我的狀況更像是分裂的雙生子，我恆常覺得有一個習於扮演觀察者的自己，像在看微縮軟片似的看著另一個歸檔在一組組場景，畫面裡的當下。嶄新的情緒太多，我無法一一消化，只好先行定格、縮影，以爲日後可以反芻些什麼來。

那年冬天，我寫下生平第一篇散文〈半城〉，也參加了雙溪文學獎。內容是敘述台北台東兩個城市之間的對照和故事，那時覺得沒有任何一個現實中的城市是完整的，我們在這個城市裡想念另一個城市，用多餘也無害的想像去充填未知的時間與空間，他方的象徵與懷想。如同容格所說的：「人們生活的最終目的在找尋更爲適宜的潛意識象徵、集體的原型」。我在這個城市裡汲汲尋訪著，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象徵在等著我，隱身在擾攘模糊的人群裡，像隧道盡頭微弱閃爍的光，像在鄉愁的藏寶圖裡清楚地數算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我將自己一點一滴地掏空，挪出位子，以爲即將找到的寶藏會像以往讀過的文章裡說的，大的

裝不下。

而更多的時候我是獨處的，在時間的鏡子面前，沈默地發問，淺淡的悲傷。

頭髮就這麼一點一點地留起來了，像一只倔強的印記。我天真的認為，若我在台北剪超過一百五十元的頭髮，喝著言不及義的下午茶，那麼，我就要被同化成一個十足的台北人了，而那正是我一直害怕、焦慮的一件事情。也因為完全沒有使用髮膠的習慣，從成功嶺下來的平頭短髮等距離地增長，像刺蝟一樣暴長著，常常睡塌了一邊也不在乎。後來，即使偶爾回家也驚扭得不想剪了。望著鏡中的自己，五官依稀，也辨認不出好看與否，只是賭咒似想著，再長一點就好了，再長一點就好了。我在南來北往的路程裡，彷彿也期待著某些連自己也無法察覺的改變願望。

結果，我在自己的鄉愁尋寶圖上並沒有找到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和家人的關係反而變好了。父母在我的頭髮這件事上表現出異於以往的巨大忍耐和包容心，如今想起來，他們約莫是抱著反正我不會變壞之類的簡單信心，來揣度著不常連絡的我的生活，和抵禦來自爺爺奶奶、街坊鄰居的好奇打探吧。到最後，我和家裡原本僵硬的關係就靠著這層看似單純實則曲折迂迴的緣由，緩緩的靠近、釋懷。

等到我的頭髮終於長到有人稱讚的時候，台東已經有了兩家麥當勞，和實際數量不明，但每次回家總又聽說那家倒了，又新開張幾家咖啡店。而我們這些平常潔癖要死的所謂大專

青年們，在寒暑假回家時倒也很捧場的會去坐坐，原本非到不得已不去的下午茶，敷衍交通，轉換了時空卻變成溫馴而固執的習慣。我們又開始在另一個場域旁觀舊時的自己，拼湊各自的生活、情感的摸索、成長的無奈與釋然，和對其他學校的印象。漸漸地，台北在我心中沈澱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形象，也包括東吳。這裡有同故鄉一般飛舞的白鷺鷥，和朋友嘴裡女孩又多又漂亮的地方。是的，又多又漂亮，我們一同坐在布爾喬亞著一點粗魯氣息的咖啡店裡，臆想著勃發而又壓抑的青春——那是鄉下小城唯一的一所女中，座落在城市邊陲布滿修車廠的一條陰暗道路上。記憶裡大多是和職校女孩的聯誼，受寵若驚，害羞而過動的共同經驗。而那些號稱最有教養、可望而不可及的白衣黑裙們，則隨著我們長大，和日後聽來的諸多關於女中老師們如何教導學生溫柔而堅定地拒絕我們的邀請、校慶日期刻意錯開又欲蓋彌彰地締結姊妹校之類的小道消息，一同稀釋在腳踏車牽起的風裡，並緩慢的發酵成某種神祕、熱情又刻意漫不經心的惆悵，被當年，即將成為新鮮人的男孩們繼承。

我們反覆翻轉把玩著對母校定義的嘗試，卻霍然發現自己也已經到了大學畢業的邊緣。伴隨著對異性距離的削減，道途的相遇，社團的攜手，人際關係像一顆持續滾動的毛線球，將我包覆其中，既是面對風雨顛簸的防護層，也是定位、形塑的枷鎖。曾經，人際網絡背後的面具，耳語是大学生涯裡最不願提起的一部分，無怨的付出、無言的誤會，種下了日後怨對的種子。而如今一路走來，經歷過更大的落差，才好似明瞭了當初的無奈和釋然。

我們反覆嘗試著，析解其中雄辯或追悔的因子，用回憶包圍，逼近現下，過去與未來，現實與未知都在其中找到了暫時的位置。像時光主持的大風吹，一段永無止盡的 call in 節目，我們接聽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臉孔，才恍然發覺，原來一直以爲的主持人才是最忠實的聽衆，母校的變換，在不知不覺中繼承融塑了我們對場域、空間、情感的觀想和模型。

有很長一陣子，我的長髮一直是初見面朋友的話題，走在路上也常被錯認，我經歷著一種錯位、換拍式的快感、和新的經歷一同進駐我的生活，成爲老人、參加補習，更急切的思考未來的方向。而這一切又在反覆的練習裡變成一種習慣、一個標籤，直到我把長髮剪去，我才能重新檢視身邊的種種，看清記憶的企圖和把戲，像一個耽溺又決絕的儀式，面對自己和母校的糾葛、未來的挑戰，彷彿又多了點心得。

頭髮又亂了。

愈來愈長的髮絲垂落我的前額，一撥一撥，像思緒的漲潮，我回首看見瓶罐羅列在桌前的慕絲、髮膠，決定不去理它，讓頭髮隨風飛舞，在這個即將踏出校門的，炎熱的夏季。

邱稚亘，東吳大學物理系八十七級畢業。作品曾獲雙溪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台北市公車詩文獎。入選八十四年度聯合報新人展、八十七年度詩選。已出版詩

合集《畢業紀念冊——植物園六人詩選》

用生命寫笑話——我在東吳的那段日子

管仁健

有人用文字寫笑話，有人用漫畫寫笑話；而我，卻只能用生命寫笑話。

二十八歲那年，我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做了一個最難忘的急轉彎。

當各校插班考試陸續放榜後，我辭了工作來東吳讀書，不但讀的是日間部，而且還是冷得不能再冷的中文系。在辦辭職手續時，有位姑娘還一面蓋章一面說道：「小管，人家都說你快瘋了，只有我一人獨排眾議；因為我看你不快是快瘋了，你現在已經瘋了。」

的確，也難怪別人會覺得我已經瘋了，因為從投資報酬率來看，中文實在不值得一個即將「而立（兒子都該會站立）」的人來讀。雖說每年的大學聯考，總要將考生分為自然與社會兩組。不幸名落孫山的是自然淘汰組，簡稱「自然組」；金榜題名的則晉昇為社會敗類組，簡稱「社會組」。

但是在這群敗類裡，流行的科系仍然年年不同。最先是外文，再來是商，如今是法律，就像女生流行的裙子，一會兒長，一會兒又短，年年都不同。唯一的例外則是中文系，咳！

中文就像女生裙裡的內褲，無論裙長裙短，永遠見不得人。

相傳大學裡的學生，學理工的看不起文法的，法商學院又看不起文學院，文學院裡外文的又看不起中文，中文系裡女生又看不起男生，中文系的男生最可憐，沒人可讓他們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上的教授。不過，說這種話的人未免太刻薄，難道歷史系和哲學系裡沒教授嗎？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以前「斯文」還可代替掃把來掃地，如今淪爲禿了頭的掃把，只剩光桿一根，孤伶伶的立在校園角落，野狗不來撒尿就偷笑了，又怎能與其他科系相提並論呢？

其實中文系這科系會日薄西山，說穿了原因也很簡單，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窮。窮了後酸，酸了後迂，迂了後腐，腐了後怪。一旦窮、酸、迂、腐、怪五毒齊發，中文人也就翻身無望了。《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節便說：「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看來這天國好像是專爲我們中文系而設的。所以學校當局在安排教室時就頗有深意，乾脆把中文系單獨擺在愛徒樓之上，讓我們這群中文學子，每天沐浴在教授的「之乎也者」之餘，順便聆聽一下「天國近了」的福音，日後自然更能不戚戚於貧賤了。

或許有人要問，難道中文系真的如此一無是處嗎？我看也不盡然。據我小管看來，中文系就有三大別系沒有的特點。

首先，中文系買書可以便宜點。以前國片裡的大學生，男女主角手上都拿本原文書，這

種蟹形文字好看是好看，但價錢就可像九天玄女一般——高不可及，尤其著作權法修正後更是嚇人。況且科技進展日新月异，其他科系的學生，課本只怕還等不到畢業，就已先成了骨董。而中文系學生不但怕課本折舊，還有些志不在此的學長姐「遺愛後人」，讓學弟妹們能在舊書店裡買到中古課本，充分達到「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效果。

其次，文學這東西還真好玩，進可當學術唬人，退可做消遣欺己。如果耐得住寂寞，寫論文就像盜墓人一樣，起「死人骨頭」由這邊搬到那邊，由別人冷冰冰的墓碑裡，搬進自己熱烘烘的口袋，這種生意也挺合算的。話說回來，如果耐不住寂寞，那就來從事創作，反正天下文章一大抄，抄一本叫抄襲、抄兩本叫習作、抄三本叫論文、抄四本就可以算創作。如今暢銷作家的成名史，不就是最先抄別人，名氣稍大一點時再抄自己，大到連自己的書都懶得抄時，就會有出版社找編輯來代抄，名利雙收是指日可待的。

最後，雖然前人的經驗是「天涯何處無芳草、老婆何必班上找」。但不管怎麼說，近水樓台先得月，日久自然會生情。而中文系別的好處沒有，就「陰盛陽衰」這點絕不騙人。尤其這年頭女孩子大多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有錢沒有」，而中文系女生看多了才子佳人的小說，應不會如此現實才對。何況話說回來又有什麼科系能保證人人畢業後都飛黃騰達，像我班上以前就有許多「班對」。即使讀中文要窮一輩子，牛衣對泣也比暗自飲泣要好些吧！

所以，在這聲光媒體發達，文字魅力逐漸流失的年代裡，中文人的未來，雖然就像玻璃瓶裡的蒼蠅——前途一片光明，卻又舉翅難飛。但我卻相信，金錢並非萬能，尤其在不夠用時，更是萬萬不能；至於夠與不夠，就全看個人了。真的，讀中文雖不能成爲人中龍鳳，但只要精神有寄託，即使只是人中的龍眼鳳梨，又有什麼關係呢？

不過別看我現在說來灑脫，當時自己在東吳時，也不見得看得多開。因爲從小就不讀書，加上失學多年，就像賽跑時落後別人一圈多，即使勉強跟上，也還輸人一圈。所以我也常興起「歸去來兮？」的念頭。直到有天在筆記小說中讀到一則小故事，才開始了我真正的大學生活。

故事是說有個老翁膝下無子，直到六十九歲那年老婆才爲他生下了一子，他有感於自己年紀已大，就爲兒子取名爲「年紀」。

第二年老婆又爲他生了個方頭大耳、相貌堂堂的兒子，老翁心想這小孩日後必能讀書上進，就取名叫「學問」。

第三年他老婆又生了個男孩，老翁怕他年逾古稀連生三子的事，傳出後一定會成爲別人眼中的笑話，就把新生兒取名叫「笑話」。

十年後有天老翁心血來潮，就叫三個兒子分頭上山打柴；黃昏時分，三個兒子都回家了。老翁問他老婆，三個兒子打柴的收穫如何？老婆竟對著他說：「『年紀』有一大把了，

『學問』一點也沒有，『笑話』倒有一籬筐。」

看到這我不免驚嘆：「這不就是在說我嗎？」這世上有人用文字寫笑話，有人用漫畫寫笑話；而我這把年紀還來求學問，不就是「用生命寫笑話」嗎？

混在一大群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同學裡，對我這早已不識少年愁滋味的老男人來說「一目十行」，但偏偏又「過目即忘」。每次看到別人腦袋像影印機一樣，自己忍不住想回家吃豬腦，看看「以形補形」這招管不管用。

不過顯然豬吃多了只會更像豬而已，吃到不只腦滿，還要外帶腸肥時，人也就更加懶了起來。能躺就不坐，能坐就不站，能站就不走，能走就不跑。

可是東吳的規定也真奇怪，體育還一定要必修。選課時我考慮了好久仍無決定。同學黃偉倫看我一副猶豫的樣子，就告訴我所有運動中最不必流汗的即是太極拳，聽得我心動萬分，馬上就跟著他一起選了太極拳。

但課一開始上後，我就發現當也一起上了。別班打籃球的、踢足球的、現壘球的都是想動時嘻嘻哈哈，不想動時在一旁休息，多輕鬆自在。

反觀我們不論烈日狂風，都要乖乖站在場中，先聽老先生一番訓誡，接著再一個大西瓜，切成一半，一半給你，一半給我的推來揉去。而站在左右前後、整齊對正的一坑蘿蔔裡，想溜更是不可能的。

每次上體育課時，只要一想到「誤上賊船」，就像皮球掉進糞坑裡，說你渾蛋還一肚子氣。但一旁的始作俑者黃偉倫，上課時推來揉去的似乎還蠻高興的。看了許久，他仍不改其「樂」。

我只好向他請教，他告訴我：「你越看旁邊的人上課當然就越生氣，像我就學陶淵明在〈歸去來辭〉中所說：『時矯首而暇觀，雲無心以出岫。』只要抬頭看天上的雲飄來飄去，手也跟著推來推去，當然心情就好多了。」

依他說的去做之後，果然改變甚多。雖不能坐看雲起時，但上課時站著看雲起，也讓我感觸不少。回想自己前半生，還真是乏善可陳。小學畢業時最後一名的同學，都還有張儲蓄比賽第一名的獎狀，唯有我是全部損龜。

如今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反正功課一定不如人，但看到這不知處的雲深，也讓我興起效陶淵明寫幾首〈停雲詩〉的壯志，搞不好因此就成了詩壇新「瑞」（詩壇最新的人瑞）也不一定。

大作一旦完成，當然是迫不及待地期望所有的人都能目共「吐」。不過當我拿給一位姑娘欣賞後，她卻面有難色的交給另一位姐妹淘。拜讀的時間雖有不同，但表情卻像連體嬰般類似，我只好先開口說道：

「你讀過南未蔣竹山那首〈虞美人〉的詞嗎？」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也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在心頭。」

「沒錯，就是這首。所謂三十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如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十年後，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

「夠了，夠了，你到底要說什麼嗎？」

「你看我的詩就是這種心情，最先感覺是喜劇，仔細一看，又有些悲劇的意味。但等你到我這種年紀，就會明瞭這種悲喜交織的悲喜劇。」

那姑娘卻不太服氣地說道：「可是爲什麼我不管怎麼看，都只像鬧劇而已？」

這時原本那不堪先「吐」爲快的姑娘，也開口說了：「小管，拜託你還是去改寫默劇吧！」

由此看來，唸大學不但不能讓我得到學問，連當個詩人的希望都沒有。以前一個同學會告訴我，說她最愛看她老公寫字的樣子了。我問她老公是寫詩、寫散文還是小說時，她說都不是，她老公只簽支票。

所以，我寫的詩在別人眼中，雖然只是張空頭支票；而三年的東吳生涯，大概在別人眼中，也只是我在「用生命寫笑話」而已；但如果我的不幸都能成爲別人的安慰，如此又何嘗不是件好事呢？

管仁健，東吳大學中文系八十三級畢業。曾任絲路出版社主編，現任文經社文學類叢書主編。曾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審推薦獎。著有小說《塵年惆事》、雜文《用生命寫笑話》等。

微生物的蹤跡

吳慧琳

微生物系？是要唸些什麼呢？望著東吳微生物系的招生海報，我的心裡不禁有些納悶。不過，既然有生物兩個字，想必會很「好玩」，從小就對動、植物充滿了興趣的我，就這樣地把微生物系填在我的志願卡中。沒想到一放榜，發現自己竟真的成了這個全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微生物系的第一屆學生，而且，從進了系上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現在，唸的書、做的工作都和微生物有關，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緣份吧！

東吳大學的生物系在大陸時期是相當有名的，在台復校後，前端木校長一直想要恢復這個傳統。因此，微生物系是在校方努力向教育部爭取下才得以成立的。對這個全校唯一的生物相關科系，校方充滿了期望，也全力地支持。由於是第一屆，我們這一班真的可以用「前無古人」來形容，沒有學長、姊，沒有考題，也沒有所謂「系」上的傳統，一切都等著我們這些連大學生活會像什麼都還不太清楚的新鮮人來開創！那一年，鍾金湯主任、曾惠中老師、宋宏紅老師加上十九個男生、十個女生，就是整個微生物系。我們一群師生從打掃、搬

桌椅開始，一點一滴地營造出屬於我們「微生物人的家」。我們不但要傳承大陸時期生物系的光采，更要創造出屬於微生物系的特色！

並不是有太多人能有這樣的機緣成爲一個系的第一屆學生，我何其有幸，參與了微生物系從無到有的過程。這四年的經歷，有些是東吳人共有的，有些是「微生物人」共有的，還有一些是只屬於我們第一屆學生的！第一年，學校所有的系際活動都必須由我們班（全系唯一的一班）來包辦。由於人數太少，任何活動幾乎都得全班動員，像女子籃球賽，十個女生都要輪流上場，連我這個運動神經極不發達的人也不能例外，我想，如果我不是第一屆學生，以我的身手，是不可能當上「系隊」的。更出乎意料的，我們這支「雜牌軍」竟能得到亞軍！系際盃合唱比賽也是全班出勤，請來了音樂系的學姊教我們，不管嗓音的好壞，每個人都盡力地唱好自己的部分，在樂音中，大家的情感緊緊地融合在一起，我們不但唱出了亞軍的榮譽，也唱出了微生物系的知名度！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當年那種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系上所不可缺少的螺絲釘的那種使命感！

第一年的生物課及實驗課程也有很多是屬於我們第一屆學生特有的經驗。生物課本是我們第一本的原本書，望著那又厚又重、充滿了密密麻麻「蝌蚪文」的課本，又沒有學長、姊可以面授機宜或提供考古題，真有不知從何唸起的疑慮。同班同學成了唯一可以相互依賴的對象。於是，說好了，每個人負責一部分，查遍每一個生字、整理重點，然後再互相討論、

交換資料，就這樣，一本厚厚的原文書幾乎重要的章節都唸過了，也練就了日後唸原文書和英文著作的功力。同學間，雖然也有課業成績的君子之爭，但更多的是相互合作的情感與默契。

實驗課也是充滿了「創造」與探索的樂趣，由於是校內第一次有生物相關的實驗課程，許多設備、器材在當年尚不完備，必須靠大家用「自力救濟」的方式來準備。當時，只要看到有人蹲在雨後的校園翻遍每一吋泥土找尋肥碩蚯蚓的踪跡，或是彎著腰站在校園的小溪中費盡眼力尋找藏身於溪石下的水螅，不用說，那一定就是我們微生物系的學生。我們也遠征校外，拜訪紅樹林，觀察水筆仔；或是到近郊的山上捕捉實驗要用的大蝗蟲，那天，滿山開滿了白色的芒花，而我們要觀察的大蝗蟲就在草叢中飛躍著，好美！這幅景象，至今都還很鮮明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系刊、系服的創立與設計也是我們第一屆學生必須負起的責任。在大家的腦力激盪及具有美工天份的同學的巧思下，第一次屬於微生物人的系服終於誕生，它以我們微生物人最常用的工具——顯微鏡加上微生物（microbiology）的英文縮寫 M.B. 做圖案，讓大家一看就知道它代表微生物系，班上有許多同學喜歡穿著這件系服，因為，我們以身為微生物系的一分子為榮，而有活動時穿著它，更能顯現出我們大家是一體的！系刊的編輯對我們更是一大挑戰，從文字編輯、美工設計、廣告招攬到付梓印刷，每一項對我們都是全新的經驗，幸好每

個人都願意盡自己的心力，貢獻自己的專長；有的人畫，有的人寫，有人充當記者訪問師長，有人則權充業務張羅經費，就這樣，屬於微生物人的第一本刊物出爐了，看到它，班上每個人都有一份驕傲，因為它是大家心血的結晶！而我個人也從參與的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我和班上其他同學一起參加學校舉辦的編研營，學習怎樣辦一份刊物，從中學到的理論再由實際參與系刊的編輯得到印證。在與師長的訪談中，師長們對教育、科學研究的那種熱誠與使命感讓我深深地感動，而胡承波老師更是讓我印象深刻，她讓我看到女性也可以成爲一個傑出的科學家，我想，這些經驗是使我日後會走向研究這條路的原因之一。

我們也想想把我們所學的一些知識應用在校園生活中。在會惠中老師的指導下，我們用很「克難」的方式爲校園中主要的植物做「名牌」，在一塊塊的白木板上，我們一筆一畫地寫下這些植物的名稱及簡要的特性，然後，在校園中搜尋它們的踪跡，豎起「名牌」，讓大家可以認識這些植物，雖然，我們的字可能寫得不夠好看，可是能在校園的許多角落看到自己的字跡以及能爲校園做點事的那種感覺還是讓我們不免有些得意！我們也試著在園遊會時販賣自製的酒釀及「養樂多」，只可惜那時「功力」不夠，沒能釀出香醇的酒釀及可口的醱酵乳，而是養出了一鍋黴菌及一桶醋酸菌，讓我們當時想靠微生物賺錢的美夢就此破裂！

身爲微生物系第一屆學生，我們就像一株株剛萌芽的幼苗，怯生生的探出頭來想要看看這個奇妙的世界。而我們之所以能夠成長、茁壯，靠的就是老師們辛勤的灌溉與照顧。系上

每個老師對我們的關愛真的是沒話說，他們細心地為我們規畫每個課程，安排、爭取每一個可能讓我們成長的機會。因此，除了將他們所學悉數傳授給我們之外，也讓我們有機會聆聽微生物學界各個領域傑出人員的授課和演講、參觀各種相關研究單位、甚至能到中研院及其他研究單位從事學士論文的研究，總之，就是希望能盡其所能讓我們在四年大學生涯中得到最好的訓練。而在我其後追求深造的過程中，的確深深感受到當年在東吳所紮下的基礎對我實有莫大的助益。我們第一屆的老師有一特色，就是外校的老師特別多（尤其是陽明醫學院的老師），這是因為系剛成立，還沒聘齊專任老師的緣故。由是之故，當年的我們不必千里迢迢的跑到校外去上課，就有幸能受教於這些外校的好老師！

在東吳微生物系的四年，不但為我開啓了進入微生物研究的大門，也給了我許多美好的回憶。而成爲第一屆學生的機緣，更是我人生中難得的經驗，最後，謹以當年我們改編自一首廣告歌曲的「班歌」（也是系歌）與大家共勉。「到處都看得到，雖然是個小東西，使你稱心如意，美滿的生活少不了它——微生物！」希望我們微生物系能日益茁壯，到處都能看到我們「微生物人」的踪跡，而且，就像有益的微生物一樣，能讓這個世界一天比一天美好！

吳慧琳，微生物系七十三年畢業，現任台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我們的故事

黃昇璣

我每在夏夜仰頭，相信英雄武仙就在那片天空中，單腳跪地，捧著剛採摘的鮮花凝望織女，然後天神響起樂音，他們即共同閃耀著相屬的燦爛星輝。

一直在那兒，不論看不看得見，我就是知道，他們一直在那兒。

我們的日子、我們的故事也如此，它僅是被傳說中的吹笛手帶了上山而已，任何時刻，只要願意，總會不期然出現於微笑的懷想裡。

天下人老想在浮華世界裡搶一點不值錢、但必須要有的餘溫，卻忘了自己善於製造冰冷。真情是他們路旁會略過的小草，因為重要的物欲指標就在前方，不容分心、不容軟弱，要超越巔峰俯瞰天下，便不可耽溺風景、回首過去，必要時，踩踐花草更是挑抄捷徑的最霹靂手段……

無論如何巧取豪奪，這些名利主義的善男信女，寧願夜深人靜時撫慰極內裡的脆弱，死也不肯在陽光下貯備夠暖夠多的精神能量。

何其堅強，何其壯大。

但，意氣風發的成功者啊，縱使拿到倚天劍屠龍刀又怎樣呢？你敢讓人看你的背後嗎？你有值得欣慰驕傲的感情支持嗎？你有把握即便失去一切，仍能謹守溫情覺得此生已然足夠嗎？

你有沒有經歷過無數飄搖可怕的時間空間存留下來，像地球綠色資源一樣珍貴的東西？那不是辛辣的競逐啊，是甜蜜的眞性情，而能觸動這性情之弦的，通常來自你的往事呵。

往事，不一定只在茶餘飯後才拿來回憶，往事也沒有好壞程度的差別，只要它對曾經的你有所啓發，對日後的你有所影響，就是你的寶藏。

屬於自己，及那群與我站在同一陣線支撐我的「我們」的寶藏。

魏斯特曾說，使我變得不錯的，並不是教訓或者祈禱，而是一兩個人硬是相信我不錯，而我又很不願意讓他們失望……

是的，這就是——我的「我們」。

認識「我們」十年了，我們相逢在腥風血雨的天安門事件那年，在繁亂熱鬧的中華商場拆除那年，兩岸間言語激刺示威，政黨間攻防烽火燎原，社會彌漫著高漲的不確定感，人人都想往安全的地方逃。

風氣是會薰冶感染的，一如當時恐懼之傳遞，暴力之流行，而我們在那年代，卻選擇

「喜樂關心」相濡以沫，五十多人攏在一個中文系班級裡，糖般黏密著，安全又熟悉，深刻而自然，三生三世的姊妹兄弟似的。

落英繽紛的山裡看見人群，我會想起我們，在廣闊無邊的海域裡泅泳，更不會忘記在我們的水澤中汲取過那麼多養分，方成就今日的本事。我是不得不驕傲的，試問大學之中，有那個班級畢業旅行能辦兩次，且次次五十人？那個班級會在選舉中，次次都全班出動？對遊玩盡力，對課業勤勉，甚至班務系務校務，我們都義不容辭地團結投入，做什麼都認真，深怕虛度了某一分鐘，沒充分把握課本裡看不到的學習經驗。是以師長誇、同儕羨，共學情誼若此這般的，人間得有幾回？快樂悲傷一起嘗，離合成長自難忘。

自是難忘啊。

爲了將來更易記起，也爲了當下不滅的感覺，大四那年，全班開會無異議通過將大一以來的十四期班刊集結出書，名曰《這班，這般！》交由黎明出版社發行上市，並舉辦爲期一周的畢業展——「我們的故事」，以紀念這段永不後悔的生活記錄。

看著每個人繁忙之下仍都認領了自己擅長的組別開始工作，那夜以繼日、胼手胝足的模樣，我說真的，你會感動，不會相信我們是大學生，因爲大學生不會如此團結做一件賺不到錢也賺不到學分的麻煩事。

我們贏得的是感情及經驗。也許是這樣的事四年來做多了，大家默契十足，兵分六組地

兩個月內完成籌備及收集，生活畢業展如期在畢業前夕風光揭幕，引發全校師生不可置信的眼光……

我永遠記得，我們的校長章孝慈先生致辭時百感交集，當場買了二十二本《這班，這般！》一系一本，說要讓同學知道，大學生活，也可以這樣有意義地過……

很多人哭了，因為高興的細胞在體內與感動分子相撞擊，激動的思緒也和良多感慨熱烈地忘情擁抱，確信，這一輩子是忘不了了……

造就○五教室那七天的門庭若市，是之前兩個月的焚膏繼晷、人馬雜沓，更是四年蓄積而成的預謀不願磨滅的情感。留言板上直的橫的滿滿話語，盡是艷羨，師長看得不禁緬懷過去，同學朋友們看得一定問自己班何以不能，我想，這就是我們的不同於常吧。故事人人皆有，但多少人能珍惜當下，能無怨無悔，能在往後毫不遲疑地說出「我們的故事」？

榮譽感油然而發，那種日後人家問起「啊？那一班就是你們啊？」會產生的煥發光彩不是人人擁有的，還維護家人般，不管這「親生同學」是優秀絕倫、離經叛道或驚鈍癡傻，都可以睥睨且理直氣壯回應：「怎樣？他就是我兄弟，你怎樣？」

反正有同學若此即是一件驕傲的事，一種鮮明的親人聚合力。

落鷹峽沒有我們就不是落鷹峽，南仁湖少了我們就不是我們的南仁湖；龍坑上的山芙蓉與林投對話著這群淨野的青年，墾丁的海水和星辰們思念這些浸淫凝視的靈魂。因為投入，

所以驕傲。

我們堅信，幸福在自家鍋裡成長會甘美味濃，凡值得的必經細膩熬煮，水份和烹調技術關乎營養的存取，唯有善用方不浪費每項珍異材料，不枉這人世寰宇一聚。一切彷彿經過讚美與設計，我們發揮特質，造就絕美色香味的驚人成果，滿溢成長的自信，滿溢幸福。

是那樣地呵護珍惜，像把寶物捧在手裡。

只因四、五十人硬是相信，我們不錯，我們可以……

那時，只有感動；而今，我卻懂得。懂得在陽光充沛中與夜夜挑燈裡，感覺我們、繼續我們，這種心情總是不想太快咀嚼完畢。

多年來，儘管市長換了、總統變了；儘管我們也難逃現實的離距，年代的轉換，頻繁往來的卻仍有二十多人，我想，那怕只剩一個人存在，我們還是我們；太陽爆炸地球毀滅，我們也依舊是我們，時空對我們狡詐的企圖，恐怕無法得逞，徒使濃郁更加、親密更加。

因為年少的習慣，以致現今生活依附著慣性定律般，仍然缺少不了「我們」。悲歡與共，事事一起經歷，結婚、逃婚，進修、遊樂，會哭倒在彼此胸口，也會笑倒在街上森林裡每個可能的角落。

「笑傲挫折、互相扶持」，一直是我們自然而然散發出來的對待，沒有過勉強，不需要假裝，它是那麼地深深著印，成為習慣。

難能啊，十萬裡擷出的緣份，我們以「珍惜」迎接命運安排的恩典；可貴，四年中累積的情誼，我們以「延續」來展現稀有的吉光片羽，感佩我們這樣美麗，天地這樣值得存在。

造物者本意讓人人公平擁有生命每個階段，是什麼原因，有人無法安然走到最後？有人長懷重重心事，有人來世虛幌，盡情揮霍，浪擲貴重而有限的青春。「我們」，則在人生最需要燃爆火花的時刻，摒棄蹣跚獨行，選擇連手點亮屬於年輕的燦爛，將這四年生命意外的春天，永遠記憶。

張曼娟老師在《這班，這般！》書中曾序言道：「他們擁有得那麼多，那麼好，他們給予的那麼慷慨。「我們」的故事是以太多，太精采……」是的，我們從不吝於付出心力付出愛，當我們感覺到愛時，早已經在愛裡面了；我想加入我們，不知不覺卻已含在我們之中很久很久了……

親愛的我們，我們持續行進，不論你是碩士博士，是販夫還是走卒；不論你在近處或者遠方，世局如何變動轉換，期盼我們都開懷認真努力著，一如那個年代，可愛又可敬的我們。

我相信，思念是沒有額度的，使用頻率愈高的人，應該發配更大的權利。對我來說，往事能這樣令人在意著，真的是一種福氣。而思念是心底一直存在的某個愛的角落，你只是偶爾沒想起，但它永遠在那位置。

「不要輕視對往事的回憶，更不要吝嗇付出真情、營造溫暖，將來才會和我一樣，在述說「我們的故事」時，陽光是迤邐照拂的……」

黃昇瓚，東吳大學中文系八十二級畢。曾任系學會會長，曾獲雙溪現代文學獎、人人獎、高天福獎等；畢業後任職私立高中、雜誌社、出版社等。八十五年獲第四屆九歌現代兒童文學獎。著有《這班，這般！》（合集）、《永遠小孩》、《光明小天使——王芃的故事》、《我的好鄰居》、《千言萬語》（合集）等。

隨機工作，彈性生活

魏永篤

我進入勤業嚴格說起來是和東吳大學淵源很深的，因為大二中級會計學的老師正是勤業的創辦人——宋作楠先生，他那時也是會計系的系主任。

記得剛進東吳時，宋先生便給了我們一席精神訓話，他說考進東吳會計系恰好和台大會計系差了一百多分，但是在未來四年內我們要努力迎頭趕上。或許是基於這種嚴格的治學理念，我們會計系大小考特別多，包括「初級會計」、「中級會計」、「成本會計」以至「管理會計」皆是如此。尤其是大二的「中級會計」課，課程十分艱澀難懂，當時每星期的正課是三小時，實習課為二小時，而星期一的實習課便固定排小考，因此對於唸會計系的我們而言，幾乎沒有所謂的禮拜六、禮拜天的玩樂時間。

系裡面除了宋作楠老師要求甚嚴外，另一位陳振銑老師對我亦是影響甚多。他是一位非常具有紳士風範的學者，學生們都很喜歡他，尤其他教學方式十分先進，喜用案例的討論模式，在「成本會計」以及「管理會計」方面，我從那裡得到許多新式與良好觀念。而我認為

他最大的貢獻有兩個，一是將會計提升至管理的概念，讓企業在管理時，能以其提供的資訊來作最好的決策。而在當時民國五、六十年代之際，陳振銑老師可說是最早宣導這種理念的人，那時其他學校皆尚未有如此新的觀念。所以我記得，當其他學校大四都修習「高等會計」時，東吳反逆其主流必修「管理會計」，這可說是一大創舉。此外陳先生在會計系的養成上投注不少的心血及時間，除了努力和學生融成一片，爲了讓會計系能更有力運作，陳先生成立了系所聯誼會，將畢業的系友與會計系能做較好的整合與交流。因此在民國五十五年左右，他首創「名人堂」(Hall of the Fame)，定期遴選出傑出系友，以加強系所校友間的互動。

在這些老師的嚴格把關下，會計系可說是特別的嚴苛。記得當時系裡流行一句歇後語「四年畢業是反常，五年畢業是正常，六年畢業也是平常。」充分反映出同學間打趣調侃的意味。尤其大一上學期的「經濟學」需補考，這真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警惕。我突然發現正科固然大小考不斷，使自己不敢鬆懈外，非主科的科目也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而我又深知自己不可能每天在功課上兢兢業業，所以每到期中、期末考前幾個星期，便到外宿同學的住處借住唸書，強迫自己在那段時間內，能心無旁騖的專心準備考試。

東吳四年的歲月除了奮戰考試的日子令人難忘外，在那物資缺乏的時代，同學間的感情卻是十分的融洽與緊密。由於物資缺乏，大家不是努力用功拿獎學金，就是在學校打工拿助

學金。雖然我的學業成績還不錯，不過我始終拿不到獎學金，因為那要全勤才能申請，而且我也沒什麼機會拿小功、記嘉獎的，所以即使功課不錯，也和獎學金無緣。

既然領不到獎學金，就只好在學校打工拿助學金。大一到大三，從剛開始的掃教室，一直做到在會計室、體育室當工讀生，甚至寒、暑假的時候，也參加過救國團所安排的保險公司的實習工作，而做這些事，都是因為我想減輕家裡的一些負擔。當時我家就住在現在的民權西路一帶，每天騎腳踏車通勤是記憶中很深刻的事，由於那時候外雙溪的交通不是很便利，如果搭公車的話，就得先搭十號公車到士林，然後再轉一小時一班的二十九號公車才能到學校。一直等到中興巴士的直達車開駛後，我才放棄騎腳踏車上下學。但是當年那些騎乘的路程，兩旁層疊相連的稻田，飛快如箭的騎車歲月，如今，猶在目前。

下課後和同學間最大的娛樂，就是相邀去打撞球。記得那時很流行打撞球這樣的一種運動，於是每次大小考完畢後，總會三五好友相邀著去。當時芝山岩附近有許多軍眷建築物被改裝成撞球店，收費十分便宜，所以我們常在那裡待一整天。此外，偶爾想要小小的奢侈一下時，就會買瓶烏梅酒一群人在校門前小店聊天小酌一番。或許正是因為學校小，全校六個系才二千多個學生，所以幾乎沒有不認識的，因此在學校中和同學感情都很融洽。

其實，當初會唸會計系也只是憑印象去填志願，但是從學校畢業之後，我十分慶幸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在我要進入社會去工作時，我發現求職並沒有多大的困難，可以說

機會是非常的多。因為那時候不但有許多外商公司需要大量的會計人才，而且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因拓展業務，更是積極吸收新血，其中近三分之一都是東吳的畢業生。不過當時我一心想出國進修，所以服完兵役後，便先回東吳擔任助教，為之後的留學做準備，然而這時也讓我與勤業結下不解之緣。

那就是我和當時系上另一位助教朱銘小姐，被陳振銑老師派至勤業做短期的職業訓練，在那段時間內我不但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有所了解，也對勤業有了較深入的認識。其實在這之前勤業和東吳的關係便十分密切了，我記得大四時候教「審計學」的老師便是自勤業聘來二位菲律賓籍老師來教授一學年的課程。一是Mr. Charlie Alindada，現在是菲律賓SGV的Managing Partner，另一位則是Mr. Van Perez，他一直在勤業服務直至退休，因此勤業和東吳的淵源可說頗為深厚。

當時我申請到了台灣聚合公司給助教的四千美元獎學金，並且順利的通過了審核後，便如願的到美國喬治亞大學進修，此後一直留在美國學習以及工作。直到民國七十年，我透過電話及信件和宋作楠先生溝通深談之後，他鼓勵我回來台灣發展，至此，我才正式的進入了勤業，而且也是真正的投入了這個企業。

我從剛開始的勤業經理職務一直做到現今合夥人的身分，我想勤業這個企業所秉持的便是公開公正的正派經營理念。勤業十分重視員工的職業訓練，不只新進員工擁有三星期的全

職訓練，一旦成爲正式員工，仍然會不斷的給予多方領域的再進修及職業訓練，而且，除了要求員工本身的專業素養外，我們也會要求給客戶的服務品質必須是高水準的。由於勤業一直以穩健的方式擴充企業體，只要有合適的職缺都讓員工有調整直升的空間，因此可說升遷管道十分暢通，不過這幾年我們對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大，可以說沒有一個學校能完全的提供我們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因此，如今的勤業不僅是只有東吳的學生，還吸收了台大、政大等國內外優秀的人才，而且，只要成爲這裡的一份子後，學校、學歷甚至性別，都不是關鍵，一切，端靠個人的努力和實力。

所以，在這個資訊與知識快速膨脹的時代，如何找出自己的專長並且保持其競爭力，與如何有效的掌握知識和有效的運用，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一定要先訂下一個目標，這樣才能有所取捨，才不致於徬徨猶豫。反正，客觀環境是會改變的，只要在前進的過程中，保持著足夠的彈性，適時的做一些修正，我想，先前的每一步都是爲了達成目標而踏出的。

當年離美回台的前夕，美國八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 Deloitte Haskins & Sells 的上司合夥人，擺宴爲我餞行。那時我還只是一個高級查帳員 (Senior)，記得在席間我會問過他如何才能成爲一位 Partner，他回答了一個字給我：“Improvising”，即「能即席作業，隨機運作。」而這個字也成爲我日後工作及生活裡最重要的座右銘。

(採訪整理／杜佳紋)

魏永篤，東吳大學會計系五十六級畢業，喬治亞大學企管碩士。曾任喬治亞大學校董會內部稽核、喬治亞某州立學院會計主任、Deloitte Haskins & Sells 高級查帳員、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副主持會計師、美國會計師協會會員、美國內部稽核師、中華民國及美國註冊會計師。現任勤業會計師事務所集團總裁。

弦裡的春天

蘇顯達

如果學習音樂，需要經過一大段漫長的冬季，那麼在東吳的這段時光，就是豐收前最繽紛的春天。

在進東吳之前，一直是待在南部的鄉下，對於所謂繁華熱鬧的台北，並都沒有太多機會接觸，直到民國六十五年考取大學後，才開始認識這個地方以及身在其中的東吳。

剛進大一時，因為家在南部，我順理成章的成為了住宿生的一份子；還記得新生報到那時候，是父母親一同陪我來學校辦理住宿事宜，當時候小販們若聽到有學校開學，個個便會聞風而來，一同聚集在校門口，向衆多學生家長們兜售盥洗用具或生活用品，於是在看見路上的同學們都人手一個臉盆時，也理所當然的買了一個，而我就一路捧著臉盆、盛著對大學生活的憧憬，進入了東吳校園。

由於住宿的關係，所以在學校的時間也較其他同學長，因此對於校園的一景一物，到現在都還有著相當的熟悉及記憶；那時候的臨溪路尚未拓寬，平常午後，總會有許多悠閒的釣

客來此處垂釣，走到學校內，迎面而來的是一整排夾道的樹木，另外還有故宮的比鄰，那時學長還戲稱故宮是我們的後花園呢！當時校園的氣氛及環境，若用世外桃源來形容，其實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而我的生活也就在這樣期待又陶醉的心情中度過了大一新鮮期。

升了大二後，大多數音樂系管弦樂的學生，免不了都會去校外的職業樂團擔任所謂的「槍手」，藉此來磨練自己的樂團經驗，當然我也不例外地遊走於各樂團間；雖然在此時期中，大半歲月是在樂團練習、表演中度過，但相對的，在大學生活中發生最值得紀念性的日子，亦是在此一時期中；其實在音樂系的傳統中，男生人數一向是比女生少很多，那時甚至可以用「稀有動物」四字，來代稱我們這群弱勢族群，而在系際間舉辦的一些體育活動，也因爲如此，使得我們常常無法成軍參賽；但是就在我大二時，系上男同學竟然大膽全體集合去參加系際的橄欖球比賽呢！這都多虧了當時一位原住民學長的號召，在他一身黝黑、強健體魄的說服下，音樂系居然破天荒的參加了系際間的運動比賽，而且，我們還得了第三名。

除此之外，在這段日子裡最大收穫，莫過於遇見了我生命中的另一場春天；也就是認識了現在已成爲內人的當初女友。那時，我是主修小提琴，而她副修亦爲小提琴，於是在同上一門課的造福下，便讓我近水樓台先得月了。還記得那時，當我聽完音樂會回到學校後，會

先在校門外頭的攤販買兩顆茶葉蛋，然後爬上山坡到女生宿舍，再請認識的人請她下來，我們就這麼一邊吃著熱騰騰的茶葉蛋、一邊聊天；有時我們也會在校園中漫步，所以校園裡幾乎每個地方都有我們的足跡，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會對東吳的一景一物，有著相當熟悉及記憶吧！

在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我搬出了宿舍，因此有機會和其他科系的同學相處，雖然大家彼此的科系並沒交集，但卻會常常聚在一起，聽著各種不同領域的朋友，講述他們所學的知識，雖然大家不見得能了解、溝通，但卻都能包容；此外，我們這群室友也會在休閒時，打打橋牌來娛樂一番，每當遊戲結束後，我們就會殺到大直一家半夜才開的豆漿店裡，由輸家作東請客，享受一頓美味的宵夜。

如今再回想起那段生活，縱使時光不在，但愜意的感覺卻始終停留在腦海中呢！

而在大二升大三的那年暑假中，台北市政府主辦了第一屆台北音樂季（也就是今天的台北藝術季），在此一活動中，剛好我得到一個機會能夠和台北愛樂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在當時以一個學生的身分和職業樂團一起合作，在台灣樂壇上十分稀少，加上我們預計要演奏一首頗為困難的協奏曲，因此我的壓力有相當程度的沈重感；還記得那時後在準備曲子的過程中，第一次要演奏給指揮驗收時，我竟然還只停留在第一樂章而已，至於其他的二、三、四、五樂章，仍呈現空白狀態，可是距離演出日期已所剩無多；但也正因如此，導致了日後在整個

暑假中，我的全部時間、生活幾乎都沈浸在曲子的練習中，而就在這樣苦練的付出下，最後的演出，竟然獲得了滿堂的喝采；回想起那個暑假，雖然練琴練得天昏地暗，卻使得我在琴藝上，有相當大的進步與突破。還記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由於我所住宿的房間夏天十分悶熱，所以每次練習時我都曾打開窗戶，有一次聽到樓下路人在吹口哨，吹的居然正是我平日練習的曲子呢！

其實想來還是十分感謝當初室友們，對於我這種不斷疲勞轟炸式的重複練習，所給予的包容。

後來到了大三升大四那年暑假，恰巧陳秋盛老師組織了一個弦樂團去歐洲荷蘭參加弦樂大賽，在這個樂團中，幾乎囊括了各個學校的菁英好手，都齊聚一堂，那時我也十分幸運的參與了陳老師的樂團，在努力艱辛的比賽過程中，當然最後我們贏得了冠軍、載譽歸國。

回顧整個大學四年的生活，都是在十分充實而美好的日子中度過。畢業後我到了國外留學，在異鄉的日子裡，幾乎可用無助、絕望來形容當時的生活；還好一切苦盡甘來，而今終於如願的屹立於表演舞臺之上。而在大學中所度過的快樂生活，便常常成爲我美好的回憶。其實，這條學習音樂之路，原本就是孤獨的，我卻能幸運的在這條艱苦的路程上，得到一段多采多姿的生活，這一切還是得感謝母校的栽培，讓我有如沐浴在春風中一般，同時亦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享受著春天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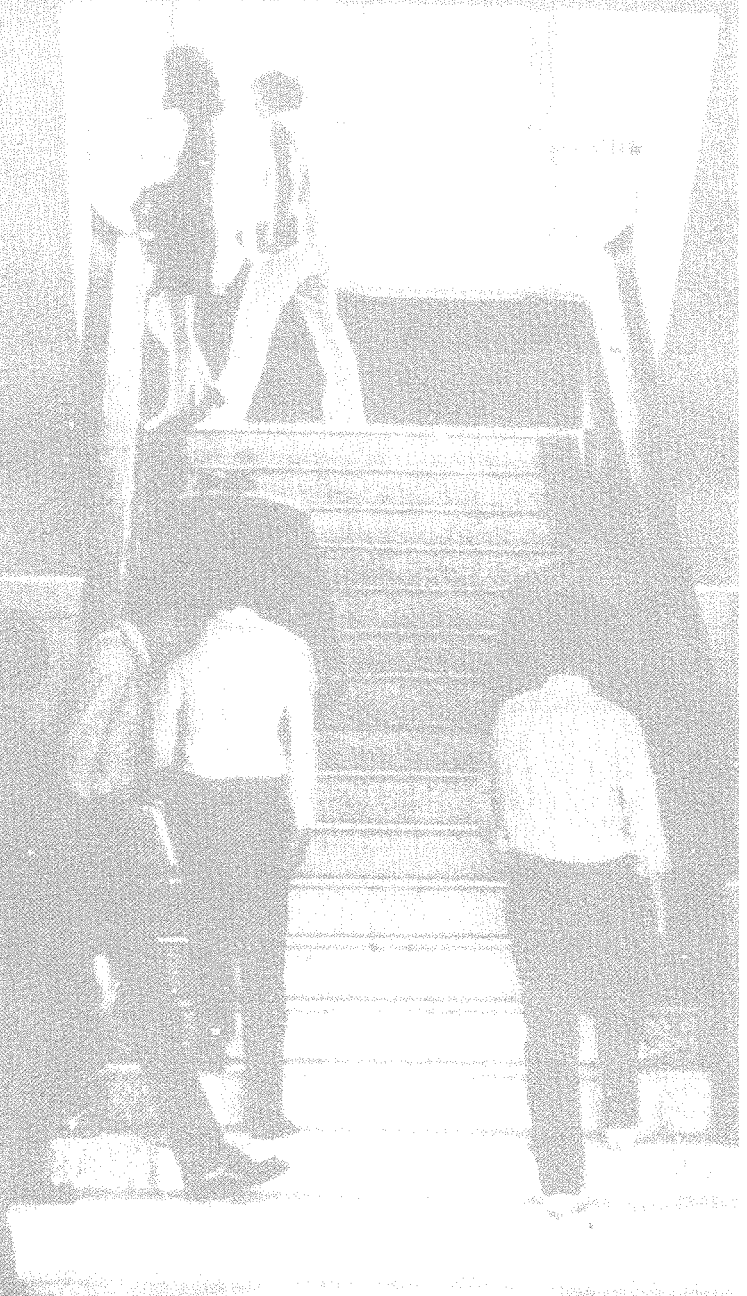
(採訪整理／陳琬菁)

蘇顯達，東吳大學音樂系第五屆畢業生，之後前往法國留學，在一九八五年獲得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最高級小提琴及室內樂獨奏家文憑。曾四次應邀至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中擔任獨奏演出，一九九五年膺獲選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現在執教於國立藝術學院及師範大學音樂系，擔任小提琴教授，同時擔任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首席，並主持台北愛樂廣播電台《迷人的小提琴世界》節目，頗獲廣大聽眾的喜愛；對推廣音樂文化活動，不遺餘力。

【伍】

風物樣貌幾更迭



書香裡的生活點滴

潘懷宗

還記得在我進入東吳化學系時，學校中最新的一棟建築物便是圖書館，也許圖書館現在已成爲東吳校園中資深的景物，但在當時，東吳的圖書館確是能夠引以爲傲的，就連端木校長也常常將「我們東吳的圖書館是國內最先進的圖書館」這一句話掛在嘴邊，提示我們是多麼幸運的一群學生；而在我四年的大學生活中也的確與圖書館結下了不解之緣；那一棟嶄新的建築物，正是記錄著我所有點點滴滴大學生活的標誌。

在我唸書時，圖書館閱覽室的功能是一個提供安靜地方，好讓大家心無旁騖看書的場所，但由於學校當時先進的創舉（率先在新落成的圖書館內安裝冷氣機，這是當時大學裡前所未有的），導致它的功能開始日趨繁複，在夏天熱浪肆無忌憚的襲捲整個校園時，只有這裡恍然成爲終年雲氣繚繞的仙境，可想而知，此處就成爲衆人爭奪的寶地，所以每當中午休息時，避暑衆生相便在此處熱鬧上映；有些人拿著外套，在物色好自己的位置後，就大大刺刺地將外套一蓋，夢周公去了；而有些人則在上完體育課後，拎著瓶水一派瀟灑的享受清涼。

除此之外，在考試期間的大排長龍以及出盡絕招占位子的腦力激盪，也是迄今都還興盛不衰的現象吧！唯一和現在不同的，就是每當週末時，外校同學還會不辭辛勞的來東吳排隊唸書，盛況可媲美市立圖書館呢！至於在占位子的方法上，二十多年前的花招可不比現今遜色喔；大部分的人占位子都是採取代表制度：三五好友通常會在前一天晚上猜拳推派代表，輸的人隔天就得起個大早去閱覽室排隊，然後把身上能占有空間的物品掏出來占位子；而在占位子的物品中，除了一般常見的鉛筆盒、書本外，私人物品也紛紛出籠，有手帕、眼鏡等等，琳琅滿目的常常令人嘆為觀止。當然在唸書時，總少不了一些能令人提振精神的物品，於是，狀似補品的瓶瓶罐罐和隨身聽也成為圖書館內的常客。

像這類令人莞爾一笑的現象，便一同隨著圖書館的趣聞，漸漸在此茁壯、發芽。

令人印象較為深刻的是有一次，當屋內一片寂靜、大家正聚精會神唸書時，忽然從某一角落中傳出引吭高歌的聲音，在眾人搜尋之下，才發現有位同學正一邊聽著隨身聽一邊看書，也許是過於專注而忘了自己身在何方，便不自覺的陶醉在旋律中，歡唱起來，直到旁邊同學上前阻止，這場個人演唱會才落幕。

除此之外，還有發生暗渡陳倉的故事呢！或許大家不知道在閱覽室的櫃檯後面，有一扇小門是可通往圖書館的書庫，由於閱覽室禁止帶食物進入，所以有些同學便利用此一秘密通道，將自己當作點心的餅乾先藏於書庫架上，再趁衆人不備之際，穿過通道大快朵頤一番；

當時我雖未親眼目擊，但按照現場常有餅乾和各種食品的殘留物來觀察，應可推知是以此種手法進行的。

在學校這個大環境中，圖書館也算是另一個完整的生態環境，人與人之間都有息息相關的因子存在，因此坐在身旁的左鄰右舍也就和自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了；運氣好時，也許可以碰到看對眼的人，這時便有可能擦出一段圖書館裡的愛情故事，而一般標準圖書館戀情模式總是如此：兩個人位子的距離，由剛開始避免傳染病般的遙遠到只剩幾公分的差距，之後，再外加上幾場電影，幾次散步，於是，一段戀情就這麼不知不覺的成形了；在這段圖書館見聞中，我亦搭上此班風潮的列車；雖然最後的結果都無疾而終，但其中滋味卻是令人印象深刻，記得有一次還為了一場三角戀愛，甚至在圖書館裡進行談判及糾紛的排解呢！還有一回，坐在對面的是系上的二位學姐，當時她們正對一位新進學弟品頭論足著，那時我聽了並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只是把頭埋的更低些；也許她們還不曉得在她們口中的那位學弟，就是坐在對面的我呢！其實，這些狀況都在能夠相安無事的範圍之內，真正令人害怕的，恐怕還是情侶相偕讀書時，不能自持的情形：兩人作伴，免不了要不停的噓寒問暖或是情話綿綿一番，有時還會出現親暱的舉止，那時坐在旁邊的鄰居們，才真是面紅耳赤，如坐針氈，不知如何自處呢。

然而，這些青春的、趣味性的情節，或許仍繼續在各處搬演著，但當時我們所具有的另

一種生態，迄今可能就難以重現了。

雖然在圖書館唸書時，幾乎是以獨來獨往的方式過著學校生活，但是，在我們這些所謂的「獨行俠」中，卻也產生出一種惺惺相惜的情愫；有的人總是喜歡坐在一個固定的位子、某人今天怎麼沒來、誰又總是在某系裡表現出眾等等，這些消息常常為大家所熟知，事實上每個人都在暗地裡默默關心著彼此的行踪，縱使彼此間只說過幾次話，甚至有的始終沈默相對未曾交談過半句。

我想這便是另一種難能可貴的情誼吧！

回首初到東吳的日子，有許許多多的生活點滴，都是隨著圖書館共同累積起來的，雖然當初並沒能很充分使用圖書館中的資源，但這個環境卻使我在大學時代中獲得相當多的知識；也許那種每天只知道在圖書館中唸書，累了，再到屋外做做體操，或者躺在草皮上望著夕陽遐想著的日子、一種單純而閒適的日子，已經離現在很遙遠了，一如現在回想過去的種種，一些人的名字和臉孔或許早已不復記憶，但對於當時的感覺，卻仍一點一滴完好的保存在圖書館之中，成爲珍貴的絕版藏書。

(採訪整理／陳琬菁)

潘懷宗，民國五十年生，東吳大學化學系七十二級畢業，美國艾默生大學神經化學及分析化學博士。曾獲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傑出青年神經科學獎。現任陽明大學主任秘書、教授，東吳化學系兼任教授，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航向記憶的沙渚

唐松章

曾經，我的夢想是成爲一位船員，希望以後可以出海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去體驗另外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因爲從小個性外向，所以也一直認爲自己長大後會朝著夢想的方向去實現，但，人事的變化總是難以預料的，當我報考大學時，決定報考東吳補習學校後（東吳大學在臺復校前身），這個夢想便深深的埋在記憶之中了。

在當時個個大學都是採取獨立招生的，所以必須一所一所去考試，原本打算唸與航海相關的科系，但由於我的父親認爲唸會計能夠幫助家中解決一些商業方面的問題，於是，我就這麼報考了東吳會計系，讓整個人生航道，目標轉向另一處未知的沙渚。

在我們那個年代中，能唸書算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更何況是念到大學，所以來唸書的人多半是出了社會後，以一邊工作一邊唸書的型態來求學，因此，當時班上的組成分子年紀多比我年長，而整個班級氣氛便籠罩在一片專注求知識、求學問的風氣之中；我想，這是能夠理解的，由於受了環境影響，大家都很珍惜能夠求學的時刻，縱使當時東吳的環境極爲刻

苦；那時候東吳剛在台灣復校，只能以補習學校的名義成立，而在漢口街的校地也僅有二、三棟三層樓高的房子，所以後來當學生人數較多、沒有足夠的教室上課時，學校便只能到博愛路上租幾間房子，權充臨時教室，當時我也曾到臨時教室上過課呢！那裡的教室隔間都是用三夾板建造，幾乎沒有隔音的效果，左鄰右舍的話語，都能清晰入耳，於是每當上課時，我們就好像一次聽齊了許多堂課，人聲鼎沸的有如大會考一般熱鬧呢！

聽我這麼一說，似乎當時唸東吳的學生生活過的挺艱辛的，就客觀環境來看，剛復校的東吳體質的確羸弱，但學校卻是以管理一所大學的角度來治學，於是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學校讓我們仍有著過大學生活的享受，而我們也不會因為環境問題或是名稱問題有所埋怨；當然，原因仍然是相同的：大家都珍惜能夠唸書的每一個時刻。所以那時，除了上本科系的課程，我們還會去旁聽其他系所的課程，幸運的是，當初剛好有一群教授從台大應系上某位老師之邀，過來友情贊助教學，使我們能夠聆聽到不同風格的教學方式、收穫匪淺呢！

在我們班上，除了平日唸書外，一些對足球有興趣的同學，就在課餘時間組成足球隊，我們常常會利用空閒的時間練習，甚至找其他學校的足球隊舉行友誼賽，雖然沒有名次或獎金等條件的吸引，但每個人仍然樂在其中；每當練習完或比賽完，大家總會相約一同出去吃吃飯、聊聊天，生活過的極為愜意；於是我的大學生活，就在點名、踢足球、唸書、補習中一點一滴累積來到了畢業的時候，那時候能大學畢業，可說是一項光榮的事，因為每個系

所、每個老師把關都相當嚴格，所以能應屆畢業的學生全校僅有一百多位而已，（不是全系，是全校喔！）而東吳的畢業典禮也是極為特別，我們一共參加了兩個畢業典禮；一個是一般的畢業典禮，一個則是由教會所主持的畢業典禮；在教會所主持的畢業典禮中，有牧師的主持，還有唱詩歌、畢業儀式等等活動的舉行，這種難得的經驗，恐怕也是其他學校極為少見吧！

對於校園的記憶除了當時學風的鼎盛，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系上一位老師，陳振銑老師。陳老師是東吳會計系創系元老，在課堂上，他總是一本嚴謹的態度，以極為嚴格的標準來教學，所以若有人要想含混過關的，幾乎慘遭紅字滅頂；在上課前，他總會慣例性的點同學來回答問題，而我總是其中的人選，因為在班上我的個頭較高、個性也比較外向，於是想當然爾便成爲老師注目的焦點，再加上那時候對會計較爲專業的科目總是表現不佳，所以陳老師總喜歡抽點我起來回答問題，甚至在畢了業後，只要他在課外開設相關課程時，也不免調侃著要我去上課，繼續當他的學生呢！對陳老師的印象深刻，除了他嚴謹、上課有要領等等個人魅力外，還有另一點舉動，才是令人難以忘懷；只要上課時，他總會叨著煙，一邊講課一邊抽煙，煙霧繚繞中讓我們領悟到薰陶的意義。也許現在的學生很難想像老師會在課堂上抽煙的模樣，但當時的確也成爲陳老師個人特殊的標誌。

除了對陳老師印象深刻外，他對我們的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在有形的影響上，像在我

們畢業之後，對聯誼會的主持以及會計系所文教基金會的建立，都是受老師耳提面命所成立的，所以，現在會計系能有如此多的管道和福利，想來應該感謝陳老師當初的構想，讓我們日後有具體的方案對學校進行回饋；至於無形的影響，則是整個系向心力的漸漸累積，使得會計系給人的傳統印象便是精神的團結一致；這些都是當初老師、學生和助教們彼此間共同創造出來的氣氛，我想，這些精神的凝聚，比任何影響都要來的難能可貴。

在經過了漫長歲月後，東吳從五〇年代的前期補習學校到現在九〇年代的完整大學，其中歷經了許許多多的變遷；而當初因過渡期而隸屬法學院的會計系，現在也正式成爲商學院的一分子，這些種種和現在同學們大不相同的經歷，雖然有著令人難以理解的差異性，但也是替我們那個時代中難得求學的人們，記錄了屬於我們獨有的生活方式嗎？或許當初我並未能朝自己的夢想邁進，但來到東吳這裡，在這另一航道上的奇遇，卻讓我在日後竟還能達成自己當初想到世界各處看看的夢想，雖然路途是曲折了些，但這些意料之外的種種經驗，卻累積成一處沙渚，靜靜的擱淺在我的回憶之中。

（採訪整理／陳琬菁）

唐松章，東吳大學會計系四十四級畢業；曾任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創辦國

揚建設與崇友實業；而後放棄商場事業，赴日進修攻讀學位，獲得拓殖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現任崇友實業公司榮譽董事長、東吳日文系、經濟系博士班兼任副教授、東吳大學董事、台北市東吳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天人合一，止於至善

趙沛明

我想，建築是一門相當複雜與矛盾的行業。一幢建築物，必須用感性去創造，卻要用理性去完成，它所創造出來的空間，關係到人在其內的活動，而且，建築物必須與環境融合，發揮建築基地的長處，減少其短處。所以，建築的最終目標，便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地。也就是因著這個理念，我為東吳大學設計的綜合大樓必須具備人性化的優點。

我和東吳的合作，緣起於我為中央研究院設計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當時東吳的楊其銑校長參觀過後，認為中研院生醫所的建築理念十分新穎，於是，便邀請我為東吳設計一幢綜合大樓。我在勘看過東吳的環境之後，發現東吳的景觀得天獨厚，依山面水，懷抱整個外雙溪，但是，從前的建築，每興建一幢，便造成一個斷層，前方新的建築物往往遮蔽了後方舊有建築的視野，所以，我必須為東吳蓋一幢不造成阻斷，能夠轉化缺點、強化優點的建築物。

那麼，我設計東吳大學綜合大樓的理念究竟是什麼呢？我想由一個經常從學校師生口中

得到的反應談起：爲什麼只有一部電梯？這可能是東吳師生對於這幢大樓相當強烈的一個感受。我想，當時礙於經費的限制，只能興建一部電梯是不得已的決定，但是，就算學校當時有足夠的經費，我也不會再加蓋電梯。不爲什麼，只因爲東吳是一座蓋在山坡地上的學校，一座氣味和九份相彷彿的山城。晴日方好之時，你可以看見層層疊疊的山巒偃著雙溪，在潺潺的流水聲中，兀自地青翠著，多麼閒適自在；飄著煙雨的夜晚，襯著操場暈黃的燈光，在任何一个窗口向外看，你就能深深地體會到，東吳大學真的是一座充滿優雅氛圍的山城，而美麗的山城是不需要電梯的，唯有一步一步拾階而上，你才能體會屬於一座山坡學校的，獨特的景致。

於是，我決定要將東吳建設成一座躍動並且相連的山城。

首先，我的第一個想法便是要讓這幢大樓，不論從哪一個重要的室內空間走出來，都能看見外雙溪。因此，我在走廊的部分都不加裝玻璃窗，並且規劃了許多的觀景平台，這些平台都是多功能性的，可以供作展覽以及辦活動使用。然而一幢建築物要能夠有動感的感覺，並不是蓋很多的房間就可以的，而是如何讓它能有一個主要的空間，並且使它有動的感覺。恰巧我們這幢建築物有三個重要的主題：體育館、大禮堂、教室，於是，我利用它們創造了中間的天棚空間。

在一個建築物中，我喜歡運用「樓梯」這個元素。在一般大樓的樓梯，主要功能是逃

生，但在我的觀點中，它代表著「動」。所以，我特別在大樓的中庭建造了一個登山型式的樓梯，藉由這座樓梯，我希望能充分彰顯東吳大學是一座山坡地學校的特性。我是一個非常中國的人，所以在樓梯間不用阿拉伯數字，而用中國字來標示樓層。另外，我也製造了許多穿透的設計，經由這樣的設計，使整個空間得以通風，解決當時因為經費不足，無法裝設冷氣的問題。我在屬於教室部分的範圍裡，建造了兩條穿透的走廊，目的就是為了讓同學們下課的時候，能夠在這裡享受自然的涼風，欣賞美麗的校景，而且，也形成了特殊的框景作用。

實際上，這種穿透的設計處處都發生。我在綜合大樓後方的這部分，做了兩層樓的挑空，為的便是能夠讓圖書館的平台得以和綜合大樓連接，成爲一個完整的整體。即使汽車從綜合大樓後方與圖書館之間駛過時，也因為不是完全被兩堵牆所阻隔，而會有一種穿透、寬闊的空間感。另外，在兩層挑空的體育館下方，我更直接將它往下鑿空，使其形成一個有遮蔽，但感覺上卻是露天的望星廣場。而圍繞著望星廣場，我設計了許多活式平台，例如在咖啡廳外面，便規劃了座位，讓同學們坐著便能欣賞底下的表演活動。這個設計一方面是爲了提供多一個聚會空間，另一方面更是爲了消除望星廣場是一個地下室的空間感，讓人即使是在餐廳中用餐，也不會有身處於地下室，而覺得幽暗、閉鎖的不舒適感。然後，我又加上了同學們俗稱大階梯的看台部分，如此一來，便打破了斷層，使綜合大樓和整個校園聯結，而

成爲一個相連的整體。總而言之，綜合大樓的建築是非常中國的，它是一個三度空間並且具有多層次的「三合院」。

但是，東吳大學綜合大樓在興建之時，雖是以「學生活動中心」爲名，但因爲是學校難得籌建的新建築，便要求其中需要具備多功能用途，除了學生活動中心的設施外，尙包含了一千人的大禮堂、七百人的餐廳、國際會議廳、完善的體育館，以及三十七間教室，因此，興建起來是一座相當龐大的建築物。然而，這樣一座龐大的建築物在東吳的校園中，無疑顯得突兀，並且極容易造成壓迫感。於是，我做出了前低後高的設計，並且利用中央由體育館、大禮堂、教室所環繞而成的天棚，將這一座巨大的建築打散成爲三幢，使它看起來不會有壓迫感。加上當時我觀察東吳的校景，基本上是以紅色系加上水泥灰色系爲主，因而，在表面顏色的選擇上，我也盡量使其能和原有的環境配合，不會在視覺上形成一幢巨大並且突兀的建築。兩側的建築物，我選擇紅灰相間的色調，而基座則採用砂紅色的建材，屋頂使用白色，後方的教室部分則使用和基座相同的砂紅色建材。如此利用空間與顏色的交錯運用，在視覺上盡量縮減綜合大樓本身不能避免造成的龐大感受。

另外，在質材的選擇上，我也經過相當的考慮。除了在大樓的維護考量上，採用了容易保養的質料，也爲了做出內外空間的區隔，使用不同的質材。在所有外表的部分，使用了價格低廉、品質優良的國產磁磚，創造出屬於室外的空間感，使得同學們能感到輕鬆、自在，

而不要因為身處於一幢大樓之中，有拘束的感覺。然後，四樓屬於教學作用的教室區域，地面質料的使用也與三樓的學生活動中心作出區隔與改變，讓人很容易就能感受到自己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屬性不同的區域。

在這幢建築物中，也隱藏了一些小小的趣味。例如，我所設計的欄杆是虛實相間的，而在寵惠堂與綜合大樓之間，我保留了一棵原有的大樹，四周高低不同的階梯，則有陰陽調和的意味在其中。然後，整幢大樓呈現一種不對稱性，使它看起來不至於呆板。望星廣場挑高的天花板，我則採用高低不同的橫樑，交錯出一種古代樁木的感覺。而中庭的假門，在機能理論上，是完全不具備任何功用的，但我設計這個假門的用意是使它成為整幢大樓意念中的大門。假門中央取出的部分，則向右平移成為校徽牆，東吳的王偉勇教授看了之後，覺得擺設那面校徽牆，正好符合校歌中「止於至善」的意境，為理性的建築設計，作出感性的詮釋。

在建築界中有這麼一句話：“Less Is More”，因此，我在綜合大樓的外表上，並不加上一些零碎的裝飾，單單利用本身的空間以及造型營造出氣勢。空間的營造是我設計這幢綜合大樓相當得意的部分之一。從大樓的外表，並不會看出它的獨特，但如果同學從四樓的平台往下看，便可以發現視野能夠由望星廣場一直延伸至外雙溪，那種獨一無二、磅礴非凡的氣勢，我敢自豪地說，沒有別人創造的出來。

總地來說，我設計東吳大學綜合大樓的主題，就是「天人合一」。但這個主題該如何落實在這幢大樓上呢？我想，因為這是一幢作為學生活動中心使用的綜合大樓，必須要讓它深具動感，因此，我所設計的樓梯，是「動」的樓梯，平台是「動」的平台，望星廣場是「動」的望星廣場，它們絕對都是不呆板，而具備多用途的，能夠配合學生在其中的活動。然而，有一回開學的時候，我更發現了它不同的用途。登山社的同學將繩索由四樓的平台懸垂而下，然後一位同學拉著繩索以攀岩的方式速疾降下，那樣的年輕動感，真是棒透了！我曾跟劉校長說過如果有一隻小狗和一隻小鳥結伴的飛躍穿梭，跑上跳下於這整幢大樓之中，該是多好的一幅動畫。

而城中校區籌建中的第五大樓，也是出於我的設計理念。首先，我亦是先考慮到其環境位置，城中校區靠近總統府，而第五大樓興建地又是城中校區唯一和外界有接觸的地方，另外一點，便是城中校區中戶外活動空間極為狹小，這幾點就是我的課題。因此，我決定將第五大樓建設成城中校區的大門，而後再創造更多學生可以活動的戶外空間，再配合校方的考量，成爲一幢多功能大樓。另外，在外觀的設計上，我則考慮到歷史的傳承。東吳大學是一座歷史悠久且人文氣息濃厚的學府，它的建築物當然應該表現出歷史的傳承，於是，我開始尋找大陸上蘇州大學的資料。而後意外地發現蘇州大學的建築風格和總統府相似，並且上海校區有一個造型相當優美的大門。這其中的關係十分奇妙，因爲上海校區是蘇州大學在上海

的比較法學院，剛好城中校區是東吳大學的法商校區，因此，我決定結合兩者的優點，蓋出一幢現代化卻又具有歷史之美的建築物。

我年輕過，而我現在依然年輕。因此，我為東吳設計一幢年輕的綜合大樓。學生社團在綜合大樓舉辦活動的時候，我看見五彩繽紛的彩帶在望星廣場，由上而下垂吊著，彷彿是一場嘉年華會，看見同學們盡情地享受著青春，散發著無窮的活力，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這就是我想給東吳的東西。

這就是我給同學們的祝福。

（採訪整理／吳家宜）

趙沛明，中原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士，美國維琴尼亞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碩士，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建築碩士。曾任中原大學兼任副教授、聖路易國際中華建築學會會長。現任易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兼任副教授。

在愛和創新的歲月裡——

在東吳大學任職的十六年

成嘉玲

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國在政大財稅系任教，也在東吳大學兼課。過了半年多，又到美國做事。後來，東吳商學院的吳幹院長在國外找到我，力邀我到東吳教書。那時候的師資非常缺乏，有博士學位的師資很少。我考慮了一陣，後來想到父親只一個人在台灣，於是決定回來，到東吳經濟系，先做副主任，隔年當主任。等到吳院長退休，商學院院長的職務先由教務長兼了半年，後來在端木校長的堅持下，我接下商學院院長職務。那不僅是東吳，也是台灣所有的大學中，第一個女性院長。沒多久，經濟研究所楊必立所長退休，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只好由我先兼著，因此，我又多了一個所長的職銜。

在台灣經濟剛起飛的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東吳大學位在台北市貴陽街的城中校區並沒有商學院專屬的大樓，只能和法學院併在同一棟樓，每兩個學系擠在一個辦公室內，不僅老師沒有研究室，連系主任也沒有單獨的辦公室。當時學校的經費相當的困難，學生人數也不多，可是學校要發展就要蓋房子，還要有維持學校正常運作所需的經常費開銷。我至今印象

猶新的是，端木校長每天為著經費在發愁，經常看見校長和會計主任兩個人在校園裡繞來繞去的，都是為著錢的事在苦惱，可見當時辦私立大學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好不容易商學院的大樓終於蓋好了，原先樓層使用的設計是學系辦公室全部都在下層，老師的研究室放在上層，不過教授們認為一個系一層樓比較好，因為專任老師的研究室在系的旁邊，學生容易找到老師，師生之間的互動會比較密切。後來，學校採納了我們的意見。現在城中大樓的使用分配，就是當時開會決定的結果。

學校經費困難，於是我們開始自力救濟到校外找尋資源。首先找到IBM，商談的結果，IBM捐助了一個電腦教室，而且還幫我們設計了一個當時只有東吳大學才有的結點。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種網路，不過，在別的大學都還需要經過教育部的結點時，我們本身就是一個和教育部平行的點了。

另外，我們向廣告界的龍頭聯廣公司爭取到一個在那個年代算是很大手筆的五十萬元講座，並舉辦了多場的學術座談。記得現在的經濟部長王志剛那時候才從國外回來沒多久，他主動的跑來參加座談會，魏啓林也常常來參與。曾經擔任過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總裁的 Dr. Arthur Burns 到台灣訪問時，也是由東吳商學院負責接待的，我們還請到他來學校做過演講呢。

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合辦研討會，也是我院長任內的大事。我們和

UCLA 談妥合辦一個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研討會，在舉辦研討會的前一年，台灣方面的學者先到 UCLA 和美方學者討論研討大綱，然後回台灣撰寫論文。那次的研討會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東吳大學是主辦單位，場面盛大隆重，十足風光。當年一同到 UCLA 研討大綱的學者，到了今天都很有成就，許家棟、吳榮義、朱雲漢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創新，是我的行事法則。在東吳商學院的歲月裏，我的創新就是主動到全省各個高中巡迴演講，介紹東吳大學。那時候，我帶著一群年青的專任老師，北、中、南、東的到處演講座談，也許是沒有別的學校如此做，我覺得滿有效果的，因為有不少學生高分進東吳商學院。我聽說，李煥先生在籌設高雄中山大學時，爲了吸引優秀學生到中山大學，也曾風塵僕僕到各個高中名校講演，推銷他的新學校，但那已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事了。我想，幹這碼子事，在台灣本人應該是始祖。

此外，我們也和台糖、菸酒公賣局合作過各項的建教合作，使東吳商學院的名聲，除會計事務所外，再遠播到其他各項行業領域。

我任內最覺得遺憾的一件事，就是當年申請成立「財務金融系」被否決。那是所有的大學第一個申請設置財務金融系的，教育部拒絕的理由是：「財稅系已經很多了，所以不需要有財務金融系。」教育部根本就弄不清「財稅」和「財務金融」的區別在哪裡。我想，當時教育部如果准許我們設立的話，現在的金融、證券業大概都是東吳的天下，就像精算界是東

吳的天下一樣，因為東吳商用數學系走的是精算的路線，畢竟得「風氣之先」才能「捷足先登」啊。在東吳申請被拒很多年之後，台大才有了「財務金融系」的設立。

那時東吳商學院共有六個學系，學生人數幾佔全校的一半，但使用空間小，分配到的資源也少，商學院的老師們心理很不平，因此每次開會，我和當時的理學院院長，也就是現在的劉源俊校長，兩個人總是爲了預算的分配而爭來爭去，兩個人吵得要命，端木校長夾在中間，被我們吵得頭都昏了。不過，說實在的，商學院爭了半天，除了電腦和軟體，也想不出更多的名目來爭取預算，不像理學院隨便一個儀器、一間實驗室，就要好多錢。但是，身爲院長，又不得不本位主義地去爲自己的學院爭取更多的經費。

在東吳大學的歲月裡，師生感情融洽，令我至今難忘。那時學生去露營、旅行，都會來邀請我。我只要沒有重要的事，通常都會去，跟他們一起睡地板，一起玩，連學生開舞會的時候，我也會跑去跳舞。爲什麼能相處那麼愉快呢？我想應該是那時候的學生比較單純，沒有現在的那麼複雜吧。而且，我又是沒有黨派色彩的人，所以學生有了問題就會跑來找我，我能幫忙解決的就儘量的幫忙，可是事情如果是不合理的，我也會告訴他們哪裡不對，告訴他們我不能幫忙的原因。我認爲，師生之間的溝通管道要暢通；管道不暢通，誤解就容易產生。其實，學生有些小抱怨就讓他們去抱怨吧，我從來就不贊成禁止學生說什麼或寫什麼。他們發行刊物批評，我也不去計較，頂多寫一個解釋或辯駁的聲明罷。我真的覺得做老師或

是做行政工作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愛心，喜歡看到學生，喜歡和學生聊天，這樣自己才會快樂，心境也才會跟著年輕起來。相對的，學生也會因為你的善意和愛心而快樂，並受到鼓舞。我至今仍懷念北一女中時的國文老師孫克寬先生，他認為我的文學底子好，希望我去唸東海大學中文系，並且承諾替我去爭取到獎學金。但我父親認為我唸台大經濟系，視野會更廣闊。結果，我當然去不成東海。但儘管我沒法完成孫老師做「中文人」的期望，但孫老師那種教書投入、全心全意陶醉在文學領域的情懷，卻深深感動了我，在不知不覺之中，我也感染到他那份熱愛工作、關懷學生的作風。

東吳大學有其先天的局限性，那就是校地太小，尤其是法學院、商學院所在的城中校區，以前學生老喜歡自嘲是「東吳補習班」。但事實上跨兩條馬路就是西門町電影街；往東不到一公里的貴陽街盡頭就是國家劇院、音樂廳；書店街近在咫尺；歷史博物館、科學館也在附近。這麼堅強的生活、學術機能，不就是人文薈萃形成的基本條件嗎？生命的歷程是不容許我們劃地自限的，我們應多發揮自身的特長，才能創造優勢。

一九九一年，世新大學的前身——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為升格學院所需，要我去當校長。我雖滿懷依依之情，但也只能忍痛揮別那度過十六個青壯歲月的東吳校園。然而，直至今今，在我內心深處，東吳對我仍有如娘家一般，相繫相依的感覺不曾稍減。

今年東吳大學創校一百周年，遙想一九〇〇年（清朝光緒二十六年），美國基督教衛理公

會派教徒，在江蘇省的蘇州市首創這所大學，而後擴展到上海，大陸易幟，校友們再在台北外雙溪關地復校。百年來，中國歷盡顛沛滄桑，但東吳大學聲譽始終維持不墜，桃李滿天下，所秉持的不外乎「務實」、「踏實」的傳統精神，以及歷任校長、教職員工的盡心奉獻。茲值百年校慶，謹敬述個人在東吳大學的一鱗半爪，並以此為賀。

(採訪整理／高岱君)

成嘉玲，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碩士、博士。曾任中興大學、政治大學副教授，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商學院院長、世界新聞傳播學院院長。現任世新大學校長、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

看見一座碧綠的山城

曾惠中

每天，我都要到一座碧綠的山城裡教書，那兒有琤琮的溪水，蔥鬱的青山。每天清晨，我總是帶著愉悅的心情，開著車，越過充滿喧囂車聲、漫天煙塵的市區，走一條長長的路，往城市的邊緣去，去一座碧綠的山城教書。

我，在東吳大學教書。

民國六十九年，我第一次來到東吳大學，因為那時候端木愷校長想要恢復生物系，然而，當時教育部考量到生物系畢業的學生，將來離開校園後可能不易尋得發展，所以並不同意學校成立生物系，而我因為在醫學微生物領域裡有了五、六年經驗，對於微生物系學生將來的發展方向，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並且深知成立微生物系並不需要甚多的空間與設備，便建議和我在《科學月刊》共同奮鬥的劉源俊校長，不妨成立微生物系。劉校長當時是東吳理學院院長，聽了我的意見，覺得十分不錯，便請我擬一分規畫資料，後來教育部審核，結果居然通過，於是，東吳便決定成立微生物系，也延聘我為副教授，因此，我成為微生物系的

第一位老師，而後學校又聘請了一位系主任鍾金湯教授和一位宋宏紅助教，我們三個人開始了微生物系最初的創系時期。

其實，在來東吳任教前，我對東吳大學並不熟悉，只知道這是一間辦學風評相當好的學校，然而，當我接觸東吳之後，便深深地喜歡上這裡的環境。每天我從中和的家中到學校來，彷彿是離開喧鬧城市，慢慢尋覓靜美鄉間準備作一趟旅行，所以，我十分喜歡課後待在學校裡，一面準備教學與研究，一面享受著校園裡的美麗景致。因為，我自己大學時代念的是植物病蟲害系，而後又轉往醫學微生物發展，所以曾經修過動物學和植物學的相關科目，對於各種動、植物的觀察有著極濃厚的興趣，我想，只要是從事生物研究或教學的人，都永遠不會喪失對各類生物的基本興趣。因此，我在東吳的校園漫遊中，發現了非常豐富的自然資源。

東吳的環境以專業角度來看，是一個屬於輕度破壞、少量污染的環境，因為我們有許多原生的植物，以及原本就棲息在這裡的動物，包括松鼠、鳥類、蛇、蜥蜴、蛙、蝸牛，以及各式各樣的昆蟲。而且除了肉眼看得見的大、小型動、植物之外，以微生物研究的觀點來看還有很多在水裡、土壤裡，看不見的微生物。雖然學校裡並沒有專人進行這方面的數量與種類的統計，不過以我們一般的觀察而言，東吳擁有的這些生物資源已算是相當豐富，尤其又是在台北市的近郊，實在很難得。

我常覺得東吳的環境真是得天獨厚，依山傍水，氣候穩定。在東吳的後山上，有許多屬於台灣低海拔的典型植物如相思樹、水柳、筆筒樹、山百合、野牡丹等，很值得同學們去認識。最近，學校裡的王偉健教官和登山社的同學，正計畫在後山開闢幾條簡便的登山步道，希望能夠把後山變成一個提供休閒、健身的環境。至於環繞著學校的外雙溪，在屬於學校的這個河段裡，算是只有輕度污染，於是我們可以看見白鷺鷥優雅地停駐，溪中還有許多的魚蝦，在午后金黃色的陽光裡，我們總是能夠見到三三兩兩的垂釣客，很專注地站立在清淺的溪流當中，整個景觀就像是一幀優美的圖畫。

在東吳的校區中，有一些較特殊的植物。十幾年前，我曾經請過台大森林系一位有名的廖日京教授來勘察，他在女一舍前發現一棵當時應該是台灣最大的綠珊瑚，可惜後來感染病蟲害無法醫治，而枯死了，十分可惜。在女三舍前也有一棵山黃麻，那顆樹可能是從前颱風時受到損傷，許多新的枝幹便從先前折斷的傷痕處長出來，樹幹上也形成了一塊塊的瘤狀物，十分奇特。

另外，東吳也擁有許多蕨類和地衣、菌菇等，曾經有植物分類學者讚嘆東吳是「隱花植物工作者的天堂」，它們常生長在陰濕的坡坎上。最獨特的像是中文系愛徒樓後面的水溝邊上有鐵線蕨，這種蕨類的枝莖是全黑且帶有金屬光澤，葉子呈扇形，葉緣還有波紋，一般都是盆栽養殖，不過不易照顧，而我們學校反倒擁有許多野生的。寵惠堂的後方有許多的姑婆

芋，因為正好適應有地下水的環境，所以生長的很好，如果種植其他的植物，可能就沒法存活。鐵線蕨和姑婆芋都是校區裡原生的植物，生長情形都十分的良好，並不需要特意的施肥或澆水，所以我們應該保存，而不要破壞它們。

綜合大樓前有黑板樹，寵惠堂前有小葉欖仁，而沿著男一舍前往上繞，直到圖書館前的坡道，便會看到青翠的龍柏沿路聳立著。在女三舍前，我們現在也從台北醫學院移植了一些楓樹，希望將來這些樹長成之後，一到秋天會有一大片，像火燄一樣鮮艷的風景。我們也種了一種名為「阿勃勒」的樹，這種樹以前並不會在東吳的校園中栽種過，直到我擔任總務長才建議種植，這種樹在夏季會開出累累成串的黃色花朵以及結成長條的豆莢，而且樹齡越久，開放的花朵會越茂盛，城中校區法學院前種了一排，今年夏天已經開花了。宿舍區裡有台灣山櫻花、洋紫荊、木棉、南洋杉，外雙溪畔有楊柳，全校各區有坡坎邊植有懸垂的雲南黃馨和紫花馬櫻丹。

在安素堂後方的坡坎上，我們也試種了兩棵台灣欖樹，因為校地的限制，現階段並不能大量種植，將來如果有新的校地，我們便希望能夠種植台灣欖樹，這是一種很美的原生樹種。校門口進來冤家路兩旁的尤加利樹，希望能漸漸地以其他樹種取代，因為尤加利樹雖然生長的速度很快，但是它的樹型不佳，經常長的歪七扭八，颱風來襲的時候，便會被吹折而損壞。另外，學校裡的松樹，生長情況非常良好，經常可以在樹下撿拾到像拳頭般大小的松

果，這樣的松果通常要到陽明山上或者是更高的地區才撿的到，而我們在松逸齋就可以看見，可惜現在有些松樹也感染到病蟲害，必須砍除。

其實東吳大學在先天的校地面積上，或許有限制，但是如果基本的設施充足，就一所中型的大學而言，我相信東吳可以發展成相當精緻的校園。學校擁有十分良好的自然資源，我想全體師生都應該盡力維護，在總務處方面有事務組及工友們在照顧著，但是如果在這個環境中活動的每一分子都幫忙維護，相信這個環境可以維持的更好。而且對環境的保持，除了每個人都盡到維護的責任，另外再加強我們的審美觀念，讓我們的校園除了整潔之外，在環境的配置上也能夠更賞心悅目。台灣很多大學的校園廣闊，但是相對的在校園維護方面的費用便十分昂貴，並且很難仔細地整理到每一處，而東吳大學比較起來，在人力、經費上較有餘裕，可以朝向更精緻的方向去做。

剛剛下過雨的午后，微風吹來，沁人心涼，站在超庸館二樓面溪的陽台上，我們經常可以清楚地看見美麗的彩虹，遠方的青山經過雨水的沖刷，顯得更加翠綠，這樣像圖畫一般的美景，是東吳師生們心中的驕傲。每天清晨，我總是開著車，越過充滿喧囂車聲、漫天煙塵的市區，走一條長長的路，往城市的邊緣去，晨光中，看見一座碧綠的山城，在喧嚷的城市裡，沉穩地發出鼓鼓地脈動。

（採訪整理／吳家宜）

曾惠中，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系畢業，台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碩士，陽明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研究所博士。曾任東吳大學微生物系副教授，現任東吳大學微生物系專任教授兼總務長。

二十年與東吳圖書館共成長

王中一

光緒二十六年東吳就創校了。當時是由蘇州博習書院、上海中西書院和蘇州宮巷書院三校合併而成，所以我們學校是先有圖書館而後有學校的。但是大陸淪陷後，學校裡大約八萬七千多冊的藏書都沒能帶出來，實在是可惜。至於東吳在台灣正式復校以後，圖書館館務漸漸開展起來，先後有陸治洲先生、張萬鵬先生、袁坤祥先生、姜文錦先生、徐幼敏先生、盛子良先生、王國璋先生、俞雨娣先生等諸位歷任館長的主持，才慢慢的上了軌道。

一開始的時候，由於學校從漢口街遷到現在外雙溪這裏，圖書館也就在當時學生活動中心的樓上，和禮堂併用，算是正式的「開張」。民國五十三年安素堂落成，圖書館就使用教堂的一半和教堂地下室做為圖書館的固定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六十年，當時設立在城中校區的法律中心圖書室著手編纂《中文法律論文索引》，付梓後廣受法學研究者的推薦利用，也是我們的特色之一。

現在的中正圖書館是在民國六十七年俞館長任內正式落成啓用的。當時它是全省少數具

有全部空調設備、又實施開架式借閱的圖書館，可說是開圖書館界之先驅啊！當時端木校長就曾開玩笑的說：「要讓我們的學生常常上圖書館，即使是進來吹冷氣睡覺也好。睡在書旁邊，多少能感染點書香氣嘛！」至於圖書的藏書量，當時還不算頂豐富，但是爲了新館落成，學校還辦了一個「一人一書運動」也鼓勵同學的讀書風氣，也增加藏書和設備。到了民國六十八年，館藏書的數量就到達十五萬冊，在俞館長雨娣之主持下也開始進行西文圖書的改編計畫，由原來的杜威分類法改成美國國會分類法，幸好學校大力支持，僅費時三年就完成這前瞻性的工作，後來大家都改用美國國會分類法。

民國四十三年左右，當時學校剛從「私立東吳法學院」改爲「私立東吳大學」。初期在財力、物力極短缺下，成立許多系及研究所。其中法律研究所即是其中之一。因爲學校經費拮据，美國亞洲協會予以大量支援，並支援設立「法律中心圖書室」(英文名稱爲Law Center)，按當時其構想，需要一個懂法律又懂圖書館的人來主持，而學校決定這項工作最好能找一校友承擔。此時我正準備自美返國服務，已透過青輔會之安排，得到了中興法商學院法律系專任講師聘書及經濟部國貿局與財政部保險事業管理委員會等專員派令。而我接受了中興法律系聘書。此爲時任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知悉。因我東吳法律系畢業後，曾考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資料室工作過，端木校長親赴寒舍數趟，拜會家父母。熱切盼望我能一本「熱愛母校」之情，回母校服務擔任此職。當時有此背景之留美學生，皆不願長期回國服

務，何況那時的東吳待遇很低（國立學校一半）、工作條件也差。聘我為法律系專任講師兼法律中心圖書室主任。並由亞洲協會支助赴美國加州大學專習法律圖書館及舊金山市法律圖書館實際工作以增強我專業能力。此為我回母校服務之大致經過。

我接受母校工作時，即希望辦一個全台灣最好的法律圖書館之抱負。但是當時無一毛錢專用經費，端木校長此時指示設法外出募款、募書。不久即有回應。憑藉我在美學習法律圖書館之表現及建立之一點關係，亞洲協會又慨允援助部分經費支援採購西文法律圖書、編纂《中文法律論文索引》及辦理其他學校座談會之費用。此為最大宗者。又透過東吳之友 Dr. Rata 向美國校友及友人招募。尚有其他零星之捐款、捐書者，如美國文化中心捐書及部分私人……等，漸漸使「法律中心」有一點氣候了。當時國內經濟尚未起飛，公、私立學校圖書館經費拮据。我校之法律中心圖書室之英文版英美法、國際法成爲台灣最強者之一。除本校師生外許多現今知名外校之法律學者皆親自來參觀，或使用過。如今日台大之王澤鍵、馬漢寶、柯澤東、王仁宏等教授、文化之張溯崇教授、中興之林榮教授等。

隔了幾年，自己獲得國科會獎助，到美國耶魯大學進修。進修期間突然母校電報及電話，因館長家事緣故辭職。正值學年中，要我必須立即返校接任館長職務，使館務繼續運作，以後再完成學業。雖有些勉強，但還是立刻回國接下館長職務。一本當年返回母校之後初衷，全力以赴推進並改進館務，以求不辱使命。民國七十二年暑假赴美處理尚未結束之部

分私人事務，楊校長電要我赴 UCLA 協助 Dr. Rada 與 UCLA 大學圖書館交涉贈書事宜，接洽成功後。因本校經費有限，我又特自費轉赴舊金山尋求美國亞洲協會友人協助，支付美國之裝運費用並安排由美國海軍輪艦免費將此兩大貨櫃之西文參考書運回母校。當時此批資料是國內少有之較新資料。國家圖書館館長及其他國內圖書館學教授及同仁於參加本校本院圖書館活動時（展覽）時特別注意此批書籍。此為當時首屈一指之西文參考書籍，雖為舊書，但皆為 UCLA 剛剛淘汰者及複本書。在那時的台灣已是滿出風頭的呢！

民國七十二、三年，那時由於學校窮的關係，各系年度的購書經費大約只有新台幣三萬元左右，少的可憐。各方募款、贈書雖繼續不斷，但為數有限，品質也差。不過這幾年學校預算年有成長，從當年之三萬、七萬、十三萬、二十二萬、三十餘萬至到目前之水準。以今年為例，本校預算，加上教育部等單位的補助款，今年單單購買書籍資料之預算就達五千兩百萬元！此為最近數年私立學校（八所私立綜合大學）中最高者，甚或高過部分國立大學。使得最近六、七年本校圖書館所購書籍平均每年皆在兩萬八千冊左右。致使館藏超過三分之一皆是這五、六年購進之新書（版本也較新）。某些學系（領域）之外文書籍，在國內已具相當分量及部分特色了。配合圖書館所提供之館際合作，師生使用起來，應該便利許多。學校為了把錢省下來買書，館內之桌椅、木質舊書架我們皆自己從事油漆、釘釘子等修補工作，延長其使用年限，所以館內的家具看起來也沒那麼時髦。不過我可自豪的說，東吳學生所繳交

之費用經撥付購書者，沒有一分一毫浪費在其他的的事情上，全部用來買書籍現代化資訊設備了。

配合電腦資訊時代的來臨、時代的進步，從民國八十年由楊其銑校長支持積極從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專案小組採用了當時台灣市面最好的系統之一之SEA-URICA系統於八十一年完成上線作業，當時還算是國內少數大專院校圖書館一次完整購置採錄、編目、流通、公用查詢目錄，期刊模組的大專院校呢！民國八十二年我們還規劃了城區分館的光碟網路架設，可以和國科會的資料中心網路連線，供讀者連線查詢非常方便。又現代資訊媒體之電子化、多媒體化、視聽化等非書資料之應用為現代化圖書館中不可或缺者。經過多方努力，同仁之日夜辛勞，圖書館於民國八十三年時就啓用了「非書資料室」，深受師生喜愛及他校學生之羨慕。從此已為圖書館電子化、視聽化、網路化奠定了美好之基礎。

本校圖書館很早即加入人文社會資料合作組織、自然科學館際合作組織。民國八十七年更發起成立區域性的八芝連館際合作組織。用電腦連線找出資料，有些可以影印，有些甚至可以整本借，以彌補館藏之不足，服務師生。八十七年我們也參加一個期刊聯盟（全國數位圖書館共享聯盟），有一千兩百多種電子期刊。學校就訂閱了八十八種，不但可以查詢，列印也是免費的。因為電子期刊及網路化是世界發展的趨勢，也是將來必然的發展重點，尤其在極端欠缺空間及經費的東吳更是必要的。同時在適度的配合聯合採購，使此項服務更為完

美。

除此之外，原本學校出版的《中文法律論文索引》，端木老校長明確的說：「只要東吳不關門，這個索引就要進行下去！作為本校特色之一。」因此我們也在持續的進行，並規劃將它光碟化，使用電子資料的形式呈現於社會，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嘉惠更多學人。

衆多先進國家，政府都培養孩子從小學、中學就持續養成利用圖書館的習慣。有許多人，在周末假日的活動就是和孩子們一同上圖書館閱讀或借閱書籍。站在圖書館推廣服務的立場，我們很早就希望從這目標邁進，輔導同學如何使用圖書館並養成習慣，在校時可擴大其課堂學習效果，離校後可終身學習，充實其生活、助益其事業。基於此緣故，便積極向學校爭取在外雙溪校區及城中校區各開設一班「圖書資訊利用」的課程，希望每個同學都知道如何利用圖書資源，目前反應良好。

我們不但關心並協助師生們利用圖書館設施。同時也不斷鼓勵要求同仁之在職進修、接受新的知能、提升服務水準。本校圖書館之服務同仁中約有四分之一是美國圖書資訊碩士，四分之三以上皆為圖書館資訊學科畢業，並有一為本校資訊系系友負責電腦硬體管理及維護，可說是國內大學圖書館中專業素質很強的一群。他們還不斷參與各種有關校內外課程、訓練、講習、相互教導學習。部分同仁已考進研究所帶職進修中，更也請校外專家學者來館演講、座談。凡此種種，皆是為了跟上不斷進步之圖書館資訊時代，提升充實對師生服務水

準及內容。圖書館與讀者共同成長。這樣的努力分別於民國八十六年及八十八年兩度佳評。評語分別為「圖書館館藏豐富、設備齊全、管理良好、圖書館設備使用率高」及「圖書館之成長數達兩萬六千一百九十三冊，期刊管理及服務良好」。可說是對我們同仁多年來不斷的努力加以肯定。

回想這半生與東吳圖書館的相遇，總括來說就是有感於東吳傳統之「情」與「義」。這兩個字其實也是東吳早期在台復校的動力，更可說是東吳今日賴以生存發展之根源。想想政府遷台初期時局動亂，個人及社會皆極度貧困，能夠集合校友熱情及社會人士的幫忙，捐錢的捐錢、捐書的捐書、出力的出力，一點一滴經營至此，豈不是「情」與「義」二字使然嗎？我真切的盼望東吳人繼續團結在「情、義、簡、樸」傳統精神下更加努力，再開創未來千萬個「百年」昌隆的校運，以不辜負在台復校先期校友及熱心人士的犧牲奉獻啊！

（採訪整理／吳芃影）

王中一，東吳大學法律系五十一級畢業，現任東吳法律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回首來時路

許玉珍

民國六十九年初秋，我來到了從未謀面的溪城。沿著外雙溪觸目所及盡是白鷺鷥和悠游在溪水中的魚類。我知道自己會喜歡上這裡，因為這裡的青山、綠水將我拉回了記憶中的美好童年時光。這一喜歡竟待上了將近十五個年頭。

依稀記得大學時代的自己每天都很期待上學，那種感覺像是每天都要去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旅行一樣。每天早上在士林下了公車，就沿著中正路一路踱步，觀賞著路旁的美景，哼唱唱愉快地直到學校。路旁的稻田、野樹雖早已蛻變成了美景公園，卻也是另一種不同的風光，但不變的仍是它的美麗。每一天早晨，我都期待被這樣的明媚風光輕輕喚醒。雙溪人另一樣得天獨厚的福氣是，即便是坐在教室裡，也可以在上課的同時，雲游在窗外的山光水色之中。這或許是大多數城區東吳人所不曾擁有過的美好經驗吧！

大學四年匆匆而逝，畢業在即，但我仍不知自己將何去何從？既不想當公務人員，卻又沒有足夠的錢可以出國唸書，當下決定先找一份工作！當時語言中心正在招考英聽助教，抱

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前去應試，想不到竟然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得到我的第一份專職工作。當時每一位助教必須負責大一及大二共八班的英語聽講實習的課程，上課時也必須使用英文來作為溝通的工具。儘管自己曾經主修英文，但自忖自己的口語能力仍有待加強。所幸當時的主任吳子平老師為我們聘請了語言學方面的專家鄧林爾教授（Prof. Paul Delinger）來教導我們有關英文測驗方面的相關專業知識。每周兩小時一整年的課程不但使我們對英文測驗方面有了更多的認識，之後鄧老師更促成了我的留美之行。

在兩年的教學過程中，自己常因為無法真正為同學們解決學習上的困境而感到沮喪。因著心中強烈的求知慾，和想要一探教學殿堂的初衷，在七十三年十一月便下定決心準備出國進修英語教學。在中心一待兩年，這之間承鄧老師及英文系諸多師長的協助與鼓勵，終於完成了繁瑣的各項申請工作，並於七十五年盛夏赴美深造。

七十七年返國後，又承母校的老師們多方為我引薦教職。除了在英文系、推廣部、政大語視中心及國立藝術學院擔任兼任講師的工作之外，也得到參與環保署英文建教班的工作機會。如此的因緣際會不但豐富了我的教學經驗，同時也拓展了我的生活圈及交友範圍。八十一年二月，我在語言中心覓得了專任的教職。這一路上，心中多有感謝。感謝母校師長對我的栽培及協助和關愛，更謝謝學校給我一個日日與它親近的機會。

長久以來，中心一直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八十三年初秋，我因意外造成椎間盤突出而

住院，並於隔年辭去了專任教職。當時的主任余綺芳老師見狀，建議我轉任行政工作並繼續擔任兼任教師的工作。原本對於行政工作一竅不通的我，在同事們耐心的幫忙下，工作終於慢慢步上了軌道。除了一般的行政工作之外，我也因著中心工作的需求，慢慢開始學習接觸自己一直毫無涉略的硬體機器。剛開始的時候，複雜的線路，多樣化的機器設備，常使我感到沮喪。還好之前曾經使用語練教室的教學經驗，多少補足了部分硬體知識不足所帶來的困擾。

接下行政工作第一年的下半年，我便著手編寫各語練教室的機器使用手冊，並且負責在每學年的第一個學期舉辦語練教室說明會。雖然自己書寫使用手冊的方式並不專業，但之中卻累積了許多自己在使用機器上的秘訣與注意事項。平日點點滴滴所累積的這些硬體知識，不但使自己在上課時得以更充分使用這些機器，同時也活潑了自己的教學方式，這之中的收穫無法用言語盡述。經過三年多的時間，我終於對於教室裡的大小機器和主要零件有了基本的認識與概念。如今中心的同事們有時還可以權充臨時的技術人員，為老師們解決一些簡易的操作問題。

此外，因為業務上的需要，我必須學習與廠商聯繫購買硬體設備等事宜。在每一次的洽談之中，我對那些硬生生的機器又有了更多的了解。每一回當中心購入新機器時，我便會開始另一次學習新鮮事物的驚奇之旅。隨著時間和工作性質的轉換，我逐漸看清楚自己的另一

個潛能。除了原來棘手的機器問題已經能慢慢上手之外，各樣工作也都漸入佳境。

八十七年五月我揮別溪城轉至城中校區工作。這裡雖然沒有青山綠水，花香鳥鳴，但我還是再次感受到了熟悉的溫暖與自在。工作的路上，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謝謝中心歷任主任的支持，技術先生們孜孜不倦的教導和協助，以及同事們的各方幫忙；也謝謝其他與中心業務相關的學校各級工作人員。因著你們，使我在生活的路途上又看見那久違的美景。

許玉珍，東吳大學英文系七十三級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英語教學碩士。現任東吳語言中心編審，歷任東吳語言中心講師、英文系兼任講師、國立藝術學院共同科兼任講師、政大語視中心兼任講師、東吳推廣部英文教師、環保署英文建教班英文教師。

深深埋藏

張維中

整理書櫃的時候，擺放在櫃子上的畢業團照忽然間掉落下來，我被突來的擊響嚇了一跳，幾秒鐘過後才漸漸地回神。

灰塵飛揚四起，在午後的日光中，緩慢而寧靜的游動著，像一枚石子無心掉落進池塘裡，水波盪漾，卻又一點聲響也沒有。我蹲下撿起照片，用雙手擦拭塵埃，準備將照片放回原處時，它卻抓住了我的目光。我暫時放開了手邊的整理工作，坐在混亂的書本和信件堆裡，注視著很久沒有仔細看過的畢業照片。

已經好幾個季節過去了嗎？我們不是還一直惶恐著大四的生活流逝得驚人嗎？此刻照片裡的我們，居然已經四散在不同的生活節奏裡。原來，我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竟然是上一個冬季的事情了。

前一陣子，大學時期的摯友從美國流浪三個月回來以後，來到我的住處叙舊，我們一時興起，就拿著這張畢業團照細說從頭。那時突然發現，面對著這張照片，彷彿有一種新的遊

戲正在展開。我們驚覺，對於照片裡有些人的面孔，竟已經開始感到陌生，而那一些從前在班上就不是和我們往來頻繁的同學，甚至連名字也已經淡忘。於是，我們便開始玩起猜一猜的遊戲，或者說是連連看的遊戲，努力地結合人像與姓名。我們不可置信地笑著，笑著對方的記憶力的差勁，然後像是不願在遊戲中投降認輸一樣，堅持不翻看同學名錄，直到想出就算曾經不熟識也牢牢記住過的名字，宣布尋回那些軼失的符號，贏得勝利。

遊戲結束以後，我們卻悵然地認為，那實在是一個太滄桑的遊戲了。

「爲甚麼會這樣呢？大學四年，畢業就忘光了。」摯友說。

「班上同學，本來就是隱隱約約分成幾個小團體在活動著；畢業以後，頂多就是各個團體會時常聯絡，那些原本就與我們交集不多的人，幾個季節都未曾叫過他們的名字，會遺忘，似乎也是自然的了。」我解釋。

那時我說的很自然，很有邏輯，但實際上感受卻並不深刻。直到幾天以後的傍晚，我經過很久沒去的城中校區校園時，才重重地感覺到，改變的痕跡。

轟聲隆隆的挖土機，笨重的機械設備，被翻了好幾層的石塊，以及漫天飛散的塵土，整個的霸占了我的視線；曾經的排球場、網球場，還有幾棵綠葉繁盛的大樹，如今，全部都消失了。我怔怔地看著，突然以爲機械怪手翻挖的並不只是那方場地，而是我安放好的往昔回憶。

曾經這一塊用鐵網高高圍起的場地，是所有在城中校區唸書的學生們，最珍惜的一塊校地。無論是不是喜歡運動的學生，總覺得一個校區總必須有一座操場，只是，學校處於城市的重要地段，那樣的必備都變得奢侈了。因此，大家開始知足地明白在黃金地段的校區，除了一個籃球場外，還擁有一處設備完善的戶外排球及網球場，是很幸福的了。

互不熟悉的同学，就在這樣的校園裡生疏地開始第一堂體育課。我和同班同學們站在這裡，結結實實地用雙手拖出大學生涯的第一發排球，當然，我也同時徹底覺悟一個缺乏運動細胞的人，可以遲鈍到多麼嚴重的地步。

發球失敗了，分組的同學們嘻嘻哈哈的，輕鬆撿起排球，決定再來一次；而歲月就從那第一顆球飛出去的同時，也從我們自己的手中輕輕被推出。一推出，才發現一切都將開始飛奔，永不回首。

那時，常在夜晚時分上體育課，整個排球場以及大樓與大樓之間的籃球場，就會亮起一旁高聳的照明燈，將整個的場地用強光包裹著，耀眼明亮。

同學們依舊在教室及走道間穿梭，在光亮的場地裡活動，在擁擠的社團辦公室中嬉笑，全然不覺得已經是一個入夜的校園了。

當時的章校長常幽默地說：「城中校區的同学可不能摔跤，因為一跌倒，頭和腳都在校外了。」但是，我們後來發現，校園狹小，反而成爲學生覺得這裡可愛的原因之一。社團辦

公室相親相愛的擠在一起，常常是參加了一個社團，也就等於會認識所有圍繞在四周的好幾個社團，結交更多朋友。擁擠的大樓，時時刻刻塞滿了學生，尤其一到了中午或傍晚，日夜間部學生同時出現的時段，教室與走道間更是一幅人潮喧騰的景象，有些人覺得喘不過氣，也有人認為熱鬧無比。

到了用餐時分，大樓旁走出去的街角，就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攤販，販賣多重選擇的熱騰騰的餐點。有西式的漢堡和三明治，也有中式的油飯和蔥油餅。常常在只有半小時的晚餐時間，趕著去買一份貨真價實的蚵仔麵線，或者漢堡加蛋，然後回到教室裡用文法書拌飯。漸漸和同學們熟識了，時間充裕的時候，就會到實踐堂旁的街道裡吃香噴噴的排骨飯，偶爾還會吃一碗紅磚道上老伯伯賣的傳統豆花。因為校園就在市區裡，一個人的時候，常會在重慶南路的書店裡閒晃，等待上課再回到學校。更多同學湊在一起時，要去新光三越附近的炒飯店吃飯，或者要到西門町看場電影，繁華的街市都近在咫尺，距離一點也不成問題。

後來，學校公告外語學院即將遷回雙溪校區上課。許多系上的同學們開始連署簽名，齊聲反對；當然，也有另一些同學們，贊成搬遷到終於有操場的校園裡繼續上課。那時候倘若被人問起你的想法或意願，簡直就像是選舉投票前，被人強迫表態支持哪一個政黨或候選人，如履薄冰的，深怕回答不宜，連朋友都會失去。我從小到大一向很安身立命但又潛在著不安於室的血液，所以，對於遷不遷校，總是抱著觀望的態度，聽天由命。

終於，還是來到新的校園裡上課了。校園裡不再看見高架著的明亮日光燈，沒有擁擠的人潮，取而代之的，是靜好的山巒，清澈的溪水。在寧靜的空間中，感受昏黃的燈光柔柔地鋪照在走過的路上。起初，在夜裡下課後的寬廣校園裡行走著，總覺得冷清許多，常常聽見同學們埋怨種種，說是懷念城中校區的一切，但是日子一久，也不再聽見有人抱怨了。

對於一個空間的情感，從來就不是憑空而來的。在新校園裡發生的故事，遇見的愛人，還有和死黨之間更多的喜怒哀樂，點點滴滴的記憶累積，已經讓自己和另一個校園又緊緊密合了。當我開始希望在這個校園裡的所有事物都能夠停駐時，現實卻又一步一步地剝去了夢想的外衣。

章校長過世後的某一個下午，經過新光三越附近的炒飯店時，赫然發現店面已經消失。後來聽朋友提起，實踐堂對面賣豆花的伯伯也很久不見。至於城中校區校園和附近的商家與餐廳，我幾乎更是從來沒有再去過了。

畢業以前，雙溪校區開始整理起校門前的空地，還不知道將來會變成甚麼樣的景致。操場和籃球場開始整修，聽說過一陣子，溪邊的鐵皮屋社辦也會拆建。

還有甚麼地方會改變的呢？畢業以後，回去過幾次學校，縱使改變仍然不大，但我也明白，當故事離開，當我不再和同樣的人們一起生活在這裡時，屬於我的那一個校園，就已經不存在了。所有留在這個空間的記憶都停格著，停留在我仍於此上課下課的日子裡。

「聽說要蓋大樓吧，學生太多，教室太少了。好像以後也會建一個室內的球場，所以還是會有地方運動的。」朋友說。我看見城中校區的球場，搖身一變，成爲了一個大工地，不可置信地告訴大學摯友。

我相信將來會有一棟壯觀的、更多功能的嶄新大樓出現。到時候，球場不再是戶外的，毋須面臨風吹雨打，教室走道也可能不再擠著這麼多人。校園環境想必會大幅改善，但，那究竟不會走進我的回憶了。

大樓會建在那方土地上，在地基的鋼架裡，深深埋藏著我的青春的歲月。

我沒有告訴我的朋友，那一個傍晚，我發現球場不見時，還走進從前在學校裡用餐的自助餐廳，結果發現連地下室的餐廳也變成了社團辦公室。

超商還是在的，我買了一罐飲料，離開大樓，走過水泥地籃球場時，一顆籃球忽然滾到我的腳邊。我撿起球，丟還給球場上的男孩們，轉身回頭時，竟然發現遠處工地的機械都不見了，整塊地在夜裡又閃亮成一片光芒。

我看見幾個背影像是我們的孩子，在球場上奔跑著，但一眨眼，天空又暗了下來，孩子們的衣衫，飄飛在空中，成了幾隻遠去的白色鴿子。

張維中，東吳大學夜英文系八十七級畢業。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教育部藝術創作

獎、梁實秋文學獎、華航旅行文學獎、長榮寰宇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雙溪文學獎。已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說集《LOVE紅標男孩》、長篇小說《岸上的心》、《水城之風》、旅行筆記書《水色天光》。

小記「人民公社」

阿盛

東吳大學校園內只有一條大路，從大門通到後門。出了後門，沿外雙溪行走，一公里餘，小坡上，幾棟「學生寮」，私人建造的，專用以出租給學生。一九七〇年代初，我們稱之為「人民公社」。

號為人民公社，取其簡陋窄狹之意。每月租金兩百元至三百元，當時吃一頓普通自助餐，約須六、七、八元。

住進人民公社，有得已有不得已，學校裡的學生宿舍不足，也較不「自由」。但女生們通常不住公社，一來該地相當偏僻，幾乎遺世獨立，二來自學校至公社途中，夏季群蛇出沒。

蛇真是多，據聞日據時期東吳附近有一毒蛇研究所，日人走後，有不少長蟲被「放生」。男生們當然也怕蛇，不過，怕歸怕，吃歸吃，我有個學長，最高記錄是一整個夏季吃掉三十多條蛇，我不吃那東西，每見他們吃得齜牙裂嘴，總是渾身起「鷄母皮」。

公社約有五十戶，一戶一小間，房東的代理人一個月出現一次收錢，我們呼他爲「共匪」，沒什麼惡意，純是討厭那種死要錢的嘴臉。有一次，學生集體作弄他，灌了酒醉，在他的帳目紙上用他的筆胡亂打勾，打勾表示租金繳收了，這傢伙厲害，醒來瞧瞧帳目，一剔掉被做手腳的符號，後來我們才打聽出來，他打勾的手法是獨創的，既像「乙」字又像英文「V」字小寫。他不多言，也識不得幾個字，卻有辦法記住每個住宿生的長相特徵、就讀科系、何方人氏……所謂天生萬人各有其用，真是一點不假。

距公社半公里處，另有小型「學生寮」，那房東是退役老兵，一年聽不到他十句話，天亮工作到深夜，家裡養鷄養鴨養豬，糞便全倒進溪溝裡，溪溝直通外雙溪，外雙溪受污染，他得負很大的責任。他的房屋一半以上是違建，偶爾有公務員要拆他的違建，他太太就把幾十隻豬放出去，讓他們到處走動，公務員連鐵鎚都使不上，吆喝一番，不了了之。

東吳音樂館大約於一九七三年興建，暑假，我隨幾位原住民工人做苦力，在音樂館的鷹架上扛模板，右肩破皮腫痛換左肩，然後又換右肩，爲的是一日八十元工資，童工計酬。那時住小型學生寮，月租兩百五十元，白天打工，晚上若有機會則到東吳旁邊的中影製片廠充當臨時演員，一夜工資亦是八十元，外加一個消夜便當。某夜，我穿上臨時演員服裝後，等待拍戲，想起一件急事未做，奔回住處，遇見房東太太，她看著我，愣了一下，癱坐地上，叫都叫不出聲，那臨時演員服裝是古代（導演沒告知是那一朝代的），破破爛爛，我臉上還塗

了紫、藍、黃各種顏色。

似乎是東吳音樂館蓋到一半的時候，一日，我扛著模板準備上鷹架，一腳踩到硬物，低頭看，一根數吋長的新鐵釘穿透腳掌，用力拔出，抓沙止血，居然次日照樣工作，怪不怪？住學生寮，鬼怪傳說特多，往往推窗外望，便見墳墓，樹林濃密，入夜悄然，陰森駭人。有一讀法律系的學弟，自言不信鬼神，有點自大，經常說些「天下唯法律最大」、「六法全書是眾鬼的剋星」等等令人摸不著邏輯的話，就有一回。他從人民公社走回學校，半夜無月光，暈倒在途中，被同學抬到住處，臉色青青，根本不能說話，自此個性大改，陸陸續續他才提起，那一晚……他見到一個……確實不是人……白髮白鬚……坐在路邊墳前……清清楚楚……

那學弟如今是檢察官，偶或寫信給我，都會感激「法律無力」、「決案判是非很難」、「人比鬼還可怕」云云。

當年人民公社及小學生寮的伙伴們，許多人都已「功成名就」，有的當國大代表，有的當縣市議員，有的炒地皮致富，有的是各行各業中堅，有的在老鼠會撈了一大票，有的回母校授課……聚會很少，即使不期而遇，談的不外女人、鈔票與政治，但若談起人民公社等學生寮，神情便改觀，少了世故，多了真意，聊得起勁，有的人還會唱起東吳校歌。

近幾年來，時或回母校演講、評審，總是去來匆匆，無暇重遊人民公社或其他學生寮，

也許模樣變了，也許沒變。但可肯定的是，學生寮還存在，其中一定也住了一些與我們當年一般的年輕學生，有著和我們差不多相同的夢想……

阿盛，本名楊敏盛，台灣新營人，東吳大學中文系六十六級畢，曾任中國時報系記者、編輯、主編、主任等職，現主持「寫作私淑班」。著有散文集《行過急水溪》、《春秋麻黃》、《五花十色相》、《銀鰠少年兄》等十八冊，長篇小說《秀才樓五更鼓》、《七情林鳳營》等，另主編散文集十三冊。

驀然回首

王宣一

應該是轉了好幾轉吧，同學在電話中說，找妳真不容易，我們要開同學會，畢業二十年的同學會。

哦，二十年了嗎？我有些愣愣的，他接著提出一大堆問題，妳到底在做什麼？結婚了吧？畢業之後爲什麼就失去聯絡了？妳有幾個小孩？妳住在哪裡？我被問得有些尷尬的就好像當年迎新會上，他問我，妳叫什麼名字。接著，同學開始敘述如何找到我，他說，我們還打電話到台北市政府去呢！我大笑，打電話去市政府做什麼？二十年前的電話號碼仍然可以用，爲什麼不打？噢？真的？他被我嚇了一跳，喃喃的說著什麼，然後又說，妳的笑聲還是沒有變，妳說話的聲音和語氣也和記憶中一樣呢！

其實自一九七八年六月畢業至今，說起來也不算太久遠，但爲什麼二十年來一個電話沒變的人，卻完完全全斷了和同學的聯絡？爲什麼那一段潮潮溼溼的外雙溪的日子很少在記憶中湧現，而今突然接到同學的電話，卻恍如隔世般的，有什麼特別的因素嗎？掛上電話，我

開始問自己。

應該就是都市人每天忙忙碌碌過日子，舊的日子舊的朋友就這麼自然的遺失了吧，想不起來有什麼特別的恩怨情仇，記憶中只有外雙溪的陰冷潮濕，很多人流連不已的大學生活，我卻似乎因為沒多花心思在課本在學問在同學在校園，最後卻只留下一片空白。

爲什麼我的大學生活有一點留白呢？

回想起來應該是青春叛逆的某一種延續吧，那時很希望要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大學生活，因此不怎麼珍惜那個小小的溼冷的校園，同時又因爲是轉學生的關係，從來便有些沒誠意好好的加入同學的生活，不只班上的活動不大熱心，即使是參加了一些社團活動，也是半推半就有一搭沒一搭的，每天匆匆的在校園中來去穿梭，有點孤傲還是什麼的，似乎一直沒有敞開自己的心胸接受這個校園。

那個時候，有一些自以爲的另類，記得最後和同學親密相處的畢業舞會，在我們那個白雪公主的遐想年代，在陽明山某個借來的招待所，男孩女孩花枝招展的，大多換上漂亮的洋裝西服，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天穿著牛仔褲和T恤的我，坐在舞池旁，一面回顧著那些外雙溪的日子，一面比照一下鹿橋筆下的《未央歌》，自以爲更浪漫更瀟灑。當年，以爲孤僻就是帥吧，回頭來看，除了多出一塊空白，也沒有更高明、或更有創意。

不能怪誰的，遺失就是遺失了，不管是他們遺失了我，還是我遺失了他們，因此即使偶

爾想起他們，卻也鼓不起勇氣打個電話或是稍費點力去打聽一下老師同學的狀況。

終於他們又回頭來尋，而現在某些人又聯絡上了，會不會一個電話之後又是二十年呢？

同學會終究還是沒有去，一方面，在台中，好像有點遠，假期嘛，會塞車，很替自己找了一個藉口，雖然彷彿有「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驚喜與惆悵，但還是沒有調整好見故人的準備。

同學會之後，他又打電話來，妳怎麼沒有去？聽說妳出國了是不是？我含混的應著，他又用我熟悉的語氣興奮的描述著誰誰誰去了，誰誰誰怎麼樣，最後他下了一個結論，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沒什麼改變，都和當年想像的差不多。是呀，我說，也許變化較多的人就不想參加同學會了。沒錯，他停了一會兒忽然浪漫起來問我，我以前有沒有單獨和妳約會過？沒有，我很肯定的回答，一起跳過舞吧。當然，我記得的，他換了一個語氣說，其實同學會妳沒去也好，妳知道嗎？我的身材可是完全走樣了，我現在八十公斤，別見面也好。

我又大笑起來，突然指間似乎憶起當年和他跳舞時，手環著他的腰的感覺。

王宣一，東吳大學中文系六十七級畢業，曾任中國時報、時報週刊編輯、記者。

著有小說集《旅行》、《少年之城》、《懺情錄》、《蜘蛛之夜》，親子旅遊書《家庭旅遊》，兒童圖畫書《三件寶貝》、《哪個錯找哪個》、《金瓜與銀豆》、《青稞種子》、《九十九個娘》等多種。曾獲多次聯合報小說獎、金鼎獎等。

百年樹人話東吳

陳松雄

夫聖王之繼天立極，君子之開物成務，莫不敬敷教義，弘宣彝倫。堯朝司徒之官，虞廷上庠之職，夏代東序之館，殷周學膠之府，所以培靈化性，明道崇德。假禮樂詩書之教，陶冶情性；藉仁義忠信之德，鎔鈞氣質。揚輝光於天下，美風俗於四方，斯教育巍蕩之功，大學淵塞之用，先聖極宏創之力，後王盡不闕之能者也。

東吳上體聖心，下通民志，當衰清多事之秋，承季世頹敝之餘，亟思圖謀振作，力挽狂瀾，培育多士以救國，弘揚大德以敦化。陶鑄性靈之美，開啓智慧之用。卜地舊吳之濱，占星東道之表，興建黌宮，賓延師儒，栽植桃李，培育俊英。當規模之粗具，值國事之多虞。列強窺窬，伺我瑕隙，辱國喪權之危，齊人波蕩；救亡圖存之義，志士雲湧。班馬動而帝制摧，魴魚頰而清室燬，卿雲爛漫，重奏虞夏之音，日月光華，再甄漢唐之舊。當茲風雨晦塞之秋，雲雷屯合之會，東吳猶峙中流之柱，保歲寒之姿，設幔傳經，開學講藝，高唱弦歌之聲，穩操風教之鐸，覃宣時雨之化，精拭靈蛇之珠，望德星以聚賢，播書種以貽世。鷄鳴之

操，譜爲周詩之詠；松柏之節，讚響論語之書。民國肇造，氣象更新，九州置驛，萬國通郵。科技日進，馳騁乎利用厚生之道；思想蓬轉，趨競乎民主自由之途。東吳則尊古用今，乘勢制宜，校政盡心以務實，課程窮力而追新。仰觀國家之期望，俯察時代之趨勢，民主與自由並進，人文與科學共榮，傳統現代，齊重而交流，理論實務，合璧而兼顧。教澤永嘔，響窮蘇杭之濱，德業交著，光照華夏之表。地異緇帷之林，覃被儒教，人本炎黃之裔，精通西學。收奇瑰於巖穴，振滯屈於繩樞。鼓篋勸學，師資盡一時之選，攻木承教，青衿皆全國之英。造法學之高才，範揚中外，育生化之秀士，聲騰遐邇。依山桃李，臨春風而結繁，在阿菁莪，過夏雨而爭茂。觀看群英聚處，皆如竹箭金石，吟賞佳木叢生，無非榭桷豫章。東南文教，廣被雕潤之功，錢塘形勝，深染風雅之彩，巍巍宮牆數仞，參天而贊其化；槃槃士子萬千，挺幹而致其才。裨益國運，粲然可徵。不意東倭野心，舉兵西犯，鯨鯢揚波，自矜海國之雄，鷹鷂礪吻，直逼蘆溝之橋，迭地奸好，攻城擾鄉，虔劉無辜之民，挫辱大漢之威。於是抗日軍興，全國一志，政府移都改邑，避敵遷蜀。滄海患桑生之劫，金陵聞麥秀之歌。東吳罹此亂離之運，邁茲陽九之會，滔滔天下，踽踽獨行。法律學門，獨留上海，文理諸院，飄寓各方，荆逢離析之運，豆遭剖分之途。蒿日時艱，能無悵恨？然而剛健篤實，輝光日新。銅馬生郊，妖蛇起陸，所以竦動其心，堅忍其性，樹彼幼苗，冀成棟樑，鑄此多士，望邁真龍。是以弦誦相聞之地，則俊彥輩出，憩遊所及之區，則慧智叢開。江山故宅，

憑添文藻之華，雲雨荒台，倍厲精剛之操，集義養氣，學道經國。或輸家紆難，效卜式之大義，或請命赴敵，慕終軍之長纓。成德達材，竟克抗倭之烈，愛國從軍，終奏攘夷之功，廓清海氛，復旋京闕，龜陰反見奪之田，鯨鯢斷猖披之路。重光禹甸，再睹堯天，履國步於康衢，復王道之一平。雖曰全民效命之功，豈非書生請纓之力哉？無何而烽火迭傳，赤焰旋張，初但憑城，終爲毀室。東吳師生，徘徊歧路，或低回故園，守杏壇以育杞梓；或遙望海濱，乘桴槎以渡蓬萊。固護堅石之國，竟瓜剖而豆分，光輝張日之校，終運歧而命舛。於是在臺校友，旅外群英，共倡復校之議，同表育才之誠。幾經盡心竭慮，研議擘畫，輔以教會翼贊之功，賢達貢獻之力。終而卜地士林之郊，起舍雙溪之旁，依山面水，飲景含煙。俯視中影之縈迴，草舍古道，瓊樓玉宇；遠眺故宮之體勢，鋼殿石階，鳳闕龍閣。群峰鍾靈，叢木毓秀，臨水聽雨，望岑迎風。尋幽訪勝之客，流連雙溪之境；探寶稽古之人，徘徊博物之宮。或歎風景之美，或稱國寶之奇。此則溪城之大觀，亦爲東吳之腹地也。學子優遊其間，陶然自適，澡雪精神，澄清心慮，仰觀吐曜之奇，俯察含章之秀，頤情學問之府，篤志德藝之園。自然氣質深厚，器度淵雅。輔以謹嚴成風，純厚爲尙，崇實祛浮，師儒免櫛楚而威，含華擢秀，英幹干雲霞而上。斯蓋環境幽雅之區，衣被之功聿著，學風敦樸之教，沾溉之澤斯深。處厚居實，老聃期丈夫之言，務勤戒嬉，昌黎勉諸生以學。原泉混混，有本始騰其瀾，虎文彪彪，依質方耀其彩，本質深厚，不其懿與？

多年以來，穩健發展，宮舍高峻，覆壓寬廣，板築學堂之殷，各抱地勢，規模擘畫之勤，咸依物曲。盤盤綦迥之館，困困簇擁之宮，先生皆博聞名師，青衿率好學高徒。是以教功纍纍，人才濟濟，或張英聲於海外，或樹典範於國中。無論法政工商，文理科技，彥士紛起，俊才間出。並標能擅美，含光耀采，各領風騷，抱當仁不讓之懷；咸躍騏驎，有在轡不勞之概。或馳騁政壇，昂昂廟堂之器；或精通律學，巍巍法界之英；或妙達貨殖之術，經商以富國；或深造科學之知，利用而厚生；或託文學之車乘，昭明世化；或預教育之講席，陶鑄俊英。東西南北，至道傳播於四方；政經工商，頭角崢嶸於各界。雨潤風化，杏壇盛結奇果，實至名歸，東吳大放異彩。

邇來更恢廓襟期，覃宣教義。校長雄圖四溢，慧眼獨具，百務填膺，極盤錯之艱難；杼軸在懷，開欣榮之面貌。禮聘名師，賓延碩儒，用心校務之推動，致力行政之革新。美化校園之觀瞻，兼尚文雅；加強教具之設備，齊重質量。語言器材，更新而汰舊，電腦裝置，隨時而進階。廣體育之用品，精音樂之教具。凡斯種種，苦心孤詣，苟利教功，縱耗資而不惜，能益生徒，雖困神以奚傷？是以黌宮撲地，吟聲沸天。校部則學舍與攢峰交映，融然訢合；城區則樓閣與群廈爭雄，巋焉獨立。竦黌宇之嵯峨，蔚英髦之薈萃，規模宏偉，聲華卓著。是智慧綻開之花，亦心血累積之果也。

余爲校友之一員，亦列教師之末席。恭逢大典，作文記盛。雖積翰累紙，難美大德之形

容；賦詩連篇，何盡茂勳之歌詠。蓋百年鳳曆，傾教澤以長流，萬里鵬程，諒校道之非孤。自古樹木爲易，樹人爲難。是以拜師而學，聖人有數進之戒，得英而教，孟子抱至樂之心。東吳建校百年，甄才無數，成聖人所難之事，推孟子所樂之心。今值期頤之大慶，會賢達於高堂。緬懷先輩之創基，近維師生之盡力，僉勉同心，積漸大成，是東吳有慶之功，乃國家無疆之福。願我前輩之師，後進之友，共勵湯盤之德，齊奏天保之音，襲百年之成業，開萬代之雄圖。則品物咸亨之理，有待東吳而宏大，乾坤不息之機，有待東吳而廣颺。願樹範於後昆來者，歷歷以薪傳，繼此而千載萬世，蒸蒸日上，盡罄至誠之禱，永垂無疆之休。

陳松雄，性樸實，不趨世利，遂託文學之車乘，寄情志於載籍。五十四年秋，負笈本校中文系，閱四載而畢業。既入文大中研所，歷碩士而博士。然後任教於銘傳，尋又受聘於警大，並兼課本校，迄今有年。鱣堂執鞭，更三十年之鳳曆，世間過客，值五五歲之馬齒。所望更進於來日，庶幾有成於暮年云爾。

片片語絲憶東吳

謝政諭

在名作家張曼娟教授的聲聲催稿中，使我這個忝為平凡的東吳人倍感無窮的壓力，在所
知麤陋下，要談這一不平凡的百年學府，千絲萬縷的思緒與情懷，豈止是誠惶誠恐所能描
繪，真怕一語之漏，錯失了他的真精神，而他的真面目，又豈是千言萬語所能道盡。

錢賓四先生、金耀基教授，都曾以「人統」、「學統」、「事統」談及中國學術傳統及大
學之理念。在援引這三大系統概念下，淺談個人所知所歷的母校若干片鱗鴻爪。

第一次聽到東吳大學是高一英文老師（吳坤緒先生）談及當年他們在夕陽西下時，於外
雙溪畔朗誦莎士比亞的詩意與美景，想不到三年後，竟然進到這所「雙溪潔秀，綠疇平曠」
的校園。這似乎印證了，沒有「校友」，就沒有你我的緣份。

東吳人都耳熟能詳的了解到，一九五一年政府遷台之初、國事如麻之際，校友們鑒於本
省大學稀少、失學青年日多，故積極倡議復校，但囿於法令，先設「東吳補習學校」，一九
五四年核准恢復大學（在台第一所私立大學），一九五八年完成龍惠堂，遷入外雙溪新址，而後

一系一所的增加、一樓一舍的完成，其中教會、董事會的努力功不可沒，而各地校友（舊學生活動中心，左右兩側為「港友廳」、「台友廳」就是一例）及復校後的前二十年全校教、職員工胼手胝足、無私無我（薪資不及公立、沒有任何年節獎金……）的奉獻精神，在有限的經費與人力下，以一元當十元，一人當十人，使我們克服了不及公立大學人事經費的七分之一暨無寬廣無邊的校園等實際問題，以上下一體、將士用命、團結和諧，養成一屆又一屆的校友們，以堅毅的精神屹立於國家、社會、企業的人才行列之中。就如端木愷校長常惕勉同學們的：「努力用功，創造自己成爲有『被利用』價值的人。」而「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不只是一句校訓，亦充分印證在艱難的創校、復校史上，更是我東吳人力行實踐「人統」——尊德性、淬煉成有價值的人之一項明證。

東吳大學成立於一九〇〇年，那是一個烽火連天，半個國家陷於不理性的義和團之亂的年度，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全國或囿於盲目地排外、或陷入瘋狂地媚外的格局之中。在這種氛圍下，東吳「學統」如何定位與立足？吾人試看合併蘇州宮巷、博習、上海中西三書院成爲東吳大學的院名已可見立校「學統」之大概，再看早年校歌中所述「中西文藝、並蓄兼輸、國運待昭蘇」，以及台灣復校後譜上的新詞：「德智兼修、中西融貫、救世育賢良」這些語詞，透顯出理性、睿智與恢宏兼容並蓄的學術傳統。

理性、多元的學風奠其基，嚴謹、認真的辦學步其後，石超庸校長站在望星橋旁，以關

愛的眼神，注視著晨曦中同學們的種種，並經常糾正「男不著奇裝，女不帶耳環」，這是五十年代學長們津津樂道的「樸實」學風之傳統，而嚴格出席考勤的堂堂「點名制度」，恐怕是八十年代以前東吳學子求學時的夢魘與畢業後的懷念……以理性為導引，東吳學風不偏執，更不曲學阿世，以嚴謹為態度，亦是造就——負責、客觀的東吳「學統」的重要法門。

至於「事統」呢？就以至今仍常魂牽夢縈的大學四年社團生活以及回母校最初四年的課外組主任的那一段忙碌的、得失參半的，但更是無怨無悔的往事加以記述。

大一時，同學們曾到王寵惠董事長及石校長墓園，那一片紅磚、白石的空地辦慶生，沒有陰森、恐怖，只有肅穆、慈祥的景緻與感覺，那種「生」與「死」的聯想與感受，就因校園小，場地受限後的另一番奇緣與收穫吧！大二時，童軍團以星象、指南針在天色茫茫的秋夜，追蹤於「人民公社」、「湧泉寺」、「鄭成功廟」等礦場山徑一帶。還有那披荆斬棘、「開山路、涉溪谷」的二路拓荒，越過「八三〇高地」、會合於擎天崗麓的考驗活動。大三時，帶領臨溪社區幼童軍、幼女童軍於「儷人谷」（今明德樂園）露營時，社區家長扛西瓜上山慰勞的景象，歷歷如繪。

六十年代家居中、南部的學長們，應猶記得一件盛事，當咱們一起辦寒、暑假返鄉「火車」專車的盛況，那整列火車載著剛奮戰（期未考）過的東吳人，奔馳於美麗的台灣西部的高山、原野、海岸邊的景象，車上的橋牌大戰、民歌歡唱、以及站台下車濃濃的「惜別與珍

重」之情，迥異於今日來去匆匆的冷漠月台。東吳社團人，我們有太多太多成串成串的回憶……

我們有持續逾三十年對孤兒院院童輔導、服務工作的幼幼社。

我們有連續二十多年到偏遠的花蓮卓溪鄉的山地服務隊。

我們對鄰近的社區關懷亦從不落人後，社會系、社工系的「臨溪社區」等全面性的社區服務工作，溪城奮進童軍團對幼童軍、幼女童軍的反哺工作，各類社團輔導高中、國中、國小的聯課活動亦有了二十多年光陰，累積豐碩種種的成果，已成今日歷史系師生寶貴的「口述歷史」研究之題材。

法律服務社義務的法律諮詢，不知亦協助了多少茫然困惑、無助的小市民，並到全省各縣市走透透出訪服務逾二十次。

當然我們亦有「征服百岳」及大霸尖山五路會師的英勇小山胞。以及歌聲、樂聲飄揚巡迴全島的合唱團、音樂系。國劇社、崑曲社在「國軍英雄館」的戲曲登台。

七十年代，解嚴前後及修訂「大學法」時，我們亦有深具批判但不偏激的「東吳政治」、「時潮」以及今日的「群際動態」等，言論刊物與多元色彩的座談論辯。

全國奧瑞崗式的辯論冠軍，男、女橋藝比賽冠軍。

首創全國社團群育護照，至今已被全國各級教育體系與學校普遍採行，亦是全國首創的

東吳畢業社團人聯誼會。

以及每次全校各類型活動比賽總是來勢洶洶的會計系、暨協助校園餐飲衛生和社區環保的微生物系。

和展現英、德、日風情的外語學院活動及僑生東南亞風情的藝文活動。以及持續已二十年的雙溪文學獎……

這些多姿多采的活動，都已化成一代代東吳人的美好回憶與驕傲，東吳社團人秉持最少資源，展望最大成效，在揉合汗水與淚水中犧牲、奉獻，從「做中學」，更從「學中成長」。我們以「紅與黑」的熱忱與剛毅之校色與精神，化為社團活動的指針。在四十年代以降兩岸對峙、國際低盪迷漫的氛圍下，東吳人不時發出：「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國風、世風之興衰、再繫於校風之振靡」，……時代的狂潮，激盪出頂天立地的社團人之無數豪語。對那情感深處的「蘇州」同源之情，時代性的「滅絕共產暴政、光榮復校蘇州」之語已成過去，取而代之的是章孝慈校長的「一藤兩瓜」的理性、雙贏之交流。

回顧這所洋溢「無私、拼搏」的「人統」與「理性、多元」的「學統」和「務實、活力」的「事統」精神的百年學府，在艱困、質樸的經營中，碩果累累、聲譽卓越。但在未來新世紀的挑戰下，應興應革之事猶多，如何更上一層樓，如何實踐現任校長劉源俊先生的「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的反思與魄力之意，將是我東吳人新世紀的共同願景。

謝政諭，東吳大學社會系六十八級畢業，政治大學法學碩士、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人。七十三年回母校服務迄今。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兼發展處處長。

偶然續前緣——話東吳理學院在台灣的生與長

劉源俊

當年東吳大學在蘇州創立時，本是一文理學院；由於有好些位理科的教授，特別重視自然科學的教育。民國六年，東吳頒授我國第一位化學碩士，民國八年又頒授第一位生物學碩士。東吳的生物學，特別是清水生物學，在大陸時期居於全國領先的地位，培育出許多人才。這一段輝煌歷史，由於後來東吳在台復校初期是以文、法、商科見長，漸漸被人淡忘。

東吳籌備復校時，曾向「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CB）請求支援，當時未能獲得任何經費資助，卻仍胼手胝足先設補習學校，後於民國四十三年正式在台復校，最初僅設五個學系（兩年後增為六個學系），教育部只准用「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名義。

民國五十一年，端木愷董事在董事會就有增設數學系並申請恢復「東吳大學」建制之議，但後來因故中止。由於當時「大學規程」規定大學至少須有三個學院，而每個學院又至少須有三個學系，因此應該增設那些學系，又如何組成學院，曾有見仁見智的討論。在法學

院（包括法律、政治、經濟三學系）之外，董事會中曾提到商學院、文理學院、文學院及理工學院等。

實際的發展則是，民國五十七學年起將當時的八個學系分屬文、法、商三個學院，五十八學年則新設數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及外國語文學系合為文理學院，於是才獲准恢復大學名義。

就在這一段努力恢復大學建制的期間，石超庸院長猝逝，桂崇基先生接任一年後又辭職，校友們於是徵召六十六歲的端木愷先生接任校長。端木校長甫接任，猛然發現，數學系的部定必修科目包括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都需要做實驗，要花不少錢設立實驗室。既然花錢不可免，乾脆再接再厲，向教育部申請增設物理、化學兩系，合併數學系成立理學院！於是理學院就這麼在民國五十九年成立；理學院確實是端木校長促成的，其背後卻隱含了東吳當年在大陸有蜚聲國內的理學院這一前緣。

理學院成立時先天不足：沒有房舍——物理、化學兩實驗室暫時利用今哲生樓的一樓；缺乏師資——三系的主任都是兼任。而理學院的院長則由端木校長約請他的老友，專長本是電機，做過第一任交大電子研究所所長的李熙謀先生擔任——在端木校長的觀念裡，理、工自是一家。端木校長又積極籌畫為理學院興建一個「科學館」。建築費三千餘萬元，當時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端木校長努力獲得「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的部分資助；也是在

這時，「聯董會」才重新「發現」他們所遺棄的「孤兒」已經站起來了。落成後的大樓命名爲超庸館，以紀念故石超庸校長。

這就要說說我和東吳結緣的經過。民國六十年春，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風雨飄搖，我決定要在翌年學成後即回國服務，而且到需要人才的地方去；但國立大學以國科會的「客座」副教授辦法吸引學人歸國，我又不能認同。正躊躇間，一日忽看到《海外學人》月刊「讀者來函」欄上，李熙謀先生答辯「讀者質疑時提到「東吳大學有充實理學院師資計劃」云云。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東吳大學位在何地，也不知道東吳理學院裡有沒有物理學系，更不知道李熙謀先生與東吳理學院的關係。後來才打聽得校長是名律師端木愷先生。十月間修書端木校長自薦，表示願意長期回國在物理系服務。端木校長的回信很快，言辭懇切；我與東吳的緣份就這麼結上了。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我到東吳任教，當時超庸館正在規劃，與助教們同擠在現今德文系辦公室；專任教師除我這一位副教授外，另有一位講師。翌年，那位講師辭去，新來兩位講師；再過一年，兩位講師之一又辭去，新換一位講師；又兩年，兩位講師再辭去，張澤祐及陳國鎮兩兄加入，師資才逐漸穩定下來。民國六十二年春，超庸館落成，至今猶記得當時與即將畢業的學生們一同將實驗室儀器搬進新館的情景。

我任教初期，物理學界正逢不景氣，而學校資源不夠，學生又對出路徬徨，也曾經思考

過，在東吳教物理的意義何在？但不久我就獲得結論：第一、東吳本是沒有辦理學院的條件的，但既然辦了，有學生，就需要好好教。第二、物理學作爲一門大學的專攻是很好的訓練；有了基礎物理的訓練，將來可以走的路子非常寬廣。我有幸在第一屆物理系學生升大三時帶他們，至今倏然已廿七年。以第一屆畢業生發展爲例，有八位獲得博士，在國內外各研究機構或大學服務，有一位綜合高中的校長，一位國大代表，好多位在電子工業或商業界服務或創業，都卓然有成。後來我把《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語改爲「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作爲從事教育的原則，其靈感當來自這多年來的體會。

回想當年，數學、物理、化學三個系的師資都很不穩定，我曾經粗略計算過早年來到東吳理學院任教又離去的博士，少說有三十人之多。辦學之不易，可見一斑。民國六十三年，李熙謀院長逝世，端木校長請擔任數學系主任的數學教育家鄧靜華教授繼任院長。民國六十六年，鄧靜華教授退休，由於人才缺乏，由我接任理學院院長，仍兼物理學系主任。

到了六十八年秋，端木校長有天突然召見，說大家多知道東吳法學院好，但不知東吳理學院當年在大陸上更出名，而生物系尤好。又說東吳想恢復生物系久矣，但教育部總以生物系學生出路不佳爲由不支持；而現在施啓揚先生擔任次長，已溝通過，應該會同意東吳設一與生物有關之學系。於是交代我一個任務，要寫個申請案，必須與生物有關，但不是生物學系。這真是個難題！我自己想到環境科學系或是個選擇，因爲當時大家開始重視環境科學，

卻還沒有大學設立這樣的學系。於是找曾惠中兄商量，他過兩天來告訴我，環境科學系很難辦，但極力遊說我成立一個微生物學系，說：生物界其實是三分天下——動物、植物、微生物，而台大有動物學系、植物學系，只有醫學院有微生物研究所；又說微生物學系所需要的投資比生物學系小多了，又可以與化學系合作；又說微生物的研究是未來生命科學的重要項目。於是請教端木校長，他持肯定態度（當時陳尚球先生仍是董事，他就是研究微生物的東吳校友）。但我仍猶豫不決，於是做了環境科學與微生物兩個案子，請端木校長挑一個；誰知端木校長把兩個案子都報到教育部，請教育部去裁奪。

六十九年年初，教育部消息到來，居然會議上通過的是「生物學系」。我立即見端木校長說，不行，以東吳的資源，是不可能辦好生物學系的，只能辦微生物學系；端木校長說，核准了就好，是什麼學系都可以。又見張培揚教務長，他說：「微生物太小了吧！」我只好徵得端木校長的同意，直接打電話給當時的高教司長楊冠政先生，向他分析說：第一，我們沒有申請生物學系，教育部不應該核准生物學系；第二，我們辦不來生物學系。楊司長的專長正是生物學，擔任過師大理學院院長，當然聽得進我的話。到元月廿九日，公文下來，教育部核准的是「微生物學系」。於是著手籌備，終於在六十九學年度開創了台灣迄今唯一的一所微生物學系。記得當時韋仲公秘書說：理學院現在有四條腿，好走路了！

民國七十二年，楊其銑先生接任校長，請我兼教務長，正逢教育部要在七十三學年度全

面推行「通識教育選修科目」；這是一項挑戰。心想，有那些科目是值得開設，而又是好的通識科目呢？除了安排「音樂與文化」、「中國藝術欣賞」與「西方文化與現代世界」這類具特色的科目外，特別想到本校社會學系、英文學系及學生輔導中心有好幾位專長心理學的教師，何不多開些心理學的課呢？於是邀蔡明哲兄共同組「心理學教學小組」，推動並安排好些心理學科目，廣受學生的歡迎。

後來我在行政會議提案仿照台灣大學在理學院成立心理學系，認為這是一個完整大學應該設有的學系；終在理學院鍾金湯院長的熱心推動下，學校提出了心理學系的申請。教育部在民國七十七年核准成立，楊校長並決定自七十八年開始招生。

回顧理學院諸學系的成立，各有其偶然因素，也都有其潛在的脈絡。如今理學院即將屆滿三十年，欣逢建校百年，緬懷過去，當知要策勵未來。目前理學院已相當完整，將來如果要再充實，地球科學系或是一努力的方向。

劉源俊，東吳大學現任校長。台大物理系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博士，歷任東吳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教務長等職。在美留學時參與發起創辦《科學月刊》，歷任《科學月刊》總編輯、社長、理事長等職。對高等教育與一般教育的改革多有關注，經常發表教育改革、科學教育、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等文章，散見於各報章。

東吳與我

王紹培

我與東吳之關係既久又深，可分幾個階段來說：

一、初中時期

民二十五年我考入東吳初中一年級，六姊重華就讀景海師範，兩個學校在蘇州天賜莊遙遙相對，都是衛理公會創辦的學校。大學校長楊永清先生，其子益彰高我一班，後去美國就學。中學部主任孫蘊樸先生，長子朔蕙兄陸軍官校畢業，現在台灣。英文老師江美貞先生，衛理公會江長川會督女公子，其堂妹江惠貞先生教數理。體育主任王守方先生，來台後任教師範大學，助理兼童軍教練蕭宣先生，曾任教羅東中學多年。猶記得入學第一日，校門管理員居然能識別中學住宿生，禁出校門，極為驚佩。回想當年大、中學同學不過數百人，憑照片認人，應非難事，如學生上萬則不可能也。當時家姊與我每天坐家中包車上學，校方認為中學生男女合乘，有礙觀瞻，責令我於下學年起必須住讀。正為能享受校園生活高興，不意

抗日戰爭爆發，學校避遷上海租界內，借西藏路慕爾堂上課，以至畢業。

初中一年在蘇州，值得紀念的是能有機會去南京參加全國第二次童軍大露營，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過團體生活，非常興奮。我擔任打小鼓，吹喇叭的是兩位學長，其中一位吳祖禹兄，曾任我國駐外大使，現退休在美。另一位別號「排骨」，本名反不記得。尚有沈曾華兄打大鼓，幾十年不見，近況不明。當年學校體育風氣極盛，東吳有游泳池、體育館、田徑場，數百同學使用，極為方便。而大學學長中有程金冠者為國內短跑名將，曾代表中國出席柏林世運，回來後告訴大家，他跑到終點，後面還有一位。大家問誰？他說是發令員。與他一起練跑的是王國楨兄，來台後任職台灣銀行。

二、大學時期

初中畢業，家長鼓勵考入南洋模範中學，希望日後進交通大學讀理工。民三十一年因個人志趣想讀法律，仍考入東吳法律系，家姊重華高我一班，再度每日一起上學。是時東吳文理學院暫設南京路大陸商場，法學院則借南陽路愛國女中校舍，於每日下午三時半以後上課。法學院仍如過去，係獨立作業，教務長初為費青先生，費先生去重慶後，由鄂森先生代理。除法律系外，另設有會計系，系主任安紹芸先生。

法律系因法學院原設在上海崑山路，遷入租界後，教授陣容仍極堅強，多為一時之選，

例如：

民法——張正學先生、曹傑先生、瞿曾澤先生。

刑法——俞承修先生。

憲法——吳芷芳先生。

英美法——劉世芳先生、姚啓型先生、艾國藩先生、呂光先生、鄂森先生等。

其中曹傑先生，係專任，幾乎全部時間都在校，對民法熟到無所不通，學生問他任何民法問題，必能獲得滿意答復。瞿曾澤先生曾在浙江高等法院任職，據說幾乎步不出法院大門，志節高尚，值得欽佩。俞承修先生所著《刑法總則》及《刑法分則》，每個大學都採用，極有權威性。

英美法教授中，姚啓型先生授「契約法」等課程，講解最爲清楚，對案例亦極熟悉。姚先生來台後曾任律師數年，即轉往美國聖安東尼天主教大學任教。於六十五歲退休後，校方堅留繼續授課，因姚先生幾乎任何一課均能教，任何一位教授請假，姚先生即可取而代之，對學校幫助極大。數年前姚先生視力衰退，不再教課。十餘年前曾往聖安東尼與姚先生夫婦歡聚一次，以後每年去美，只能藉電話請安。今年通話時，得悉前幾日姚先生跌交受傷臥病在床。姚先生已年逾九十，我們祝他福壽康甯。

此外，吳芷芳先生講授「政治學」及「比較憲法」，吳先生後曾出任廈門大學文學院

長，八十年回上海，專程往謁請安，除失明外，頭腦仍甚清楚。

艾國藩先生講授「國際公法」，家中藏書豐富，一部分可能係他人寄存。艾先生任職瑞士總領事館，據說曾以此為掩護，替政府做地下工作。他的住處同學常去，隨意談論，成為課外交際場所。

劉世芳先生講授「法律哲學」與「法理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曾留學德國，討了一位德國太太。眼睛高度近視，鏡片厚如瓶底。學問根底深厚，戰後曾出任國際法庭法官，審判戰犯。來台小住後，移民美國。

鄂森先生講授「英美刑法」，鄂先生係上海名律師，律務甚忙，能抽時間出力辦東吳法學院，功不可沒。呂光先生授「侵權行為」，後改由阮潤桓先生接替，我無緣受教。此外，王遂徵先生講授「羅馬法」及「法文」。抗戰勝利後，查良鑑先生曾返校授「國際私法」。

一般課程中，王佩錚先生教「國文」，對中國古籍均能背誦如流，此類人才當時已鳳毛麟角。「英文」有張中楹先生，記得將英文三字經，譯成中國古書中「天厭之」三字，對仗工整，永不能忘。倪徵燠先生之夫人張韻桐博士亦曾授「英文」一年。

在國難期間，學校與學生關係極為融洽，凡事均可商量而行，試舉其中較為重要者兩項為例：

(甲) 本班同學，熱中讀書，曾商請學校於暑期內增開原不講授之課程，如「比較憲

法」，請吳芷芳先生講授，一切費用均由同學分擔。因此，四年畢業時共修學分達兩百零四個之多。幾年前接到在校同學來信，希望少修幾門課，早一年畢業，今昔同學的想法大不相同。

(乙) 避難租界，同學中有經濟情況較差者，於註冊時均由我們（用什麼名義已不記得，當時並無學生會之組織，可能幾位同學出面而已）商得校方同意，於繳費單上加蓋保證印章後，即可先行註冊上課。以後我們與學校結賬，分頭設法歸墊，或由同學延後付清，未造成任何呆賬。

當年侷處租界內，借用愛國女中，每天她們下課後，我們才能上課，幾無課外活動可言。學校有一個「天井」（水泥地，不能稱之為操場），課後可打排球。記得東吳男同學組隊應戰愛國女中隊，三比〇大敗，實在慚愧。而本校女子排球隊，隊長奚敏同學，由男同學擔任幹事跑腿，去青年會練球，還有女同學穿高跟鞋，不帶球鞋，如何打得出色績。

我們入學時，一班同學七十多人，畢業時不到二十人。畢業當天尚有一位同學因一門未過，無法參加典禮。究其原因，主要在英美法課程全部用英文課本，教授用英文講授，當時同學中有英文程度欠佳者，難以適應。記得二年級艾國藩先生授「國際公法」，用 Dickenson 原著，有千餘頁，該書用字深奧，文句長者佔有一頁以上，看了後面，忘記前面，甚難抓住主旨。每週要求同學看幾十頁，據知有一位同學（孟子後代），每天讀到深更半夜，生字尚未

能全部查完，期末考試僅得十分。轉學至另一所大學，用中文重修「國際公法」，全班第一，九十五分。這種情形，雖由於同學英文程度一般偏低，但用外國文字讀法律甚為不易，亦屬事實。二年級淘汰幾乎一半，三年級「契約法」，四年級「英美普通法訴訟程序」，「平衡法」幾門功課再淘汰一部分，所剩不多。英美學制，法學院與醫學院同，必須大學畢業後方能投考，我國學制不同，高中畢業即可考入法律系。但本班同學為以後出國進修方便起見，有在其他大學先得到學位者，如王以德係聖約翰大學畢業，王毓驊係滬江大學畢業，本人則在復旦政治系畢業。後來王以德在母校任教短期後，赴美獲得哈佛法學碩士，耶魯法理學博士，中英文及法學修養均佳，曾來台在法律研究所任教，終因家庭關係，移民加拿大。王毓驊與居同匱去印地安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歸國，文革時代均被迫改業，改革後王毓驊重回南京大學任教，現已退休。居同匱出任律師，承辦涉外業務，曾去美國幾次，現因年齡關係，回到上海退休。王重石來台後任職美國大使館，旋由本人介紹參加理律法律事務所，於兩位李先生去世後，出任事務所負責人，不幸十餘年前去世。楊昌烈初任職物資局，旋自營對外貿易，極有成就，現移民加拿大，每年仍回國一、二次。一起來台的除王重石、楊昌烈外，尚有查逸崑，獻身教會，離台後未有聯繫。在美國紐約的有田耕堯（文南），常有連絡。

民國八十五年，本班畢業五十年，很久前大家約好，於四月二十日在上海集合慶祝。原

擬於四月十九日上午飛香港轉上海，不意到機場後，因氣候關係，班機停飛，心中焦急萬分。經洽中華航空，於下午天氣轉好後，趕往香港，因已無去上海的班機，只好在機場旅館住一晚，次晨飛上海，下機後趕往八仙橋青年會聚餐暢叙。次日大部份同學去蘇州母校參觀。我應邀前往作專題演講，聽講者有王毓驊與袁鑑等。袁鑑遠自西康趕來，一別數月後，不意竟接其公子來信，已因病去世，不勝悲惜。是日參加聚會者，除王毓驊與袁鑑外，尚有郭俊華（已移民美國紐約）、陳忠法、崔璧君、何鶴年、顧新奎、徐家康、楊昌烈、田文南、居同匱、武殿彪及本人。王以德在加拿大，徐嘉璋在濟南，因故未參加。後分別去加拿大、倫敦及濟南見到二位。汪樹榮在南京，當時未聯絡到，後去南京曾約王毓驊與他同遊一日。

三、教書時期

民國四十四年呂光先生囑回校講授英美票據法，最初為必修科，因分數較嚴，影響同學畢業，很傷感情，乃商請呂光先生改為選修。結果下一學年發現很少同學願意選修，呂先生以近乎「拉夫」的方式，勉強湊成一班。以後學校決定改在研究所講授，當經決定以寫報告代替考試，報告不過關，均經詳細修正說明發回重寫，雖費時費力較多，但對個人與同學均有幫助，乃欣然為之。民國六十八年，研究所所長梁鑿立教授因病請假，端木校長囑我代理，梁先生去世後，即辭去他職，專任所長。七十八年李模兄辭去公職，經商請接任研究所

所長，本人仍兼任教職。民國七十九年內人因病住院，個人無法專心授課，乃辭去教職。任內貢獻甚少，乏善可陳，但師生感情融洽，值得安慰。

四、校友會時期

接替徐傑學長出任台北市東吳大學校友會會長，時間已記不清楚，在任內除定期召開年會及聚餐外，並曾全力發動校友及向外募捐協助母校完成中正圖書館及城中區第二大樓之興建。在第二大樓落成典禮中曾致詞：「慶祝第二大樓落成，我們要著眼取得旁邊那塊土地」。會後有人認為該地價值過高，恐難成爲事實。後來政府將總統府四周土地禁止做爲工商用途，承地主國泰人壽蔡董事長萬霖（本校校董）慨允照公告地價讓與本校，價款分十五年分期清償，全體校董（包括楊董事長亮功先生）連保。今日城區部成爲沿貴陽街的校區，與過去自延平南路小巷內進入，氣勢迥然不同，亦因此有土地可建第五大樓，值得慶幸。七十六年秋因出任董事長職務，校友會改選陸潤康兄接任會長。

五、董事會時期

擔任校董多年，七十六年端木鑄秋先生逝世，改選本人接替董事長至今。接任後，嚴格遵守董事會不干預學校行政之規定，校務由校長主持推動，董事會則依照規定僅負責：一、

選任校長，二、審核學校預決算，三、其他重大事項之決定。八十年楊校長因健康關係請辭，經懇切慰留，希望假以時日，培植繼任人選。二年後楊校長告以醫生認為如繼續擔任頗重之校長工作，隨時可能發生狀況。事既如此，乃提報董事會，通過由章副校長孝慈接任。章校長年富力壯，原以為當可長期主持校務，使學校穩定發展。出於大家意料之外，章校長在訪問北大期間忽然發病，經接運返台入院長期治療，終於不起。八十四年董事會決定，請蔡教務長仲平代理校長職務，並依大學法規定，遴選校長。遴選過程極為順利，校內未發生任何不妥之競選活動，遴選委員會由朱前部長匯森先生擔任召集人，選出二位人選後，提報董事會通過由劉源俊教授出任，報教育部核備後發布。

我與東吳的關係概括而言，六十三年前入初中，五十三年前法律系畢業，教書三十五年，承乏校友會職務二十餘年，擔任董事二十餘年。稱之謂既長又深，應不為過。

王紹堉，東吳大學法律系三十五年級，國立復旦大學政治系，美國財務學校畢業，美國貝克大學榮譽法學博士。歷任本校法研所教授、所長，菸酒公賣局局長，財政部次長，中財會副主任委員，台灣苯乙稀工業公司董事長。現任東吳大學董事長、銘傳大學董事長、復旦中學董事長及中美和石油化學公司董事長。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易旗，
一切都有了變化。在學術研究
方面的重大改變之一，是
遷除了和校制度。一九五
一年，正當江蘇省政府
政當局將東吳大學校務
有並籌辦江蘇師範學院
時候，也正是東吳大學
在台北為歐漢波校長
祭走的時候。



坎坷與榮耀

本書由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曼娟主編，邀請國內政、商、文學、教育界著名的東吳人以散文的方式，為東吳的百年作紀錄，藉以展現東吳的世紀風華，以顯東吳人不忘母校的培育，更肩負起服務國家社會的重任。在在證明「今日我以東吳為榮，明日東吳以我為榮」。

全書分五部分，為掌燈擺渡的師者、璀璨的文學光澤、流轉的社團風景、宜晴宜雨來時路及風物樣貌更迭等，共計五十餘篇。

ISBN 957-586-855-2



9 789575 868550